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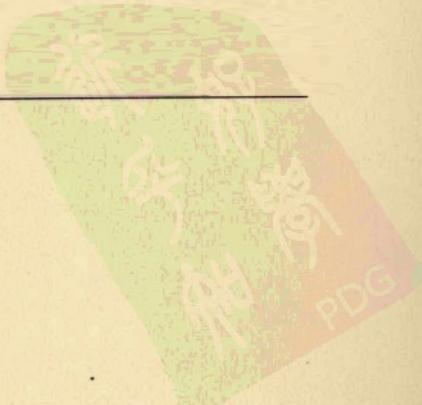
下

金大陆著



FEICHANGYUZHENGCHANG
SHANGHAIWENGESHIQIDE
SHEHUI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金大陆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4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ISBN 978 - 7 - 5326 - 3284 - 8

I. ①非… II. ①金… III. ①社会生活—研究—上海市—1966~1976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1085 号

责任编辑 余 岚
封面设计 姜 明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56 插页 4 字数 676 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284 - 8/K · 769
定价: 8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2431119

PDG

目 录

第十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生产和供应	1
一、一般情况与特别方面	1
二、“菜农不吃商品粮”	8
三、郊菜、客菜与价格	15
四、供应与服务	25
五、两条波动线	36
附一：上海“文革”时期菜场、批发机构及其包装、运输等 情况	45
附二：上海“文革”时期蔬菜加工业及其供销	48
 第十一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粮油供应	
——兼论“国家管理”的“在位”	53
一、上海的粮油市场	53
二、口粮、口油与票证管理	61
三、粮价、油价及其议价销售	69
四、粮食管理的两项举措	72
五、“国家管理”的“在位”	78
附一：粮库、粮店与粮食保护	93
附二：上海“文革”期间其他副食品供应情况	97

附三：上海市打击投机倒把总指挥部《打击投机倒把简报》

第一、二、六期	118
---------	-----

第十二章 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

——以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为个案	122
一、传媒话题的舛误与厘正	122
二、三项持续性的保证	126
三、记忆建构时的史实假托与价值取舍	141
附：上海“文革”时期的禽蛋供应	149

第十三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水产品生产和供应 157

一、资源与资源链的断裂	157
二、供应与票证	165
三、供应与价格	169
四、简短的结论	173

第十四章 像章“问题” 176

一、非常的时尚与收藏	176
二、交换场所的背后	180
三、整肃活动	183
四、所谓“拘留者”	187
五、部队与地方	189
六、从高潮到消歇	191

第十五章 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 198

一、一尊毛泽东不锈钢胸像	198
二、两尊毛泽东金属立像	200

三、第一尊校园塑像	203
四、其他的塑像	206
五、荒诞与失当	212
附：来自北京的消息	221
 第十六章 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229	
一、四类报刊	229
二、第一类报刊与第二类报刊的沟通	234
三、对第二类报刊的整顿	235
四、对第三类报刊的整肃	242
五、对第四类报刊的查处	249
附表：	
表一 上海“文革”运动中主要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	256
表二 上海“文革”运动中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主办的 报刊(铅印版)	262
表三 上海“文革”运动中各系统、单位群众组织主办的 报刊(铅印版)	269
表四 上海“文革”运动中外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在 沪主办的报刊(铅印版)	285
附一：披露一条史料	291
附二：一点佐证	294
 第十七章 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宣传品” 296	
一、从传单到可供买卖的“宣传品”	296
二、制止与反制止	299
三、一份调查报告	303
四、“政治影响”与“经济得失”的博弈	307

附一：关于《红卫东》刊和八种批判资料发行销售情况的 调查报告	312
附二：关于上海大批判资料的情况	316
附三：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文革”资料出售情况(1968年 4月22日—12月23日)	319
附四：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通讯录(1967年11月)	322
附五：“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收藏图书馆类 资料的整理和说明	324
附六：“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交换资料中的 印章汇编	341

**第十八章 “深挖洞”——以上海1969年至1978年的
 人防工程为中心** 357

一、缘由与背景	357
二、“深挖洞”的三个阶段	360
三、人力、物力与财力	370
四、演习记录	378
五、一条弯曲之道	388

附：上海“深挖洞”运动期间人口疏散情况(1969年至
 1974年)

398

**第十九章 “野营拉练”——以上海1970年至1974年的
 “野营拉练”为例** 400

一、野营拉练的缘起	400
二、高潮与高潮的退落	403
三、不同的拉练队伍	408
四、回答三个问题	420

附：《野营进行曲》两首	428
第二十章 题旨和结论.....	429
一、“文革”研究的“两个支点”	430
二、“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	432
三、“文革”研究的“两个向度”	437
四、“文革”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范式”.....	440
五、“文革”社会史研究的昭示和价值.....	445
后记 心心念念.....	450

第十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生产和供应

一、一般情况与特别方面

根据上海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状况(市区常住人口共五六百万),这座城市每天需要供应 500 多万斤蔬菜(合 2 500 吨),如果以火车运力计算的话,大致需要 100 多个车皮,可联结一里多长。如此数量的蔬菜供应和消费,主要依靠市郊菜农长年累月的生产,以保证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城市的正常运作。

按照时令,上海年度蔬菜生产分“三播”,即春播、秋播和冬播,^[1]且受气候影响甚大。上海四季分明,适宜作物生长,但夏季常有暴雨(降水过多,易遭明涝暗渍灾害)和高温(日照强烈,易引起茄果类蔬菜灼果),如 1971 年 6 月 26 日至 8 月上旬,上海持续高温干旱 40 多天,其中 35℃以上多达 17 天,引起红蜘蛛大暴发。接着,8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总雨量又多达 370 毫米以上,造成蔬菜大缺;冬季则常有寒潮(最低气温连续两天降到 -7℃ 以下,大田蔬菜冻害),如 1967 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上海最低气温降到 -8.2℃ 和 -8.5℃ 以下。1968 年 1 月上旬至 3 月下旬,蔬菜上市量大幅度下

降,缺菜情况严重。^[2]所以,一般年景下,上海 8—10 月称为夏淡季;12 月至翌年 3 月称为冬淡季。

为保障城市供应,市人委于“文革”运动前的 1963 年批转了《关于改进蔬菜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三十五条》),不仅将上海的蔬菜生产面积保持在 18 万亩左右(整个“文革”期间至 80 年代末,上海的菜地面积基本稳定在这个数量上),还调整了郊区菜田的布局,大致分为常年菜田:主要分布在近郊或中郊,交通便利,生产条件良好,有悠久的种菜历史。一般种植生长期短、管理精细的常年品种,并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保证种足种好,不能移作他用。轮作菜田:约有 3 万亩,主要是为了平衡产销,故安排大熟种棉粮,小熟种蔬菜,以减少旺季上市和增加淡季供应。季节性菜田:在棉粮生产空隙栽种一熟蔬菜,如崇明大白菜,嘉定蒜头、葱头等,至 70 年代中期共有菜田 6~7 万亩。^[3]

再据具体的调查和统计,上海“文革”期间共有 52 个种菜的农村人民公社,其中 27 个“以菜为主”,它们分别是所属近郊上海县的新泾(1965 年至 1979 年,有菜田 $8\ 768 \rightarrow 9\ 610$ 习惯亩。下同)、虹桥($11\ 590 \rightarrow 14\ 707$ 习惯亩)、龙华($2\ 644 \rightarrow 2\ 808$ 习惯亩)、梅陇($7\ 275 \rightarrow 7\ 599$ 习惯亩);嘉定县的长征($15\ 063 \rightarrow 14\ 862$ 习惯亩)、桃浦($7\ 273 \rightarrow 8\ 148$ 习惯亩);宝山县的彭浦($9\ 399 \rightarrow 9\ 185$ 习惯亩)、江湾($7\ 468 \rightarrow 7\ 577$ 习惯亩)、五角场($3\ 366 \rightarrow 3\ 570$ 习惯亩);川沙县的杨思($7\ 231 \rightarrow 7\ 332$ 习惯亩)、六里($5\ 943 \rightarrow 6\ 127$ 习惯亩)、严桥($6\ 972 \rightarrow 6\ 988$ 习惯亩)。所属中郊上海县的华漕($3\ 510 \rightarrow 4\ 156$ 习惯亩)、纪王($2\ 830 \rightarrow 2\ 918$ 习惯亩)、七一($4\ 301 \rightarrow 4\ 484$ 习惯亩)、三林($7\ 149 \rightarrow 8\ 072$ 习惯亩);嘉定县的封浜($3\ 600 \rightarrow 3\ 930$ 习惯亩)、江桥($8\ 483 \rightarrow 8\ 883$ 习惯亩);宝山县的庙行($5\ 620 \rightarrow 6\ 157$ 习惯亩)、大场($6\ 826 \rightarrow 7\ 757$ 习惯亩);川沙县的花木($5\ 579 \rightarrow 6\ 552$ 习惯亩)、北蔡

(5 229→6 069 习惯亩)、洋泾(7 326→7 573 习惯亩)。所属远郊嘉定县的黄渡(8 096→8 957 习惯亩);青浦县的白鹤(6 138→6 130 习惯亩)、华新(4 522→4 659 习惯亩)和南汇县的周西(4 120→5 139 习惯亩)等。^[4]由此可见,在整个“文革”期间,除了个别单位如嘉定县长征公社、宝山县彭浦公社的菜地面积有少量缩减外,绝大多数人民公社的菜地面积是有所增扩的,以致到1976年时,郊区计划常年菜田达到18.7万亩。^[5]其实,这正源于上海蔬菜产销主管部门制定的“以销定产,产略大于销”的原则,那就是郊县菜区人民公社必须按照年度生产和上市计划,统筹安排茬口、品种(一般细品种的产量不少于总产量的38%)。为了做到均衡上市,各生产单位交叉配套的播种、收摘计划,甚至要精细到季、月、旬、日。^[6]



上海郊县菜田,毛主席“宝像”摆田中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如果说以上是上海“文革”期间蔬菜生产的一般情况,那么以下三点便是上海“文革”期间蔬菜生产的特别方面。

第一,蔬菜栽培技术有所发展。“文革”前夕,市农业部门为提高蔬菜种植技术,建立了农科院园艺所,并在近郊四个县设立蔬菜技术推广站,开展从国外、外地引进、培育新品种的工作。因此项工作的纯技术性质,且直接关涉蔬菜生产的品质、产量等要素,故在“文革”

期间,非但没有间断,仍有步骤、有规模地持续进行。以番茄为例,1966年川沙农业局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引入“北京早红”品种,成熟早,结果多;1971年宝山江湾公社从浙江农业大学引入“日本大红”;1972年市园艺所又从日本引入“强力米寿”品种。至1973年,市园艺所与宝山彭浦公社合作,采用杂交技术育成红度足、果形大、不开裂、产量较高的浦红1—8号系列番茄。^[7]其他于70年代引进、培育成功的蔬菜品种还有上海县新泾公社耐热、抗病的“揩青冬瓜”;先后在嘉定、宝山、川沙三县获得推广的“丰收白”、“白头翁”马铃薯;早熟、丰产、抗病的“上海黄瓜”以及由川沙县严桥公社试种的茎椰菜;上海县虹桥公社引种的荷兰豆等。与此同时,70年代初上海县新泾公社、川沙县洋泾公社、严桥公社、嘉定县长征公社等采用塑料薄膜覆盖技术,反季节地种植辣椒、番茄、茄子、芹菜、草头、蓬蒿菜等,“使市区工人和居民在严冬也能吃到原来在春季、夏季才能上市的蔬菜”。^[8]另外,蘑菇、香菇等食用菌栽培也于同期在市郊获得推广。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在“文革”动乱的背景下,上海的蔬菜栽培技术怎么还会有平稳的进步呢?这主要是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技术方面的小环境,相对于(或者说假借于)政治动乱的大环境,



上海郊县的蔬菜技术推广站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保持了正常的间隔和独立,得以遵循一条正常的技术发展的路径(此属“非常中的正常”)。而况,蔬菜生产保障着城市供给,城市供给是任何当政者都必须正视的,某种意义上还是衡情度势的权重或标识。同时,“文革”前就建有农科院园艺所、县蔬菜技术推广站等,其构架和职能决定了推进蔬菜栽培技术成为工作之必需。正是这

些因素的集合,促成了上海“文革”时期蔬菜栽培技术的进步,甚至为往后的发展打造了基础。

第二,近郊菜田污染日趋严重。据 60—70 年代的统计,上海全市每天有近万家工厂的 7 000 多根烟囱和市民的 80 余万只煤球炉在排放废气;每天有约 500 万吨的废水直接排入工厂附近的河道。废气在空中形成酸性烟雾或酸雨,下降后造成菜区叶枝枯黄,果菜败落;废水则随潮涌漫溢,污染水体,尤其上海自西向东,有普陀、彭浦、杨浦等工业区,其间的桃浦河、彭越浦、蚂蚁浜、俞泾浦、沈金港、沙泾港、界泓港、随塘河等多南北流向,清水来源少,自然稀释能力低,河水中的有害物质镉、汞、铬、酚等含量远远超过灌溉标准。北新泾、漕河泾、长桥地区的新泾港、蒲汇塘、龙华港及浦东沿江地带的白莲泾等河段水质也因工业排放受到污染。严重的情况是这些污染源恰恰与近郊菜田联结一体,农业的灌溉显然成了工业排放的牺牲。至 70 年代后期,彭浦、桃浦、长征、梅陇、六里、花木等公社都曾发现蔬菜中的有害物质超过含量标准而不允许上市(三林、桃浦等公社曾将高浓度的镉泥当作有机肥试用,结果直接导致这部分菜田不能种植)。据调查,1979 年全市有 10 570 亩菜田受到了中等程度的工业污染,分布在 11 个公社、36 个大队,占全市菜田面积的 5.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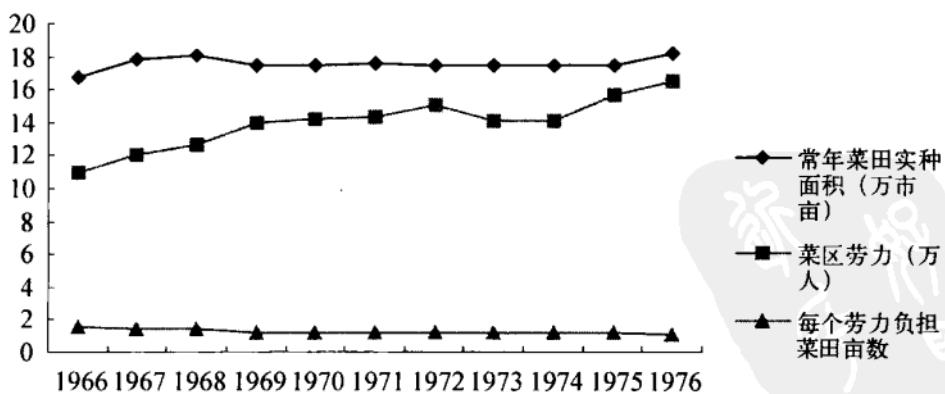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上海的工业污染祸害近郊的蔬菜生产是否起始于“文革”期间?回答是确切的。首先,这是因为解放十七年来(1949—1966),上海的工矿企业曾有较大规模的建设,且多坐落在市郊接合部。其初期的排放到污染祸害的呈现应有一个累积的过程,而这个累积过程的最终构成,大致是在“文革”期间。其次,因上海“文革”运动未曾发生两大派的“军械性”武斗,上海“文革”时期的工业生产亦基本未曾中断,尤其在“抓革命,促生产”及各类政治口号的鼓动下,甚至还会传来频频的“捷报”。然而,当时的工业生产未曾处

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监督之下,工业排放非但得不到有效治理,反而速度加快,程度加深,直至侵害近郊大片的菜田。与工业区相邻的嘉定县桃浦、长征;宝山县彭浦、江湾、五角场等菜区公社率先遭遇污染就是例证。当然,此处的结论不是说上海菜区的污染是由“文革”直接导致的,而是说多种因素的集合效应恰恰在“文革”时期呈现了,爆发了。

第三,“种菜人与路线图”。先看表一的曲线走势:上海 1966 年至 1976 年常年菜田的实种面积(平均 17.6 万市亩),基本处于稳定的状态,尤其 1969 年至 1975 年间甚至没有变化。菜区劳力人数从 1966 年的 11 万人,到 1972 年的 15.1 万人,再到 1976 年的 16.5 万人,逐步走高;而每个劳力负担菜田的亩数,从 1966 年的 1.53 亩到 1976 年的 1.10 亩,则逐渐缩小。这三组数据的比对,说明上海的种菜人在积年累月的辛劳中,也面临着劳力与田地的矛盾,投入与产出的压力。

表一

1966—1976 年市郊菜区蔬菜面积、劳力情况表



资料来源:《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7—108 页。

如果说这种矛盾和压力是上海郊区蔬菜生产本身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状态,那么,“文革”运动的政治路线,特别表现在“批林批孔”

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期,所谓“抵制资本主义倾向”、“抵制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等,确实干扰了正常的蔬菜生产。据报载:1974年8月,宝山县五角场公社一生产队多种了4亩产值高的花菜,公社党委立即组织社员批判“看价种菜”、“看价上市”,提出“不在价格上打主意,要在增产上下苦功”,硬生生地拔掉了这4亩超种花菜,种上了青菜;^[10]上海县新泾公社程桥大队批判“钞票里翻跟斗”,规定计划的品种,无论产值多高,一亩也不多种;无论产值再低,一亩也不少种。一次,蔬菜公司要求扩种3亩产量高的土豆,少种产值高的番茄(每亩番茄的收入是土豆的三倍)。结果,在已脱季的情况下,程桥大队从外队买来种子,完成增播任务。又一次,蔬菜公司为充淡季,要求程桥二队将17亩冬瓜提前上市。这批冬瓜尚未长足,若按原计划10天后上市,起码可以多收480元。结果,队委召开紧急会议,统一思想,第二天就采摘了两百多担冬瓜送到收购站。^[11]在此,蔬菜生产与市场供应确实处在互为协调、互为制约的关系中,其间既要遵循蔬菜生产的规律(气候、品种、茬口之类);又要顾及市场消费的需求。然而,当下却是政治路线挂帅,大批判决定一切,生产的规律和市场的需求必须符合政治的铨度,其内在的活力和内含的戒律如何才能有效地作用呢?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究竟能从“文革”政治路线统辖下的蔬菜生产背后看到什么?应该承认,在“文革”的语境中,其政治路线具有强力的煽动功能和批判指向,在郊区蔬菜生产方面,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千方百计”,“心往哪里想,劲往哪里使,路走哪一条”等口号就是例证,^[12]以致生产的规律可以违背,供销的秩序可以错乱。但是,同样在这些宣扬性的报道中,依然可以读出“种菜人”的种种坚持和屡屡努力。比如1974年8月,宝山县五角场公社工农大队将20多亩小白菜提前上市,若是再留七八天,浇上一遍水,就可以卖出好

价钱,社员群众中就有人议论“‘菜园’上市太可惜啦”;^[13]同年10月,嘉定县长征公社发生烂菜,有人提议迅速“改变种植计划”,上级组织则开展大批判,坚持“保品种,保面积”。^[14]甚至还有所谓“坏分子大垦十边地,扩大自留地种植玉米、青萝卜,到市区卖高价”而受到批斗等。^[15]没有“倾向”,何来“批判”?正是这些社员群众的“议论”、“提议”乃至行动构成了“倾向”;正是这些“倾向”的反复存在,说明“种菜人”不甘“文革”政治路线的搅扰,凭借多年的经验,孜孜地盼望“种好菜”、“卖好价”。确实,对“种菜人”来说,此中不仅有尊重蔬菜生产规律(“种好菜”),更有尊重蔬菜销售的价值规律(“卖好价”)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在政治路线的压迫下显得怯气而无奈,终究是在顽强地表达,是在持续地出现。

二、“菜农不吃商品粮”

1969年11月19日,《文汇报》头版在毛主席语录“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引下,发表了长篇报道《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和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正式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宁愿多收一百斤粮,不要多赚一百元钱”等口号。接着,12月1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文章《菜农不吃商品粮!》,直接将该口号推向全国,以致产生了“棉农不吃商品粮”、“果农不吃商品粮”、“林农不吃商品粮”、“茶农不吃商品粮”等连锁反应。这一从“生产—经济”领域伸展出来的“政治一路线”的旗帜,因背后有着巨大的权力掌握,因高悬在头顶上哗哗作响,一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

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属上海县梅陇公社(今属闵行区),是以种植蔬菜为主,粮、棉、油作物夹种的生产队。全队24户、118人,耕地107.8亩,^[16]平均每人二分四厘粮田。1969年该队获得农业生产大

丰收，亩产蔬菜 5 250 公斤、皮棉 107.5 公斤、油菜籽 134 公斤、粮食 1 079 公斤，成为上海县农业生产的典型。更为重要的是，全队年粮食总产量 59 108 斤，除去口粮，尚余 1 867 斤，做到了社员口粮自给。^[17]

张春桥注意到牌楼十一队的情况，指示要从“政治高度”将菜农种粮得高产上升为“斗批改的方向”。^[18]为此，徐景贤亲自去牌楼十一队蹲点，亲自审改《文汇报》的报道稿件，并将原来拟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改为社论发表，强调指出：“这件事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19]再据该报道称：去年，牌楼十一队曾少种八分早稻，有人提出多种八分蔬菜可多收入二百多元。多数队委认为这不是八分田之争，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补种了八分早稻。为提高粮食产量，牌楼十一队积肥上万担，每亩粮田施肥 150 担。大忙时节，白天队里将主要劳力放在粮食生产上，部分辅助劳力用来管理蔬菜和棉花，晚上再集中全力抓好蔬菜种植。该队生产队长也发表长篇采访文章（因队长不识字），表示“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因为 1967 年社员口粮自给率达到 80% 以上时，该队队委就提出“常年亩产两千斤，实现口粮自给”，结果“一部分



摘自《支部生活》1970 年第 1 期

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人有抵触情绪”，认为“蔬菜上多浇几担水，多收钞票看得见；水稻田里多开几条沟，起不了多大作用”，多种了粮食，会影响社员收入。有“阶级敌人也乘机活动”，如一地主分子在群众中说：“多种粮食呒啥用，外面好看里厢空”，“种双季稻，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队里便举办学习班，在田头开展大批判，把地主分子“当作活靶子，上挂黑主子，批判经济挂帅”。同时，削平坟山，填河造田，改造低洼地，大搞积肥运动。^[20]第二年，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甚至提出了“三粮”（口粮、种子粮、饲料粮）自给的口号。^[21]



改造低洼地，增加粮田（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当时，包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在内的传媒，开足马力宣传牌楼十一队“菜农不吃商品粮”的事迹，川沙、宝山、嘉定、上海、松江等郊县蔬菜生产社、队纷纷派代表前往学习，纷纷对照反省，主动承认因“头脑中修正主义经济挂帅的流毒没肃清，认为人多地少，种粮食收入少，每年总要在种粮面积上打折扣”等。为此，上海县召开“学习牌楼十一队现场会”，七一公社号上大队率先检讨：今年

早稻少种二亩，中间播种了二熟蔬菜；新泾公社革委会则表态因“重菜轻粮”，认为“种菜钞票多，样样买得到”，直至今年才种了30%左右的双季稻，现在将立即着手修订1970年规划，保证明年粮食三熟制达80%以上；诸翟公社甚至要“争取三熟制达90%以上”。一些粮田面积低于人均二分四厘以下的社队，如川沙县洋泾公社二塘大队表示要大挖潜力，“适当扩大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争取尽快做到粮食自给”。^[22]



漕河泾镇居民向梅陇公社送肥
摘自《解放日报》1970年1月21日

不久，与梅陇公社毗邻的上海县漕河泾镇居民深受感染，喊出了“我们不吃现成饭！”的口号，表示城市居民“虽然没有土地，但是有劳动力，有肥源”，准备开展“百部车、千担肥”的送肥下乡运动。12月18日，漕河泾镇“全镇上下，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八九岁的红小兵；从闲散居民到在职人员，男女老少，人人动手，争先恐后地挖阴沟，扫垃圾”，“几个居委会还联合起来，大战臭水沟，挖掘了大量黑油油的河泥”。当天，“全镇出动一千二百多人，二百多部各种车辆，组成三

里多路长的送肥队伍,浩浩荡荡地将近千担肥料送到梅陇公社”。^[23]为此,《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度赞扬漕河泾镇居民的“送肥支农”是“思想感情的一大变化,是思想上的一场大革命”,并郑重地提请大家“好好地想一想,作为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居民,怎样更好地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观点,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24]

从“送肥支农”到“世界革命”,此间的时空隧道一下子就被打通了。“文革”期间,任何事情都可以这么随意地放射到“政治”的向度;都可以这么随意地牵拉到“革命”的高度,以致它的语言、语气,更重要的是它的思维和表达的方式,很轻易地就可以呈现出喷薄而澎湃的态势。当时,市郊菜农围绕“不吃商品粮”喊出的口号就有:

人有红思想,田有高产量;
地靠人种,人靠毛泽东思想武装;
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
人听毛主席的话,地听人的话,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它;
革命大批判松一松,资本主义思想就要攻一攻;
千变万变,贯彻执行以粮为纲方针不能变;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不能钞票挂帅;
钞票收入少了,为公的思想多了;
站在家门口,心向天安门,眼望全世界,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25]

一场针对“多种粮”与“少种菜”的批判,竟然遣用“千万”、“天大”、“全人类”之类的词句,足见“文革”时期政治口号的呼喊是何等的夸张和张扬,即唯有推向高远,推向极致,才可能尽显其浮游的风



“地靠人种，人靠毛泽东思想武装”，上海嘉定县菜农出工前学习《毛主席语录》（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光和炫耀(可称“海市蜃楼”效应)。何况多是源自基层的议论，不仅说明上层鼓吹的政治氛围对下层民间舆论的主导；更证实当这种民间舆论处于集体无意识的潮流中，其虚拟化、浮泛化的形态；其流行性、公共性的态势，就将决定这种口号只可能放逐，只可能飘扬，而不能降落——因为，降落了就是口号的破碎，就是事实的责罚！

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该口号“挤出近 3 万亩菜田改种粮食，影响了蔬菜上市量”。^[26]

又据《中共上海历史实录》记载，该口号“造成全郊区菜区以粮挤菜，仅 1970 年全市菜田面积就减少 3.7 万亩”。^[27]

再据《中共上海党史大典》记载，该口号“给市郊农业种植，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带来极大的混乱。1970 年全市郊区蔬菜种植面积减少了 5 万亩，占规划面积的 1/4，城市蔬菜供应紧张”。^[28]

最后据《上海蔬菜商业志》的记载：1969 年，上海郊区蔬菜实种面积为 19.8 万亩(习惯亩，下同)；三播(春播、秋播和冬播)合计种植面积为 73.0 万亩。1970 年，该两项统计分别下降至 19.1 万亩和 69.9 万亩。此后，至 1974 年的数年间，该两项统计始终低于 1969 年

的水平。直至 1975 年和 1976 年,蔬菜实种面积增加到 19.7 万亩和 20.3 万亩;三播合计种植面积增加到 74.9 万亩和 79.2 万亩。具体看“文革”时期前五年(1965 年至 1969 年)与后五年(1970 年至 1974 年)的平均菜田面积变化,减少种植面积的大致有上海县的七一(4 301→4 296);嘉定县的长征(15 063→14 693)、封浜(3 600→3 525);宝山县的彭浦(9 399→9 205)、五角场(3 366→3 332)、庙行(5 620→5 544);川沙县的杨思(7 231→7 055)、六里(5 943→5 834)、严桥(6 972→6 561)、洋泾(7 326→7 309)等公社。^[29]

不管采信怎样的统计方式,即不管是减少 3 万亩、3.7 万亩、5 万亩,还是更多或者更少,经历了“菜农不吃商品粮”的折腾后,1969—1970 年度上海郊区蔬菜种植面积有所裁减,并引发了市场供应紧张,应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当这一口号被认作政治路线的标杆,企图在全国树立的时候,其对农业经济的冲犯,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周恩来、李先念的警惕和批评,^[30]以致 1970 年冬天,徐景贤不得不将这场闹剧草草地收场。那天,徐景贤不带秘书和警卫员,特地戴了一只大口罩,一个人乘坐公共汽车来到牌楼十一队,将生产队长拉到仓库里交代:“以后介绍经验不要再提‘菜农不吃商品粮’了,要讲的话,就讲粮菜双丰收。”^[31]

在此,还值得提请注意的是:临近“文革”结束时的 1975 年和 1976 年,上海郊区的蔬菜实种面积确有所增加,且在政治上一改过去的口径,扬言大城市郊区“蔬菜是第一位”,只要种好菜,“粮食减产也不批评”。^[32]何来如此彻底的背弃和改张呢?原来自 70 年代开始,上海引进外地蔬菜层层受阻,淡季供应出现严重困难,只得通过增扩郊区种植面积以求缓解。过去强调“多种粮”,突出“以粮为纲”是政治的需要;现在要求“多种菜”,保障“城市供给”也是政治的需要。在一个非常时期,“经济—生产”的底线可以随意地被“政治—革

命”碰触和篡改,于是,“政治”随“需要”而变幻、而代嬗,“文革”政治简直成了变脸术!

三、郊菜、客菜与价格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8—1963),上海的蔬菜供应实行按人口比例分配。1963年后,为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一般每人每天需要350~400克左右),市人委批转了《关于改进蔬菜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三十五条》),规定蔬菜批发商业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支持生产发展,保证供应和稳定菜价。为此,上海撤销了蔬菜收购点,废止了“区县对口、场队挂钩”的做法,同时扩建了20多个交易市场,^[33]推行“进场交易、计划选购,三员(即生产队运销员、菜场采购员、购销站营业员)见面、议价成交”等行之有效做法。1963年至1965年,本市蔬菜供应数量充足,品种多样,质量新鲜,价格稳定,“为历史上产销良好时期之一”。^[34]

“文革”开始后,《三十五条》被指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蔬菜交易市场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缩影”,尤其在蔬菜购销工作中,全市以杨家桥蔬菜购销站为样板的革命大批判,采取“请进来”(请贫下中农、菜场营业员)、“走出去”(到生产队)、三员“联合批”(共举办“三员”学习班60多期,召开“三员”大批判会30多次,编辑大批判专栏80多期)、“现场批”、“田头批”等方式,批判“自由选购”、“三员议价”,是“菜多假痴假呆,菜少你争我夺”;“进场轧苗头,菜多避风头,菜少摆噱头,作价讲斤头”;“一把算盘一杆秤,客来客去收佣金,秤砣落地无责任”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其实质“是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向,还是搞资本主义自由化;是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是搞以市场为中心,‘流通决定生产’;是用计划调节生产,还是用价格

“调节生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35]于是,自1968年杨家桥蔬菜购销站率先把“进场代销,自由选购”改为“国家收购,计划分配”;把“三员议价”、“讨价还价”改为“国家统一定价”之后,全市蔬菜交易市场全部改为蔬菜购销站,实行生产队定点交售、菜场定点采购、货源按固定比例分配的“三固定”购销形式。

从“交易市场”到“购销站”;从“三员议价”到“三固定”,加强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的管理模式,并不适宜蔬菜生产和蔬菜供销的特点。在生产上,国家包下菜农生产的全部产品,但菜农的生产品种是否对路、是否畅销,与经济利益关系不大,哪来的积极性?在购销上,零售菜场没有进货自主权,批发部门分配多少拿多少,分配什么拿什么,有什么卖什么,又哪来的主动性?尽管生产仍在进行,销售仍在继续,广大的郊区菜农和菜场职工坚守岗位,信守职分,保证了城市的基本供应。然而,许多问题和症结还是可以通过购销、价格等环节透视而出的。

先从购销的环节看:

上海蔬菜来源分为郊菜和客菜。据常年统计,郊菜一般约占总量的91%。^[36]“文革”时期,上海郊菜常年收购量相对稳定在110万吨上下,除去商业加工和提供出口、工业用外,日平均零售销量为2318吨,供应水平为人均393.6克/日。蔬菜销售品种排列前十位的为青菜(含小白菜、鸡毛菜等,占总收购量的42.72%,下同)、卷心菜(7.68%)、番茄(5.96%)、冬瓜(4.27%)、雪菜(3.51%)、菠菜(2.41%)、芹菜(2.40%)、茄子(2.31%)、黄瓜(2.28%)、土豆(2.24%)等,^[37]一般约占总收购量的80%左右,可见此类大众菜不仅直接影响市场供应,还是沪上居民的家常菜。客菜对上海蔬菜市场来说,从数量上是必要的补充,^[38]从品种上是重要的丰富,其中主产于山东、河北的大白菜;黑龙江、内蒙古的土豆;浙江、安徽的竹笋,



市郊菜农送菜忙(徐建刚提供)



郊菜上市

以及江浙水乡的芋艿、水芹、鲜藕等，均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甚至成为饭桌上的时鲜菜。

自 1963 年起，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含“文革”时期），上海市蔬菜公司是将货源按既定比例分配给各区（该分配比例为：黄浦区 10%，南市区 11.7%，卢湾区 8.2%，徐汇区 7.5%，静安区 8.8%，长宁区 6%，普陀区 8.6%，闸北区 9.8%，虹口区 13.1%，杨浦区 13%，吴淞与闵行分别为 2.2% 和 1.1%）；再由各区蔬菜公司按属地各菜场供应人口的多少，确定菜场的进货量。其间，市蔬菜公司曾多次准备依据行政区划和人口增减的变化（市郊部延伸，新建居住区等），对上述比例进行调整，但因蔬菜零售处于长期亏本的状态，调高比例的单位均不接受（直至拖延到 1989 年才作了一次调整）。同时，上海近郊的一些城镇，如龙华、北新泾、真如、大场、江湾、五角场、杨思、洋泾、高桥等城镇居民的蔬菜供应，也列入市蔬菜公司供应范围，但供应原则是“先市区，后城镇，适当妥善安排”。60 年代以来，每年供应市郊城镇居民的蔬菜为 6 万吨上下，多时 7~8 万吨，少时 5 万吨。^[39]综上所述，就总的情况而言，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购销，在基本保证城市生活方面尚属正常，没有出现大的混乱，却也因

自然灾害和政治干扰,造成了以粮挤菜(向蔬菜生产争田地、争劳力、争肥料)、品种减少、茬口错乱、淡旺季矛盾突出、上市大起大落等一系列困难。

现在请看上海“文革”时期蔬菜收购总量表:

1966 年至 1976 年上海蔬菜收购总量表

单位:万吨

年份	郊客菜 总收购量	郊 菜 收 购		客 菜 购 进	
		合 计	占总收购量%	合 计	占总收购量%
1966	115.56	104.47↑	90.4	11.09↑	9.6
1967	120.05	106.80↑	89.0	13.25↑	11.0
1968	133.33	117.55↑	88.2	15.78↑	11.8
1969	108.57	99.97↓	92.1	8.60↓	7.9
1970	120.87	112.80↑	93.3	8.07↓	6.7
1971	130.87	124.90↑	95.4	5.97↓	4.6
1972	140.20	135.61↑	96.7	4.59↓	3.3
1973	108.07	101.80↓	94.2	6.27↑	5.8
1974	121.13	114.73↑	94.7	6.40↑	5.3
1975	108.16	100.40↓	92.8	7.76↑	7.2
1976	130.32	124.46↑	95.5	5.86↓	4.5

资料来源:《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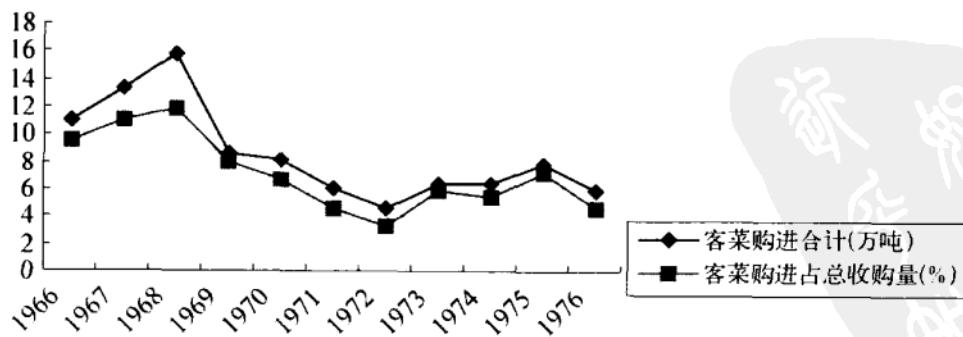
如表所示,因“文革”时期郊菜占总收购量的 92.9%,整座城市的蔬菜供应自然也就取决于郊菜的购销了。于是,检阅此 10 年的郊菜收购量,可见 1966 年至 1968 年为涨势;1969 年为落势;1970 年至 1972 年为涨势;1973 年和 1975 年为落势;1976 年为涨势等,基本呈现较明显的起伏状。这证明由政治大批判引导的计划管理模式,确

实未能有效地调节蔬菜生产,平衡供销矛盾。在此,如果说1969年跌落的原因(也牵连1970年),很大程度是推行“菜农不吃商品粮”,由“粮田挤占菜田”的非常情况导致了供应短缺,那么,1971年和1972年郊菜收购量分别达到124.90万吨和135.61万吨,是否就标志着供销进入了良性循环呢?

答案并非是肯定的。其一,重新实行“场队对口,产销挂钩”后,一些生产队因强调“为革命种菜”(实为追求产量)而少种精细品种,多种粗枝大叶,直接导致蔬菜品质降低。其二,全年收购量高,并不表明已平衡了淡旺矛盾,反而可能导致大批量的蔬菜返销。事实证明,恰恰是1971年和1972年的蔬菜批零返销总量,分别达到19.7万吨和30.2万吨,占当年收购总量的15.8%和22.3%,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蔬菜返销序列表上首当其冲。^[40]反之,1973年至1975年时,为减少返销,压缩保淡面积,计划调节难以跟上丰歉交替和灾害气候的变化,导致全市蔬菜上市量短缺,几乎“每年要有几十天到一百多天日上市量低于2500吨的最低需要,有些日上市量只有500~1000吨”,^[41]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

现在看“文革”时期的客菜购进情况:

1966年至1976年上海客菜购进图



资料来源:《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很明显，“文革”期间上海客菜购进量自 1968 年上升至 15.78 万吨(占总收购量的 11.8%)后，便一路呈现下滑的态势，以致整个 70 年代的客菜调入量平均为 5.24 万吨/年，只占郊客菜总购进量的 4.1%。^[42]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跳荡的变样呢？从经营管理上说，自郊菜采取“三固定”购销模式后，客菜经营体制也高度统一，即采购计划和权限集中掌控在市蔬菜公司手中，各区批发部门成为执行单位而丧失了工作主动性。同时，郊菜“三固定”购销模式所造成的蔬菜上市大幅度起落的结果，也直接影响了、连带了客菜采购计划的落实。当郊菜丰收时，便放弃客地的采购合同，给客地产区以经济的补偿；当郊菜歉收时，则突击采购，甚至不计价格和质量。^[43]这种上下脱节、内外失措的集中统一型管理，既窒息了各方的活力，又丢失了彼此的信誉，甚至扰乱了客地的市场，怎能不节节退落呢。

从政治形势上说，这条下滑的曲线大致可以从蔬菜供应的方面，反映上海与外地关系的走向。那就是“文革”中后期，尤其“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上海的特殊而张展的地位，王、张、姚“上海帮”在中央高位的呼风唤雨等，普遍招致外地群众的反感和抵制(当属江苏最为典型)。况且，这种政治的情绪必然牵涉到工作和生活上来，必然针对蔬菜供应之类的具体需求化为种种的磕碰。1976 年 1 月 19 日，张春桥就上海蔬菜供应问题所作的批示可谓精确的注释：“不只是蔬菜，整个副食品生产，都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问题不列入市委的议事日程，越来越被动，靠外省市越来越靠不住，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44]在此，如果说经营上的失误是管理性的，那么政治上的违拗则是根本性的，两者纠合一体，上海客菜购进量的连年下跌是不可扭转之趋势。

再从价格的环节看：

蔬菜销售历来是微利，菜场长期靠“以荤养素”维持经营。历史上，

菜价以粮价为参照,菜粮比价是“担菜斗米”,即 50 公斤青菜换标二梗米 7.8 公斤。不同蔬菜品种之间的比价又以青菜价格为参照,由此确定各品种的价格水平。据上海 1961 年至 1985 年(一个长时段,含“文革”时期)蔬菜价格的统计,以青菜(每 50 公斤 2.27 元。若以“文革”十年计算,每 50 公斤 1.98 元)、萝卜(每 50 公斤 2.28 元。若以“文革”十年计算,每 50 公斤 1.91 元)为基准,大头菜、鲜雪菜、莴苣、菜苋、大白菜、冬瓜的价格分别比青菜高出 20%~40%;卷心菜、茄子、芹菜的价格比青菜高出 50%~70%。超过青菜价格 1~1.5 倍以上的有塌菜、夜开花、菠菜、黄瓜、米苋、芥菜;超过青菜价格 2 倍以上的有番茄、豇豆等;超过青菜价格 3~4 倍以上的有芋艿、土豆、韭菜、花菜、茭白、毛豆和刀豆等。现具体拣选几个品种列表如下:

上海 1966—1976 年部分品种蔬菜收购价格表

单位: 元/50 公斤

年份	青菜	土豆	番茄	长萝卜	卷心菜	菠菜	黄瓜	豇豆
1966	1.73	8.42	5.86	1.53	2.85	5.03	4.03	7.16
1967	1.87	7.51	5.76	1.99	2.89	4.92	3.91	7.07
1968	1.66	7.24	4.92	1.78	2.61	4.54	3.57	5.84
1969	2.05	7.73	5.44	1.75	2.85	5.30	3.83	6.29
1970	1.96	7.05	5.22	1.73	2.88	5.35	3.90	6.32
1971	1.96	8.16	6.31	1.69	2.91	5.17	4.63	6.61
1972	1.81	9.74	5.78	1.73	2.89	4.88	4.95	7.54
1973	2.20	9.56	6.19	1.99	3.34	4.98	5.65	7.82
1974	2.15	9.38	6.60	2.05	3.13	5.03	5.22	8.05
1975	2.33	9.33	6.31	2.38	3.37	5.76	5.07	7.84
1976	2.08	9.37	6.54	2.34	3.39	5.25	5.09	6.91
平均	1.98	8.50	5.90	1.91	3.01	5.11	4.53	7.04

资料来源:《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8—129 页。

如表所示,“文革”十年间,青菜、萝卜等参照品种的收购价,一是基本稳定,二是渐渐有所上扬(70 年代后蔬菜生产的成本有所提

高)。自然土豆、番茄、卷心菜、菠菜、黄瓜、豇豆等收购价也持相同的状态。其实,具体决定蔬菜价格的有季节、地区、质量等多重因素,比如每年淡季8—9月份青菜的平均价,一般要比旺季11月份平均价高2~3倍;1970年初冬淡季1月份时芹菜收购价为每50公斤7元,旺季4月份时则为每50公斤2元。比如长期以来,蔬菜地区差价原则上是以市区中山环路为起点,距离中山环路1公里范围内为市区价;1公里以上6公里以内为近郊价;6公里以上15公里以内为中郊价;15公里以上为远郊价。1972年起,又调整为市区和近郊两种类型。^[45]再比如1966年,上海蔬菜质量大致分为三等九价,1973年起则统一实行三等六价(一等为100%~90%,二等为80%~70%,三等为60%~40%),每等均设高低两档价格。同时因郊区上市蔬菜“遮头盖面”(即篮面的菜质量好,篮底的菜质量差)现象时有发生,便要求物价员作价时必须“一看(质量)、二翻(翻检)、三分(分等级)、四定(定价)、五讲(定价理由)”等。^[46]

那么,与菜农(农家)、蔬菜公司(商家,含菜场)、市民(买家)紧密相关的蔬菜收购价与零售价的差价如何呢?如表:

1966年至1976年上海蔬菜收购价与零售价情况表

单位:元/50公斤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收购价	3.25	3.31	3.11	3.41	3.20	3.32	3.40	4.14	4.04	4.19	3.79
零售价	5.51	5.45	4.86	5.60	5.06	5.04	5.23	6.23	5.87	5.80	5.30

资料来源:《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页;《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说明:此处的收购价和零售价指常年菜全部品种混合平均价。

注:1.关于1976年度收购价与零售价的记载,《上海价格志》第127页记为3.79元与5.73元(加权平均为5.30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330页记为3.79元与5.30元;《上海蔬菜商业志》第364页记为3.79元与5.23元(似有误)。现采用《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330页的记载。2.1975年前全部品种混合平均价即为收购价和零售价格总水平;1975年起采用主要品种指数价作为收购价和零售价格总水平。

长期以来,上海按照历史习惯主要采用“混合法”来计算蔬菜价格。^[47]“文革”十年期间蔬菜收购价与零售价的差价大致在2元/50公斤上下浮动,批零差率为30%左右,菜场零售毛利率大约在18%~22%之间,一般认为扣除损耗、营业税和费用等应有微利。但事实上,上海蔬菜经营亏损情况相当严重,如表:

1966年至1976年上海蔬菜经营盈亏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批发盈亏	93.5	146.5	-69.8	313.5	91.6	-164.8	-339.4	184.1	-383.4	-681.3	-1074.3
零售盈亏	-208.3	-182.5	-537.5	-215.4	-776.1	-671	-854.9	-59.1	-384.0	-369.7	-609.1
批零合计盈亏	-114.8	-36.0	-607.3	98.1	-684.5	-835.8	-1194.3	125.0	-767.4	-1051	-1683.4

资料来源:《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353页。

说明:《上海蔬菜商业志》第215页1969年度零售盈亏记为-215.4万元;第353页记为-216.4万元,现取第215页数据。1974年度第215页零售盈亏记为-38.4万元(有误);第353页记为-384.0万元,现取第353页数据。1968年度批零合计盈亏应为-607.3万元,第353页记为-607.9万元(有误)。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据“文革”爆发前三年(1963年至1965年)的统计,郊客菜总批发盈利,主要原因是客菜经营情况良好,1963年、1965年分别盈利190万元、218万元。除了1968年(亏78万元)、1976年(亏75万元)等个别年份,客菜盈利一直是“文革”时期上海蔬菜经营的主导态势,甚至在郊菜多年亏损的前提下,两者盈亏轧抵后仍然盈利,如1966年,客菜盈178万元,郊菜亏98万元,轧抵后盈81万元;1970年,客菜盈138万元,郊菜亏61万元,轧抵后盈77万元。^[48]“文革”中后期时因购货量减少,客菜盈利状况有所下降。现以客菜土豆为例说明:自1963年起至60年代末,上海每年调入北方土豆1万多吨(一年需要申请200多节车皮),除留种5000吨,可解决郊区2万亩至3万亩的种植面积所需。经挑选品质差的

供应市场,品质好的则进库储藏(约3 000~5 000吨),用于冬淡时投放。60年代中后期的土豆当地收购价一般为50公斤4~5元,每年便有10~40万元的经营利润。70年代起,则调入量减少为5 000~6 000吨,当地收购价提高为每50公斤6~7元,直接导致利润减少,少数年份还出现亏损。同时,客菜竹毛笋不仅是上海市场的紧俏货,每年都能带来相当的利润。^[49]由此可见,约占“文革”时期上海蔬菜总收购量7.06%的客菜销售,却成为平衡蔬菜经营盈亏的重要筹码。

反之,“文革”十年间的郊菜经营基本是亏损的,其中的缘由,除了有生产成本提高等客观因素外,一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利润第一”的旗幡下,将50年代中期行之有效的“供求支配,随行就市”的做法,改为高度集中的“统购包销,以产定销”的政策(统一收购、统一作价、统一分配),打击了各方的积极性;二是70年代以后,完全出于政治局势的需要和城市管理的考量,中共上海市委只得对蔬菜经营采取“保两头”(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贴”(批发)的政策,即由财政拨款来填补购销价格倒挂的漏洞。所以,60年代中后期,郊客菜轧抵后尚有盈余;70年代时,即便郊客菜轧抵后仍是负账,且亏损程度持续而大幅度地上升。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69年和1973年的凸显性起伏,即为什么这两个年头会在一片亏空中盈利,呈现出特别涌动的状态?这种涌动究竟是“真性”的、正常的;还是“假性”的、非常的?据《上海蔬菜商业志》的材料,因为1969年时吸取了上年郊菜、客菜集中上市,只得削价处理的教训,便调整生产计划,均衡上市时机,降低返销率。且当年客菜竹毛笋恰逢大年丰产,进沪量高达历史罕见的2万吨,仅此项就盈利83万元。1973年时则是有关管理部门为了扭转连年的亏损,一度将收购价每50公斤提高0.74元,零售价提高1.11元(均比较上年。即平均计算每斤蔬菜上涨一分钱),总经营实现了盈利。^[50]

由此可见,1969年调整生产计划和1973年提价等做法,均是在统购包销的背景下局部性地运用价值规律的成功。从这个角度上说,应该承认其是“真性”的、正常的。但统购包销的背景终究没有改变,提价等措施立即遭到市委的批评,于是动用财政一边提高收购价,一边稳定零售价,由国营批发商业来承担价格倒挂的亏损,结果“1971年及1972年两年平均亏252万元,1974年亏损上升到383.4万元,1976年突破1000万元”。^[51]从这个层面上说,又可认为是“假性”的、非常的。其实两者关系应认定是“假性”中的“真性”,非常中的正常,且一旦这种“真性”、这种正常被再次打压和否定后,其反跳的代价被证实是更大的。另外,上海的蔬菜零售因批零差率紧、毛利率低、返销量大、费用高等原因,^[52]长期处于严重的亏损中,除了“以养养蔬”,还靠财政补贴支撑,就不赘述了。

总之,打开上海“文革”时期蔬菜购销的账册,不仅可见郊客菜的供应情况,可见上海蔬菜市场的价格构成,更可见其背后存在着的一片混沌和复杂。

四、供应与服务

城市的供应与服务,关涉政局的稳定,关涉市民日常生活的安妥。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蔬菜供应与菜场服务如何呢?会不会是一幅图谱化的破乱而凋敝的景象(当今“文革”图谱化是一种倾向)?

事实上,上海1966—1976年蔬菜供应量每天平均在2200~2500吨,总体供应水平保持在每天人均吃菜370~420克,^[53]就总的情况而言,当时上海的蔬菜供销是正常的。然而,由于前述中已提及的“三固定”购销模式,使市场调节的杠杆功能有所丧失,以致旺淡

矛盾十分突出,如“常年菜田多年平均最旺月份上市 11.2 万吨,最淡月份仅 4.5 万吨,前者为后者的 2.5 倍”。^[54]尽管每逢淡季各菜场均采取“以咸补鲜,以荤代素”等措施,终究不能避免在这座城市里每天会有百万人为排队买菜而起早摸黑,1973 年至 1976 年淡季时,“只能按户凭证限量供应,有时居民要三四天才能轮流买到一次鲜菜”,^[55]甚至在一些局部地区出现哄抢、套购等。如 1968 年早春,上海蔬菜供应困难,据报道上海县北新泾镇发生如下情况:

最近一个月以来,北新泾镇从早到晚,从市区赶来买菜的人络绎不绝。从镇北申乙港、野鸡墩到镇南的三星牧场,提着篮子、推着自行车的人群在田里横冲直撞如过“无人之境”,野鸡墩附近一处就有十来亩的庄稼被踩得一塌糊涂……3月 1 日下午 3 点左右,有两只从吴江县八渡公社行来的农船,船上装满青菜,因潮水关系停在红旗船厂后面。这时,有近百把个人冲破船厂大门,跳上近岸的一只船,动手就抢青菜,结果装了三千斤菜的一只船,被抢走整整二千斤。青浦县白鹤公社有一条装菜的船,带了生产队的证明有 10 担青菜到上海来卖。船在渔行湾码头,被一帮人连哄带抢,劫走了 3/5 的青菜。桐乡有条船证明有 45 担菜,定价每斤 6 分,总价 270 元。结果被一帮人一抢一哄,只收到 46 元。^[56]

再据同期报道:

近来,发现我公司船员,在外港套购、抢购、捎带上海暂时脱销或供应紧张的物资和副食品的现象日渐增多。捎带的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前一阶段上海大白菜供应较紧张,我公司战斗轮在烟台港好多船员都买了,有人买了上百斤,一条船就

达数千斤。战斗轮在秦皇岛时,几个船员骑了自行车到郊外农民家中去买活鸡,讲好价钱,鸡捉了就称,鸡逃就满地追,鸡飞到屋顶上去了,还爬到农民屋顶上去捉。弄得鸡飞狗跳,影响极坏。^[57]

那么,这其中除了存在淡季供应短缺等直接原因外,“文革”中的政局变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管理,是否也构成一种原因呢?在此,“文革”衍生出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应排列其中,上述两例可引为实证,说明在城市管理的角落,仍然横竖着庞杂和淆乱。至于副食品零售行业的革命造反派和“文革”当局在夺权、掌权中,面对城市蔬菜供应的实际问题,标举“阶级斗争”和“为人民服务”的两面旗帜,则延伸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公平买卖、笑脸相迎”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

在 1967 年冬春革命造反派夺权之际,恰逢蔬菜上市淡季。或许是当权派的政治博弈,或许是基层群众追逐福利——据当时的报道称:在一个短暂的时段里,一是“当权派漠视全市人民的日常生活,放弃职守”;^[58]二是“不少受蒙蔽的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丢下一副‘烂摊子’”,^[59]以至田间管理放松,外地采购不力,营业时间缩短,上市量锐减,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结果,“农商部门革命造反派召开市蔬菜工作会议,建立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的各级领导班子,有力地把蔬菜生产抓了起来”。^[60]1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市郊就播种了 2 万余亩蔬菜,比前 20 天快 40%。农商造反派还共同踏田,核实上市货源,增加供应量。同时增派采购人员分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北及东三省采购大白菜、萝卜及卷心菜、大头菜等。广大菜市场的造反派也拉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横幅,如普陀区“15 个菜场 70 个供应点,自始至终维持原来的早市、下午市。大型的西康菜场坚持从早上六时到晚上八时,中午不休息,全天供应,节假日还提早开秤”;为增加蔬菜上市量,“单东方红菜场就组织到太湖菜 1 500 担、芹菜四五百担

之多。西康菜场还到棉粮地区的徐行公社采购来六百多斤大蒜充实市场供应”。^[61]1968年入冬，上海遭遇寒流侵袭，海运系统造反派抽调包括远洋万吨轮“东风号”在内的10多条货船，从青岛、烟台运来蔬菜7万多担，以解燃眉之急。^[62]

在此，当权派、基层群众、革命造反派之间，是否存在黑白之分、是非之辨呢？确实，围绕城市蔬菜供应，三者的态度和行动各有企图，各有目的，且这种企图和目的均具有政治指向性，用当时的话语体系应称作“路线之争”。然而，这“文革”“路线之争”不是本文关涉的主题，只是从“文革”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厘析，可知保证城市蔬菜供应是各个观点、各个立场的政治力量都必须重视、必须把握的紧要环节——即便如动荡时刻有所扰乱，甚至有所搅局，那也是以此为权重、为凭借催逼之、要挟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证城市蔬菜供应是手段，政治路线才是目的。然而，因为此在的手段关联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目的便借助着手段，托举着手段，即以手段为倚重、为标志，来铺排和考量具体的工作。所以，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与服务，在革命造反派掌权以后，坚持要求“卖菜人想到吃菜人”，^[63]强调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为革命而卖菜”，就不是偶然之举措了。

其实，“文革”运动爆发前夕的1965年，市蔬菜公司就以虹口区三角地菜场为样板，总结了上海蔬菜供应与服务的特色，那就是实行三市二摊（早中夜三市，早早摊、中午值班摊）；设地方口味、盆菜、供应外侨等专摊；固定设摊和流动供应相结合（或下厂、下里弄，或推拖车串街走巷）；除按斤两供应外，还采取论堆、论盆、论把、论块等拆零供应；优质优价，劣质低价，过市菜贬价，以及商品陈列上艺术化等。^[64]“文革”运动爆发后的蔬菜供应与服务，继续沿用着这套路数，发扬着这些特色，只是其支持系统的政治符号和政治指向（目的）不一样了。现选取《解放日报》、《文汇报》的相关报道以求证实：

**上海“文革”时期《解放日报》、《文汇报》
关于蔬菜供应与服务的新闻报道**

日期	报纸	标题	单位	内 容
1968年10月27日	《文汇报》	菜场开夜市，工人很欢迎	徐汇区12号路菜场	工人群众上班前要做家务、买菜、送孩子上托儿所等。大多数集中在同一时间买菜，人很拥挤。决定在傍晚5—7时增设夜市。
1969年2月17日	《解放日报》	菜场扬新风	黄浦区凤阳路菜场	菜场职工抬着蔬菜和鱼肉蛋等，深入里弄送货上门。开秤前，居委会组织“忆苦思甜”大会。
1970年2月24日	《解放日报》	以战斗姿态搞好菜场服务工作	杨浦区鞍山菜场	为方便“三班制”工人，增辟“夜市供应”，后又将营业时间改为早5点半到夜12点半。夜市营业员将带鱼洗净切块，配上葱姜，使下班工人回去就好烧煮。
1970年12月30日	《解放日报》	卖菜也讲辩证法	普陀区西康路菜场	24小时通宵服务，顾客都是在各个战斗岗位上辛勤劳动的职工同志。“一分钱”生意，符合“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标准。
1971年6月19日	《文汇报》	菜场新风	闸北区副食品公司	挂“24小时日夜服务”的牌子，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菜场代为磨刀、修篮。为买鱼乘车的工人备小蒲包和草绳。
1972年2月10日	《解放日报》	冒雪送菜到里弄	卢湾区巨鹿路菜场	营业员顶风冒雪送菜到弄堂，使居民大雪天不出门就可买到新鲜菜。
1972年7月5日	《文汇报》	转移立足点，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卢湾区顺昌路菜场	将立足点移到工农兵一边来。不是顾客要求“没有底”，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彻底。提高服务质量，影响党群关系，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是个路线问题。
1972年9月3日	《文汇报》	供应工作做到五个一样	静安区长寿支(路)菜场	买的数量多或少接待一个样；卖热门菜与卖冷门菜的态度一个样；对待新老顾客一个样；忙时闲时热情服务一个样；对待大人小孩服务态度一个样。“方便柜”上有一分钱的葱姜蒜、一角钱的火腿肉；还有一只鸡蛋、一块排骨等，不用秤，不必等，随到随买。

(续表)

日期	报纸	标题	单位	内 容
1973年2月28日	《文汇报》	上海蔬菜供应自给有余	综合	全市菜场中,现有11个实行日夜服务,90个实行早夜服务,为三班生产的工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974年9月4日	《文汇报》	为烈属送菜上门	卢湾区吉安路菜场	旧社会卖菜为活命,新社会卖菜为革命。
1974年11月30日	《文汇报》	卖菜人要想吃菜人	普陀区西康路菜场	四百多名职工“大干快上”,以减少顾客买菜时间为主攻目标。拆整零卖,有荤有素,有炒有汤,一个早市供应各种盆菜一千几百套。
1974年12月9日	《解放日报》	供应工作越做越好	华山路菜场	为提高服务质量,下里弄调查。代客余肉皮、代杀鸡鸭等。
1975年2月12日	《解放日报》	节日照常营业	虹口区三角地菜场	坚持节日通宵营业,代客服务。年初一为顾客加工鸡鸭230多只。对烈军属、病残者送货上门。坚持政治方向,反对商品“走后门”。
1976年5月26日	《解放日报》	本市部分菜场全日制供应	综合	调整营业员班次和商品供应比例,“宁愿自己麻烦千遍,不让顾客为难一时”,做到“计划商品保证供应;热门商品合理分配;一般商品随意挑选;大路商品积极推销”。
1976年5月27日	《文汇报》	为方便居民吃菜着想	南市区副食品公司	成立区蔬菜小组,“集体采购,全区调剂”,降低返销,品种对路。大境路广东人多,采购组多分配蕹菜,一天可销三四十担。半淞园、塘桥北方人多,喜欢用老韭菜切碎包饺子,采购就将韭菜多分配些。

由表可见,除了一度出现无政府主义的干扰,上海“文革”时期的菜场营业,起码在运作方式上、在行为态度上,与“文革”前以虹口区三角地菜场为中心的优质服务经验别无二致,那就是在管理上体现城市服务的有序;在服务上体现城市管理的水准。70年代初,静安区长寿支路菜场在夜市供应、设荤素综合摊、为老弱病残送货上门等方面成绩显著。



服务到门口
(徐汇区少年宫美术小组王青)



1972年春,江南菜场流动菜车深入里弄供应蔬菜(摘自东方早报网站)

1972年4月,市蔬菜工作会议便树立长寿支路菜场为标兵,在全市副食品行业开展了“学星火(星火日夜商店)、赶长支”的劳动竞赛。如果说当初的学习和竞赛还围绕着“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那么到了“文革”后期,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以来,长寿支路菜场就成了“学理论、抓路线”的典型。1975年8月13—14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分别在头版加短评发表长篇报道“菜场学理论,面貌日日新”和“把方便送给千家万户”,全面介绍长寿支路菜场的职工“半夜上班,事先把冬瓜切片,豇豆扎把,鸡毛菜扎捆,标好价目”,盆菜供应“由每天一千多盆增加到二千多盆,品种由五十多只增加到八十多只”;菜场组建了16人的下里弄供应小组,采取定期轮换供应品种的办法为居民送菜(对解决淡季和时鲜菜供应有作用),这天记者随营业员到余姚街道第五居委会为1400多户居民送去豇豆、毛豆、辣椒等,目睹“车子一到,大人小孩都围上来,由居民小组长协助,不到十分钟就把蔬菜送到了家家户户”;^[65]特别是学习了“商品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的理论后,该菜场检点重视大

生意、轻视小生意；重视热销货、轻视冷门货是资产阶级“利润挂帅”的流毒，便重点巩固发展“一字方便柜”，“仅一分钱一扎的鸡毛菜，每天供应一百多斤；一分钱一摊的尖辣椒，每天要卖五六十斤，顾客近千人次”。^[66]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等也在《朝霞》杂志上，以洋洋洒洒的《可敬的人们——长寿支路菜场的日日夜夜》参与到歌颂的行列：

9个73届毕业才进菜场的姑娘，把宏伟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平凡的卖菜劳动紧紧相连，提议设立综合摊，使顾客能一次买到鱼、肉、豆腐、蔬菜……开秤啦，毛豆一斤半： $0.14 \times 1.5 = 0.21$ ；青椒半斤： $0.10 \div 2 = 0.05$ ；肋条肉八两三钱： $0.90 - (0.09 \times 2) + (0.09 \times 0.3) = 0.747 \approx 0.75$ ；子鱼一斤：0.49；葱两分，姜一分……菜场上，从来不用算盘，当然更没有笔墨纸张，全靠脑记心算。姑娘一手拿，一手秤，一边往顾客篮里放，一边在心里拨乘除法……她们天天下班后把“钱头秤”带回家，家里大大小小瓶瓶罐罐、碗盏调羹、书本钢笔，都拎起来过过秤……现在“九姑娘组”每个秤手，手搭秤杆，数字就有了。当最后一种菜送到你篮子里时，总数跟着报出。每个秤手平均每分钟接待三个顾客，敏捷而从容，被顾客誉为“电子脑”。^[67]



静安区长寿支路菜场“九姑娘组”

老照片
PDG

应该承认,上海“文革”中后期以长寿支路菜场为中心的服务,精细而周至,堪称样板。1976年5月25日,市革委会又在该菜场召开现场会议,并以“批邓斗争中涌现的新事物”为口实,进一步向全市推广长寿支路菜场实行全日制供应的经验。^[68]由此可见,此时由权力机构推定的“优质服务”,不是着重于岗位的职能、经济的绩效和文明的指向,其核心源是强调为“阶级服务”、为“政治路线服务”等,以致它的聚焦点、它的驱动力,既有空幻张扬的一面,又有实际推进的一面。正是立足于这个角度,既不能忽视“优质服务”背后的政治主导,那会造成一片模糊;又不能否定这政治主导下的“优质服务”,是现场的和确切的存在,那会造成一片虚无。同时,还应该更清醒地指出,在媒体所吹奏的以长寿支路菜场为主调的旋律中,实际上还遗留有另一片灰暗的地带,那就是围绕着蔬菜供应与服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开后门”现象和贪污盗窃活动。^[69]

或许蔬菜是市民生活必需而又短缺的商品;或许菜场经营管理存在颇多的漏洞;或许菜场人员的组成多来自合作前的摊贩;或许利益驱动下存在着先天的人性之恶,总之,在“文革”“阶级斗争”利剑的高悬下;在“文革”“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符咒的念叨下,谁能知道“后门”照样敞开,“后门”之路照样畅行呢!1968年3月5日,市财革会召开“进一步揭开财贸系统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点名闸北区南山路菜场一造反派头头带头“开后门”,“今年春节,用5爿(半只)热气猪肉,与一家食品商店交换瓶头酒,造成该店一时无瓶头酒供应”。^[70]至于“通风报信”、“少撕票证”、“代购紧缺品、热销品、时鲜品”等等,则更是属于通行的常情之道。如果说“开后门”是菜场经营中屡禁不止的一种习气,那么这种习气必然导引出“贪污盗窃”。在同一会场上被点名的就有“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出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好几万元”。^[71]4月10日,市公检法军管会与无产

阶级革命派联合召开“坚决打击贪污盗窃犯罪公判斗争大会”，数个案例涉及副食品行业，其中长宁区三角菜场一统计员，通过改动报表、伪造单据，“有时主动帮人点现钞，故意在每叠中多放二三元，然后在交款前再抽放入自己的腰包”，累计贪污 8 500 余元。^[72]再据同年 10 月《工人造反报》披露的卢湾区斜徐菜场集团性的“贪污盗窃”活动，更是触目惊心：

到目前为止，挖出了 6 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金额高达二万几千元，占到菜场流动资金的 60% 以上。参加贪污人数连同菜场以外的三十多个，一共有 88 人，其中有的同时参加几个集团。

这些贪污集团的手法，有偷窃商品的、有捞现钞的、有一起吃喝贪小便宜的、有窝藏赃物接受贿赂的、有“日积月累”的、有大量盗窃的、有内外勾结的、有独霸一方的、有定期分赃的、有天天拆账的……如贪污集团一头头，勾结居民食堂采购员，利用设摊运货的机会，中途将商品出档；另一集团首恶分子，动员全家老婆、孩子五人一起参与“以少找多”的贪污活动；一坏头头则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将整爿整爿的猪肉偷走，67 年春节供应，仅一次就利用发货的机会，将三爿没有过磅的猪肉（计二百斤左右），往拖车上一甩，拉了出去。今年春节供应时，又一次拿走了两爿。整个食品大组在节日前后共销了十五万斤，按正常损耗，最多只有六七百斤，可是这个大组竟高达一千八百多斤，也就是说一千多斤不翼而飞了。一贪污犯以色情、金钱腐蚀干部。另一方面则以送物借钱等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收买群众。她对人说：“吃过三年菜场饭，叫你做官也不肯去啦！”

这个菜场还有那么一小撮自作聪明的“单干户”。他们认为集体搞，油水虽足，但寿命不长，因此得出结论：还是单独干，小摸摸

太平。有一人公开宣扬“单干”的优越性，大肆贩卖“情愿独牵一只羊，不愿合偷一头牛”……这是这个菜场挖出六个贪污集团之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73]

毋宁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诳语，恰恰是经营体制和管理方面的罅漏，恰恰是利益方面的驱动，终究使“贪污盗窃”如此大胆和张狂。固然，卢湾区斜徐菜场的情况可列入特殊的罕见，但上海数百家菜场处于大致相同的经营环境和风气中，联系前述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文革”时期的菜场经营出现连年亏损，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追究的原因吗？！

70年代初，市、区各蔬菜公司均已建立革命委员会，为了制止贪污盗窃，曾一度在少数零售菜场实行营业款“走钢丝”试点，即模仿上海棉布店的收款方式，每个营业员将每笔买卖的所签斤两单和所收钱款，通过钢丝滑轮传送至总收款台，再由总收款台结算后回传给营业员。这样，营业员虽然不直接参与结算，却因菜场营业场面杂乱，钱款需经历“收”和“算”两个环节，一旦出现差错，便辩说不清，只得终止试点。1975年，上海部分菜场又施行居民买菜扯给定额小发票的办法，即模仿公共汽车的收款方式，一手收钱款，一手交票据，以求钱款与票据间的平衡。但营业员操作时既要称、算，又要找零、撕票，手续烦琐，常常拖延顾客排队的时间，且居民完全不需要小发票，有的不拿，有的拿了随手乱丢，弄得“菜场遍地皆是，也解决不了贪污问题，试行一段时间，就告终止”。^[74]粉碎“四人帮”后，上海菜场系统曾多次开展教育和查处活动，但真正消除贪污盗窃，还是在90年代后，国营、合作菜场全面退出副食品零售行业。

围绕上海蔬菜市场的供应问题，既看到为了“政治路线”而构筑的“优质服务”，曾经热气腾腾，喝彩一片；又看到无政府主义的扰乱，

“开后门”和贪污盗窃等活动，曾经屡禁不止，嚣张一时，这大概才是整体的真实的面目。

五、两条波动线

综上所述，以“文革”时期较低水平的生活状态为基准，如果说粮食是市民生活必要之保障的话，比照而言，鱼肉蛋禽就是市民餐桌之奢侈品，蔬菜就是市民餐桌生活之必需品了。同时，对偌大个城市来说，蔬菜的正常供应与消费，就如同流水线中一道细小的程序，或许不显见，或许不起眼，却十分地紧要。所以，蔬菜问题一头关联民众的正常生活，一头关联社会的正常运作，即蔬菜生产、蔬菜供应与市民生活、城市管理之间，平行而又互动地存在着两条十分敏感的波动线：一条是“民众—生活”的波动线；一条是“社会—管理”的波动线。当蔬菜供应丰裕时，两条波动线处于隐性状态，平顺而和谐；当蔬菜供应紧缺时，两条波动线便立即应急性地处于显性状态。对市民生活来说，率先反映在家庭的一日三餐上，于是，家家户户半夜三更地排队；长时间地面对咸菜、萝卜干……；对社会管理来说，则是运作不遂，操持滞碍，伴随着群众的抱怨、民间的流言……市民日常生活发生的波动，进而牵动整个社会情绪的起伏——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谁能回避，甚至放任这两条波动线的振荡呢！难怪通过“文革”夺权的革命造反派，在蔬菜供应淡季时，也得派人勘踏田头，促进上市；集中车船，各方调运，以平息这两条波动线的同频共振。

其实，“民众—生活”的波动线与“社会—管理”的波动线不仅是联动的，两者之间互为影响和作用；且两条波动线的目标指向也是一致的，那就是其内在之间还存在着互为协调的功能，以警戒和防止事

态的扩大。就此,如果说两条波动线的显现,属城市管理的调节机制,它确实也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但“文革”中高举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具体落实在城市的蔬菜生产和供应方面,推行“菜农不吃商品粮”;批判“利润挂帅”、“钞票挂帅”(菜农通常的“看价种菜、看价管理、看价上市”,被批判为“看价,看价,这和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是一家”),^[75]将富有活力的“进场代销”、“三员议价”,改为“生产队定点交售、菜场定点采购、货源按固定比例分配”的“三固定”购销模式等,便很大程度地削减了、破坏了两条波动线的自我协调。这种属于“文革”“政治路线”的强行介入,强行搅局,且表现为“不断革命”的刚性的特征,严重地背离了价值规律。

于是,综合考量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销,在大致正常的经营场面和为政治而提升的“优质服务”背后,其内在的政治方面的困惑、管理方面的紊乱和经济方面的漏洞都是巨大的。这即是说,“文革”“政治路线”的失措,要换取一种代价——其具体的证实,就是当政者为维持和粉饰市场稳定,只得通过权力运作,调拨巨额的财政补贴,来应对、来弥补、来平衡因蔬菜供应紧缺而可能引发的波动——这就是代价所在(经济为政治而付出)!这就是必然招致的市场规则的报复!

注 释

[1]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36 页。春播,品种有刀豆、土豆、辣椒、卷心菜、青菜、米苋、番茄、黄瓜、冬瓜、生瓜、南瓜、茄子、毛豆、豇豆、茭白、慈菇、芋艿等 17 个以上。因大部分为夏熟作物,一般从 5 月上市起,可供应到 9 月份。秋播,品种有小白菜、秋青菜、鸡毛菜、晚豇豆、晚毛豆、

卷心菜、大白菜、大头菜、长圆萝卜、秋刀豆、秋塌菜、秋菠菜、秋芹菜、芥菜和花菜等 17 个以上。因夏令时节,作物成熟快,有的 7—8 月可上市,如小白菜、鸡毛菜。一般秋菜在 9—12 月供应,其中萝卜、花菜、卷心菜等可供应到第二年的冬春。冬播,主要品种为冬藏菜、三四月慢青菜、卷心菜、塌菜、雪菜、菠菜、菜苋、芹菜、芥菜、莴苣、葱头、蚕豆、青豆等 15 个以上。这些菜到第二年的 3—5 月份供应。

- [2] 束家鑫:《上海气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3 页。
- [3]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6、111、115、116、140 页。1975 年前崇明大白菜有 2.5 万余亩种植面积,平均亩产达 2 500~3 000 公斤。冬春期间源源不断运往市区,供应量占这一时期全市上市量的 40% 左右,对解决蔬菜淡季供应短缺问题起了很大作用。1975 年后,崇明大白菜纳入“保淡”计划,确定种植面积为 4 万亩。又:清康熙年间嘉定已有蒜头、葱头栽种,品质优良,驰名国际。60 年代上市量保持在 1.5 万吨左右。又:青浦县水质好,全县水面占总面积的 21.6%,有低洼地 4 万余亩,主要在练塘、沈巷、莲盛公社,发展茭白生产有得天独厚的优势。70 年代后因苏州、无锡等地改种粮食,客地茭白不再调入上海。随着青浦茭白种植面积逐步扩大,70 年代每年上市量在 1 万吨以上,1972 年、1973 年超过 2 万吨。
- [4]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0 页;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4 页。
- [5]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2 页。至 80 年代中后期,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所属近郊 12 个乡的蔬菜生产田大面积缩减。上海的蔬菜生产田开始向中远郊和外地转移。
- [6]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4 页。
- [7] 张世芳:《上海科学技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83 页;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9 页。
- [8] “市郊蔬菜生产丰收供应足品种多”《解放日报》1972 年 9 月 24 日。
- [9]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0 页。至 90 年代初,宝山、嘉定两县的彭浦、桃浦、大场、长征等公社的土壤、大气污染等已不宜再种植蔬菜。因此,在市政建设规划中,便将这类土地用于城区发展。据 1969 年 4 月 8 日市污水灌溉小组《关于落实污水灌溉 5 万亩请示报告》记载:1968 年,市郊农田实施污水灌溉 15 360 亩(上海县 7 300 亩、嘉定县 1 750 亩、川沙县 1 660 亩、宝山县 4 650 亩)。1969 年能用污水灌溉农田的有 20 个公社,66 个大队,规划灌溉面积为 48 000 亩。

1969 年污水灌溉规划面积表

单位：亩

上海县		嘉定县		川沙县		宝山县		合计
新泾公社	6 000	城东公社	2 400	严桥公社	1 010	五角场公社	6 040	
虹桥公社	2 600	长征公社	2 300	洋泾公社	450	江湾公社	6 960	
北桥公社	5 000	安亭公社	900	杨思公社	800	彭浦公社	2 200	
马桥公社	3 000			六里公社	160	吴淞公社	1 500	
塘湾公社	900					大场公社	3 000	
莘庄公社	900					庙行公社	1 550	
合计	18 400	合计	5 600	合计	2 420	合计	21 250	47 670

说明：本统计包括上海东区污水灌溉数。

- [10] “抓好蔬菜生产，确保市场供应”《文汇报》1974年10月18日；“一心为了城市人民吃菜”《解放日报》1974年11月9日。
- [11] “种菜人一心想吃菜人”《解放日报》1975年9月20日。
- [12] “学理论，鼓干劲，抓紧时机管好稻棉蔬菜”《文汇报》1975年7月9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搞好蔬菜生产”《文汇报》1975年4月1日。
- [13] “抓好蔬菜生产，确保市场供应”《文汇报》1974年10月18日；“一心为了城市人民吃菜”《解放日报》1974年11月9日。
- [14]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搞好蔬菜生产”《文汇报》1975年4月1日。
- [15] “抓好蔬菜生产，确保市场供应”《文汇报》1974年10月18日；“一心为了城市人民吃菜”《解放日报》1974年11月9日。又据《支部生活》1969年第32期报道：川沙县六里公社一生产队“全队四十多户人家，有三十多户上自由市场高价出售蔬菜，一富农分子也暗底里参与。政治指导员不制止，还带头干”。
- [16] 江怡、邵有民：《中共上海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79页。此为《中共上海党史》记载的数据。《文汇报》1969年11月19日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记载的数据为耕地100.1亩。
- [17] 据《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中共上海党史》记载，1969年时牌楼十一队并未真正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因为当年该队粮食总产量为29 554公斤，但包括口粮、饲料粮、种子粮在内，实际用粮为44 113.5公斤，国家供应统销粮为16 796公斤。再据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上海自 1954 年对市郊菜农实行口粮统销,即“按户发证,定点凭证供应”以来,历经“以人定量”、“指标包干”、“上市蔬菜包干,奖赔粮食”、“口粮补贴,结合奖励”等种种办法。1965 年 3 月 22 日,上海对市郊 22 个公社、1 434 个以种菜为主、靠国家供应口粮的生产队,实行“包两头,定中间”的办法。“包两头”,即对非劳力和儿童、学生口粮按城镇标准随时调整,定量供应,如三岁儿童定量为 6 公斤/月;初一学生定量为 14 公斤/月;高三学生定量为 16.5 公斤/月。“定中间”,即国家对生产队劳动力确定 14.5 公斤的平均水平包给生产队,具体劳动等级和吃粮标准,由生产队自行一年评定一次。有种粮面积的生产队,需折抵定量;超产、减产则按棉粮地区的政策办理。1965 年,上海对郊县收购蔬菜奖售粮食共 766 万公斤。1966 年 7 月,落实粮食征购“一定三年”,对统销指标继续实行一年一评。至 1970 年止,全市郊县粮食连年丰收,农村统销粮相对稳定,每年供应粮食在 9 931~11 345 公斤之间。1971 年,农村统销实行“一定五年”政策,国家对缺粮队只定一个统销指标,为指导生产队粮食消费,口粮定人均 240 公斤为最低水平,最高水平则在此基础上增加 15% 的幅度内安排。统销队粮食增产,适当抵减统销指标;减产后国家酌情借销、增销一部分。“一定五年”政策落实到 5 234 个统销队,占全郊县总队数 28 017 个的 18.7%,落实统销粮食 10 108 万公斤,比上五年的统销指标减少 1 500 多万公斤。

- [18] 江怡、邵有民:《中共上海党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79 页。
- [19] “赞‘菜农不吃商品粮’”《文汇报》1969 年 11 月 19 日。
- [20]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以粮为纲’方针——我们是怎样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的”《解放日报》1969 年 12 月 10 日。再据《支部生活》1970 年第 1 期报道:该队共搬掉三座大坟山,拆掉 111 只砖廊,排平了 19 亩土地,全部种上了水稻。
- [21] “既大力增产粮食,又不断提高蔬菜产量”《文汇报》1970 年 9 月 9 日。
- [22]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以粮为纲方针”《文汇报》1969 年 11 月 21 日。
- [23] “菜农不吃商品粮,城镇居民怎么办?”《解放日报》1970 年 1 月 21 日。
- [24] “我们不吃现成饭!”《解放日报》1970 年 1 月 21 日。
- [25]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以粮为纲方针”《文汇报》1969 年 11 月 21 日;“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以粮为纲’方针——我们是怎样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的”《解放日报》1969 年 12 月 10 日。
- [26]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8 页。
- [27] 冯小敏:《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0 页。
- [28] 张文清:《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1 页。江怡、邵

有民主编的《中共上海党史》也持相同观点，“郊区各蔬菜生产区修改原定的耕作计划，片面砍掉蔬菜种植面积，向蔬菜生产争地、争劳力、争肥料”。据统计，1970年郊区粮食播种面积比1969年增加48.65万亩，而蔬菜种植面积却一减再减，全郊区曾有5万亩蔬菜地被借茬种粮，占全郊区蔬菜生产规划面积的四分之一。城市蔬菜供应紧张，居民买菜需凭卡限量供应。

- [29]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340页。
- [30] 文新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2001年内部版，第411页。
- [31] “四人帮鼓吹‘菜农不吃商品粮’居心何在”《解放日报》1976年12月16日。
- [32] 同上。
- [33] 主要有南市经营部的开平、关桥交易市场；北市经营部的曹家渡经营部；上海县经理部的中山西路、沪西、新泾、七号桥、三林交易市场；嘉定县经理部的兰溪、光新、杨家桥、江桥交易市场；宝山县经理部的水电、吴淞、公兴桥、庙行、大场交易市场；川沙县经理部的塘桥、杨思、六里、洋泾、北蔡交易市场等。
- [34]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 [35] “支持计划经济，密切农商关系，保证蔬菜供应”《文汇报》1970年12月24日。
- [36]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 [37]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说明：该资料以1966年至1990年共25年的统计为准。
- [38] 同上书，第146页。解放前，上海蔬菜市场有“从南方吃到北方”、“从山上吃到河塘”的行话。据解放初1949—1951年的统计，客菜到沪量为17~20万吨，占全市蔬菜总供应量的50%~60%。1960年至1961年困难时期，各地供应紧张，全年调入量分别为2.16万吨和2.93万吨，只占郊客菜总购进量的1.7%和2%左右，为历史上客菜购进量的最低点。1963年至1965年客菜调入量回升到7万吨以上，占郊客菜总购进量的8%~9%。
- [39] 同上书，第163页。
- [40] 同上书，第190页。据《支部生活》1970年第11期报道：有些生产队甚至将蔬菜公司卖不掉的菜买回去，加工后再卖给蔬菜公司，每担可赚七八角钱。
- [41] 同上书，第4页。
- [42] 同上书，第146页；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 [43] 同上书，第150页。
- [44] “挑拨上海与外地关系的罪证”《解放日报》1976年11月20日。

- [45]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2 页。市区站是：关桥、开平、曹家渡、中山西路、沪西、兰溪、光新、公兴桥、水电路等 9 个。近郊站是虹桥、程桥、北新泾、闵行、七号桥、江桥、杨家桥、大场、庙行、吴淞、塘桥、六里、杨思、北蔡、三林、高桥等 17 个。差价由原 5 档简化为 3 档，即差价在 3 元以下的，近郊差价 0.20 元；3~10 元的，近郊差价 0.30 元；10 元以上的，近郊差价 0.50 元。
- [46] 同上书，第 371 页。
- [47] 同上书，第 358 页。解放初期，上海采用“混合法”，即常年菜全部品种混合平均收购价为全部品种实际总收购额除以全部品种实际上市量；零售价格总水平则是全部品种零售额除以零售总量。1956 年一度试行“简易算术平均法”，即以各个品种实际有价日的牌价，除以牌价天数，再按各品种的比例计算价格总水平。但因蔬菜早晚市价不同，常常牌市价脱节，菜农不予接受，不久便废止。后采用“综合法”，即以上年各品种的上市比例，计算出总水平。又因各品种的比例数不固定，此法较为复杂。所以，整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长时期价格总水平的计算，报表上报用“综合法”，日常工作用“混合法”。直至 1976 年 2 月，在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组、财贸组、郊区组及市物价局、商业二局、蔬菜公司等调研的基础上，决定采用“综合物价指数计算法”，即共同商定以 1970 年至 1974 年五年（有丰年、平年、歉年）主要品种平均上市量确定的权数作为固定权数不变，来计算主要品种蔬菜收购价格指数。这才解决了计算复杂和变动基期价格的问题，也排除了品种好差的因素，比较符合蔬菜生产实际状况。
- [48] 同上书，第 353 页。
- [49] 同上书，第 154 页。
- [50] 同上书，第 352 页。
- [51] 同上书，第 352 页。
- [52] 同上书，第 213 页。据统计，“文革”十年间，上海蔬菜零售返销共计 74.3 万吨，每年要返销 4~8 万吨，共计亏损 4 867.6 万元，平均每年 440 余万元，最多的 4 年，每年亏损 600~800 万元。当时蔬菜零售的毛利率在 18%~22% 左右，而费用率却在 21%~24%。有 7 个年头倒差率在 1%~6%。特别是 1972 年，蔬菜零售返销达 11.94 万吨，费用率超过毛利率 6.78%，全年蔬菜零售经营亏损达 854.9 万元。“文革”结束后的 1977 年，市蔬菜公司提高批零差率，1977 年从原来的 30% 提高到 45.1%，蔬菜零售的毛利率提高到 28.8%，扣除费用率 27.3% 后，销售利润率出现 1.49% 的顺差。

- [53]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0 页。
- [54]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3 页。
- [55] 同上书，第 8 页。
- [56] “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市场供应，不要再到北新泾去抢购蔬菜”《工人造反报》1968 年 3 月 7 日。
- [57] “不要到外地抢购物资”《上海交通报》1968 年 3 月 14 日。
- [58] “大力扭转蔬菜供应紧张局面”《解放日报》1967 年 3 月 7 日。
- [59] “普陀区十五个菜场的革命造反派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财贸战士》第三期 1967 年 3 月 27 日。
- [60] “大力扭转蔬菜供应紧张局面”《解放日报》1967 年 3 月 7 日。
- [61] “普陀区十五个菜场的革命造反派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财贸战士》第三期 1967 年 3 月 27 日。
- [62] “大批外地蔬菜运来支援上海”《解放日报》1968 年 1 月 20 日。
- [63] “卖菜人要想到吃菜人”《文汇报》1974 年 11 月 30 日。
- [64]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0 页。
- [65] “把方便送给千家万户”《解放日报》1975 年 8 月 14 日。
- [66] “菜场学理论，面貌日日新”《文汇报》1975 年 8 月 13 日。
- [67] 黄宗英、蒋小馨：“可敬的人们——长寿支路菜场的日日夜夜”《朝霞》1975 年第 12 期。
- [68] “本市部分菜场全日制供应”《解放日报》1976 年 5 月 26 日。
- [69] 此处不将菜农的所谓“贩卖活动”列于正文。“文革”前夕，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当前市场上反对资本主义斗争和其他几个问题》的文件，强调整顿有证商贩。1965 年时，上海市区尚存的 17 处集贸市场全部消亡。“文革”时期，有郊区菜农将自留地上的蔬菜挑到市区出售，被称为“大田里做一工，不如自留地里一把葱”。结果，既受到居民的欢迎，又常受到有关人员的批判和抵制。据《支部生活》1968 年 6 月报道：近来有人把大量蔬菜从郊区挑到市区贩卖，扰乱了市场管理，也助长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应当坚决抵制这种贩卖活动。再据《解放日报》1969 年 2 月 17 日报道：马当路小学红小兵发现一农民推着自行车，正在出卖挂在两边的两大筐蔬菜，便围上去召开了马路批判会，向那农民高声诵读“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人民公社好”等毛主席语录，直至那个农民把蔬菜送到市场管理部门。

[70]《财贸战报》1968年3月10日第33期。

[71]同上。

[72]“革命的同志们，你们可要警惕啊”《政法战报》1968年4月10日第三十二、三十三期合刊。

[73]“把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菜老虎’揪出来”《工人造反报》1968年10月24日。

[74]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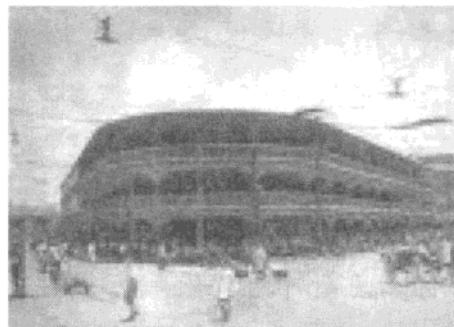
[75]“蔬菜纵有上百种，人民需要伲就种——谈限制商品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解放日报》1975年8月25日。



附一：

上海“文革”时期菜场、批发机构及其 包装、运输等情况

菜场：据 1966 年统计，上海中心菜场为 149 个，其中合作菜场 138 个，国营菜场 11 个，包括分场、门市部、供应网点 500 个上下。大体形成以中心菜场为核算单位，大中型菜场为主，分场、门市部和里弄供应点为辅的供应网络。当时在上海蔬菜供应方面起骨干作用的大型室内菜场（均为解放前留存）主要有：八仙桥菜场（1929 年建成，钢筋水泥 2 层）、福州路菜场（1930 年建成，钢筋水泥 4 层）、三角地菜场（1920 年建成，钢筋水泥 3 层）、松潘路菜场（1925 年建成，钢筋水泥 1 层）、陕西北路菜场（原西摩路菜场，1928 年建成，钢筋水泥 3 层）、西康路菜场（原大自鸣钟菜场，钢筋水泥 2 层）、大沽路菜场（原马力斯菜场，1925 年建成，钢筋水泥 2 层）、福建北路菜场（原唐家弄菜场，钢筋水泥 2 层）、凤阳路菜场（原白克路菜场，1928 年建成，钢筋水泥 1 层）等。比较有名的马路菜场有：宁海东路菜场、宁波路菜场、牛庄路菜场、永安路菜场、广西路菜场、平望街菜场、黄河路菜场、巨鹿路菜场、嘉善路菜场、华山路菜场、乌鲁木齐中路菜场等。



上海三角地菜场

蔬菜批发机构：据 1965 年 5 月的统计，上海蔬菜批发机构市区有南市、北市、曹家渡 3 家经营部，下设 19 家交易市场和 7 家收购站（分站、联络站）；郊县有上海、嘉定、宝山、川沙 4 家经理部。1966 年市区 3 家经营部改为市蔬菜公司第一、第二、第三经营部。1968 年

起,郊县 4 家经理部改为市蔬菜公司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经营部。因“文革”时期的蔬菜经营方式又改为统购包销,所有交易市场均改为蔬菜购销站。1974 年 1 月,市蔬菜公司建立第八经营部(中山东二路 5 弄 5 号),除主营蔬菜种子外,兼营酱菜、淀粉等业务。上述批发机构因蔬菜生产流向、水陆交通要道及历史习惯而布局,整个“文革”时期直至 80 年代,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包装:自 1961 年始,上海对郊区菜农运送蔬菜进城的包装实行“以铁代竹”,即用强牢度的铁筐代替竹筐和竹篓,效果很好。铁筐有方、圆两种规格,方铁筐大号面长 72 厘米,面阔 56 厘米,底长 55 厘米,底阔 45 厘米,高 45 厘米;中号面长 62 厘米,面阔 48 厘米,底长 50 厘米,底阔 40 厘米,高 42 厘米。圆铁篮,大号直径 70 厘米,高 45 厘米;中号直径 65 厘米,高 42 厘米。在运作过程中,蔬菜购销站往往忽视包装的及时回收,很多菜场长期借用和拖欠,加剧了包装不足的矛盾(因钢材紧张)。长期以来,上海的铁包装每年维持在 35 万只左右,勉强保证正常的周转使用。70 年代后期,具有轻、牢、软、通风等优点的塑料网眼袋用于茭白、土豆、毛豆等包装。1984 年出现塑料周转箱,逐步实行“以塑代铁”。

运输:自 60 年代起,郊区蔬菜进城的水运比重下降,汽车运输的比重(包括企业支援)占总上市量的 60% 上下,全市每晚出动运菜的汽车少时 200~250 辆,多时达 400~450 辆。后中远郊菜田缩减,交易市场多在近郊,农民用非机动车送菜进城比重上升。1964 年,市蔬菜公司对农民运菜进城实行“四统一”:即运输对口组织统一(生产队与菜场挂钩),运价统一(每 50 公斤/公里为 3~4 分,过江 4~4.5 分);运输结算统一(通过银行);发放补贴粮统一(原发放给个人,改为发至生产队)。至 60 年代后期的统计,全市参加送菜的生产队有 950 个,非机动运输车辆 3 500 多辆,每天承运蔬菜 2 000~

2 250吨,约占上市总量的70%,生产队每年运费收入在300万元以上。^[1]1975年起,社会上一度刮起“抢菜风”,特别在番茄、黄瓜等上市时,“在普陀区等市郊接合部一些无业之流结群抢菜,有的殴打农民”。^[2]同时正值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人提出送菜农民收入过高应加以限制等。于是,农民送菜进城的车辆急剧减少(停运达1 000余辆),约占总上市量的30%的菜运不出去,有的购销站积压量高达几百吨,各蔬菜经营部门纷纷告急。1976年夏天,市蔬菜公司派人去北京学习机动车代替马车送菜的经验。1977年6月,市商业二局与市农业局作出以社队为主、开展以汽车代替劳力车送菜的决定。

注 释

[1] 李君如:《个性的孵育与规范》,见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当年在上海郊区插队的李君如写道:“到达生产队的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召开知青座谈会,书记劈头第一句话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说:

‘从今天起,你们要记住:种田是为自己的。’……‘为革命’的满腔热血,瞬时间都转化为自己管理自己……新采的豌豆,当天就要送到城里去,别人一车装两袋,我装三袋,不仅多了工分,而且多了信任。”

[2]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页。再据“桥头盛开向阳花”《红小兵报》1976年10月6日报道:中山桥里委党支部针对有人捞蔬菜、瓜果,发动几百名青少年组成桥头服务队,分成十四个服务小组,每晚轮流到桥头值勤。既帮菜农推车上桥,又与不良倾向开展斗争。



附二：

上海“文革”时期蔬菜加工业及其供销

上海蔬菜加工业包括酱腌菜、咸菜豆芽、豆制品、脱水菜(菜干)、速冻菜等行业，属蔬菜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的组成部分。从调剂口味的角度说，这是上海食品供应的特色之一，构成上海市民的喜爱；从增加品种的角度说，这对上海淡季市场鲜菜供应不足，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据统计，上海 1966 年至 1976 年，全市供应加工鲜菜总量为 106.7 万吨，平均每年 9.70 万吨，约占年鲜菜总批发量的 8.07%。^[1] 主要品种有莴苣、生瓜、大头菜、长圆萝卜、青萝卜、胡萝卜、大蒜头、刀豆、红黄葱头等。^[2]

酱腌菜行业：1965 年，全市有蔬菜加工场 12 家，国营 2 家，公私合营 10 家。“文革”破四旧时，原合营的上海扬州、荣祥丰、五福、鼎泰、源丰祥和戴万美等加工厂，分别改为国营南市、红星、大众、延安、东风、闸北、星火和杨浦酱菜厂。同年 12 月，原由郊县经营的新泾和江湾酱菜加工厂划归市蔬菜公司。^[3] 整个 60 年代中后期，上海的酱菜生产有所上升，每年在 1.2~1.5 万吨之间，销量在 1.1~1.4 万吨左右，平均每天零售达 3 万多公斤。^[4] 进入 70 年代，酱菜列为战备物资，供应水平较大幅度地下降。1971—1973 年间，年销量维持在 0.8 万吨左右。为确保日常供应，市蔬菜公司自 1972 年 2 月起，实行“按厂划区，定点供应，划而不死，区别对待”的办法，将全市酱菜厂划分若干地区，对口供应。市第一食品商店、全国川湘土特产商店、大丰、万里、永红、群众和上海果品商店等几家特色商店，则可根据历史销售习惯，在全市各厂进货。^[5] 上海生产的酱菜价格自“文革”前的 1965 年作过调整，如面酱乌笋由 0.36(元/500 克，下同)提升到 0.45；酱油乌笋由 0.30 提升到 0.32；甜包瓜(甲)由 0.50 下降到 0.46；面酱

生瓜(甲)由 0.29 下降到 0.27 等,直至 1985 年都没有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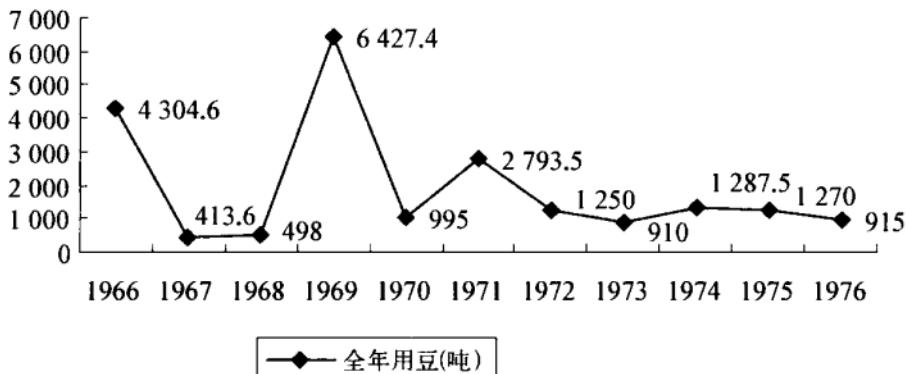
咸菜豆芽行业:“文革”前,全市共有 16 个咸菜豆芽合作工场,其中大型工场 6 个,中型和小型工场各 5 个,共有职工 2 867 人。“文革”中,为统筹生产和供应,每区合并建立 1 个咸菜豆芽加工场(中心场),下设多家分场。^[6]60 年代中后期,工场负责生产,菜场负责包销。1972 年起,黄浦、静安、长宁三区将工场大半人员划归菜场编制,实行产销一体。其他各区仍保持工场到菜场设摊自销的做法。

上海地区的咸菜豆芽工场一般生产咸雪菜、咸白菜、咸弥陀芥菜和黄豆芽、绿豆芽、发芽豆等品种。弥陀芥菜以春天加工为主,大青菜以秋天加工为主,成品率一般在 50%~65% 之间;雪菜加工在春秋两季,成品率一般达到 70%~75%,一季加工,周年供应。60 年代,上海咸菜供应量保持在年销 3.5 万吨到 4 万吨,每月人均吃咸菜 500 克左右。70 年代,咸菜作为“战备菜”,持续大面积安排生产和加工,最多的年份如 1971 年(鲜菜原料:雪菜 29 900 吨+青菜 7 300 吨=37 200 吨。下同)、1973 年(雪菜 29 500 吨+青菜 8 050 吨=37 550 吨)和 1976 年(雪菜 34 950 吨+青菜 3 700 吨=38 650 吨),不仅将鲜菜推到里弄叫卖,广泛动员社会加工,甚至还租借游泳池腌菜。每逢淡季,菜场便增加咸菜销售摊位,增加秤手,增加咸菜盆菜供应(咸菜配豆腐干和百叶等),以至动员鲜菜摊位参与卖咸菜,缓解居民吃菜的困难。据统计,当时咸菜的日供应量一般在 80~90 吨,最高一天销售竟达 150 吨左右。^[7]

豆芽菜口味清淡,价格低廉,是深受上海市民喜爱的大众菜。“文革”期间的生产与供应状况极其不稳定。

如下页图所示,上海 60 年代中后期豆芽菜用料呈现大幅度的跌宕起伏(低至 1967 年的 413.6 吨;高至 1969 年的 6 427.4 吨,相差 15.5

上海“文革”期间豆芽菜用料统计图



资料来源：《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倍)。至70年代，则走出一条低水平的平衡线，一般维持在年用豆千吨左右，这与豆料多用于战备储存相关。所以，上海“文革”时期的豆芽菜实行计划供应，国庆、春节期间，才向每个居民供应500克，供应水平充足时全年人均为0.40元，短缺时只有0.06元。^[8]豆芽菜成了上海市民的稀缺食品。

豆制品行业：1965年时，全市有26个豆制品工场。1970年1月，南市区率先对全区的豆制品加工场实行合并。接着，各区以建立一两家大型豆制品厂为目标撤销众多小工场，至年底，全市形成独立核算的豆制品厂17家。以后，为更新设备，解决生产蒸汽、噪声与市容环境、居民生活的矛盾，如坐落在市中心的卢湾豆制品厂等又进行了迁厂扩建(新厂房3层，达2 000平方米)。同时大部分筋粉生产工场(指生产烤麸、素肠、油面筋、粉丝、粉皮、麻腐等)亦一起并入豆制品厂。^[9]就此，上海豆制品行业的生产构架得以调整，生产环境得以改善。

1960年起上海豆制品实行凭卡定量计划供应，由于各供销单位执行情况不一，1965年12月，市蔬菜公司制定了《关于改进零售豆制品供应方法的意见》，统一全市经营方式和批零差价，即由工场负责生产，菜场负责经销(批零差价平均为16.2%)。这种经营方式贯穿

于整个“文革”时期，一直延续到 70 年代末。

“文革”期间，上海豆制品生产维持在年大豆投料量 2 万吨左右，最高年份为 1966 年的 27 134 吨；最低年份为 1973 年的 18 089 吨（50 年代初，上海豆制品敞开供应时，大豆年投料量均为 3 万吨以上，其中 1954 年达到 41 497 吨），整体上呈现降落的态势。在市场供应方面，上海市民凭证每人每旬可购人民币 4 分的豆制品（直到 1987 年，上海市民的豆制品供应才改为每人每旬人民币 6 分），全年为 1.44 元。每逢国定假日略有增加，增加多的年份如 1966 年的 0.17 元（全年 1.61 元），1969 年的 0.27 元（全年 1.71 元），1975 年的 0.18 元（全年 1.62 元）；增加少的年份如 1967 年的 0.02 元（全年 1.46 元）和 1968 年、1972 年的 0.06 元（全年 1.50 元）。那么，每人每旬 4 分钱的标准，可购买多少豆制品呢（自 1957 年市蔬菜公司定价以来，20 年未变动）？即豆制品各个品种的零售价是多少呢？如嫩豆腐每块 4 分；豆腐干每块 1.66 分，5 分 3 块；薄百叶每张 3.33 分，1 角 3 张等。只是由于“文革”时期的种种干扰，质量不稳定，出现“老豆腐不老，嫩豆腐不嫩，臭豆腐干不臭，香豆腐干不香”的状况。为此，1974 年 1 月，市蔬菜公司革委会印发《上海市豆制品、淀粉规格、质量、价格》铅印小册子，定出具体的规格和质量标准，要求各豆制品加工厂参照执行。

因为供应短缺（含各类副食品），上海市民不仅将豆制品当作鲜菜之外的调剂食品，更当作改善生活的时尚食品。一锅豆腐菜叶羹可以是家庭餐桌上难得的欢喜；一碟芹菜炒干丝可以是单位食堂里多日的紧俏，以致为了在夏天买到粉皮，在冬天买到豆腐，不得不三更半夜地起床排队。许多家庭还经常“旬初舍不得吃”，导致“旬末排队购买”。1974 年 11 月 1 日，市蔬菜公司在西康路菜场召开现场会议，推广该单位豆制品销售“勤提货、巧安排、不放秤”的经验，积极做

到旬末早开秤、增摊位等。^[10]据现今许多中年以上的市民回忆：当年能吃上豆制品就是改善伙食。

上海的脱水菜(菜干)、速冻菜生产在“文革”期间获得发展，包括从日本引进生产装置，因产品多用于军需和外贸，兹不赘述。

注 释

[1]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6—177 页。

[2] “文革”期间，上海酱菜市场供应的品种有：紫香大头菜、酱萝卜、常州萝卜干、萧山萝卜干、甜包瓜(以上 5 个品种的生产、采购和定价由市商业二局管理)。还有玫瑰大头菜、上海大头菜、龙须大头菜、佛手大头菜、桂花仿云南菜、本色玫瑰大头菜、酱大头菜、枣香萝卜片、紫香萝卜、佛手萝卜、咖喱萝卜、辣椒萝卜、咸青萝卜条、人参甜萝卜、辣酱萝卜、辣萝卜干、青萝卜丝、乳腐卤萝卜、蜜枣萝卜头、酱萝卜头、酱萝卜头丁、甜萝卜头、面酱生瓜、酱油生瓜、面酱黄瓜、玉露乳瓜、白糖小乳瓜、甜酱乳瓜、甜乳瓜、面酱乌笋、酱油乌笋、什锦菜、酱油洋姜、酱青辣椒、酱生姜、甜酱芽姜、红辣椒酱、白糖大蒜头、糖醋大蒜头、糖醋芥头、玫瑰香片等(以上品种的生产、采购和定价由市蔬菜公司管理)。

[3]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6 页。

[4] 同上书，第 276 页；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1 页。

[5]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0 页。

[6]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3 页；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5 页。

[7]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7 页。

[8] 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4 页。

[9] 同上书，第 3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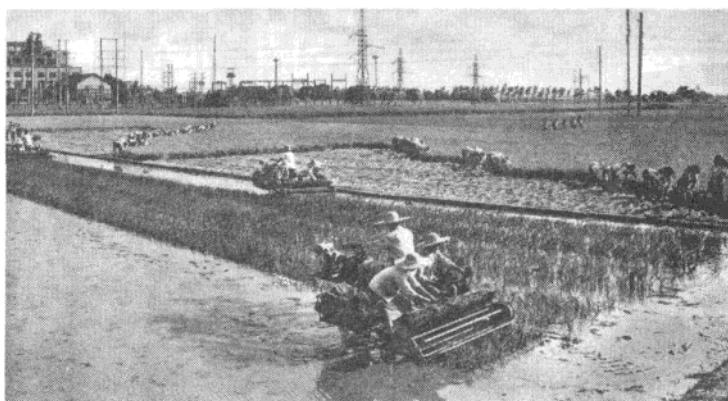
[10] 同上书，第 315 页。

第十一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粮油供应 ——兼论“国家管理”的“在位”

一、上海的粮油市场

“文革”爆发前夕的 1965 年，上海郊县开始种植双季稻。至 1969 年起，便加速推广粮田一年三熟制（麦、稻、稻），水稻播种面积增加，1971 年达到 517.37 万亩。1972 年，市郊早稻面积达到 202.8 万亩，比 1965 年增加 1 倍，总产量增加 1.4 倍。“上海郊区以双季稻为主的格局一直保持到 1984 年”。^[1]请看表一：



一边收割，一边插秧。“文革”时期上海市郊推广双季稻（徐建刚提供）

表一

上海 1966 年至 1976 年度粮食产量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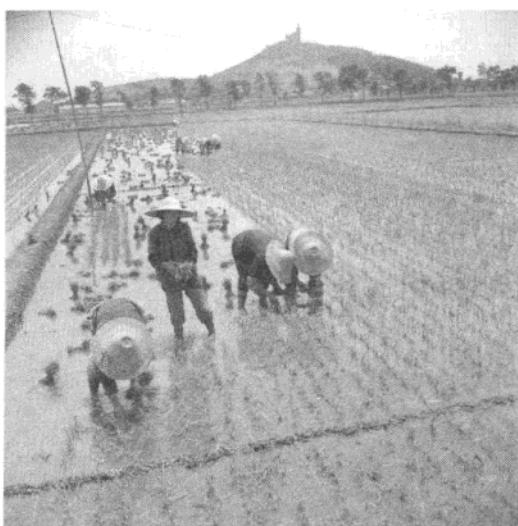
单位：万吨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粮食	186.41	183.81	185.42	208.03	212.02	218.94	228.99	244.32	248.36	230.05	252.39

资料来源：《上海计划志》，第 160 页。

如表一：上海“文革”期间的粮食产量，基本呈现稳定递进的局面。积十年之增长，1976 年的产量甚至比 1966 年多达 65.98 万吨，增长率达 35.4%。^[2]应该承认，这种直线上升的态势，除了推广“一年三熟制”（耕地面积增加），60 年代中期以来，上海郊区电力网的普及，^[3]县、公社、大队三级农机修配网的形成，^[4]化肥、农药的使用等，^[5]均是直接而重要的原因。

自 1965 年起，上海实行粮食征购基数“一定三年”不变。基本原则是收藏于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关系。至 1967 年，中央下达上海粮食征购任务贸易粮 3.9 亿公斤，折合原粮 5.09 亿公斤（实际落实到各县为原粮 4.87 亿公斤）。其不足



上海郊区粮食生产（吴四一提供）

部分，除通过增产增购和工业品换购余粮办法解决外，还取消棉花奖售粮，从减销途径中解决。1968 年，原“一定三年”的政策沿用一年。丰收地区实行超产超购奖的办法；^[6]受灾减产地区，经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动用集体储备粮和组织队间调剂，或由国家根据实际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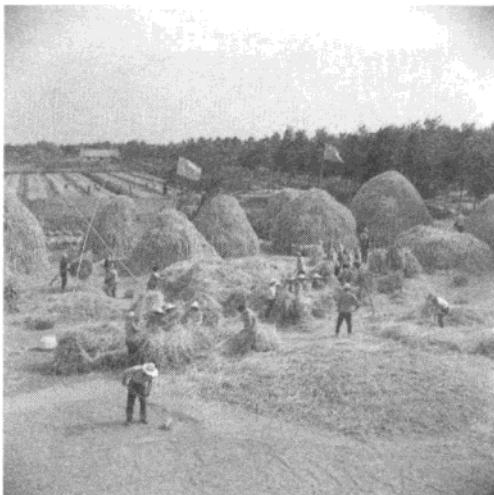
上海郊区粮食生产(吴四一提供)



上海郊区粮食生产(吴四一提供)

给予缓交或减免一部分征购任务。1969年6月制定第二个“一定三年”粮食征购任务,计划征购原粮4.62亿公斤,比上一个“一定三年”减少0.47亿公斤。1971年8月中共中央下达50号文件,上海便将已部署落实的“一定三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改为“一定五年”。^[7]原来国家对生产队实行“三定”,即“定粮食产量,定国家征购和统销,定集体留粮”,亦改为只定“征购”任务,对超购粮食则实行加价30%;生产队人口变化“生不增死不减”;人口迁进迁出由生产队之间协商处

理。^[8]就此,上海郊区粮食生产和征购均超额完成任务。据统计,上海“四年征购和增产增购的粮食共计 47.020 0 亿斤,占分配总产量的 26.8%,除去缺粮队统销 7.701 0 亿斤,净征购 39.324 4 亿斤,占分配总产量的 22.49%。同时农村留粮增长较快,四年来留粮共 129.895 7 亿斤,占分配总产量的 74.29%。全郊区 95% 的生产队有了贮备粮,其中金山县的贮备粮已超过社员的半年口粮;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的贮备粮已达 42 个月口粮。至 1974 年社员口粮水平每人平均 536 斤,比 1970 年提高 24 斤”。^[9]



上海郊区粮食生产(吴四一提供)

再看上海郊区油料收购的情况。“文革”前,上海郊区油菜籽种植面积不少于 80.2 万亩,有关管理部门对种植油菜籽的生产队“确定购、留比例、包干统购、只购不销”。^[10]同时,国家按定量供应农民口油,为每人每月 2 两,并实行奖售办法,如统购部分每百斤油菜籽奖售食油 2 斤,超产部

分每百斤则奖售食油 4 斤,^[11]外加票证奖励。^[12]1967 年始,上海油料统购任务落实到生产队,实行全购全销,农民的口油以每人每月 3 两,按人定量分月供应。生产队向国家交售油菜籽,统购任务以内每百斤奖售食油 2 斤,超售部分每百斤奖售食油 6 斤。^[13]1971 年 9 月 14 日,市委批转市粮食局革委会《关于执行中央油料收购政策的请示报告》中的规定:从 1972 年起,生产队在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和按政策留下种籽、口油后,增产的油菜籽实行协商增购政策,按统购价加价 20% 给予奖励。^[14]社员自留地种植的油菜籽,交售给国家的则

采取加价 30% 收购,或每百斤油菜籽奖售食油 34 斤。政策的变通与优惠,促进了油料统购任务的完成和奖售条款的落实,以致在“文革”大批判思想路线的引导下,中共金山县委竟然于 1974 年 5 月向市委、市革会反映:“社员的吃油水平不低,自留地油菜籽的奖售基本上自己不食用,有的以

油票换粮票,或高价出售油票、粮票,助长了农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影响自留地补充社员的口粮和养猪饲料,因此,对自留地油菜籽一律加价收购,不奖食油。”后经市革委会财贸组、郊区组同意:最近三年,仍按原规定办法,可加价收购,也可奖售一部分食油,具体由各县自行掌握。结果“出现因各县规定不统一,毗邻地区部分社员往奖油的地方跑,有的还流到邻省去”。^[15]总之,综合考量“文革”期间上海的油料收购和供给,尽管也有受灾严重的年份,需要提请国家增拨,^[16]但基本做到了口油自给,^[17]洵属来之不易。

对上海这座一千多万人的城市来说,郊区的粮食供应终究是杯水车薪,且历史上、现实中均以全国调运为主。^[18]三年困难时期,甚至“将南昌、吉安等地仅能维持一、二天的内销粮,优先调出,支援上海”,^[19]难怪有关领导大声疾呼“浙江、江西保上海,你们一定要保住。上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命根子,上海不能叫它发生问题”。^[20]正是遵循着这条政治至上和计划为重的路线,“文革”十年间外省(含国库)向上海调运了大量的粮食。具体情况胪列如下:



上海郊区油菜丰收(吴四一提供)

表二

1966 年至 1975 年上海粮食调入情况统计

单位：万斤、%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外省	310 670	252 284	302 533	233 210	232 205	270 260	220 702	259 784	227 793	223 700
比例	87.65	76.28	79.57	80.32	74.98	85.25	77.92	82.39	77.78	76.79

资料来源：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调运科 1968—1973 年《粮食(平价)收付存平衡月报表》68—73 永久-2-5-2;1974 年至 1975 年《粮食(平价)收付存平衡月报表》74—75 永久-2-5-2;《上海粮食志》，第 142 页。

说明：本统计缺 1976 年资料。

如表所示：“文革”期间每年调入上海的粮食高达 20 亿斤以上，最高年份为 1966 年的 31 亿多斤，占全市粮食供应的 87.65%;最低年份为 1972 年(受灾)的 22 亿多斤，占全市粮食供应的 77.92%，十年平均供应量占全市粮食供应的 79.89%，可见外省粮食调入一直保持在高位平稳运行，对上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具体以 1973 年为例：因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的原则，当年全国天南地北(南有广东、福建等；北有黑龙江、吉林等)共有 15 个省份向上海调粮，调粮最多的 3 个省份是浙江(61 429 万斤)、江西(58 316 万斤)和安徽(40 387 万斤)，甚至连北京市都在 10 月份向上海调运粮食 6 万斤，足见落实“全国保上海”方针的广度和力度。^[21]

另据有关资料记录：1968 年中央各省调给上海的粮食仅三个季度就达调运计划的 111%，其中 9、10 两个月共调进 41.5 万吨……调沪粮食中 60% 均系白米，露天场地已堆放白米 5 万吨。^[22]“上海货场储粮逐步达到饱和状态……1968 年至 1969 年，所有仓库、货场堆满粮食，其间还借用徐汇、闸北、黄浦区工人体育场等 15 个单位的空地，计 21.1 万平方米作货场搭建露天桩，共储存粮食 14 258 万公斤”。^[23]有时因调运粮食集中抵达，一度在车站、码头造成积压，市革

委会工交组、市粮食局革委会曾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全市运输部门抢卸抢运。如1975年6月11日至15日,共出动突击人员1855人,卡车155辆,抢卸运输粮食91货车皮,计3638吨;^[24]1976年6月11日至17日,市粮食局革委会出动机关干部、工人2340人次,卡车112辆,连续开7个中班,抢卸抢运粮食3969吨。^[25]对上海来说,粮食供应确实不同于蔬菜,蔬菜以郊菜为主,客菜为辅,短缺时期仍可以咸菜、萝卜干、海带等临时应对。粮食供应则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作保障,即便外省调入困难,也得动用国家库存弥补缺口。如1974年度,上海因粮食销售增加,就调用了国家库存粮食4545万公斤。^[26]应该指出,“文革”时期外省大规模向上海调粮,源自于1962年以来全国农业的连年丰收,尤其粮食方面“从1966年至1976年间,除1968年和1972年减产外,其余九年都能稳定增长,总产量由21400万吨提高到28631万吨,平均亩产量由118公斤提高到158公斤”。^[27]张春桥曾针对“文革”初期农业丰收混淆黑白地断言:“现在最明显的,各个省市委瘫痪了,农业收成还是很好的,可见人民决定着历史的命运。”^[28]其实,这哪里是“革命促进生产”的结果,恰恰可以断言的是:没有基层群众的辛勤劳作和风调雨顺促成的农业增产,中国的“文革”运动根本维持不下去。

在上海的粮食市场中,除了本地征购和外地调运的份额,还有一定量的进口粮。^[29]据统计,“1966年至1976年,上海共进口米6313.5万公斤,其中籼米2640万公斤,粳米3673.5万公斤”。^[30]但小麦进口量较大,1966年至1970年度,上海口岸进口外麦1514830吨(同期调入国麦只有4275吨)。1971年至1976年度,国务院决定以出养进,增加粮源,即以优质大米和小杂粮出口,买进国际市场价格低廉的小麦和玉米。其中1973年6月,国务院决定利用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上升(1吨大米可换2吨小麦)的有利时机,从国家

储备中拨出 100 万吨大米增加出口,以换回更多的小麦。^[31]据统计,这 5 年上海口岸进口小麦 2 131 250 吨。^[32]且“文革”十年间,上海的面粉年销售量平均达到 337 497 吨,最高年份为 1973 年的 392 905 吨;最低年份为 1970 年的 259 290 吨。^[33]就此,鼓励和推进上海人“吃面粉”,便成为一项政治任务。^[34]请看 1968 年 2 月 26 日上海《支部生活》面向全市市民所刊登的“关于调整供应大米、面粉品种比例问题的答复”:

目前的粮食形势和整个政治、经济形势一样,是空前大好……表现为全国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年产水平,国家粮食充沛,已不吃进口粮。之所以要调整供应大米、面粉品种比例……是因为某些品种上还有不平衡情况,北方增产大于南方,其他品种粮食增产多于大米。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国家对全国粮食品种的调拨安排,要求北方城市多吃点杂粮,上海适当多吃点面粉,少销些大米。为此,我市的粮食供应,从二月份起已实行按比例供应米、面的办法……虽然对原来多吃大米的一部分居民带来一些生活习惯上的改变,对各个集体伙食单位更要增加很多工作和必要的手续……这样做,就能支持全国生产和供应以及一部分出口的需要,也就是支持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了世界革命……同时要严防敌人趁机造谣破坏,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及时揭露和打击他们的各种阴谋活动。

诚然,即便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作为国家管理的职责和功能仍在运行。所以,在外贸方面,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差价,以大米换回成倍的小麦,鼓励城市居民多“吃面粉”,应该是相当正常的举措。以致当时上海的许多家庭学会了擀面条(菜汤烂糊面)、蒸馒头等家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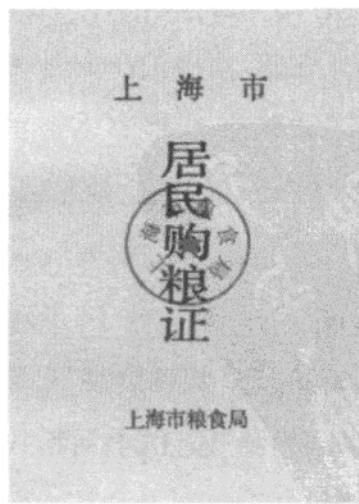
活,摊面饼、下面疙瘩等则成了家常便饭。

然而,值得追问的是:明明是正常的社会供需,为什么偏偏还要申明形势“空前大好”,更要强调多“吃面粉”,是“支持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了世界革命”?如此夸张和盛大的推演,再加上宣布“严防敌人趁机造谣破坏”,必须“揭露和打击他们的各种阴谋活动”的严厉儆戒——恰是这一软一硬的两手,将意义的鼓吹和行动的惩治串联起来了。在此,固然是“文革”“政治至上”、“路线至上”的意识形态的牵引,但以非常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体系,为正常的“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涂抹一层大红的色彩,不啻是非常的荒诞和悲哀。

二、口粮、口油与票证管理

票证和票证管理从何而来?乃是计划供应的产物,而票证恰是计划供应的量度和记录。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实行市镇居民凭证按定量(口粮)计划定点供应。上海属大米为主地区,全市于10月16日开始实行以人定量的供应办法。^[35]就此,上海印制了《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和“上海市粮票”(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其面额分为一两、四两、半斤、一斤、二斤、五斤、十斤7种(十六两制。面额以成品粮为单位),只限于本市(当月)使用。^[36]1958年8月份起,上海增印长期通用的“上海市粮票”,其面额为半斤、一斤、二斤、伍斤、拾斤5种。^[37]此后,1960年5月、1963年4月和1965



年1月,上海又发放了不同版本的“上海市粮票”,^[38]直至“文革”时期,这几种版本的粮票均在流通使用。^[39]1972年6月,上海发放供长期使用的1972年版“上海市粮票”,其面额为半市两、壹市两、贰市两、伍市两共4种。^[40]“文革”后的1990年7月,上海发放、使用法定计量单位的新版“上海市粮票”(简称“新版小额粮票”),其面额为25克、50克、100克、250克4种。^[41]直至1993年4月1日,上海市正式取消粮油供应票证。

在1955年至1993年长达38年的粮票流通史上,上海建立起了市、区、街道三级构架的票证管理机构,实行分条分级管理。具体在市一级的统一规划下,在各区粮食局设立票证科,配备干部4~6人,负责全区范围内票证发放的布置、指导和检查工作。街道则成立粮食管理所(与粮油中心店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负责粮油供应的管理和对所属里弄的“以人定量”或按户定量的票证发放工作。为方便居民,粮食管理所一般按两至三个里委派出一个小组,在粮店附近设点办公,办理票证发放和居民粮食关系转移等。^[42]即便在“文革”时期,上海的票证管理体系仍然健全而稳定地运行,包括追讨红卫兵大串联时借用的粮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转移粮油关系等,体现了“国家管理”的职能和功用。

在此,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上海“半两粮票”的传说。学者杨东平指出:“北京人津津乐道的上海人的洋相:包括半两粮票的小点心。”^[43]其实,岂止是北京人的嘲讽,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人以此为笑柄指戳上海人“守财奴”、“抠门小气”、“锱铢必较”,甚至断言在全国,只有上海一地发放了“半两粮票”。^[44]幸亏杨东平是落户北京的上海人,知道这“半两粮票”是用来买“小点心”的,实际上恰是上海人由“点心精制”印证“生活精致”的表现。所以,此事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就餐券”和“糕点券”。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粮食部门曾发放“就餐券”和“糕点券”，以供市民到饮食店中享用点心，到食品店中购买糕点。^[45] 1963年7月起，上海规定居民购买糕点改为凭定量粮票或本市粮票供应。因上海传统早点类的豆浆、油条和糕点类的桃酥饼、杏仁饼、芝麻饼、椒盐饼、鸡蛋糕等用粮均为半两，便“相应增发100克

(二两)、50克(一两)、25克(半两)的小额月度定量粮票三种，供粮店、食品店、饮食店调换和找零时用”。^[46]在此，与其说实行该措施是取消“糕点券”后，给统一以粮票结算提供方便，不如说是为了保持上海传统食品业精细化和花式化的生产品质，以满足上海市民的口味习惯和需要(当时北京等城市生产的点心，确实大、粗、硬，且多以斤两为单位购买)。此后，“文革”运动爆发前夕的1965年1月，上海索性取消“按月使用”的小额定量粮票，改用二两、一两、半两等三种供“长期使用”的小额粮票。见表三：

表三

1966年至1976年上海市区熟食、糕点用粮统计表

年份	单位：吨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熟食	87 965	88 595	93 090	90 425	82 090	87 305	93 605	96 990	98 965	104 340	111 335
糕点	25 290	22 270	22 270	28 080	29 775	28 945	29 435	30 685	34 775	40 895	48 395

资料来源：《上海粮食志》，第90—91页。

说明：熟食指饭菜、面条、大饼、油条、豆浆等。糕点指花式饼、面包、饼干等。



上海糕点店的蛋糕收“半两粮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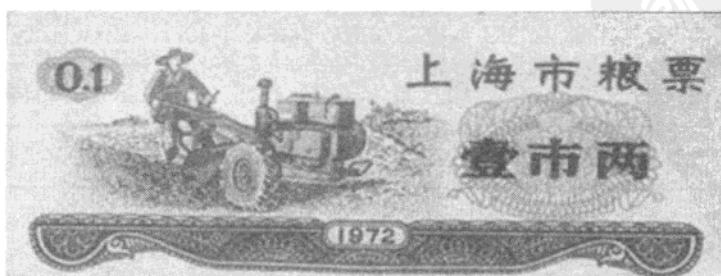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如表所示：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市区饮食店的熟食和食品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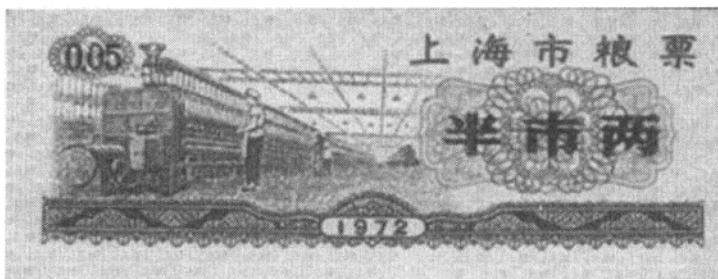
糕点供应,大致保持在年8万多吨至11万多吨、2万多吨至4万多吨之间,即平均每天在数十吨至数百吨之间。^[47]如此用粮数,不是在单位的食堂里,更不是在家庭中,而是在遍布大街小巷的饮食店、食品店中供应和销售,没有数以(百)千万斤的小额粮票在市场中流通,便难以维持整个局面的正常运转。尤其1972年以后,熟食和糕点的供应量均直线上升,据有关报道:当时在百年老市场豫园,南翔馒头、糯米糖粥、面筋百叶、鸡鸭血汤等小吃点心深受欢迎,一度断档的常州小麻糕、杭式面包、鸽蛋圆子也都恢复供应。^[48]所以,1972年6月上海改换新版粮票时,继续保留并扩大发放小面额品种的数量。由此可见,“半两粮票”等小额粮票在“文革”中是普遍使用、广泛流行的。至于它后来被各地的舆论逼迫到一个局促之境,承负上海人“精明不大气”的骂名,那实在是误读了上海人追求精致生活的情趣和兴致。包括在“文革”的非常时期,生产者仍不忘点心的精美,消费者仍不忘点心的可口。上海“半两粮票”的故事,一直延续到粮票票证终止使用。



二市两(上海市粮票)



一市两(上海市粮票)



半市两(上海市粮票)

下面看上海“文革”时期粮食定量人口与供应水平的关系。

表四

1966 年至 1976 年上海粮食定量人口与月定量水平统计

单位：万人、公斤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人数	715.73	712.69	715.89	677.40	653.49	643.95	638.35	636.78	633.48	630.94	630.89
定量	13.625	13.815	13.925	14.115	14.255	14.375	14.615	14.735	14.855	14.97	15.06

资料来源：《上海粮食志》，第 80 页。

如表所示：1968 年以后，上海的粮食定量人口（指享受城市供应的市区和郊县城镇的非农户）呈现平缓下降的态势，至 1970 年时，甚至直线减少 62.4 万人。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学校的大批毕业生通过上山下乡运动，完成了“非农户”向“农户”的身份转化。^[49]然而，上海同期的粮食月平均定量水平却呈现平缓上升的态势。这种交叉的组合，说明上海“文革”时期的粮食供应充足而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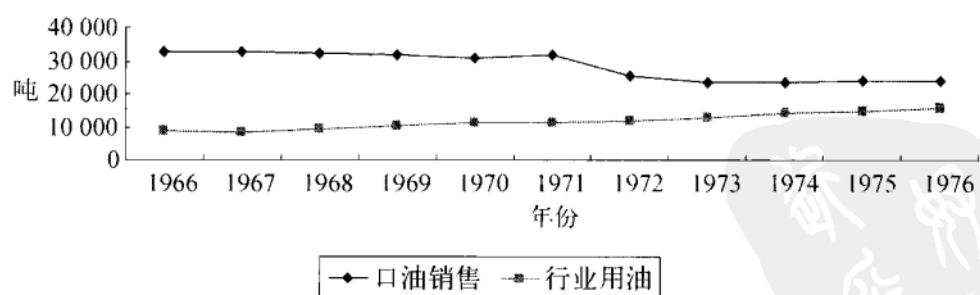
1955 年，上海初始实行职工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时，人均月定量水平为 11.83 公斤。具体按照工种（共 1307 个）、劳动强度等定为 9 等 19 档。^[50]以此为基准，市粮食局曾对儿童、在校学生等粮食定量标准作过微调。^[51]对口粮不足者，则有各种补助等措施。应该承认，“文革”时期除了婴儿出生报进常住户口后，即当月起全数供应粮食（1971 年 3 月规定），以及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生参照全日制大

学生标准(每人每月 33.5 斤)供应粮食外,^[52]各类粮食定量标准均没有发生变化。反倒是各种名目的粮食补助直线增长,尤其 1972 年时,上海全年的粮食补助高达 43 830 吨,其中夜餐补助粮 12 985 吨;1975 年时,全年的粮食补助更高达 57 695 吨,其中夜餐补助粮 17 355 吨。^[53]固然,这与上海各工矿企业“促生产”,增开中班、夜班有关,还应与上海各条线“抓革命”不无关系,例如据统计:1971 年 1 月至 5 月,上海共为参加“野营拉练”的 884 435 人,补助粮食 3 606 054.3 斤,平均每人 4.07 斤。^[54]包括 1973 年时,上海“派出一千余支民兵小分队,深入里弄”,^[55]其夜间的巡逻活动等,无疑应享有粮食的补助。另外,在特需用粮方面,例如“文革”初期对外宾、外侨的供应,就规定外国领事馆及外国驻沪机构人员的口粮、口油,由指定商店不定量供应;外国侨民每月的粮食定量则为脑力劳动者 30 市斤,体力劳动者 34 市斤至 40 市斤,食油每人 7 两半。^[56]至 1975 年底,有关部门通知今后国际海员、外国驻沪机构人员、专家、留学生、实习生等外宾,自行上街购买粮油和粮食制品,一律免票免证供应,供应后做好记录,经两个营业员证明备查。对无法辨认者,一般可按外宾对待。^[57]对归国观光、探亲、治病三个月以内的华侨、港澳同胞等,在报入临时户口后,粮食按每人每天不超过 1 市斤、食油每人每月 1 市斤的标准发放票证。住宿在市属饭店的华侨、港澳同胞,则由所在饭店按个人自食需要发给。^[58]再例如对犯人、劳教人员的用粮,1973 年 7 月,上海市粮食局革委会下发《关于调整在押犯生活供给标准的通知》:将每人每月 13~15 公斤的囚粮标准,修改为特重体力劳动,每人每月 24 公斤;重体力劳动,每人每月 20 公斤;轻体力劳动,每人每月 16 公斤;不参加劳动,每人每月 13.5 公斤。^[59]正是这些因素的集合,使上海的粮食供应水平保持了稳步增进的态势。

中国的票证史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一般多以权重之首的粮票为发端。然而,在上海却因制止“奸商套购外运”等原因,[60]首发的票证是 1954 年 3 月 1 日使用的“买油券”,其面额为壹市两、肆两、半市斤三种,另有壹市斤、拾市斤主要供熟食业使用。[61]“买油券”每月一次发给,分上半月、下半月两期购买,过期无效。本市市区居民每人每月 1 斤,郊区居民每人每月 12 两(16 两制),[62]以后则有所调整和变化。在此,如果以票证核准上海居民食油定量的情况,该阶段当为最高年份,最低年份为 1962 年 7 月至 1964 年 4 月,每人每月 2.5 两(十两制)。[63]“文革”运动爆发前夕的 1965 年 8 月起,上海口油定量核准为市区居民每人每月 5 两;城镇居民每人每月 4 两;农村农民每人每月 3 两(十两制)。逢国定假日则有增补,1966 年春节、国庆时,上海市区居民增补食油每人 5 两,城镇每人 4 两;1967 年后,节日食油增补量为每人 2 两。这个标准经“文革”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

下面请看上海“文革”时期食用油(口油和行业用油)销售量的统计,如图:

1966 年至 1976 年上海口油和行业用油销售数量统计图



资料来源:《上海粮食志》,第 110、114 页。

由图可知:上海食用油分为口油和饮食业用油销售两大类。“文革”十年间,上海口油销售最高年份为 1967 年的 32 815 吨;最低

年份为 1973 年的 23 225 吨,平均为 28 329 吨。以此为界标,不仅整体呈现平缓下降的趋势,还可见 1971 年以后的销售,基本滑行在平均值以下。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历年的口油均自给自足,一般没有充足的余留量提供额外的增补;另一方面是因为上山下乡运动,导致上海的粮食定量人口(油随粮)逐年减缩,口油销售总量自然也就下降了。同期,上海饮食业的用油销售,从 1966 年的 8 800 吨到 1976 年的 15 795 吨,却拉出了一条平缓的上升线。这主要是因为上海饮食业的用油,如油条、粢饭糕、面点等大众点心是根据百元营业额、花式饼、面包、饼干等糕点是根据百斤粮食用油比例来配给的。就此,统计显示上海大众点心的用粮数,从 1966 年的 87 965 吨到 1976 年的 111 335 吨;糕点用粮数从 1966 年的 25 290 吨到 1976 年的 48 395 吨,^[64]均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怎能不拉动饮食业用油同步增长呢?

具体在管理和执行方面,1973 年前上海饮食业实行用油包干的办法。^[65]1974 年时有关部门对黄浦、卢湾、普陀等区点心店、合作食堂进行联合调查,以油条生产为例,当年用油维持在 1973 年度用油实际 4 547 500 斤的水平上(全市平均每天供应油条 897 300 根)。^[66]据此,如果说用油包干是稳妥而又略显保守的办法,那么,上海自 1974 年 4 月起,饮食业便实行按每百元营业额实际用油标准 1.95 公斤、糕点用油按用粮数 10.5% 的标准分配(因配方不同,如上海蛋卷按产量的 11.4%、香草蛋卷按 8% 计算用油)。1974 年 8 月,上海恢复生产鱼皮花生,提高了整体用油量。^[67]其实,仔细辨析各项用油标准并没有增加,但因按生产实际配给油料,即突破了用油包干的框框,产量增长,用油量自然也就增长了。

总之,综合考量上海“文革”期间的各类食品供应,尤其针对实际生活而言,相比于粮食、猪肉和水产品等,上海市民的口油供应水平,

应属于短缺而紧张的。

三、粮价、油价及其议价销售

自 1961 年起,国家提高粮油收购价,因销售价格不变,上海粮油商业发生政策性亏损。这个亏损一直延续至整个“文革”时期,且亏损额从 1966 年的 3 987 万元扩大到 1976 年的 7 093 万元。^[68]“文革”爆发初期的 1966 年 8 月,上海曾对粮价作过调整。

表五

1966 年 8 月 1 日上海(市区)粮食统销价

品 种	价 格	指 数	备 注
标二白梗米	0.164 元/斤	108.25	1954 年 1 月 1 日,0.151 元/斤,指数为 100
标二早籼米	0.143 元/斤	118.18	1954 年 1 月 1 日,0.121 元/斤,指数为 100
标二白糯米	0.205 元/斤	122.39	1954 年 1 月 1 日,0.167 元/斤,指数为 100
富强粉	0.22 元/斤	112.13	1954 年 1 月 1 日,0.196 元/斤,指数为 100
标准粉	0.17 元/斤	97.70	1954 年 1 月 1 日,0.174 元/斤,指数为 100

资料来源：上海市粮食局档案，《1954—1990 年粮油价格、购销价格资料》。

说明：同期上海(郊区)粮食统销价：标二白梗米由 0.138 元/斤提高到 0.16 元/斤；标二早籼米由 0.122 元/斤提高到 0.14 元/斤；糯米由 0.167 元/斤提高到 0.20 元/斤；大豆由 0.14 元/斤提高到 0.155 元/斤；富强粉由 0.205 元/斤提高到 0.22 元/斤；标准粉由 0.162 元/斤提高到 0.17 元/斤(以闵行、松江、嘉定为例)。^[69]长期此价。

这次统销价的调整,依据“各种成品粮收购价加加工费的基础上再稍提高的原则安排”,同时“上海市采取降低中小学杂费和降低煤球零售价等措施,平衡居民收支”^[70]。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夺权后,上海市物价委员会(隶属市人民政府)被撤销。尽管各类物品短缺,却因多数凭票证定量供应,市场管理便按既定流程运作。1967 年中央发出《八·二〇通知》,宣布冻结所有商品价格,

即便不合理的价格也得放到“文革”后期处理。1970年国务院又发出《关于不得自行调整商品价格的通知》，重申冻结物价的规定。^[71]由此，上海自1966年8月调整粳米、籼米、糯米和富强粉、标准粉等大宗粮食统销价以后，直到1978年（共12年）价格没有变动。^[72]

粮价如此，油价如何呢？

表六

1964年5月1日上海(市区)食油统销价

品 种	价 格	指 数	备 注
豆 油	0.88 元/斤	172.55	1954年1月1日,0.51元/斤,指数为100
生 油	0.88 元/斤	172.55	1954年1月1日,0.51元/斤,指数为100
菜 油	0.81 元/斤	172.34	1954年1月1日,0.47元/斤,指数为100
棉清油	0.75 元/斤	161.29	1954年1月1日,0.465元/斤,指数为100

资料来源：上海市粮食局档案，《1954—1990年粮油价格、购销价格资料》。

说明：同期上海(郊区)食油统销价：豆油0.86元/斤、生油0.86元/斤、菜油0.78元/斤、棉清油0.72元/斤。

如表，自1964年5月1日起执行的上海(市区)食用油统销价，为豆油和生油0.88元/斤、菜油0.81元/斤、棉清油0.75元/斤。尽管与粮食统销价相比，其同期指数约高65.7%（如粳米指数108.25、籼米指数118.18；豆油指数172.55、菜油指数172.34）。尽管“1971年以后油料购价不断提高，油脂销价不动，以致购销价格倒挂一再扩大”，^[73]但整个价格历经“文革”十年，直至1990年未发生变动。进一步检索，可发现只是从1973年1月5日起，经市革委会批准，作为小宗粮食品种的豆类等购销价格有所提高，有关记录如下：二级红豆0.182元/斤→0.23元/斤（郊区0.177元/斤→0.22元/斤）；二级杂色赤豆0.155元/斤→0.21元/斤（郊区0.15元/斤→0.20元/斤）；二级绿豆0.19元/斤→0.24元/斤（郊区0.18元/斤→0.23元/斤）。

斤);二级明绿豆 0.20 元/斤→0.26 元/斤(郊区 0.19 元/斤→0.25 元/斤)。^[74]其实,对“文革”时期的大众生活而言,赤豆等只是在端午节才有少许的定量供应,就如同红色的点缀一样,乃至还有些奢侈。当然,民以食为天的米、面、油价格是稳定的,这才是上海“文革”粮油供应的重要特点。

“文革”前的 1964 年,市粮食局内设有议价购销科,主要负责粮食制品议价供应的管理。据 1966 年 7 月 9 日《市粮食局、二商局、供销社报告》称:上海 1965 年粮食制品议价供应量为 5 400 多万斤,比 1963 年增加一倍以上。同时,因群众手中的粮票不能全部回笼,不利于控制销量,故提出对粮食制品议价工作加以改进。^[75]于是,同月中旬市粮食局等有关部门发出《通告》,宣布收缩网点,减少议价供应品种,即饮食业中除市区车站、码头供应的品种适当放宽外,其他只限于大饼、油条和米饭。糕点、饼干、面包等粮食制品一律凭粮票供应。^[76]就此,上海粮食制品议价销售量迅速从 1966 年的 9 050 吨下降到 1967 年的 5 620 吨和 1968 年的 4 480 吨,^[77]很大程度地抑制了议价粮的支出。1968 年 7 月 18 日,市粮食局革委会、二商局革委会等主管部门再次发出《联合通知》,宣布从同年 8 月 1 日起,进一步取消饮食行业议价供应的大饼、油条、面条及粢饭糕等熟食品,一律收取粮票,仅保留米饭议价供应。^[78]此后,1969 年至 1976 年间,上海市区议价粮销售保持在年均 3 420 吨左右。^[79]

也许上海的口油标准略微紧张,“文革”前的 1965 年,全市共设 340 家供应点,向居民和伙食团敞开供应议价食油。议价油售价为豆、生油 1.6 元/斤;菜油 1.45 元/斤、棉清油 1.35 元/斤(郊县各比市区低 0.10 元/斤)。^[80]据统计,1965 年 4—12 月,上海平均每月供应议价食油 22 万斤;1966 年 1—3 月平均每月供应 30 万斤;4—7 月平均每月供应 78 万斤。其中,行业与集体伙食单位约占 30%;居民

约占 70%。^[81]可见,议价油政策受到普遍的欢迎。

1966 年 8 月 25 日下午,普陀区粮食部门电告市粮食局,声称红卫兵贴大字报责问“为什么供应高价油?”导致全区“十七家议价油供应店中,陆续停止供应的已有八家,其他店发生排队争购的情况”。第二天(26 日),市财办向各区下达通知:立即停止向居民供应该价油;伙食团今后凭“伙食团购粮证”记数供应(每购 25 斤粮食,可供议价油一两);饮食行业供应则照常。^[82]两年后的 1968 年 8 月 1 日起,因上海统一取消饮食行业议价供应的熟食品,议价食油随即停止供应。^[83]所以,至“文革”中后期,上海市区议价食油销售一直处于紧缩下滑的状态。^[84]

四、粮食管理的两项举措

尽管“文革”期间上海郊县粮食连年丰收,外省调沪粮食也连年保持高位运行,却因粮食一直被列为国家战略物资,以粮食管理部门主导的“节约用粮”和“打击投机倒把”等,便成为常年开展的重要活动。

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以后,在城市管理的诸方面,有一个以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为说辞,实际上却是掌权者重新整合社会秩序的企图——这是革命的“非常”之后的“正常”——其间,既有手段的“正常”,即必定以此为路径;又有目的的“正常”,即必定以此为内容。于是,当时的报刊(含“群众报刊”)上登载着种种的“群众来信”,呼吁制止“像章买卖”、“公车旅游”、“抢购农副产品”等所谓“歪风邪气”。其中,关系到粮食管理的就有对“私人养鸽”的批评。据 1968 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市由国家供应粮食饲料的养鸽户有 1 487 户,饲养鸽子 17 000 余羽,全年供应粮食 31 万斤(每羽每年供应 18 斤粮食)。另

外,国家不供应饲料的养鸽户饲养鸽子约 33 000 羽,全年约耗用粮食 69 万斤。两项相加,全市共养鸽子约 5 万羽,每年要用去粮食近百万斤。由市革委会财贸组批转的市粮食局革委会的《请示报告》严肃指出:“这些粮食需要由 1 千多亩土地来种植。可供 2 500 人一年的口粮,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为此决定“对私人饲养玩鸽,国家不再供应饲料。对有关铁路、工厂、部队、公安、科研等部门,因工作需要饲养的军鸽,通讯和工业探毒用的鸽子,其所需饲料,仍由粮食部门继续供应”。^[85]此事甚至引起了在京沪两地往来的宋庆龄的关注,她在见到上海报纸刊登《养鸽、养鱼玩物丧志》的报道后,立即指示北京寓所的工作人员将一部分鸽子送何香凝,余下的全部交伙房杀掉。后因工作人员不同意,申辩鸽子是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就养着的,并报告周恩来说明情况,才得以保留。^[86]

1970 年,国务院正式下达“节约用粮”的通知,市革委会六办与粮食局革委会立即主持五个单位节粮和整顿粮食工作的试点,全年压缩不合理销量 35 万斤。此后,为落实全国计划会议、商业会议和粮食会议精神,全市召开干部大会,各区、县粮食部门持续发动广大职工深入里弄、社队,举办展览会,开办学习班,报刊、电台发表宣传文章上百篇;人民评弹团等专业剧团编写了节目,上百个文艺小分队下基层,进行节粮专题宣传。各粮管部门则着手对人口、工种、定量进行核准和调整,据 1972 年第一季度统计,各种补助粮为 2 893.5 万斤,比 1971 年第四季度减少 152.7 万斤。1973 年,上海市委批转静安粮油六店发动群众“到店储粮”的经验(即把家庭积存的粮票存在粮店里),进一步推进“社会储粮”,当年全市储粮 11 万户,储粮近 1 000 万斤;1974 年 11 月底,全市储粮 16.5 万户,储粮 1 256 万斤;1975 年 11 月底,全市储粮 55 万户,储粮 2 500 万斤。与此同时,根据 1973 年市粮食部门《关于做好淘米水中回收大米处理工作的通

知》，各区街道里弄居民学习杨浦区龙江街道第四里委的经验，积极开展淘米水中回收大米的工作。淘米水中回收的大米，统一由粮食部门按照“依质论价，充分利用，方便易行，义务服务”的处理原则作价收购。基本要求水分基本烘干，以防霉变。同时，金属物、煤屑、石子等硬性杂物除尽。标准为一等回收淘洗米，整米不低于50%，收购价每百市斤10元；二等回收淘洗米，碎米不限量，收购价每百市斤8



上海宣传“节约用粮”

元(一等与二等回收米用于工业饴糖);三等回收淘洗米,杂质较多,饲料利用率不低于70%,收购价每百市斤6元(饲料利用率低于70%的,则按质论价收购)。^[87]据统计,1974年全市里弄居民从淘米水中回收水洗米33万斤;1975年回收水洗米40万斤。此项以“节粮为备荒,储粮为备战”而开展的活动,坚持数年,颇有效果。^[88]

如果说“节约用粮”是软性的一手,那么“打击投机倒把”则是硬性的一手。其实,上海自统购统销以来,就出现了粮食外流的情况,^[89]这种情况直至“文革”从未间断——尤其对上海这座大型城市而言,各类物资的积聚和流动均处于高管制、大规模状态中,而物资的总体匮乏和人群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紧张,于是在政策、规则和运行的缝隙处,便会生发出一些“倒流式”的涌动——所以,在革命造反

关于控制粮食外流的请示报告

市委、市革委会:

遵照市委的指示精神,我们最近会同市革委会工交组、地区组和民兵指挥部以及工商行政、粮食、铁路、海运局等单位对如何控制粮食外流问题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自贯彻执行中央〔1972〕44号文件以来,各级党委以批林整风为纲,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在抓紧粮食征购,开展工业节约代用,以及整顿粮食销量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城乡粮食供应情况是好的,保证了军需民食和工农业生产用粮的合理需要。

但是,由于我们工作抓得不紧,在粮食销售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粮食及粮食复制品的外流比较严重。据工商行政、粮食和交通部门检查,来沪船只及人员返回时普遍外带粮食,有的船只一次外带粮食达二万多斤。外流数量较大的,多数是通过本市集体伙食单位代购的。粮食部门管理制度不严,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粮食大量外流,冲击了上海的粮食销售计划,并造成了有些粮食复制品经常脱销,也增加了交通运输的很大压力,同时给了阶级敌人投机倒把以可乘之机。

- 1 -

1973年10月,市革委会财贸组《关于控制粮食外流的请示报告》

派夺权后的 1967 年 7 月 31 日,市革委会下达了沪革(67)第 53 号《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知》,严正指出:“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严禁粮食、棉花、油料、烟、麻等国家统购物资上市,严禁商贩插手,投机倒把,不准弃农经商,串街走巷,流动叫卖,加强价格管理,不准哄抬价格”,并决定对上海的六种粮油议购价格进行适当调整,如红赤豆最高议购价格为每市斤 0.25 元,白芝麻每市斤 0.43 元等,其他粮食品种一律停止议价收购。^[90]至“文革”中后期的 1973 年 10 月,市革委会财贸组针对“粮食及粮食复制品的外流比较严重”的情况,向市革委会提交了《关于控制粮食外流的请示报告》。《报告》称:

……据工商行政、粮食和交通部门检查,来沪船只及人员返回时普遍外带粮食,有的船只一次外带粮食达二万多斤。外流数量较大的,多数是通过本市集体伙食单位代购的。粮食部门管理制度不严,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粮食大量外流,冲击了上海的粮食销售计划,并造成了有些粮食复制品经常脱销……

采取措施如下:一、教育干部、群众自觉遵守国家的粮食政策,严格禁止外带或替外地单位和个人代买粮食。发现大量套购外流粮食的要加以劝阻,劝阻无效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二、今后,对居民供应粮食一律凭证、凭票、记数;对集体伙食单位、部队以及工商行业的用粮,要认真审核计划,严格手续制度。无论单位和个人凡买粮超过正常用粮过多的,要调查研究,根据情况适当处置。对外来船只,一般不予供应粮食;三、适当压缩精白面粉和卷面供应。除粮店供应外,其他商店一般不供应卷面。精白粉的供应要从紧掌握,适当控制;四、加强重点车站、码头、港口等交通口子的检

查；五、粮食及粮食复制品，一律不准邮寄或托运到外地。工厂、机关、部队等单位需要外运粮食的，必须经市有关领导部门审查批准，由市粮食局签发出境证明，验数放行。

10月28日，市革委会办公室又向各组、办；各区、县、局革委会转发了高层批示：

要切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改进粮食供应工作，警惕和防止阶级敌人乘机制造谣言，进行捣乱，冲击市场。

确实，从事端到管理；从犯禁到制裁，并非是说“打击投机倒把”没有成效，也并非是说上纲至“阶级敌人捣乱”没有震慑力，而是这一波又一波的起伏，不仅证实关涉粮油的倒卖贯穿于“文革”的始终，甚或是相当严重的，据1976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完全统计，上海当年查处的票证投机倒把案件有1187起，共没收粮票417900万斤。此外，据车站、码头和几个公路口子的检查，每天外流的粮食达10万斤以上。^[91]

与此同时，粮油经营和管理部门也并非一潭清水。早在1972年12月，国务院商业部就通知各地，因全国通用粮票发行已超过正常需要，“给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以可乘之机”，故要求“严格控制粮票的发出和领取”。^[92]于是，有关部门通过在瑞金医院等处的调研，发现市级医院外地病员多，进修医生多，已成为擅自兑换全国粮票、谋取差额利润的“重灾区”（因全国粮票含油票）。1977年，上海粮食系统曾对“文革”期间的商品、票证、资金、现金等进行清仓查库，结果发现粮管内部的贪污盗窃触目惊心。例如徐汇区粮食局清查了9个商店，共挖出了20个贪污犯，占商店职工总人数的20%，贪污金额达

1.33万元,贪污粮食15 500斤,食油965斤,粮票12 700斤,油票1 000多斤。长宁区查出贪污分子25人,贪污金额9 888元,贪污粮票84 952斤,粮食9 951斤,食油305斤。上海县粮食局查出一个投机倒把集团,物资被非法套购外流达6万多元。^[93]至于粮店店员回笼粮票时,利用“鱼鳞式”粘贴贪污粮票,在不少粮店“有类似情况”,据静安区第四十一粮店一店员交代:自1976年起到1981年,共用此法贪污粮票1万余斤,其中从宿舍搜出粮票2 550斤,从家中搜出粮票13 505斤。^[94]

在“文革”时期蔬菜、副食品供应的研究中,我们曾揭露贪污盗窃活动。在粮食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经营和管理部门,竟然也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犯罪,这恰恰证实即便在“文革”的“非常”时代(其特征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总有那么一部分人要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答这种冒犯,更不能解决这种冒犯,因为这种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达,这便构成了“非常”中的必然,“非常”中的“正常”。

五、“国家管理”的“在位”

本文多次提及粮食为“国家战略物资”,除了强调这一要素的特性和权重,更要紧的是借助粮食的生产和供应,引申出、凸显出“国家管理”的“在位”。这也就是说,“文革”作为特定的政治运动,甚而出现“造反”、“夺权”、“武斗”等一系列“非常”社会状态形态,但“国家管理”作为一种权力构成和权力运作,不仅始终“在位”,更是始终行使着职能。就此,在“文革”政治运动以外,便可伸展出一条研究的思路:即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社会—经济”和“群众—生活”的情状;反之,亦可检证“国家管理”职能的在位和效用。粮油供应应属比

较确切的方面和事例。

先考察上海“文革”期间的粮油市场,可见是由“全国调运”、“市郊征购”和“外国进口”三部分组成。其中,“全国调运”保持每年20亿斤以上,平均占全市总供应量的79.89%,且天南地北,四面八方,从征收到储运,确保上海粮库处于饱满状态。而上海市郊的粮油征购,则有兼顾“国家—集体—农民”的政策保证,且“一定三年”,又“一定五年”,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如果说这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管理”功能在计划执行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体现,那么,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一吨大米可换两吨小麦”的差价,并以“政治任务”来饰说,鼓励市民多吃面粉,则是“国家管理”直接运作的结果了。

再考察上海“文革”期间粮油方面的票证管理和价格管理,可见在长达数十年的粮油票证流通史上,作为行使粮油票核准、发放和迁移等功能的票证管理机构,不仅有市、区(县)、街道(镇)的三级构架(基层称为“粮管所”),更在分条分级的执行方面,处于稳定的运行中。同时,上海“文革”前制定的各年龄段、各工种类的粮食定量标准;各类户籍人口(市区、郊区城镇、郊区农村)的食油供应标准,均保持原状。而米、面、油等大宗粮油食品的统销价,即便在收购价提高的情况下,仍维持原状,以致“文革”十年间,上海粮油商业发生政策性亏损达61188万元。^[95]固然,这与“文革”初期中央通知冻结商品价格有关(不合理则后期处理),于是不变的是定量标准和统销价格,有变的是政策亏损递增。这种为稳定社会和民心而出现的局面,只有“国家管理”才能应对,才能支撑。

最后考察上海“文革”期间粮油主管部门的行动和举措,可发现粮油主管部门除了完成常规工作外,还掀起了一些社会活动,比如组织小分队下里弄举办展览会、学习班,宣传全国粮食会议精神,号召“社会储粮”、“回收淘洗米”等;比如向社会发布通知“对私人饲养玩

鸽，国家不再供应饲料”等。同时，因粮食外流屡禁不止，“有的船只一次外带粮食达二万多斤”，严重冲击销售计划。市粮管部门断然决定“居民供粮一律凭证、凭票、记数；粮食复制品一律不准邮寄或托运外地；对车站、码头、港口等交通口子严加检查”等。在此必须指出：粮油主管部门的类似行动，并非是纯业务性质的，而是在“文革”特殊的环境下，代表了“国家管理”的意志，体现了“国家管理”的措施。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粮油主管部门的行动带有鲜明的“文革”运动的色彩和印记，却是在行使着“国家管理”的职权。

在“文革”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中，借助“粮油供应”的章节，提出“国家管理”的“在位”，不是为了与“文革”政治运动中下达的种种“文件”、“通知”和“最高指示”等发生混淆，更不是为了指认这两个方面存在着性质上的抵牾。而恰恰是申明“文革”运动中，人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如常进行，尤其在粮油供应方面，须臾不可疏忽。“国家管理”的“在位”，正是这种确认和保证。

注 释

- [1] 王祖德：《上海农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5 页。另记：1985 年起，上海郊区粮食生产逐步调整为两熟制。
- [2] 王祖德：《上海农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5 页、第 131 页、第 135 页、第 138 页。上海郊区水稻播种面积、产量可见统计图。关于小麦：“文革”十年期间，上海郊区种植小麦平均 78.7 万亩/年，最高年份为 1967 年的 96.25 万亩，最低年份为 1975 年的 53.90 万亩。总产平均 12.6 万吨/年。最高年份为 1974 年的 17.47 万吨（当年播种面积 79.68 万亩，亩产 219.0 公斤），最低年份为 1966 年的 8.54 万吨（当年播种面积 74.52 万亩，亩产 114.5 公斤）。关于大麦：“文革”十年期间，上海郊区种植大麦平均 60.07 万亩/年，最高年份为 1976 年的 131.10 万亩，最低年份为 1967 年的 35.65 万亩。总产平均 9.52 万吨/年。最高年份为 1976 年的 27.47 万吨（当年播种面积 131.10 万亩，亩产 209.0 公斤），最

低年份为 1967 年的 4.04 万吨(当年播种面积 35.65 万亩,亩产 113.5 公斤)。关于元麦:“文革”十年期间,上海郊区种植元麦平均 85.46 万亩/年,最高年份为 1973 年的 134.31 万亩,最低年份为 1967 年的 59.94 万亩。总产平均 11.78 万吨/年。最高年份为 1974 年的 22.68 万吨(当年播种面积 110.93 万亩,亩产 204.5 公斤),最低年份为 1966 年的 6.82 万吨(当年播种面积 70.95 万亩,亩产 96.0 公斤)。其他还有玉米、蚕豆等。

- [3]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8 页记:“60 年代初,农村平均年用电量 0.8 亿千瓦/时;70 年代初增加到 3.2 亿千瓦/时,1972 年,用电量 4.6 亿千瓦/时。”
- [4]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5 页记:1972 年,机电灌溉动力达 525.6 万千瓦,占郊区灌溉面积的 95.8%。机耕面积 414.95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75.3%。到 1976 年机耕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 90.4%。
- [5]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7 页记:化肥使用 1961—1970 年间,平均年用量 5.68 万吨,亩平均用量 10.43 公斤。1971—1982 年间,平均年用量 13.65 万吨,平均亩施用量 24.87 公斤。农药:60 年代,年使用量 2100 吨,亩用量 0.38 公斤;70 年代,年使用量 4520 吨,亩用量 0.83 公斤。除草剂也于 70 年代中期使用。农用薄膜:始用于 50 年代末,1964 年在各郊县推广,当年全郊区使用农膜 119.82 吨;1969 年达 1670 吨。70 年代,年平均使用量 3670 吨。
- [6] 据上海粮食局档案长期 378 卷,上海市粮食局 1970 年 4 月 11 日,《关于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度超产超购超奖粮食的奖励金分配的通知》称:经市革委会同意,1968 年、1969 年两年超购粮食加价的奖励金为 196 万元,各县可根据生产队增产增购粮食数量,“按每百斤原粮加价六角四分直接奖到生产队,由生产队掌握使用于扩大再生产”。又:上海粮食局档案长期 378 卷,据上海市粮食局 1971 年 5 月 21 日,《关于一九七〇年度超产超购超奖粮食的奖励金发放的通知》:1970 年度,上海超产超购奖金为 712500 元,“每百斤增产增购原粮加价奖励人民币五角正”。又:上海粮食局档案长期 2-2-56 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 年 12 月 25 日批转财贸组《郊县粮食工作会议纪要》称:在上海农村实行“统购粮食奖售棉布”的政策,如 1967 年奖售标准为:每千斤贸易粮奖售棉布 6 市尺。
- [7]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 155 卷。
- [8]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 155 卷,1971 年 11 月,《关于贯彻执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情况汇报》称:1969 年前,上海采取增产增购 40% 的办法,即生产队增

产 100 斤粮食,国家增购 40 斤。为算这 40%,粮食征收部门常常为核定产量,与生产队“顶牛”。1969 年后,改为“民主协商”的办法,即“从实际出发,三者兼顾协商增购一部分余粮”;对因灾减产的队,也采取协商的办法,合理减免征购任务。

[9] 上海市粮食局郊区处档案,1975 年 9 月 3 日,《关于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意见》。

[10]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 1962 年永久 1537 卷,第 19 页。上海市粮食局《关于 1963 年郊区油菜籽统购的意见》。

[11]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 1963 年长期第 1655 卷,第 5—7 页。上海市粮食局《关于 1964 年度油菜籽统购办法》。

[12]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 1964 年长期第 1026 卷,第 4—5 页。1964 年 5 月 7 日,《上海第一、第二商业局、粮食局、水产局、供销合作社报告》称:1963 年度,上海实际收购食用植物油 3760 万斤,奖售用布 94.51 万尺。奖售标准夏油每百斤奖售 5 市尺;秋油每百斤奖售 10 市尺。又:上海市粮食局档案 1963 年长期 1341 号第 30—32 页。1963 年 10 月 17 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转第一、第二商业局、粮食局、水产局、供销合作社《关于 1964 年郊区农副产品综合换购办法的报告》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同意 1964 年郊区农副产品换购办法,如油脂 100 斤,发工业券 5 张,专用券 2 张。又:上海市粮食局档案 1965 年长期 1793 卷,第 1 页。1965 年 3 月 3 日,上海市粮食局《关于 1965 年统购粮油奖售工业品安排》称:1965 年度,上海安排统购食用植物油 100 斤,奖售棉布 7 尺,日用工业品购货券 2.5 张;超额交售食用植物油脂 100 斤,奖售棉布 7 尺,日用工业品购货券 5 张。中央规定奖售的化肥仍统一分配。

[13] 上海市油脂公司档案长期 1—118,第 146 页。1967 年 6 月 16 日,《上海市油脂公司有关油菜籽收购问题的通知》。

[14] 上述收购政策执行至 1978 年。1979 年起提高油菜籽收购价格,由原 50 公斤 28 元调整到 36 元,增长 28.6%。同时增加奖励指标。

[15]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 1976 年长期 891 卷,第 28—29 页。1976 年 9 月 20 日,上海市粮食局《关于改进社员自留地油菜籽奖售的请示》。

[16]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室 2-2-62,第 29 页。1973 年 8 月 7 日,上海市粮食局《1973 年夏粮、油菜籽征购情况汇报》称:1973 年上海受灾严重,油菜籽比 1972 年减产 8 千多万斤,减少 38.96%。上海口油居民 5000 万斤,部队、行业、议价 3000 万斤,计缺油 2000 万斤,请求中央增拨。又:上海市粮食局档案 1973 年长期第 600 卷,第 14 页。1973 年 6 月 8 日,上海市粮食局《关于做好今年夏季粮油分配

工作的报告》称：农村方面“可以采取先留好四斤八两基本口油”，核减以后“仍然不足四斤八两的，由国家返销”，有余的协商征购一些，“按收购牌价给予30%的加价奖励”。

- [17]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室 2-3-54,75-3。1975年2月22日,《全国棉油会议典型材料》。
- [18]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档案 61-长期-1卷,第5155页,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调运科1961年12月,《关于1958年至1961年调运工作总结》;64-67-永久2-5-2全页,1964—1967年12月31日,《粮食(平价)收付平衡月报表》称：解放前,上海米市最大来源为苏州、无锡等地,约占全市供应量的80%。1953年秋,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8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粮食歉收。调沪粮食由“等粮上门”到“派人催粮”。有关部门为求得粮源平衡摆布,将一月一安排,改为五日一平衡,天天一碰头。1961年7月份,全市大米库存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只有4984万斤。当年为确保上海的大米供应,中央华东局成立运粮指挥部,粮食部委派干部参加指挥部领导,上海则由三名局级干部带队,率130名干部分赴江西、浙江、安徽等省,督促运粮工作。“文革”前的1964年度,整个国民经济好转,粮食平价调沪全年为27.68亿斤,上海城市居民米面供应7个月不限比例,粳米、籼米10个月任意选购。居民缺粮面缩小。
- [19]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粮食志资料长编》,第699页。江西省粮食局编志办:《江西调动上海粮食的概况》。
- [20]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档案 64-长期-37卷,第8页。《粮食部刘司长1961年9月21日在第九届全国储运会议上的报告》。
- [21]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档案 73-长期-29卷,第118—198页。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调运科1973年1—12月《市外粮食调入月报》。
- [22]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档案 68-长期-36卷,第242—243页。1968年11月8日,上海市粮食局革委会《关于粮食调运入库情况》。
- [23]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 [24]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粮食志资料长编》,第705页。
- [25]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档案 76-长期-4卷,第42—46页。1976年6月28日,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革命委员会《简报第十五期》。
- [26]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 [27] 王瑞璞、郭德宏等主编:《共和国经济大决策·第二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

- [28]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2 年版。1967 年 6 月 17 日，《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 [29] 王祖康、朱晓明：《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5 页；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5 页。上海历史有进口小麦的传统。50 年代后期，国内粮食供求平衡，上海无粮食进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上海成立进口粮接运领导小组。国家粮食部安排上海接运的进口粮食主要为小麦。1961—1963 年，上海接运进口粮食 16 亿公斤，其中小麦 14.98 亿公斤，占 93.6%。1964—1965 年国内粮食丰收，上海进口粮食减少，约 2 万多公斤，主要用于库存。
- [30] 王祖康、朱晓明：《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3 页。
- [31] 王瑞璞、郭德宏等主编：《共和国经济大决策·第二卷》，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8 页。
- [32]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9 页。
- [33] 同上书，第 431 页。
- [34] 上海粮食局档案卷 0726-16 页。1961 年 6 月 16 日，上海粮食局党委《扩大面粉供应的报告》称：60 年代，上海就实行“居民搭吃面食”，如 1961 年 6 月，市粮食局就下达面粉供应的比例：“居民从 18% 增加到 35%；里弄食堂从 22% 增加到 35%；机关、学校、企业等伙食团保证达到 70%。”
- [35]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 1955 年永久卷 252 号，《市局供应管理处 1955 年度总结》称：1953 年 11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4 年 8 月 18 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粮食定点供应的办法。市粮食局便于 8 月 26 日起对居民实行粮食划片定点，采取按户发给购粮证，将供应与消费的双方关系固定下来。据统计，全市发购粮证 1 335 703 户，行业用粮证 21 539 户，伙食团用粮证 9 355 户，实行凭证计量，即不限量，1 斤以下则不计量的供应办法。8 月 21—23 日三天中，上海大部分地区发生排队争购现象，提篮桥区一家代销店至打烊时还有 300 余人排队等购，全市销米超过正常销量的一倍以上，最多一天近 1 700 万斤。26 日实行定点供应后，销量比平时减少一半左右，最少一天只销 300 万斤。又：上海市粮食局档案长期卷 786 号，1954 年 9 月，《粮食定点供应工作和目前存在问题》称：事实上，实行划片定点凭证计量（不限量）供应的办法，并非完全制止粮食套购外流，漏洞仍然很多。如嵩山区一商贩，先后向居民借购粮证，套购粮食 1 000 余斤。1955 年 4 月，上

海粮食销售达二亿五千四百多万斤,突破了销售计划。为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紧张局面,控制销量,掌握供应,1955年5月20日,上海市委决定在本市实行按户计划供应的办法。又:上海市粮食局档案1955年永久卷783号,《上海市粮食局1954年度总结》称:具体规定本市有正式户口的居民,以每一住户为单位,制定出月份的购粮计划,汇总到区办事处后,发给新的购粮证。自7月份起,上海各区成立512个工作队(队员6744人)与社会力量13万余人,着手调查工种,消费水平,确定各类人口供应标准、训练干部等准备工作,并完成对国营、合作、市区两级机关等单位,以及团体、学校、医院、公私小厂、小店等的分等评级定量工作。在全市分批开展宣传教育后,于10月16日实行“以人定量”的供应制度。(见上海市粮食局档案《上海市粮食局1955年度总结》,1955年5月19日,永久卷815号,第2—4页。)

- [36]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卷871号。1955年9月30日,上海市粮食局《关于粮食定量供应凭证管理实施细则》;又:《上海粮食志》第101页记,1955年10月上海首次发行粮票,面额分16两制的“半市两、一市两、四市两、壹市斤、贰市斤、伍市斤、拾市斤7种”,此处有误。应没有“半市两”,有“半市斤”。
- [37]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卷1206号。1958年8月11日,上海市粮食局《关于发行上海市长期通用粮票的通知》。
- [38]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卷1338号。1960年5月16日,上海市粮食局《关于本市与江苏省停止互通地方粮票和发行1960年上海市粮票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称:1960年版粮票的面额为五钱、一市两、二市两、五市两、一市斤、二市斤、五市斤、拾市斤8种。其中五钱、一市两、二市两主要供各区县熟食行业使用。同时,停止与江苏省粮票互通使用的办法。又: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1616号。1963年2月23日,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居民实行凭证凭票供应粮食的暂行规定》称:1963年版粮票面额为半两、壹两、贰两、半斤、壹斤、贰斤、伍斤、拾斤、贰拾斤、壹佰斤、伍佰斤共11种(壹佰斤、伍佰斤粮票供单位使用)。又:上海市粮食局档案,上海市粮食局、商业二局、供销合作社永久1683号。1964年11月28日,《关于改进本市小额粮票使用管理办法的联合通知》称:1965年1月起,上海取消按月使用的二两、一两、半两的三种小额定量粮票,改用小额定量粮票长期使用。1965年第一季度始,对半斤以上大额定量粮票,实行一个季度内可以延期使用的办法(定量粮票按季发放,分月使用)。
- [39]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卷5-1-1号。上海市粮食局1981年8月22日《关于停止使用1958年和1960年版上海市长期粮票的通知》称:因1958年版和1960年

版的粮票已使用二十多年,长期以来粮管部门只收不发,留在群众手中的为数极少。为加强粮票管理,减少粮票种类,市粮食局决定1981年12月31日起停止使用该种粮票,持有者可向当地粮管部门兑换。

- [40]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长期72-12号。上海市粮食局1972年5月16日,《关于发放使用一九七二年版“上海市粮票”的通知》。
- [41] 上海市粮油贸易、供应公司档案,上海市粮食局1990-217号。上海市粮食局1990年5月21日,《关于使用1990年“上海市粮票”的通知》称:自此,1972年版的4种“上海市粮票”只收不发,流通使用至1990年12月31日。
- [42]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卷1521号1—2页。1962年12月13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转第一商业局粮食局等单位关于加强商品供应票证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
- [43] 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
- [44] 据袁念琪,“‘阿拉’的半两粮票”《劳动报》2003年11月28日;金沙,“见证历史时刻的‘收藏骄子’”《合肥晚报》2008年5月31日记载:浙江、安徽和湖北武汉等地均发放过“半两粮票”。江苏南京还发放过面额“一钱”的粮票。新疆发放过“一厘米”的布票。
- [45]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上海市粮食局1961年2月2日,《关于自二月份起市区居民每人每月加发0.2市斤饮食补贴粮的通知》称:1960年起,凡本市市区居民(不含吴淞、闵行区)发放0.8斤饮食补贴粮(就餐券)。1961年2月份起,每人按每月1市斤标准发放。又:上海市粮食局1962年7月1日《通知》称:1962年7月起,原每人定量外补贴的1斤就餐券取消,改为每人补贴口粮1斤。上海市粮食局档案长期卷60-0640号,上海市粮食局、商业二局1960年10月29日,《糕点、饼干、面包实行凭票供应办法》称:同时,1960年10月起,上海糕点、饼干、面包一律凭券、凭证收取粮票供应。糕点、面包每人每月发“糕点券”四张,凭券供应成品粮250克(半斤),折粮食150克(三两);饼干每人每月凭购粮证供应125克(二两半),折粮食100克(二两)。
- [46]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卷1619-225号。上海市粮食局商业二局,1963年6月15日,《一般糕点饼干、面包和饮食就餐一律凭定量(本市)粮票供应的联合通知》。
- [47] 上海市区有糕点食品厂60多家,一般为前店后工场,生产的糕点有苏式、扬式、宁式、广式和西式等,驰名全国。据1965年的统计,全市有上海面包厂、益民食品四厂、天山回民食品厂三家生产面包,品种有吐司大方包、大白包、甜鸡蛋方

包、白鸡蛋方包,以及罗宋面包和各种花色面包。“文革”时期,革命造反派经常在人民广场、文化广场集会,面包厂等需承接突击任务,生产数千斤的面包供应大会。当时上海市场上的饼干品种,主要有万年青甜饼干、夹心饼干、小球饼干及新开发的葱油香味万年青梳打饼干、奶油梳打饼干等。

[48]《解放日报》1972年9月28日。

[49]金大陆:《上海1966年至1976年人口状况》,《上海研究论丛》第十六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50]据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粮食志资料长编》,第287—290页所记标准:1.“特殊重体力劳动者”平均水平25公斤(甲27.5公斤、乙25公斤、丙22.5公斤);2.“重体力劳动者”平均水平20公斤(甲22公斤、乙20公斤、丙17.5公斤);3.“轻体力劳动者”平均水平16公斤(甲17公斤、乙15公斤、丙13公斤);4.“脑力劳动者”平均水平14公斤(甲14.5公斤、乙13.5公斤、丙13公斤);5.“大中学生”平均水平16公斤(甲16.5公斤、乙14.5公斤、丙13公斤);6.“居民和10周岁以上儿童”平均水平12.5公斤;7.“6周岁以上不满10周岁儿童”平均水平10公斤;8.“3周岁以上不满6周岁儿童”平均水平6.5公斤;9.“不满3周岁儿童”平均水平3.5公斤。

[51]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4页记:1960年12月起,市粮食局规定对10周岁以下的儿童,改为每年调整一次。比如1周岁3.5公斤、2周岁4.5公斤、3周岁5.5公斤,并以此类推至10周岁以上为12.5公斤。1964年7月起,上海儿童粮食定量每月标准平均提高0.25公斤,比如1周岁4公斤、2周岁5公斤、3周岁6公斤,并以此类推至9周岁以上为12公斤。1960年12月,初中生定量标准为12.5~15公斤;高中生在16.5公斤内调整,中专生和大学生为16.5公斤。1963年1月时,上海中学生的定量标准为初一14公斤,初二、初三14.5公斤;高一15.5公斤,高二、高三16公斤;中专和大学生为16.5公斤。

[52]据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第302页。

[53]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54]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卷号71-16号,《做好野营训练粮油供应工作的情况汇报》记:其中工人303 965人,补粮976 827.7斤,平均每人3.21斤。大学生7 820人,补粮39 252.1斤,平均每人5.01斤。中学生472 617人,补粮2 373 856.2斤,平均每人5.02斤。小学生88 162人,补粮154 829.6斤,平均每人1.75斤。党政机关6 810人,补粮28 015.1斤,平均每人4.1斤。后勤人员5 061人,补粮

33 272.6 斤, 平均每人 6.5 斤。

[55] 1973 年 6 月 8 日, 上海市委《关于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报告》。

[56] 1968 年 12 月 30 日, 上海市革委会第 654 号抄告单《同意市财贸组沪革财 108 号〈关于外国人的粮、油、棉、布供应问题的请示报告〉》。

[57] 1975 年 11 月 28 日, 上海市粮食局《关于外宾、华侨在市场购买粮油制品供应的通知》。

[58] 上海市粮食局沪粮革供字(72)234 号文, 1972 年 7 月 31 日, 《关于归国华侨、港澳同胞粮油供应通知》。

[59]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3 页。

[60] 上海市油脂公司档案长期 3-4。1954 年 2 月 19 日,《实行食油计划供应的宣传提纲》。

[61] 据统计: 其他是 1961 年发放的“买油券”, 有壹两叁钱、贰两半、四市两、半市斤、壹市斤 5 种。1964 年发放的“买油券”, 市区居民有半两、壹两、贰两半、壹市斤 4 种; 郊区发放的“奖售油券”有半两、壹两、贰两半、半市斤、壹市斤 5 种(长期使用, 包括“文革”期间)。1981 年发放的“油券”, 市区居民有半两、壹两、肆两、壹斤 4 种; 郊县有“油券”肆两 1 种。以及半市斤的“上海市专用油票”。1990 年发放的“油券”, 市区居民有壹两(50 克)、肆两(200 克)、壹斤(500 克)3 种; 郊县有“油券”肆两 1 种; “上海市农民留油票”有壹两(50 克)、伍两(250 克)、壹斤(500 克)3 种, 以及“专用油票”和“国庆补助油券”等。

[62] 上海市油脂公司档案长期 3-14。1954 年 4 月 4 日,《上海市食油计划供应暂行办法》。

[63]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第 495 页。

[64]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0—91 页。

[65] 上海市油脂公司档案 1965 年长期 4-152,《历年口油供应情况》称: 大致以 1965 年时的标准, 即大众点心每百元营业额用油比例为 4 市斤, 糕点用油每百斤粮食用油比例为 15 市斤。

[66] 上海市油脂公司档案长期 4-159。1974 年 7 月 15 日,《关于饮食行业用油情况调查和改进意见的报告》。

[67] 上海市油脂公司档案长期 4-159。1974 年 8 月 21 日,上海市糖业烟酒公司革委会《关于烟糖行业用油情况调查和改进意见的报告》。

[68]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31 页。

[69] 徐尚武、汪祖超:《闵行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6 页。

[70]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71] 同上书,第10页。

[72] 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855页。

由于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粮食统购价格偏低矛盾突出。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1979年4月11日,商业部、国家物价总局发出通知,提高了粮食统购价,并将超购加价幅度提高到50%。

[73]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74] 1972年12月28日,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统计组、财贸组《关于调整小宗粮食购销价格的报告》。统购价格:红赤豆0.167/斤元→0.20元/斤。杂色赤豆0.15元/斤→0.18元/斤。绿豆0.17元/斤→0.21元/斤。明绿豆0.18元/斤→0.23元/斤。

[75]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粮食志资料长编》,第156页。

[76] 1966年7月15日,《市粮食局、二商局、供销社关于压缩粮食复制品议价供应的联合通告》。

[77]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78] 1968年7月18日,《市粮食局革委会、二商局革委会、供销社革委会关于压缩饮食行业议价熟食品和议价粮油供应的联合通知》。

[79]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80]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记:1966年8月降为生、豆油1.5元/斤;菜油1.2元/斤。

[81]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长期卷-66-62,第65页。市粮食局供应处,《两年来议价食油供应情况》记:供应品种主要是菜油。豆油等只占总销量的10%。麻油不供议价。

[82]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长期卷66-62,第62页,市粮食局供应处《关于议价食油停止供应经过》。

[83]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长期卷68-12,第277页。1968年7月18日,《关于压缩饮食行业议价熟食品和议价粮油供应的通知》。

[84] 上海粮食局计划处档案2-2-119,第34—35页记:至改革开放的1979年,上海恢复敞开供应议价食油和杂粮,如花生油(每市斤2.4元),麻油(每市斤3.1元),花生酱、芝麻酱(每市斤1.9元),黄豆(二级,每斤0.55元),红赤豆(二级,每斤0.58元),绿豆(二级,每斤0.60元),香梗米(每斤0.55元),糯米粉(每斤0.45元),花生仁(二级,每斤1.20元),白芝麻(每斤1.30元),菜油(每斤1.80元)。

元)。又：据市粮食供应公司《情况汇报》第 24 号，1979 年 8 月 22 日报告：“8 月 21 日，闸北区天潼路粮油杂品商店首先开张营业。从早上六时开始至中午十一时半，共销粮油 402.5 斤(305 笔次)，金额 356.4 元。绿豆比较畅销，计 182.5 斤。其中最高一人购买 25 斤。……其他品种销量不多，蚕豆 24 斤、黄豆 6 斤、芝麻 1 斤、菜油 29.1 斤、麻油 3.4 斤、花生酱 59.1 斤、芝麻酱 4.9 斤。对 2.4 元一斤的生油，无人问津……群众认为绿豆价格合理：‘比自由市场便宜一角钱……农民要五斤或五斤半粮票调换一斤绿豆，要合七角五分’，‘菜油每斤一元八，价格还公道，杭州凭购粮证还要一元六角五分至一元七角’。群众认为蚕豆售价三角七分太贵，他们说：‘自由市场二斤粮票调一斤蚕豆，一斤粮票加一角六分也可购一斤蚕豆。’同时，少数居民对议价粮油有看法，说：‘现在什么都有议价，是官方黑市，工资有议价哦？’从 22 日起，全市各区粮油商店正式营业。”

[85]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长期卷 266，粮票管理 4-2-7-1。1968 年 4 月 10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批转上海市粮食局革命委员会“关于私人饲养玩鸽不供应粮食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称：据 1959 年报告，“市居民养鸽户分散各区数达三千余户，已有多年饲养习惯”。为了制止营利性质买卖行为和利用鸽料进行黑市投机，1959 年，上海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关于鸽料供应原则：凡属本市常住户口，原已建立供应关系的养鸽户，维持“原供应量在原地区”申请，由各区店核实只数后发给《鸽食饲料供应证》，凭证供应；新养鸽户暂不供应。

[86]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28 页。

[87] 据上海粮食局档案 2-2-49,53—56 页。

[88]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第 390—391 页。

[89] 上海粮食局档案永久卷 159 号，第 22 页。1957 年 5 月 29 日，《上海粮食局 1956 年度总结》称：今年油料、杂粮内流数量“仅大达码头一处 5 月至 10 月就流入 37 万斤，贩运者主要是江、浙二地自产自销的农民，其次是小商小贩”。

[90] 上海市粮食局计划处案卷号 00042 记：如红赤豆，最高议购价格(下同)为百市斤 25 元，每市斤 0.25 元；明绿豆，每百市斤 27 元，每市斤 0.27 元；中粒黄豆，每百市斤 23.5 元，每市斤 0.235 元；花生仁，每百市斤 40 元，每市斤 0.40 元；白芝麻，每百市斤 43 元，每市斤 0.43 元；鲜山芋，每百市斤 4 元，每市斤 0.04 元等。除此六类粮油品种外，其他粮食品种一律停止议价收购。以上价格自 1967 年 10 月 21 日起执行。

[91]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室永久卷局-6，第 33—37 页。又 1976 政 197 局办公室《1976

年度计划上海市收支情况汇报》;1980年12月21日,上海粮食局《关于当前本市粮食外流情况汇报》称: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粮食外流的情况仍然严重。11月份全市粮食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近3000万斤。据初步调查,从十六铺码头和江苏浏河这两个口子流出粮食平均每天约30万斤左右;从苏州河和其他公路、水路口子流出去的粮食为数也不少,估计一个月外流不下1000万斤。商贩投机倒卖严重,一个是“苏北帮”,主要品种是籼米,流向南通地区;一个是“温州帮”,主要品种是精粉,也有籼米。这些商贩用农副产品同居民调换粮票,如6只鸡蛋换10斤粮票,1斤赤豆换7斤粮票,1斤菜油换15斤至20斤粮票,1斤鸡换10斤至15斤粮票等。也有用每斤0.12元至0.14元买进粮票的。1980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获没收的粮票已达80多万斤。商贩向城市居民借购粮证,或给居民一点好处,由居民代为购粮。如黄浦区检查了三个粮店,就发现有33人套购籼米5053斤,最多的人购买700斤。原因是农村因灾减产,农村粮食统销。又:1983年4月4日,上海粮食局第18期《粮食简报》:现在粮食购销价格倒挂,国家为了保证城市市民生活需要的粮食,从收购粮食到供应每个居民,就要付出大量的财政补贴,如按议价收购平价供应计算,一斤粮国家要亏二角多,一个人每年消耗几百斤粮食国家要拿出七八十元补贴。现利用购销倒挂套购平价粮食,再转手以议价贩卖,每套购100斤粮,可获利10多元收入。又:上海粮食局档案1981年卷1-1-3,第47—51页,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关于三月份粮食外流情况汇报》称:1980年起,上海在市区和郊县的车站、码头设若干粮食检查站。流向苏北南通地区启东、海门方向,主要是从南市区大达码头和宝山罗店的洋桥向浏河出境。北区汽车站、吴淞经崇明到苏北、黄浦江、苏州河沿岸的各种船只带粮外出,还有公平路码头和北火车站等带粮出境到全国。“据检查人员观测推算,收购处理的仅占带粮人数的三分之一。”又:上海粮食局档案卷号1-1-3,第110—113页。1981年7月25日,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关于上半年粮食外流检查工作的情况汇报》称:从对象上分析:旅客少量(30斤以下)携带,每天估计1.5万斤至2万斤,占66%;在沪调换粮票,再套购大米流向南通地区,估计每天8000斤左右,占27%;从火车、轮船带向东北、西北方向的精粉和卷面每天估计2000斤左右,占7%。又:上海粮食局档案1-1-2卷,第204、108页。1983年10月21日,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简报》第二十期《加强伙食团用粮管理的情况》;1983年3月1日,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简报》第十二期《加强伙食团用粮管理制止粮食外流》称:同时发现伙食团也存在较严重的粮食外流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已查出有问题的伙食团323户,占市区

6 699 户集体伙食单位的 4.8%，粮食 2 644 598 斤，其中套购外流 1 140 818 斤。

例如徐汇区 669 户伙食团中“发现有外流的 52 户”。“杨浦区至八月底止，全区 850 户伙食团中，有 350 户外流粮食 94 万斤”。

[92] 1972 年 12 月，商业部《关于加强粮食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93] 上海粮食局档案，《一九七七年清仓查库总结》。

[94] 上海粮食供应公司档案案卷号 81-63。1981 年 1 月，《静安、闸北发现两起严重贪污粮票案件》。

[95]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31 页。



附一：

粮库、粮店与粮食保护

粮库与粮店

因全国农业连续丰收，外省调运和市郊征购的粮食大批而顺畅地进入上海，“1968年至1969年，所有仓库、货场堆满粮食，其间还借用徐汇、闸北、黄浦区工人体育场等15个单位的空地，计211 000平方米作货场搭建露天桩，共储存粮食14 258万公斤”。^[1]1970年，上海学习黑龙江经验，建造土圆粮仓25座，容量388万斤。因土圆粮仓不适宜本地地理环境，不久倒塌报废。同年12月15日，市革委会设702办公室，根据“分散、隐蔽、靠山、机动”的原则，批准在松江天马山区建造7条坑道的战备粮库。战备粮库建成后，于1974年7月1日起，由市粮食局革委会接收使用，名称定为“上海市743仓库”。^[2]1972年以来，上海还先后在陈行、颛桥等地建造地下战备库，面积3 500平方米，容量700万斤。^[3]同期，上海第四粮食采购供应站、第六粮食仓库等先后投资建造了钢筋混凝土立筒库，全面提升了解放军的储粮能力。

60年代，上海市内粮食运输大部分交付给公路交通部门，如上运五场505车队，对口上海第三粮食供应站，承担虹口、黄浦、卢湾、徐汇等区500多家粮店的市销粮运输。因上海的粮店分布在全市大街小巷，不少地段道路狭窄，车辆进出不便，并影响交通。至70年代，上海粮食部门陆续增添1~2吨的小型汽车，扩大自运能力。1975年，上运八场会同粮食部门，改装成功散装运米车，投入运营。但因上海的许多粮店店房狭小，装卸条件差，散装运米车未能广泛使用，一般“进货时，要靠人力把米包搬进店房，堆桩上高，一般要堆7包高。个别粮店又小又挤，须堆11包高，工人劳动强度很大”。^[4]

50年代上海有粮店1000多家,后经网点撤并,至“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市区有粮店680家,粮油综合店213家,“居民排队购粮情况严重”。^[5]长期以来,上海粮店设备简陋,仅靠几只米箱、磅秤、笆斗营业,劳动强度高,效率低。“文革”期间,上海开展了群众性的粮店、油酱店技术革新运动,如1974年2月,南市区粮管部门与上海汽车运输二场在第72粮店联合试制了电子自动发米机、容量27吨分成4个品种的散装储米斗和散装运粮专用车;市油酱店试制成功晶体管自动发酱机等。至1975年底,全市已实现半自动化售粮的有811家,占粮店总数的98%。^[6]208家油酱店使用电子售货器,占市区油酱店总数的30%,^[7]基本改变了落后的手工操作方式。另外,上海的粮店还在“文革”中开展为“工农兵”的优质服务。据1971年的统计,上海有316家粮店延长营业时间,有207家粮店增设早晚服务,还有22个粮店实行通宵服务等。^[8]

粮食保护

据1964年统计,上海“四无”(指: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粮仓达标率为96.73%。1966年因“文革”运动考核停顿。1972年重新恢复考核,发现质量普遍下降。1973年上海开展三次以“四无”粮仓为内容的储粮大普查,不安全粮达440275吨。^[9]于是1—10月熏蒸虫粮88055万斤,捕鼠19000多只,捕雀14000多只。^[10]当年市区粮食储存量的总损耗为585吨,比上年2080吨下降1495吨。^[11]1974年,上海粮库处理不安全粮5004斤,熏蒸虫粮134150万斤,捕鼠13789多只,捕雀12001只,年终鉴定,全系统“四无”粮库比例已达到90%。^[12]与此同时,经1974年7—12月的普查发现,国家粮仓的害虫种类由54种降到49种,害虫密度亦降低。但加工厂、饮料站和进口粮库的虫种增多,甚至发现上海少见的阔鼻谷象、椰子甲等害虫,属国外检疫对象的四纹豆象、鹰嘴豆象、赤颈郭公虫等已在上海

部分仓库立足。^[13]面对物种侵害的威胁,1974年12月13日,上海首次对装运进口小麦的外轮“埃勒欧森”号进行熏蒸除虫,使用溴甲烷4052公斤,密闭110小时,杀虫效果达100%。^[14]1975年,京津沪三市粮食部门开展“四无”粮仓检查交流活动,经鉴定上海“四无”粮仓占总容量的88%。^[15]

粮食保护还关涉事故。1967年6月9日下午2点多,因使用化学方法保管仓粮,三天内仓中突然升温至39度,上海市第一粮食采购供应站及科研所7人进库检查。仅2分多钟,人员即昏倒在地。经嵩山路、北京路消防队和医疗救护大队的抢救(抢救中也发生人员昏倒),将昏倒人员急送长征医院,此时已有5人停止呼吸和心跳,2人有微弱的心跳而无呼吸。长征医院迅速组织抢救小组,市卫生部门全力给予器械和人员的支持,粮食部、卫生部连夜派出医生赶赴上海。经过三昼夜的抢救,共10人脱离危险,戚文华等5人抢救无效死亡。事后,由中科院生理、生化、药物各研究所、警备区防化兵部队、市消防总队、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十多个单位,结合尸检进行试验,确认该事故为封仓二氧化碳过高造成仓内严重缺氧窒息所致。^[16]其他比较严重的事故还有1969年8月29日,上海第十粮库206库房发生火灾,烧坏粮食334吨,烧毁仓库1150平方米。^[17]1976年6月7日,上海港区257仓库出仓粮食时,发现总数约80万斤的混合粮霉变等。^[18]

注 释

[1]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2]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档案,74-永久-1卷,第1页。1974年6月30日,《关于上海市粮食局743仓库工程移交书》。

- [3]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第 1709 页。
- [4] 王敬德:《上海公路运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8 页。
- [5]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卷 76-19 号,第 1 页。1976 年 8 月 18 日,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革命委员会:《关于市区粮、油商店制面工厂饲料站网点设置和改造规划情况报告》。
- [6]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卷 8-4。1976 年 1 月 29 日,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革命委员会:《关于粮食供应系统一九七五年技术革新工作总结》。
- [7]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卷 74-1-1,第 15 页。1975 年 1 月 9 日,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1975 年技革工作总结》。
- [8]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卷 71-1,第 2 页。1971 年 12 月 22 日,《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一年工作总结》。
- [9]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6 页。
- [10]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档案,卷 74-永久-1。1973 年 2 月 28 日,《1973 年工作总结》。
- [11]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6 页。
- [12]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档案,卷 74-长期-25。《关于 1974 年度保粮工作情况》。
- [13]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9 页。
- [14] 同上书,第 304 页。
- [15]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卷 75-长期-29,第 1—6 页,《关于 1975 年京津沪开展粮食仓储工作经验交流活动情况的汇报》。
- [16]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第 1905 页。
- [17]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8 页。
- [18]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第 1816 页。



附二：

上海“文革”期间其他副食品供应情况

食盐

解放后，上海地区设有金卫、山阳、漕泾盐区和奉贤县盐场。70年代，金卫、山阳盐区辟为金山石油化工总厂；80年代，漕泾盐区改为对虾养殖场，奉贤县盐场撤销。上海地区成为纯销盐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盐供求失调。1962年1月1日起，对市区居民和城镇非农业户口，凭蔬菜供应卡或购粮证按月记数不定量供应。郊县农业户口，印发“食盐票”凭票购买，每人每月定量供应食盐0.75市斤。因供应仍趋紧张，自1962年5月1日起，市区和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定量供应食盐1市斤，凭副食品购买证计数供应。^[1]1963年7月1日起，因市场供应稳定，上海恢复食盐敞开供应。^[2]

“文革”期间，上海食用盐因产区配载不及时和远程延误，“1971年曾一度断档脱销，1973年盐源及运输均有困难，调入更少，不得已改以优质洗涤盐加工轧细供应食用”。^[3]同时，1971年8月30日，市革委会批准投资50万元，在军工路2700号征用江边低洼地21亩，筹建上海制盐厂。^[4]“文革”期间上海食盐零售价格为每500克(1市斤)0.15元(1989年时，调整为每500克(1市斤)0.24元。);食用精制再制盐的市场零售价格为每市斤0.18元。^[5]

食糖

食糖为国家第一类商品，销售、供应均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上海是食糖的主要集散、转口和销售区，其货源由商业部直接下达调拨计划，由市糖业烟酒公司调运。1966年至1978年，上海共调入食糖98.13万吨(平均每年7.55万吨)，其中白糖83万吨，红糖15.13万吨。按产区分，广东54.57万吨、广西12.8万吨、福建17.39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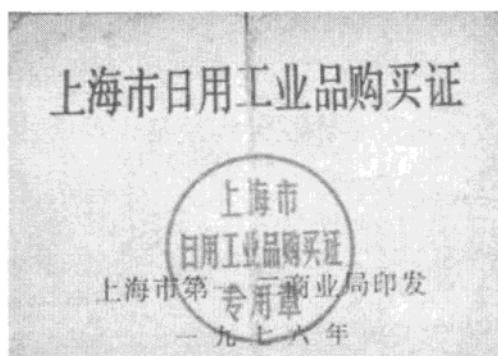
黑龙江 5.7 万吨、内蒙古 0.94 万吨、吉林 2.02 万吨、云南 1.26 万吨、其他 3.46 万吨(南方为蔗糖;北方为甜菜糖)。上海的食糖库存量一直比较充裕。60 年代,上海平均年库存量为 26 801 吨,相当于同期 5.23 个月的销量;70 年代,上海平均年库存量为 45 454 吨,相当于同期 3.62 个月的销量。当计划调拨的货源不敷供应时,商业部便从市糖业烟酒公司代为保管的储备糖中,划出一部分给上海以安排市场供应。^[6]

上海根据各个时期的货源情况,分别对民用糖采取“敞开供应”、“凭票(证)供应”、“特殊供应”和“高价供应”等方式。现将“凭票(证)供应”的情况记录如下:

1. 1954 年 12 月至 1956 年 5 月,凭票定量供应,市区每人每月 6 两(16 两制,187.5 克);郊区每人每月 4 两(16 两制,125 克)。
2. 1957 年 4 月至 1965 年 7 月 14 日,凭票定量供应,市区每人每月 0.2 市斤~0.6 市斤;郊区每人每月 0.1 市斤~0.25 市斤。
3. 1969 年 12 月 25 日至 1975 年 5 月 14 日,凭“日用工业品购买证”记数不限量供应。
4. 1975 年 5 月 15 日至 1975 年 5 月 31 日,凭“日用工业品购买证”划区定点计数限量供应,市区每人每月不超过 1 市斤;郊区每人每月不超过 0.7 市斤。
5. 1975 年 6 月至 1977 年底,凭“日用工业品购买证”划区定点计数限量供应,市区每人每月不超过 0.6 市斤;郊区每人每月不超过 0.4 市斤。
6. 1978 年 1 月 1 日至 1984 年 9 月 15 日,实行凭糖票定量供应,市区每人每月 0.6 市斤;郊区每人每月 0.4 市斤(其中临时增加定量 14 次)。
7. 1987 年 9 月 16 日至 1988 年 3 月,市区凭“上海市副食品购



上海市居民日用工业品购买证



上海市日用工业品购买证

买证”定量供应,大户(5人以上)每月2.5公斤;小户(4人以下)1.5公斤。郊县按农业户口每户1公斤、非农业户口每户1.5公斤的水平安排货源,由县包干供应。

8. 1988年4月至1992年1月28日,凭票定量供应,市区每人每月0.5公斤;郊县按原水平包干供应。

自1954年12月起,至1992年1月止,在近39年的时段里,除以上凭票(证)供应的时期外,均实行敞开供应,总时间共14年9个半月。其中,1965年7月15日到1969年12月24日敞开供应。再至1975年5月14日,是记数不限量供应。由此可证明上海“文革”

期间的食糖供应情况十分良好。反之，“文革”前和“文革”后的情况均不理想。^[7]上海“文革”期间的食糖销售基本处于增长状态可为证实，具体见表：

上海 1966 年至 1976 年度食糖销售统计表

单位：吨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销售	64 319	74 016	80 858	84 183	81 640	87 998	101 303	123 689	129 894	121 213	113 911

资料来源：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 298—299 页。

至于上海“文革”时期的食糖零售价，自 1965 年 11 月商业部、全国物价委员会联合通知，确定上海白砂糖零售价为 1 市斤 0.78 元（批发价 1 市斤 0.68 元）后，一直未有变动。^[8]直至改革开放十年后的 1988 年，上海的食糖价格才较大幅度地调整为 1 市斤 1.18 元。

糖果

上海的糖果生产分轻工业食品行业和商办食品行业两个部分。“文革”运动前的 1964 年，经协商市轻工业食品行业生产 70%~80% 的产品，由市糖业烟酒公司收购；20%~30% 的产品，则由工厂接受外地来料加工和自销，这一规定一直延续执行到 1976 年。糖果销售有很强的季节性，旺季的销量为淡季的 8 倍。1974 年起，市糖业烟酒公司借用松江山洞仓库储存糖果，每年从 3 月份进库，5—6 月封库，一般储存 3 000 吨，元旦、春节前出库供应市场。

上海“文革”期间的糖果生产情况见表：

上海 1966 年至 1976 年度糖果产量统计表

单位：吨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产量	2 450	3 150	3 988	3 874	2 424	2 264	3 483	3 650	4 380	4 525	5 011

资料来源：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 228 页。

如表所示：上海“文革”期间的糖果生产处于间歇性增长状态，即虽有起伏，总量明显增长，1976年的年产量甚至高出1966年的两倍。即便以最低生产年度的1971年为例，以销售糖果、糕点闻名的哈尔滨食品店仍宣称：“现在一个夜市就要售出一千多斤哩！”可谓产销两旺。^[9]

上海“文革”时期的糖果品种如益民食品一厂的太妃奶糖、伟多利食品厂的花生牛轧糖和爱民糖果食品厂的大白兔奶糖等产品，均保持了很好的质量和品牌声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署《上海公报》时，周恩来总理将大白兔奶糖作为礼品赠送给美国代表团。至1976年，大白兔奶糖日产4吨以上，30%外销欧美、东南亚等国）。70年代较为有名的软糖还有儿童食品厂的上海奶糖（民间传说六粒上海奶糖可冲成一杯牛奶），天明糖果厂的结连奶糖和华山糖果厂的百花奶糖等（因取吉利口彩和包装鲜艳，成为市民婚庆送糖的首选品种）。与此同时，上海“文革”时期的糖果生产还推出了新产品。比如1972年以来，上海天山回民食品厂首创蜜饯型风味的奶油话梅糖、陈皮梅硬糖、拷扁橄榄糖等；1975年大陆糖果厂研制成果



大白兔奶糖糖纸和糖袋

汁粉夹心糖；1976年在上海医药公司和第二制药厂的配合下，又研制成维生素C夹心糖（每粒含维生素C约10毫克）等。巧克力系列的新品种如牛奶巧克力、酒心巧克力，及1974年上海儿童食品厂引进意大利金币套壳机生产的金币巧克力等，投放市场后均深受欢迎。^[10]

酒类

上海的黄酒、白酒货源大都来自浙江、江苏等地。三年困难时期，外地调入的酒类数量锐减，上海酒类供需矛盾突出。就此，一方面上海对市区居民凭证、记数、不定点供应每户黄酒或果酒1斤，啤酒1瓶。节日安排大户供应白酒1斤，黄酒2斤；小户白酒、黄酒各1斤。^[11]另一方面，市郊大小酒厂（坊）获得一定规模的发展。整个60年代，上海酒业开发的新品种有上海白酒和黄酒中的甲黄、特加饭、花雕等。70年代，市糖业烟酒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又先后开发了红、白葡萄酒等果酒系列；上海曲酒、七宝大曲、江南头曲、上海特曲等白曲酒系列；研制了青梅煮酒等产品。^[12]



70年代，上海本地酒类货源大幅增加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由下表所示：上海“文革”期间的酒类货源，从1966年购进酒类34 565吨（市内购进20 167吨，外省调入14 398吨，比例为58.3%：41.7%）；到1970年的51 242吨（市内购进37 024吨，外省调入14 218

上海“文革”时期酒类进销统计表

单位：吨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市内	20 167	21 518	31 558	35 177	37 024	34 200	39 489	45 579	50 719	56 780	62 101
外省	14 398	9 456	9 234	13 777	14 218	10 531	8 768	10 507	11 532	11 158	11 794
合计	34 565	30 974	40 792	48 954	51 242	44 731	48 257	56 086	62 251	67 938	73 895
销售	36 602	44 081	47 264	51 934	50 304	48 257	55 508	61 274	65 080	72 055	81 080

资料来源：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299页。

说明：1. 以上数据均为批发口径。2. 关于销售量大于购进量，是因为每年度均有期末库存。如1966年共购进34 565吨，本市销售36 602吨，上年度期末库存19 327吨。

吨，比例为72.3%：27.7%；再到1976年的73 895吨（市内购进62 101吨，外省调入11 794吨，比例为84.0%：16.0%）。基本呈现出两条递增的线索：一条是市内的酒类货源比大幅度上升，一条是酒类货源总量大幅度增加。再具体看酒类销售量的统计，从1966年的36 602吨，经1971年的48 257吨，再到1976年的81 080吨，其指标竟翻了两番。这不仅说明上海的酒类货源主要依赖本地生产支撑，更证实“文革”中后期以来，上海的酒类销售量持续上扬。按照“文革”运动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饮酒终究属于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且“文革”初期因红卫兵的冲击，市区专业酒店大部停业，怎么会于1971年后出现如此“井喷”的情况呢？上海啤酒产量的统计可谓例证：

上海市“文革”时期啤酒产量统计表

单位：吨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产量	14 113	18 244	21 321	23 402	22 457	24 310	26 317	27 867	30 947	36 304	40 537

资料来源：贺贤稷：《上海轻工业志》，第136页。

上海是全国最早生产啤酒的基地之一。上海1966年至1976年

的啤酒产量，总体上升 2.6 万多吨，虽节节升高，但整个态势是前期较为缓慢，后期才达到生产和销售的高潮，如 1971 年至 1976 年的五年间，上升量为 1.8 万多吨，占总上升量的 69.2%。1976 年 5 月 2 日，徐景贤曾对《解放日报》内参反映“青工上饭馆大吃大喝现象增加”一文作出“急件”的批示，要求王秀珍和团市委书记陈新发专门在全市五四青年节大会上讲一讲此事。^[13]这说明“文革”中后期，整个社会对饮酒的看法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生活中的婚庆、生日和孩儿满月时，会有人操办酒席，就连平常的朋友聚会也会有人借酒助兴，以致夏季时啤酒供不应求。正是在此阶段的销售高潮中，上海的啤酒生产形成了天鹅、灯塔、帆船、海鸥等品牌的特制系列和上海、光明等品牌的普通系列。^[14]上海“文革”前形成的酒类零售价格，如甲级黄酒每市斤 0.48 元，啤酒每瓶 0.42 元等，至 1981 年未发生变动。^[15]

茶叶

上海茶叶货源大多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云南、四川等省。上海茶叶市场以销售绿茶为主。因茶叶列入国务院管理的第二类商品，销售价格均由对外贸易部管理。1970 年 10 月，上海茶叶的内销业务划归上海市糖业烟酒公司。

1962 年 4 月起，上海城乡凭“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买茶叶，每券购碎茶叶半市斤或片茶 2 市两。服务行业用茶由各区主管公司指定茶叶店供应。高温工厂用茶，由单位提出申请，由市第一食品商店供应。随着经济发展，1966 年 3 月起，凡零售价每市斤 6 元以上的茶叶敞开供应。1967 年 1 月，茶叶供应进一步缓和，上海茶叶零售价每市斤为 4 元以上（含 4 元）的品种，免券敞开供应。至 1967 年 3 月，各种茶叶一律敞开供应。^[16]当时，上海茶叶销售价为祁红三级批发价 592 元/50 公斤，零售价 7.70 元/市斤；龙井三级批发价 900 元/50 公

斤,零售价 11.70 元/市斤;茉莉花茶三级批发价 456 元/50 公斤,零售价 5.90 元/市斤;沪拼红茶批发价 462 元/50 公斤,零售价 6.00 元/市斤。此价格长期不变。^[17]

罐头食品

“文革”期间,因外地发生“军械性武斗”,导致许多食品厂停工停产。上海的罐头食品业则仍有发展,如 1965 年上海开发的“生字牌”菊花晶饮品(以浙江产杭菊为原料),当年生产 188 吨,1974 年的产量达 720 吨。1968 年上海生产的西瓜酱罐头 1 418 吨,1974 年达到 1 948 吨。固体饮料主要有乐口福麦乳精。1974 年,上海冠生园食品厂在生产紫云英蜂蜜的基础上,首创营养丰富的生字牌蜂乳。^[18]

60 年代中期,上海的午餐肉罐头产品已形成系列,圆听罐头有 198 克、300 克、1 588 克;方听有 198 克、340 克、1 814 克。70 年代,火腿罐头产品得到改进和发展,畅销国内外市场。1972 年,上海年产猪肉罐头 13 737 吨,为 70 年代最高年份。由于黄鱼、凤尾鱼资源下降,70 年代上海梅林厂便以马面鱼为原料,生产熏什鱼、红焖鱼罐头投放市场。^[19]

50 年代,上海农科院技术人员栽培蘑菇成功,并在嘉定、上海、宝山、川沙四县推广。60 年代,上海市郊蘑菇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并向松江、青浦、金山、奉贤等远郊发展,成为上海罐头食品出口的重点品种。1968 年,上海市郊蘑菇种植面积首次超过 1 000 万平方尺,产鲜菇 4 495.7 吨,加工成罐头 3 704 吨;1973 年,蘑菇种植面积增加到 1 300 万平方尺,产鲜菇 6 191.8 吨,加工成罐头 5 051 吨,10% 供应市场,大多供出口。1974 年后,市郊蘑菇生产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除,种植面积下降。^[20]

水果类(以西瓜供应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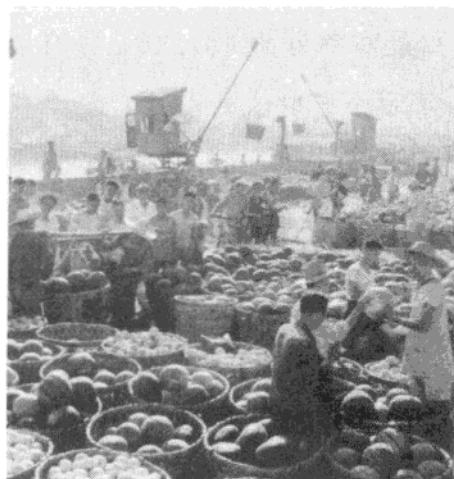
公私合营以后,上海的水果批发由国营商业统一经营,货源向各

产地采购或调拨。1959 年起,上海郊区开始种植西瓜,购销价格随行就市。不久,上海市郊国营农场开始兴办果园。“文革”期间,上海的水果销售总量是短缺的,用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的话说:“我是至今也忘不了老百姓不烧到 38 度的体温,没有医院开出的证明,不得买西瓜的年月。”^[21]追索其缘由,一是市郊的瓜田面积严重压缩,因为这关系“要政治挂帅,还是要经济挂帅”的“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问题。据 1968 年 5 月 20 日《文汇报》通讯“瓜田问题上的一场大辩论”称:上海县塘湾公社新建大队多种了七十二亩瓜,结果抓住“中国赫鲁晓夫”的活靶子,进行大批判、大辩论,将瓜田全部改种了粮田。二是紧缺的货源引发出的抢购活动十分放恣,据 1967 年 7 月 27 日《解放日报》发表“上海市果品公司一造反队员”的来信称:“最近,上海有许多工厂企业,不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擅自开卡车到市郊金山、嘉定、青浦以及浙江平湖等地,直接向农民购买西瓜,或者要农民将西瓜用船运到上海,直接卖给他们。”^[22]在此,如果说用政治的标准来制裁经济的生产,是一种“非常”时代的“非常”举措,那么,对这种“非常”举措的应对,却是以“抢购”的“非常”手段来反弹。这幕景象作为解构那个时代的一个旁注,不仅生动而贴切,更具有嘲讽的意味。同时,《文汇报》通讯的编者按和《解放日报》的来信,均上升到“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作“大是大非”的评说。这或许会令当事人忐忑和恍惚(今人则不解和哂笑),但事实终究是货源紧缺,供应紧张。且比照当时普遍实行的低工资制,确实价格不菲,据统计“文革”十年间,上海西瓜(年度平均零售价)为 8.40 元/50 公斤,即 1 市斤 0.084 元。其中,最低年份为 1968 年的 6.58 元/50 公斤,即 1 市斤 0.066 元;最高年份为 1975 年的 9.47 元/50 公斤,即 1 市斤 0.095 元。^[23]

至“文革”中后期,因压缩经济作物的做法遭到市场的报复,播种

面积有所扩大，上海的水果销售有所增长，据 1970 年 9 月 25 日《文汇报》称：当年 1—8 月，上海水果销售比 1969 年增长 18.3%；比 1966 年同期增长 48.5%。1972 年夏季，上海的西瓜销售“市区的供应量平均每人就达 40 斤左右，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24]“晚上，沿黄浦江的关桥、开平码头和苏州河的新闸桥、西藏路桥、曹家渡附近市场，灯火通明，瓜船云集，一辆辆汽车、劳动车把大批瓜果分送到全市几千个零售点”；^[25]“商业部门扩大经营网点，一些原来不销售西瓜的烟糖、副食品和综合贸易商店，也经营了西瓜”；“南京路大丰水果店开出店面供应堂吃，市食品一店组织职工下基层供应，两天多的时间就跑了近百个单位，供应了十万斤西瓜”。^[26]或许这是形势的逼迫；或许这是政治的需要，所以借此打出的旗帜便是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污蔑‘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谬论的有力批判”。^[27]而这恰恰也证明，天下的生产力一旦被某种政治需要所松绑，随时随地会释放出很大的能量。

“文革”时期销售瓜果还存在十分有趣的社会一幕，那就是在河道中、在码头上、在桥墩边，往往会有些被称为“流飞”的青少年抢劫瓜果。据 1969 年 7 月 20 日《文汇报》刊登的上海市果品杂货公司革命群众来信指出：“预计今年西瓜、甜瓜上市将达二百多万担，水蜜桃四十多万担，但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一些青少年借游泳为名，公然在河中登船抢瓜，甚至殴打贫下中农。”^[28]所以，经研究决定，由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上体司”（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



70 年代，苏州河边的瓜果市场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令部)协助市果品杂货公司维持瓜果市场的“革命秩序”。销售瓜果的“革命秩序”要由“文攻武卫”来维持,青少年抢瓜的背后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这就是“文革”社会景象的真实和“文革”行为逻辑的荒诞——真实的是“文革”的“非常时代”;荒诞的“文革”的“非常行动”。然而,“非常时代”导引“非常行动”当属“正常”,且在现实中越是臆造和推演“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越是复杂和尖锐,以致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和鸡毛蒜皮,统统归结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这又怎能不是“正常”中的荒诞呢!

另外,上海“文革”期间其他水果年度平均零售价记录如下:苹果为 0.49 元/500 克(1 市斤),最低年份为 1970 年的 0.47 元/500 克(1 市斤),最高年份为 1969 年的 0.51 元/500 克(1 市斤)。柑橘为 0.43 元/500 克(1 市斤),最低年份为 1966 年、1967 年、1975 年、1976 年的 0.42 元/500 克(1 市斤),最高年份为 1968 年、1969 年、1970 年、1971 年、1973 年的 0.44 元/500 克(1 市斤)。生梨为 0.398 元/500 克(1 市斤),最低年份为 1970 年的 0.37 元/500 克(1 市斤),最高年份为 1972 年的 0.42 元/500 克(1 市斤)。香蕉为 0.356 元/500 克(1 市斤),最低年份为 1969 年、1970 年、1971 年的 0.33 元/500 克(1 市斤),最高年份为 1972 年、1974 年、1975 年、1976 年的 0.38 元/500 克(1 市斤)。

干果与干菜类

1956 年,上海市食品杂货公司成立,干果与干菜类批发和零售由公司统一管理,并实行国家定价。现选取若干品种介绍如下:

红枣长期属计划管理商品。自经济困难时期到 1970 年,春节期间敞开供应,平时一般不零售。1971 年以后,春节每户定量供应红枣(或黑枣)0.5 公斤(1 市斤)。1984 年以后,取消计划调拨,实行议购议销,敞开供应。“文革”前的 1964—1965 年,小红枣代表规格为

三级,零售价稳定在1市斤0.78元。1966年降为1市斤0.76元。1967—1972年再降为1市斤0.70元。1973年,三级小红枣零售价上升为1市斤0.80元。至改革开放的1979年,尽管农副产品收购价全面提高,上海春节定量供应的小红枣仍保持原零售价,亏损则由财政补贴。1984年,上海取消春节定量供应,实行议购议销,三级小红枣年度平均价上升为1市斤0.965元。^[29]

上海的黄花菜(上海人称“金针菜”)货源长期处于紧缺状态,平时一般不供应,春节时每户定量供应100克(二市两),或另加10克(二市钱)黑木耳。这套搭配成为上海许多家庭春节餐桌上一道山珍,一年一次,一年一碗,全家团聚时品尝,构成记忆,甚至构成口味爱好。每逢春节购买时需凭证划卡,且价格较高,1966年为1市斤1.26元,1967年至1972年为1市斤1.20元。1972年底,商业部提高黄花菜收购价格。上海从1973年1月起将零售价提高为1市斤1.30元。这个价格一直保持到1982年,其中批发环节的经营亏损由财政补贴。直至1983年,黄花菜敞开供应,当年平均零售价为1市斤1.55元。^[30]

以豆类或薯类为原料提取淀粉加工而成的粉丝,深受上海市民的喜爱。解放后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外省调入粉丝减少。市粮食局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平价原料(主要是蚕豆)进行加工,所以,市场供应的粉丝每0.5公斤收取粮票1.5公斤(春节期间按户定量供应的粉丝均不收粮票),1970年10月起减为1公斤。至1983年1月起,改为一、二级纯豆粉丝收粮票1.5公斤,三级以下及混合粉丝仍收粮票1公斤。至1988年春节后,沪产粉丝取消粮票,放开价格。“文革”前的1964年,上海一等粉丝为1市斤0.89元,1966年降为1市斤0.84元。至1985年4月,粉丝零售价提高为1市斤0.90元。^[31]

黑木耳主产于黑龙江、四川、湖北、陕西等省。“文革”前的1965

年,上海黑木耳零售价为1市斤6.74元,1966年为1市斤6.35元,1967年为1市斤5.80元。1973年1月起,由于产地收购价格提高,上海零售价格调整为1市斤6.50元。1983年,黑木耳价格放开,上海年度平均零售价为1市斤9.2元。^[32]

卷烟(兼述卷烟贩运)

解放初期,上海有卷烟厂89家。后经公私合营和调整改组,上海卷烟厂于1960年挂牌成立,成为上海唯一的卷烟厂,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卷烟厂。当时,上海生产的卷烟品牌主要有熊猫、中华、红双喜、牡丹、大前门、飞马等。1959年时,上海卷烟实行凭票证供应,品种范围为红双喜牌以下至飞马牌以上(1990年,上海取消卷烟票证)。

以“文革”前的1964年统计为基准,上海出产的中华牌香烟零售价每包0.58元(批发价每条5.28元);牡丹牌每包0.49元(批发价每条4.50元);大前门(锡纸包装)每包0.38元(批发价每条3.50元);精装飞马每包0.31元,平装每包0.28元。整个“文革”时期至1980年,上述香烟的价格未有变动。1980年后,因产品结构调整(改产过滤嘴烟),中华零售价每包1.80元,牡丹每包0.90元,大前门每包0.48元,飞马每包0.48元。^[33]

今日讨论“文革”,往往会被“文革”运动的许多政治场景所定格,



上海市打击投机倒把总指挥部胸章(摘自《证照中国 1966—1976 共和国特殊年代的纸上历史》第57页)

便以破碎了的、撕裂了的“片断化”记忆为支撑,而遗忘了“文革”的整体状态。现在讨论“文革”社会生活史,就是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座,从底座开始激活整个“文革”记忆,使“文革”记忆不仅有政治运动的骨架,更有社

会生活的血肉。以此为由，翻开上海“文革”政治运动波澜壮阔的画卷，可见在1967年初“一月夺权”的时候，上海市面上正在抢购煤球和手表等高档商品（伴随着经济主义）；7月份在抢购煤球和大米（伴随着全国武斗）；10月份在抢购毛巾（因不要布票）等。至1967年底，则出现了抢购香烟、火柴、肥皂等小商品的风潮。如此叠加起来，且上下贯通，大致可复原“文革”运动的整体面相。

现请看第28期《财贸战报》“打击水上投机倒把”专刊的几则报道：

去年年底最后一天的清晨，长宁区、上海县打击投机倒把战斗队伍搜查到北新泾木桥江边，停泊着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小渔船。经盘问，原来是从安徽马鞍山来贩运香烟的。一渔民还交出了上海的联络地址。战士们当即出击，在市区某处擒获两名投机倒把分子，并搜出大前门、飞马牌香烟五百多包。再经审问，两名投机倒把分子承认准备夜间偷偷装船，被迫交代藏在另一处的香烟二千余包，从芜湖套购来沪的尼龙丝袋七千只等。同时，又捉住了套购香烟的同伙和腐蚀干部的暗娼两名。^[34]

天刚拂晓，黄浦区饮食二公司打击投机倒把的战士正在搜查一装载青砖的木船，发现一贴有易碎标记的木箱，便要求船主打开看一看，船主不肯并说客户不在船上。但战士们觉得箱子的比重不相称，是轻飘飘的，更引起了怀疑，当箱板揭开后，却是满满一箱飞马牌香烟，足有几百包。战士们根据船主的线索找到了“客户”，查明此人是江苏泰安一农机厂的采购员，正伙同该厂的会计和厂长利用在沪采办物质的机会，做一批投机买卖。^[35]

十二月三十一日早晨，红三司战士接到命令，对停泊在黄浦江的五只非机动船展开攻势。结果战士们进入船舱，发现在一个高一米左右的米桶里，除了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米外，其他都是香烟

和火柴。当查到最后一条船时，发现船上没有人，结果在这条船的箱子里、暗舱内、桌肚间，甚至在帆布的夹层中，都搜出了数以百计的香烟、火柴、现钞和一些工业用品。这时，一条小舢舨正渐渐靠来，结果又在一个根本不像船民的矮个子身上，搜出大量的香烟。^[36]

东方红百货商店香烟柜台的营业员发现近来常来买烟的一个约摸五十岁的女人，又来买两包群英牌香烟，便决定跟踪，只见该女人径自向浙江路朝北走，进了“新中国”旅社。不久，该女人又来柜台买烟，营业员脱口而出：“咦！你怎么又来买啦。”该女人拔脚就跑，连香烟、找零都没有拿。营业员立即将情况向财革会（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报告，并组织打击投机倒把队伍直奔“新中国”旅社。原来该女人是温州来的，打开房间没有人在，只见背包及面上装着荸荠的篮子下面全是香烟，共193包。等到晚上近七点钟，当该女人拎着一草包来到房间时，打击投机倒把的战士对她进行盘问，该女人装聋作哑，但打开草包一看是29包香烟，不得不作了交代。^[37]

再请看同期上海报刊的相关报道：

1968年1月14日《解放日报》“警惕坏人捣乱春节供应”报道：“最近，有的商品（主要是小商店中的副食品）供应出现了排队争购现象，甚至有些青少年在一小撮流氓阿飞的挑动下发生争吵打架，煽动起哄，冲击店堂。更有少数坏人乘机捣乱，造谣惑众。”

1968年1月18日《文汇报》文章“上海市场商品充沛购销两旺形势大好”报道：“最近煽动抢购小商品，有些地区发现有坏人在商店门上隔夜偷偷写上明天供应某种商品的字样，让顾客排队空等，制造紧张气氛和矛盾”；“对于那些一次购买几十斤到上百斤糖果的顾客，我们商业职工有责任加以劝阻”。

1968年1月21日《工人造反报》刊登造反派战士来信“刹住抢购风”称：最近“发现有不少的人排队大量购买糖果、香烟、酒、无线电器材等”；“一次在市手工业局产品陈列所门前有几百人排队等候，上前一问，排队的人竟笑笑说‘不知道’”。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场上以香烟、糖果为主的“抢购风”十分猖獗，据有关消息，近期“以香烟为例，市场供应量不断增长，近几个月比以往增加三分之一左右”。^[38]那么，除了应对性地采取经济措施以外，当政是如何看待这股“抢购风”的呢？请看《文汇报》的一段经典评论：

当前市场上出现的一股抢购风，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阴谋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从市场问题上打开缺口，制造混乱，从而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罪恶目的的一种恶毒手段。^[39]

从“抢购风”引出“两条道路斗争”，引出“复辟资本主义罪恶目的”——恰是“文革”习以为常的思维逻辑，那就是小题大做，惹是生非，即所谓“上纲上线”——无论什么人与事，统统上升到政治的“纲纪”上，表面上阵线严明，实质上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恐惧漫溢而出；表面上立竿见影，实质上是积聚民间的怨怼和矛盾。再联系“抢购风”，明明是物资短缺；明明是城乡差别；明明是岁末年初，城市居民购置年货。当然，明明是有人伺机从中牟利等——但这都是“正常”——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正常”，那个社会的“正常”，乃至是人之本性的“正常”。所以，当以“非常”的立场和眼光来作判断，来作处置时，“正常”也就变得“非常”了。

解读两张表格：

表一

上海 1966 年至 1976 年度国营商业消费品(食品类)零售价格分类指数

(以上年价格为 100)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指数	96.4	101.1	99.9	100.5	99.5	100.0	99.9	100.2	99.8	100.1	99.8
粮食	103.8	107.1	100.0	100.0	98.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副食	92.1	102.3	98.9	102.5	101.2	100.0	99.9	100.0	100.0	100.1	100.0
烟酒	101.6	101.2	100.0	100.0	98.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汪杰：《上海价格志》，第 659 页。

印象一：从分类指数看，1966 年至 1967 年间，粮食的价格指数（103.8→107.1）和副食品的价格指数（92.1→102.3）略有变动，其他年份均起伏不大。烟酒的价格指数更是十分稳定。这主要是因为 1967 年 8 月 20 日，中央宣布冻结物价。1973 年 8 月，国家计委又召开全国物价工作座谈会，规定猪肉、牛羊肉、食糖等销售价格属国家计委审批；鸡蛋、名酒、奶粉、茶叶等销售价格属商业部管理。^[40] 正是这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的“在位”，正是这两个步骤的部署，上海“文革”十年间商业消费品零售价格的指数，维持了大致不变的状态。就此，上海市民的生活在“低工资—低物价”的构造中，在“收入—消费”平衡中，基本保持了低水平的重复。

表二

上海“文革”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构成比例统计表

单位：亿元/%

年份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食品类		衣着类		用品类		燃料类	
		总额	比例	总额	比例	总额	比例	总额	比例
1966	28.72	16.10	56.1	4.12	14.3	7.68	26.7	0.82	2.9
1967	30.78	16.85	54.7	4.94	16.0	8.19	26.6	0.80	2.6
1968	29.94	17.11	57.1	4.29	14.3	7.76	25.9	0.78	2.6
1969	32.57	17.26	53.0	5.36	16.5	9.19	28.2	0.76	2.3

(续表)

年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食品类		衣着类		用品类		燃料类	
		总额	比例	总额	比例	总额	比例	总额	比例
1970	31.85	16.80	52.7	5.47	17.2	8.84	27.8	0.74	2.3
1971	32.91	17.38	52.8	5.36	16.3	9.44	28.7	0.73	2.2
1972	36.15	19.19	53.1	5.35	14.8	10.89	30.1	0.72	2.0
1973	39.79	20.16	50.7	6.96	17.5	11.97	30.0	0.70	1.8
1974	44.06	22.14	50.2	8.28	18.8	12.93	29.3	0.71	1.6
1975	47.71	23.56	49.4	9.37	19.6	14.02	29.4	0.76	1.6
1976	49.98	25.23	50.5	10.01	20.0	13.95	27.9	0.79	1.6
1985	173.39	64.08	37.0	35.51	20.5	72.70	41.9	1.10	0.6

资料来源：由月东：《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第 688—689 页；《上海计划志》，第 238 页。

印象二：根据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恩格尔系数，即考察食品支出总额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消费结构变化），可得出如下结论：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反之，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则呈现下降趋势。一个家庭的情况亦是如此，其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这个家庭经济越富裕。从表二可见：上海“文革”十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1966 年的 28.72 亿元到 1976 年的 49.98 亿元，确有相当幅度的增长。但与改革开放后 1985 年（又一个十年）的 173.39 亿元相比，便相形失色，不可企及，分明是两个时代。

同时，关键的要素是食品类的支出总额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 1966 年的 56.1% 到 1976 年的 50.5%，只下降了 5.6%，应该承认是较小幅度的下降，说明社会经济状况，尤其表现在民生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和进步（继续以 1985 年食品类支出占总额的 37.0% 为参照，可知相比于 1966 年，其构成比例下降了 19.1%。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真正是横跨了两个时代）。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1978年中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至2005年为36.7%)。就此,可以认定“文革”期间的上海市民生活,既没有经受灾害,也没有享受富裕,其总体生活水平处在温饱线上。

注 释

- [1]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1961年226卷第1—2页。1961年12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一商局党委、二商局党委、粮食局党委《关于改变食盐、酱油、火柴、民用线、肥皂、香皂、药皂的供应办法的报告》。又: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314,第1—2页。1962年2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一商局党委、二商局党委《关于改变食盐、酱油、卫生纸、煤球的供应办法的报告》。
- [2]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1963年1621-256,第1页。1963年6月7日,上海市粮食局《关于恢复食盐敞开供应取消凭票供应等办法的通知》。又:上海市粮食局档案,卷7,第1页。1988年8月26日,上海市粮食局《关于对本市居民临时实行食盐凭票定量供应的通知》称:1988年7月中旬,食盐供应一度紧张。8月28日上海临时实行食盐定量凭票供应。市区居民暂以当月50克票面的定量油券代用,每券购买食盐500克(1市斤)。
- [3]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 [4] 据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粮食志资料长编》,第3309页记:1972年5月2日,市革委会财贸组批准盐厂设计方案。1975年1月正式投产,连续三年亏损,1978年转亏为盈。以十年计,该厂累积生产精盐13.47万吨,占同期上海市场精盐供应量的65%。1986年1月,上海制盐厂停止生产。
- [5] 上海市盐业公司档案,1967年11月4日,《关于食用精制再制盐价格问题的通知》称:1967年11月15日执行。
- [6]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 [7] 据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2页记:1984年至1987年9月,上海先后发生5次抢购食糖的风潮(1984年1次,1985年2次,1986年与1987年各1次),群众排队抢购,一般多买5~10斤,个别的甚至买50~100斤。市糖业烟酒公司紧急调运库存食糖,每次投放量达3000~10000吨不等,一般在2~10天平息抢购风潮。

- [8]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 [9] “淮海路商店新貌”《解放日报》1971年9月26日。
- [10] 贺贤稷:《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 [11]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1961年1525-101卷,第42—57页。1961年8月21日,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处《关于酱油、米醋、双酱小商品市场情况的请示报告》。
- [12]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 [13] “青工上饭馆大吃大喝现象增加”《解放日报》内参《情况简报》增刊第56期。
- [14] 贺贤稷:《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 [15]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 [16]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 [17]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 [18] 贺贤稷:《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 [19] 同上书,第93页。
- [20] 同上书,第583页。
- [21] 陆谷孙:《也谈邓丽君》,《南方周末》2009年1月8日。
- [22] “不要下乡直接向农民买西瓜”《解放日报》1967年7月27日。
- [23]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 [24] “欣欣向荣的上海市场”《文汇报》1972年10月3日。
- [25] “西瓜甜瓜大量上市”《解放日报》1972年8月5日。
- [26] “上海市场西瓜供应充沛”、“商业人员卖瓜忙”《文汇报》1972年8月5日。
- [27] “西瓜甜瓜大量上市”《解放日报》1972年8月5日。
- [28] “狠狠打击煽动抢瓜的阶级敌人”《文汇报》1969年7月20日。
- [29]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 [30] 同上书,第160页。
- [31] 同上书,第161页。
- [32] 同上书,第163页。
- [33] 同上书,第224—225页。
- [34] “这是什么渔船?”《财贸战报》1968年1月16日。
- [35] “一箱奇怪的‘精密仪器’”《财贸战报》1968年1月16日。
- [36] “提高警惕,不放过一个坏人”《财贸战报》1968年1月16日。
- [37] “一个奇怪的香烟‘采购员’”《财贸战报》1968年1月16日。
- [38] “打退扰乱市场的歪风”《文汇报》1968年1月23日。
- [39] 《文汇报》1968年1月18日。
- [40]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附三：

上海市打击投机倒把总指挥部 《打击投机倒把简报》第一、二、六期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打击投机倒把简报》第一期(绝密)

打击投机倒把总指挥部为了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新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市革命委员会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继“一二·一九”对全市旅馆、饭店、招待所采取革命行动之后，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对水上码头、船只进行一次打击投机倒把的突击战斗。

“一二·一九”战斗，由市《打投》总指挥部会同市航运公安局港务监督、内河航运管理处、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组成作战总指挥部，下设七个临时指挥部，全线配备兵力 12 000 多人。在广大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对内港所有船只的停泊点(共分五块三十八个段)、外港的吴淞、复兴岛、杨树浦、新开河、董家渡等五个重点锚地全面突击清查。

根据战斗部署，《打投》大军在清晨六时前，进入指定的集中地段，六时三十分开始统一行动，战斗至下午六时基本结束。这次革命行动的初步战果如下：

(1) 在政治上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捕获隐藏的四类分子、走资派、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及政治嫌疑犯 51 名，搜出轻机枪 2 挺，步枪 4 支，信号枪 1 支，炸药 6 包，子弹 2 000 多发，信号弹 60 发。

(2) 查获了大量套购贩卖和非法外运的粮油、工业品和农副产

品。香烟 12791 包,火柴 7809 盒,大米 6307 斤,茶叶 1000 斤,尼龙丝袋 7000 只,玻璃 1208 块,废铁 3000 公斤,以及食糖、花生、芝麻、家禽、蛋、虾、鱼、棉花、棉毯、土布等物品,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倒把破坏活动。

“一二·三一”革命行动以来,香烟、火柴等工业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一直比较正常,排队抢购紧张商品现象已经显著减少,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普遍好评。

上海市打击投机倒把总指挥部

1968 年 1 月 3 日

最 高 指 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打击投机倒把简报》第二期(绝密)

值 得 注意 的 几 件 事

在苏州河内发现一条小木船装有本市生产不凭票证供应的棉胎四十八条,初步分析有投机贩卖之疑。

恒丰路桥附近苏州河内发现两条木船运载空棺材达九十具。据称系本市某寿器店(经过破四旧,还有寿器店?)出售的处理商品,其主管单位系市口木公司。经与该公司联系,答复称:本市破四旧时已有很多棺材敲掉处理了,留下一部分考虑到国家的经济收入,考虑到外地农村在用好的木料生产棺材,故派员出去推销,以便使国家减少经济损失(报废)和节约外地木材。这九十具就是向外推销的。

总指挥部战士认为:这是一件重业务、重经济的突出表现,负责处理该一业务的主管部门领导,必须作深刻检查。

在浙江路桥附近水面的一条载重量不满五吨的小木船上,查获煤球三十五箩(袋、筐),估计重量约十余市担。看来大多系市内居民分散托带往乡下用的。

有铁皮加固，有封签，并标明“精密仪器”、“小心轻放”的一只木箱，经打开检查，全部香烟。

上海市打击投机倒把总指挥部

1968年1月3日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打击投机倒把简报》第六期(绝密)

“一二·一九”革命行动的战果

“六月天兵征腐恶”，市打击投机倒把总指挥部会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12月19日晚上十时，组织了一万五千名战士，对全市十个市区296家旅馆、饭店、招待所采取了革命行动，给阶级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这次革命行动，共查获手枪3支，子弹160发，手榴弹2颗，匕首11把，手铐3副，现金12540元，香烟25816包，火柴8402盒，纪念章9343枚，粮食3124斤，黄铜3吨，棉布301尺，裤料28件，皮鞋180多双，西药134瓶，人参5斤，板鸭100只，香肠65斤，玻璃530块，塑料线4200公尺，漆包线240尺，以及空白介绍信10本，还有花生、绿豆、鸡、鱼、淡菜、茶叶、棉花、棉胎、棉纱、绒线、肥皂、皂粉、草席、半导体、日光灯、五金电料零件等大量物品。

这次革命行动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杀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气焰，使那些投机倒把，为非作歹的坏蛋饱尝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目前，战斗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打投》大军正在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为把这场打击投机倒把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而不懈努力。

嘉定县在水陆交通要道进行突击检查

嘉定县《打投》指挥部在工厂、财贸革命职工、红卫兵小将和嘉定

上艺司的配合下,于1967年12月28日晚上至30日中午,对全县水陆交通要道进行突击检查。查获外地逃来的走资派2名,搞投机倒把的四类分子1名,冒充市打击投机倒把指挥部的拦路诈骗一起,搜查出手榴弹15颗(系太仓三司的,现交嘉定县武装部处理),匕首2把。同时,还查获香烟25000多包,火柴5000多盒,大米3000多斤,蛋800多只,以及黄豆、花生、肉松、芝麻、糖精、棉花、砖瓦等物品。

上海市打击投机倒把总指挥部

1968年1月5日



第十二章

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

——以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为个案

一、传媒话题的舛误与厘正

先看一段报摘：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前后，上海人年三十的傍晚，在新式里弄的几家合用厨房里，石库门民居煤球炉红火的灶披间中，放眼望去，端的是：冷盘中布置的是风干的酱肉、咸肉、白切肉、白斩鸡；砂锅中煮的是笋干或霉干菜红烧肉；铁锅煎的是黄鱼或带鱼；待下锅的热炒是，烤麸素鸡金针菇黑木耳花生米、黄芽菜与肉丝混炒的“烂糊肉丝”、清炒黄豆芽与油豆腐、家常豆腐加蒜加葱、雪里蕻咸菜炒冬笋……看官或问，这不早就是小康社会景物了？其实，那时沪人过年，准备“年货”费时要达月余。这“大鱼大肉”四字，肉要靠每人每月半斤数两肉票的攒积，鱼则分大户小户论条供应……^[1]

再看一段刊摘：

据上海自行车厂一食堂采购员的女儿回忆：因为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厂革委会（“文革”时期单位权力机构的称谓）决定每月给他（指父亲）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2]

最后看一段网摘：

买肉凭票是70年代末才取消的。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在全国看还是比较高的）。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1元，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比如说0.80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类）。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会比外地好得多。^[3]

我们注意到：以上三段摘编皆对上海“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言之凿凿，甚至列出切实的数据（如“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0.80元的熟肉”等）。藉此，笔者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十人一组）作过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4]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他说：

在家我是老小。当时买菜做饭全是我。因“文革”时期，当教授的父亲受到冲击，工资也减掉了。我们家就经常买一块猪肉切成片，肉片炒青菜，肉片炒卷心菜，既有荤又有素。我断定“文革”买肉不凭票。



多数人的记忆不仅构成强势,还可生成“话语霸权”。那么,比照个别人相悖的记忆,只能依凭梳理史实来论证、来说话了。为了求得对该问题的全面厘正,现将上海凭票证供应猪肉的情况排列如下:

1. 1955年12月1日至24日,上海首次实行猪肉凭票供应。凡持有常住户口的居民,不分市区和郊区,一律按月定量,每人每月发放375克猪肉票,凭票买肉。后因生猪到货较多,当月24日起,不再执行凭票供应的办法。前后历时23天。尽管时间很短,但开启了上海凭票供应猪肉的先例。

2. 1957年1月1日至1964年5月31日,上海第二次实行凭票供应猪肉,规定市区居民每旬定量125克,元旦加量125克,春节加量625克。本次凭票供应历时7年5个月。其间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供应方法和定量年年不同,甚至月月变化,如1961年8—12月的每月下旬,全市有票却不供应猪肉。

3. 1976年7月16日至1979年10月,上海第三次实行按人定量、凭票供应猪肉的办法。按规定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2元(折合猪肉2.36市斤)。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1元;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50元。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75元;郊县农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元。春节加1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5元。1977年4月起,因商业部要求上海的猪肉供应定量标准应与北京、天津两市取齐,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公斤(去骨猪肉);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0.75公斤;郊县农民定量为0.5公斤。本期凭票供应猪肉的办法历时3年多。

4. 1984年12月23日至1985年4月20日,上海第四次采取凭证(票)供应猪肉的办法。规定市区居民凭“上海市购物证”,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30元(折合统货猪肉1.5公斤)。此次供应办法历时4个月。

5. 1987年11月21日至1992年5月,上海第五次采取凭证(票)供应猪肉的办法。按规定凡市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发给“上海市副食品购买卡”,凭卡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元。回族等少数民族居民,发放“清真牛肉专用卡”,每人每月供应牛肉5元。节日增加供应量。此次供应办法历时5年半。

综上所述,上海自1955年至1992年的37年间,共五次采取凭票证供应猪肉的办法。第一、二次发生在“文革”运动爆发之前。第三次发生在“文革”运动临近结束的两个多月前。第四、五次则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再作进一步检索,可知第二次与第三次间隔中的“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5]就此,可以明确断言:广泛传播的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凭票证之说,是舛讹失真的“集体记忆”。它与“文革”发生的连接,就那么一鳞半爪的最后时段。只是这最后时段的演变很有咀嚼和解析的意味。^[6]

二、三项持续性的保证

那么,上海“文革”前与“文革”后均实行凭票证供应猪肉,怎么“文革”中会是“敞开供应”呢?

原因之一:“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

在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保证上海等中心城市的资源调运和副食品供应,是一条重要的棋路。早在 1958 年,国务院即规定由商业部从各地区调剂生猪指标,供应北京、上海和辽宁,其余由省、区、市及协作区负责安排。自 1963 年起,商业部将生猪列为第二类商品。调往上海的生猪指标先由市专业公司上报商业部,由商业部在全国商业计划会议上统一平衡后,再下达分季、分省(区)调拨计划,具体则由产销双方衔接调运。^[7]当时,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为主要调运地(上海派出人员设立固定联系点),后扩展到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

“文革”期间上海市区生猪进货统计表

单位:吨、%

年份	货源合计	外省调入		郊县调入		市区收购	
		吨数	货源比例	吨数	货源比例	吨数	货源比例
1966	137 405	98 466	71.66	38 131	27.75	808	0.59
1967	155 119	120 943	77.97	32 962	21.25	1 214	0.78
1968	156 530	120 047	76.69	35 245	22.52	1 238	0.79
1969	123 017	88 043	71.57	32 649	26.54	2 325	1.89
1970	130 110	87 222	67.04	40 718	31.29	2 170	1.67
1971	148 476	99 021	66.69	48 504	32.67	951	0.64
1972	154 341	97 731	63.32	55 924	36.23	686	0.45

(续表)

年份	货源合计	外省调入		郊县调入		市区收购	
		吨数	货源比例	吨数	货源比例	吨数	货源比例
1973	139 499	98 095	70.32	40 746	29.21	658	0.47
1974	177 584	125 033	70.41	50 604	28.49	1 947	1.10
1975	158 558	101 976	64.31	55 619	35.08	963	0.61
1976	171 325	115 449	67.39	54 977	32.09	899	0.52

资料来源：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1 页。

由表可知：上海“文革”时期市区猪肉年总供应量在 12 万吨（1969 年度）至 17 万吨（1974 年度）之间，一方面总量保持基本稳定，二方面间距也略为明显。这说明在总体的宽余中仍存在局部的紧缩。然而，表中最重要的信息是：外省调入的猪肉占据上海市区供应的主要份额。其中，最高为 1967 年度，所占总货源的比例为 77.97%；最低为 1973 年度，所占比例为 63.32%，整个“文革”期间外省货源总平均比例达到 69.8%，即上海市区菜场三分之二强的猪肉由外省提供。

另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披露的资料，可从增添冷藏车和建造冷库等侧面提供佐证。当时外省猪肉调沪后，由市汽车运输公司三场的 16 辆冷藏车承担运输。当旺季集中到货时，难以为继。1970 年 1 月至 9 月，就因铁路卸货超期罚款 146 783 元。1971 年 1 月市革委会财贸组、工交组联合发文，批示将交运局汽车运输公司所属 15 辆冷藏车调拨给市食品公司，以承担外省调沪猪肉的运输任务。1973 年，商业部下拨给市商业二局一批意大利“菲亚特”保温车。1975 年又增配 4 辆罗马尼亚“布切奇”保温车，以充实上海副食品冷藏保温运输的能力。与此同时，因上海 60 年代，全市冷藏容量仅 4 万吨左



1969 年投资建造的大场肉联厂生产流水线

右。生猪上市旺季时,全年猪肉库存量都在 5.6 万吨左右,高峰时甚至近 8 万吨,为此还曾削价推销造成亏损。1969 年 2 月,经市革委会批准,上海投资在大场肉联厂建造万吨冷库一座,并配套安装了日宰生猪 0.4 万头的流水线。1970 年 8 月,市革委会财贸组又批准在波阳路建造 1200 吨简易冷库一座。市商业二局革委会则自筹资金,在大场、龙华、北新泾、外冈、黄渡、北蔡等地,扩建、兴建可容 10 万头活猪的饲养仓库,缓解生猪候宰猪仓不足的矛盾。^[8]先看“全国保上海”的供应量常年保持如此之高的比例(尽管 70 年代后,该比例有些微的下降),再看其运作部署如此切实和周全,说明上海“文革”时期以猪肉为主的副食品供应,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若是进一步探究,在猪肉等副食品“全国保上海”的背后,同时可见在日用工业品方面“上海保全国”的功能。例如据有关报道:1968 年春节前夕,上海“仅从陆路运往外地的日用品,就达六千多吨”,“第二季度调拨给全国各地的日用品工业比第一季度增长 20% 以上”;^[9]1971 年 1 月上半月,“上海商业部门已调出大批吃穿用商品,其中仅毛巾、被单、毛毯、卫生衫裤、锦纶袜、弹力袜、丝绸、呢绒、化纤布、胶鞋、搪瓷制品、钢精器皿等日用工业品,就运出 9900 吨,比同期增长 20%”;^[10]1973 年全市工业品“对外地调拨总值比 1972 年增长

7.5%，超过计划2.7%”；^[11]1975年初，为支援兄弟省市的春节市场供应，上海“铁路、航运部门，加快速度组织调运。本市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总值，1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长二成以上”。^[12]

看来，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制造的日用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调运外省，构成了外省猪肉等副食品保障上海的互动。如果说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动因，那么，它在根本上属于国家计划经济调控的结果。这种计划经济的调控可能会削弱民间的经济活力，亦可能会造成经济格局的失衡，但恰恰是它的权威至上，恰恰是它的强力主导，即便在政治动乱的非常时期，仍向上海提供了充足的猪肉供应。

原因之二：郊县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

再看表，“文革”十年间，上海每年从郊县调入的生猪，在3万多吨至5万多吨之间，平均占总货源比例的29.4%，即三分之一弱。其中，最低年份为1967年的32 962吨，占当年总比例的21.25%；最高年份为1972年的55 924吨，占当年总比例的36.23%。在此，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年度之间的生猪调入量有差异，甚至发生跳荡性的跌落，如1966年与1967年之间（总量38 131吨→32 962吨；所占比例27.75%→21.25%）；1972年与1973年之间（总量55 924吨→40 746吨；所占比例36.23%→29.21%）。但十年间的总体走势却呈现出稳步的增长状态，如1966年调入总量为38 131吨，所占比例27.75%；1976年，调入总量增至54 977吨，所占比例上升至



上海产品大量运往外地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32.09%。这说明“文革”期间，上海郊县的生猪饲养、收购和上市情况不仅是正常的，且对市区的供应和民众生活作出了贡献。



反映上海郊区养猪的连环画《养猪阿奶》
川沙县龚路公社文艺创作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 9 月出版

那么，在“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非常时期，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正常的情况呢？

50年代，上海对生猪实行派养派购，再分别给予饲料票、留肉票等奖励。60年代，上海实行了“换购”政策，即社队集体和社员按照合同规定出售肉猪（含牛羊）等，收购站则根据合同发给“上海市日用工业品购货券”（简称“工业券”，可用来选购人造棉、呢绒、胶鞋、铝锅、面盆、手表、自行车等39种工业品）和“上海市郊区专用商品购货券”（简称“专用券”，可用来选购肥皂、香烟、食糖、火柴、食盐、酱油等24种食杂商品）等。表面上看，甲方交货，乙方给券，似乎是一种约束性的交换，实际上恰是一种诱导性的促进。正是这种“把向农民收购肉食品和向农民供应商品结合起来”的政策，使上海郊县“1965年收购生猪148.13万头，为1962年的2倍”。^[13]

“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2月，上海生猪收购由派购改为计划收购，具体由市计委根据农商各部门的建议，核定年度生猪饲养和上

市任务,再由各县政府下达并逐级落实到生产队;各级商业部门则同生产部门逐级衔接,按计划进行收购。如果说这是明确加强了生猪生产的指令性,那么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高潮中,即便是奖售的方法发生了改变,但奖售的原则却一如既往。如1966年2月起,“不论集体或社员,出售符合起收标准的肉猪,每头奖售布票2公尺(1967年4月1日改为1公尺)、饲料15公斤”;1971年5月,“为鼓励养大猪,凡交售肉猪每头白肉超过35公斤的,每超过0.5公斤由国家奖精料(包括粮油副产品)1公斤。1974年7月1日起,由生产队出料加奖原粮0.5公斤”等。^[14]为了较全面地显示情况并说明问题,请看下表:

上海1963年至1978年生猪饲料供应政策标准

文件日期	文件标题	政策标准	有效期
1963.7.13	《关于肉猪收购问题的补充通知》	每头金额在50元以内的每元奖售饲料2市斤,超出50元以上的部分每元奖售饲料6市斤。	1963.7.1—1963.12
1963.8.12	《帮助集体养猪场多养一部分肉猪问题的通知》	每头肉猪供应饲料125斤。	1963.8—11
1963.11.3	《市人委批转商业二局关于1964年郊区猪、牛、羊、禽蛋等收购政策的报告》	每头肉猪收购金额不足40元的每元奖售饲料1市斤,40~50元的每元奖售饲料2市斤,超出50元以上的部分每元奖售饲料6市斤。	1963.1.1—1965.2.14
1965.2.5	《1965年郊区上市肉猪奖售饲料办法和手续的通知》	肉猪(连头白肉70市斤),每头一律奖售饲料(原粮)30市斤,并凭奖售饲料票供应。	1965.2.15—1971.7
1970.11.25	《关于1970年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年终分配工作意见的请示报告》	对超过规定标准的部分,每斤白肉奖售饲料1斤半到2斤,由各县从副食品和留队超重奖中解决,不足部分在购销结余中开支。	1970年年终分配

(续表)

文件日期	文件标题	政策标准	有效期
1971.5.3	《关于调整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的请示报告》	肉猪超过白肉 70 市斤的,每超过 1 市斤,由国家奖售精饲料 2 市斤。	1971.7—1986.2
1971.8.2	《1971 年郊区上市肉猪奖售饲料办法和手续的通知》	肉猪每头奖售饲料(原粮)30 市斤,改由国家直接奖售(原留队奖售),奖售饲料票全市通用。	1971.7—1978.12
1971.11	《关于贯彻执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情况汇报》	每头生猪集体留料(一般)90 斤,符合收购标准交售(70 斤白肉)的肥猪,每头奖原粮 30 斤;每超出标准 1 斤,奖售粮油副产品 2 斤。	
1973.10.11	《1973 年超计划上市肉猪精料解决办法的通知》	超 1 头给 1 头料,动用原料、储备、借支。	1973 年度
1978.4.24	《关于促进当前养猪事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通知》	肉猪增重白肉 1 市斤,补贴育肥饲料粮 1 市斤,并超 1 头给 1 头奖。	1978.5.10—1980.2

资料来源：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永久 22 卷 006—007 页；长期 150 卷；长期 195 卷；永久 298 卷。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 153 卷、155 卷、长期 381 卷等。

由上表可知：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上海郊县的生猪饲养始终处于优惠政策的支持之中。其间，从“派购”到“换购”再到“计划收购”，显然是自上而下地增强了调控权重；从奖赠购物券到奖售饲料，显然是为了持续保证并扩大生猪饲养的规模；从集体留料到国家奖售，以及各种细节和标准的变化，显然是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积极扶持。而这三个方面聚集于一点，那就是“文革”期间上海郊县农民的生猪饲养，非但没有像市郊菜农遭遇“菜农不吃商品粮”的戏弄和挤压，还因政策方面的宽松和激励，在个人和集体均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基本确保了生猪饲养量的有效增长。

上海 1966 年至 1975 年度生猪年饲养量统计表

单位：万头、%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饲养量	388	386	388	419	464	538	567	534	580	618~620
比上年增长	62	-2	2	31	45	74	29	-33	46	38~40
增长百分比	19	-0.5	0.5	8	10.7	16	5.4	-5.8	8.6	6~7

资料来源：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郊县十年粮食总产饲料粮养猪的增长实绩表》，1975年12月，“留料”1-7-45页。

说明：1975年为预计的统计资料。1976年资料暂缺。

确实，优惠政策导致了有效增长（“文革”十年间，上海生猪年饲养量从1966年的300多万头，上升到1975年的600多万头）。然而，“优惠政策”的背后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撑。众所周知，生猪饲养的关键是饲料粮的供给。若是让郊县农民自产、自留、自寻饲料粮，即便有“购物券”、“留肉票”等政策保证，也只能自给自足，略有多余，而不可能构造成郊县生猪饲养的基地，承担起向城市供应猪肉的任务。所以，通过向农民奖售饲料粮，既可使农民有所收益，又可促进郊县农村的养猪事业。据统计：1966年至1977年间，上海饲料供应数量为205 014.23万公斤，其中猪饲料

上海 1966 年至 1976 年中央专项和地方自筹饲料粮及猪饲料供应量统计表

单位：万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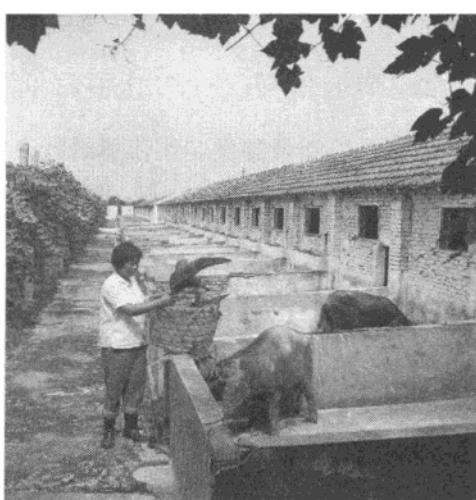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中央专项	5 228	5 136	4 093	3 948	3 556	3 847	4 665	4 034	3 745	3 731	4 043
地方自筹	11 728	13 479	11 612	10 968	10 653	12 925	6 178	2 618	5 447	5 413	5 514
猪饲料量	11 149	13 794	6 931	13 355	3 935	13 791	9 005	7 152	7 160	18 427	16 036

资料来源：《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第三册，第3045、3047页、第3212—3215页。

占 33.81%，禽蛋饲料占 8.72%。^[15]这些饲料粮有的是中央专项下拨的，有的是地方自筹的。

由此可见，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不仅是向农民提供了谋取利益的可能，调动了农民务实于养猪产业的积极性，更有来自政府的巨大专项资源的输入和扶持。例如商业部 1975 年第 50 号通知明确指定，提供给上海的 3 000 万斤饲料粮，“用于生猪催肥，以增加肉食自给量”。^[16]所以，上海郊县生猪交售政策不是单一性的存在，它聚合着中央、地方和农村集体、个人的多方责任和积极性，它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供应保障的有效结合。而在本质上，它仍然属于国家计划经济主导的运作和结果。

当然，中央专项拨入和地方自筹的饲料，并不能完全满足上海郊县整个饲养业的需要，其间的差额仍需多方筹措和调配。例如 1966 年上海饲养业投入的精饲料达 23 382.38 万斤，其中玉米、蚕豆、大麦等粮食 8 092.83 万斤；麸皮、清糠等粮油副产品 15 289.55 万斤。^[17]1976 年上海市管商品饲料总计 31 852.35 万斤，其中粮食 16 303.01 万斤，粮油副产品 15 549.34 万斤。^[18]同时，上海郊区大力利用水生



青饲料喂猪（松江区档案馆馆藏，吴四一提供）

饲料“三水一萍”（水花生、水浮莲、水葫芦、绿萍），据《上海市郊县青贮饲料历年统计总表》记载：1973 年度为 2.19 亿公斤；1976 年度为 3.80 亿公斤。储存“二壳一芒”（菜籽壳、麦壳、麦芒等）也是重要的饲料来源，例如 1972 年入夏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十个县约一万多生产队开展收集工作，储量

达 70 多万担,为 40 万头猪解决了越冬粗料”。^[19]就此,上有饲料粮的调拨和奖售,下有青粗饲料的收集和利用,终于确保了“文革”时期上海郊县养猪业的顺利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 80 年代,“农村粮油销售价格调整后,国家取消了收购生猪及其他农副产品的奖售粮和奖售油”,^[20]上海郊县的生猪饲养业进入了市场经济运作的轨道之中,价值规律成为其勃勃生机的原动力。^[21]

接着,应该追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文革”期间上海郊县的蔬菜生产、经济作物生产均受到“利润挂帅”、“钞票挂帅”的批判,而同样关系城市副食品供应和市民日常生活,生猪饲养却得到了多方的扶掖呢?

事实上,“文革”运动爆发初期,上海郊县的养猪业曾一度受到猛烈的冲击。据 1967 年 2 月 17 日《解放日报》报道:当时,一些公社因“革命”而“饲养工作无人管,生猪大量死亡,圈存量显著下降。如松江县一个公社在最近一个多月里,圈存量就少了两千多头”,还有人声称要“分掉集体饲料粮”;同时,也有造反派振振有词地指责“社员养了猪,生产呒劲道,收工回家朝棚里跑”,是“私”字当头,直接导致“有些地方出现了‘杀猪风’,如金山县吕巷公社在最近一个多月里,就杀掉了母猪七十头,出售了小肉猪一百七十九头,使社员养猪大大下降”。^[22]但这股伴随着“经济主义”而兴起的潮流,很快就被制止了。同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评论员文章《戳穿新的阴谋,发展养猪事业》,直接将冲击养猪业的行径挂在了“阶级斗争”的纲纪上。此后,当政者便悉力推进郊县养猪业,使其规模和产量不断扩展。

其实,存在于此中的缘由和内里的玄机,并非直接指对着保障城市供应(即城市供应的权重并不是至上的),否则很难解释发生在上海郊县的“菜农不吃商品粮”的故事。^[23]然而,恰恰关系到“商品粮”——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谓最高指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积粮”而养猪,便成为“文革”期间上海郊县养猪政策持续而稳定、养猪业迅速发展的根据和保障。



为革命而养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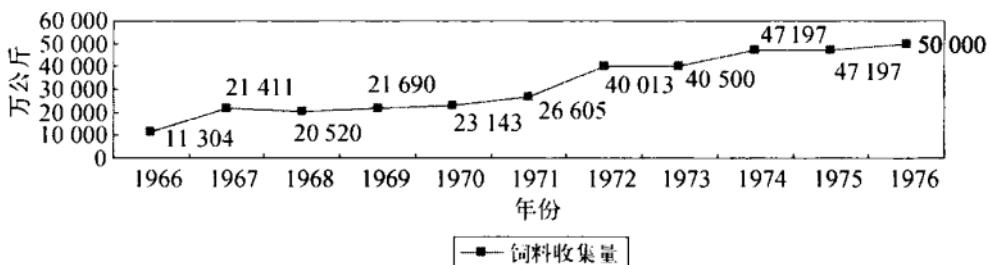
原因之三：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

上海作为人口集聚的大型城市,其源于公共饮食行业、单位伙食团和居民群三个方面的饮食下脚(上海人称“泔脚”),历来作为“城市副饲料”供给农村养猪。上海解放初期,全市有十多处泔脚自由市场,参与贩卖的有300余人。1958年8月,上海按办事处地段设立了205个泔脚收集站,有800多人参与工作。据当年统计,上海市区共收集米浆24万担,泔脚28万担。同时在淡家桥、四平路头道桥、控江路桥等处仍存在泔脚贩卖自由市场,“经常有300多贩户和100多条船自由买卖,每天有5000斤左右的泔脚流往外地”。^[29]“文革”运动爆发前的1964年,市人民委员会批转市粮食局、商业二局、农业局等《关于充分利用城市饮食下脚发展近郊菜区养猪》的报告后,“上海、宝山、川沙、嘉定、青浦、南汇6个县的62个人民公社都在利用饮食下脚喂猪,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30]各区普遍建立饲料机构(称为“区饲料工作组”、“区粮食局饲料工作组”等),郊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或公社则派专人

常驻市区各饲料中心站,按分配的泔脚数量派人到集中站车运。如上海县主要包销长宁、徐汇、黄浦、静安四个区的饲料喂猪,全年可节约相当于 1.3 万亩土地生产的粮食。^[31]据综合统计: 上海 1964 年收集泔脚 1 亿斤左右,1965 年收集了 2 亿斤左右。^[32]

或许是上海的“文革”运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械性武斗”,整个社会的生活秩序尚属正常;或许是郊县养猪业受到“革命路线”的护佑,没有非常的力量能够割裂城乡间的良性互动,总之,上海“文革”十年间,城市泔脚饲料的收集工作持续而发展。

上海 1966 年至 1976 年度泔脚饲料收集量汇总图



资料来源:《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第三册,第 3012 页。

由上图可知: 1966 年至 1967 年由 11 304 万公斤升至 21 411 万公斤; 1971 年至 1972 年由 26 605 万公斤升至 40 013 万公斤, 上海城市饲料收集工作连续翻番性地跃上了两个台阶。联系前述“文革”初期郊县养猪业曾受到冲击,说明这第一个台阶是制止冲击后的效应。至于第二个台阶能够陡然将城市饲料收集从 2 万多公斤提升到 4 万多公斤,且一直保持在高位数运行,那是因为全市掀起了收集饮食下脚,支持农村养猪业的群众运动。

据 1971 年的统计,当年“全市建有饲料收集站 228 个,收集人员 1 470 人”,如果说这只是推进常规工作,那么敲锣打鼓进里弄,男女老少齐动员,才是真正地调动和激发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例如徐汇区在各街道开展宣传活动,在各里弄增加泔脚缸。卢湾区粮食局组

织里弄干部、退休工人到宝山县彭浦公社参观养猪场，亲眼观看农民使用饮食下脚喂猪。然后组织 70 多人的宣传队伍，深入到 77 个里弄挨家挨户宣传。^[33]正是这种“文革”运动群众的模式，因为群众的思想和意绪被高度地整合化了、剪贴化了，且内在的认知与外在的氛围，被校对在一个以“革命”的名义为目标的准星上，以至时刻处于被点燃、被召唤的状况中，以至很轻易、很顺畅地就能运动起来。例如卢湾区鼓动里弄居民“争当饲料义务收集员，复兴中路 106 弄有位 80 多岁的陈老伯，主动在饲料缸上写‘为革命积聚饲料’；退休工人金某每天在饲料缸内将猪不吃的蚕豆壳、螺蛳壳等用手捡出来”。虹口区通过掀起高潮，“1—7 月的收集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31%”。^[34]为此，李先念副总理指示推广上海经验，国务院第 15 号《参阅文件》以《城市的废料，农村变成宝》为题，作了全面的总结和介绍，^[35]引得“北京、天津、武汉、哈尔滨等几个大中城市都先后来沪参观”。^[36]至 1973 年的统计，“全市在 107 个街道、1180 个里委都开展了饲料收集工作，有 1800 个收集人员，建立了 181 个饲料集中站，摆设盛器 10 万余只”。同时，泔脚饲料的质量得到提高，“如静安区南西饲料站做到菜皮、泔脚、米浆三分开；杨浦区控江饲料集中站水控制在 30%”，有力地支持了郊县养猪业。^[37]发动群众是“文革”运动的法宝，开展阶级斗争和大批判需倚重此道，连市民的日常生活也为此所牵缠、所搅动，这便是“文革”时期的社会特征。^[38]

与此同时，上海有关部门将所属真粉、淀粉厂的糟渣，统一交由各区县的饲料部门经营分配。据 1965 年的报告：“本市支持郊区养猪的统糠每月约 1 千余万斤。”^[39]1968 年 6 月，市革委会财贸组、郊区组召开郊区养猪工作会议后，决定自 1969 年起，糟浆饲料的投放将主要倾向于上海、嘉定、宝山、川沙等近郊地区。以上海县为例：全市糟渣类饲料 19.34%，淀粉浆水类饲料 31.36%，酒糟类饲料

30.12%，麻油渣饲料30%分配给该县。^[40]70年代后，由于工艺革新降低了单耗用粮，如豆制品行业采用隔心脱水法后，使百斤豆片的豆渣由原来的220斤下降到150斤，直接导致城市糟渣饲料量减少。如1970年安排郊县的糟渣6990万斤，比1969年同期减少1440万斤，下降18%，甚至造成“有些社、队组织力量去外省采购，增加了养猪成本”。^[41]为此，市饲料业为支持郊区养猪，尽量压缩市区单位的糟渣供给。据统计：1966年至1972年间，上海饲料业共向市郊各饲养场提供糟渣11亿斤，除供商业二局饲养出口肉猪外，其余均分配给郊县。如1972年，全市共分配糟渣1.37亿斤，商业二局系统3200万斤，科医教“五·七”干校900万斤，郊县共8300万斤。^[42]

另外，“文革”前市人委成立的“养猪办”，曾抽调一百多人派驻农村基层养猪试点场（队）担任联络工作，促进了城与乡、产与销之间的沟通，提高了管理水平。此项工作在“文革”中也持续进行。市食品公司还举办“猪医生”培训班，受训达1300多人次。^[43]1974年，市食品公司响应“卖菜的学种菜”的号召，开辟“走卖猪的学养猪”的道路，共抽调城市采购员、营业员一百多人，分9批去宝山、嘉定、上海、南汇、崇明等县参加养猪实践。^[44]此项工作对城市卖肉人掌握生产情况、预测上市趋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看来，从动员群众参与到糟浆饲料投放再到管理人员下乡，城市支持郊县养猪业呈现出多方位、多渠道的状况。如果说这确实是提供了一些资源和人力保障的话，不如说这是计划经济整体运作的特点、功能和结果。

综上所述，针对上海“文革”时期猪肉“敞开供应”的事实，原因之一：“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属基本保证；原因之二：郊区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属重要保证；原因之三：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属辅助保证。正是这三个着力点既分散又汇聚的构架，在缺欠价值和市场等活力因素的支配下，完全依据方针的引领、

政策的落实和措施的妥帖,打通了里外,沟通了上下,为上海非常时期的副食品供应,支撑起了一个稳固的平台。

三、记忆建构时的史实假托与价值取舍

关于上海“文革”时期猪肉“敞开供应”的问题,属于“是”或“不是”的事实判断。然而,当它与“文革”“非常态”的政治生活搅拌在一起,当它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淘洗,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公共论坛中构成了公共话题,甚至在已发生了歧义的境况下,便准定要引出“集体记忆”的辨析。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由法国学者哈布瓦赫提出。它强调记忆的公众性,在对历史记忆(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和其他记载获得)与自传记忆(个人对于经历往事的回忆)作出区分的前提下,指出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集体记忆”理论予以关注。确实,上海“文革”猪肉“敞开供应”的事实,畸变性地演化成“票证供应”的“集体记忆”,也是通过各个“个体的记忆表达”,再经过公共平台的制造和形塑而成为“集体性的记忆传达”,此间,从“个体的记忆表达”到“集体的记忆传达”是两个阶段的分布和跨越,但并非是说“个体的记忆表达”是真实的,而“集体的记忆传达”就是失真的。

其实,属第一阶段的“个体记忆表达”,处于或家庭、或亲朋、或好友的相处与聚会中;处于或讲故事、或发议论、或抒怀旧之情的沟通与交流中。于是,当有讲述者的意见、观点、情节描述成为主导倾向的时候(这往往取决于某一群体中讲述者的权威身份和讲述的质量),便能在倾听者、议论者中产生“呼应效果”,即先引起吸附式的共

鸣，再引出附和式的共识。此时，没有任何因素和环节可以保证讲述者的意见是确切而不失真的。尤其面对“文革”时期猪肉供应是否凭票的问题，因为它不是在记忆当时猪肉价格这么精确的数字（因关系家庭生活和开销，被不少人准确记忆），而是在记忆一个时期的供应状态，被许多类似的记忆枝蔓（如繁多的票证）遮掩着、错落着，生发出失真的记忆便是很正常的事了。应该承认，这种民间记忆自然地——“存在”——于人群的交流中，即便有所差谬，因为呈现出漂移性、涣散性的“存在”状态，也就不会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然而，属第二阶段的“集体记忆传达”，则是处于或报刊杂志、或广播电视、或讲坛报告的传媒机构中；处于或介绍、或阐述、或评论的大众传播中。于是，原来个体的、民间的记忆，便凭借社会公共论坛的权威和功能，产生着“膨胀效果”——既储存起来，又传播开去，以致成为大众的话题。如果说这只表现在形式上，那么更关键的便是既传播开去，又聚汇起来，以致在实质上成为公共的认同。此时，如果没有史学工作者根据档案作出结论，并进行有效的传播，同样不能保证公共认同的讲述和意见是确切而不失真的。因为类似“文革”时期猪肉供应是否凭票的问题，毕竟属于日常生活的记忆，而不是如上海“文革”时期的“炮打张春桥”、“踏平联司”等事件性记忆。比照而言，事件性记忆有确切情景、人物与过程的关系，且时空坐标不可动摇，事变演进不可复制。日常生活记忆也会有片断、细节的真实，但日久天长，琐碎笼统，难免生发出凿空之论。应该承认，这种进入公共传媒的记忆——“存在”——具备了社会活动的公信价值和意义，即便有所乖舛，因为呈现出至上性、权威性的“存在”状态，也就不仅成为公众记忆的依托，更成为公众记忆的动力。

接着，必须追问的是：面对上海“文革”时期猪肉“敞开供应”的简单史实，为什么个体的记忆表达和集体的记忆传达，均会出现舛误

的失实情况呢？

“集体记忆”理论强调记忆是需要构建的，即记忆不仅是人们对过去经历和体验的回忆，还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再造”的。所以，当下的境况和理念、认知和判断、利益和期待对“集体记忆”的构成至关重要。这也就是说，记忆建构不仅关涉事实认定，还关涉情感迁移和价值判断。于是，联系本题题旨，可知在上海长达37年（1955—1992）的票证史上，先后有五次发放票证供应猪肉，但恰恰不包含在“文革”时段之内。在此，曾经发生过“票证供应”的史实，便在形态上为记忆建构提供了依凭，但在实体上却被幻化的意象迁延了、讹舛了，难怪一些中老年人信而有征地描述肉票的形状，并以此为“事实认定”。

至于这段“事实认定”被穿凿附会地种植到“文革”时段内，那是因为时下人们对“票证时代”的记忆，总是关联着“经济短缺”、“供应紧张”、“生活艰难”等回顾和评价，这便很自然地唤起人们的苦难记忆、创伤记忆和灾害记忆，而这又怎能不聚焦到“文革悲剧”的价值判断上呢！何况，人们还可提供许多类似“半夜排队”、“猪油拌饭”、“发放票证”等精彩的生活片断——以真实的片断支撑模糊的时段——来作响应和确证。就此，关于上海“文革”时期凭票供应猪肉的“集体记忆”，便在一个属于政治选择的意义框架内完成了建构。

关于本题的逻辑推演，尚需辨析和应答的话题还有：存在于公共论坛中的“集体记忆”已确认上海“文革”时期使用肉票，便可推导出城市猪肉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等境况，进而可推导出“‘文革’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结论。^[45]事实上，这是“集体记忆”重建时，引入“文革灾难论”的价值取舍的结果。反之，当公布上海猪肉“敞开供应”的史实时，就如同笔者曾数次遭遇到的质问：这是否会推导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不同的“文革”记忆产生不同的“文

革”追问。史实核查与价值辨别，既要区分，又要联系。前者是真与假；后者是是与非。真与假的核查靠的是功夫；是与非的辨别靠的是学识。所以，即便在原则上信守“‘文革’灾难论”的价值取舍，回到史实，坚持史实——不仅 1976 年 7 月 16 日前，上海猪肉“敞开供应”——再看两条相关材料：

其一，整个“文革”时期，上海猪肉一直按国营牌价九折供应，即零售价为每 1 市斤(500 克)0.85 元。这个价格标准根据京、津、沪三大城市猪肉价格平衡的要求，由商业部通知于 1965 年 9 月开始执行，于 1979 年 10 月停止执行，历时 14 年。^[46]其间，当猪肉货源充裕时，上海市区还多次实行临时降价销售，如 1966 年 1 月 5 日至 26 日，以 8 折销售，每 1 市斤 0.69 元，全市供应 15 163 吨。1966 年 12 月 16 日至 1967 年 1 月 2 日，以 7 折销售，每 1 市斤 0.665 元，全市供应 22 838 吨。火腿、香肠、肉松等也同期降价。^[47]

其二，整个“文革”时期，上海猪肉的年市场供应量与年人均消费量均稳步上升。以 1965 年、1970 年和 1975 年为参照坐标，可见上海市区的年市场猪肉供应量分别为 95 166 吨→103 557 吨→154 343 吨。年人均猪肉消费量则为 14.8 公斤→17.85 公斤→27.71 公斤。^[48]这就是说“文革”起始年人均每月消费猪肉 2 斤多，“文革”中期月消费近 3 斤，“文革”后期甚至达到月消费猪肉 4 斤多。

由此可见，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和消费，一是敞开供应；二是平价甚至折扣供应；三是人均消费量逐年递增——与现时“凭票供应”的“集体记忆”大相径庭——但这绝不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史实的失真需要纠正，史实的判断更不容悖谬。所以，关于本命题的正确结论应该是：尽管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但国家管理和计划经济的强力运作，仍然为上海以猪肉为主的副食品供应提供了保证。

最后,需要指出这只是“文革”时期关涉猪肉供应的“上海视角”。若有学者能继而展示北京、天津等直辖市的猪肉供应情况,以及江苏(南京)、安徽(合肥)、湖南(长沙)、四川(成都)等猪肉输出地的情况,并进而将这些“视角”合成起来,既看各自的动态,又看各方的关联,所谓“票证时代”研究(含“文革”经济史研究、“文革”城市生活史研究)将会获得有价值的展开。

注 释

- [1] 吴晓明:“饕餮之夜”《新民晚报》2004年1月26日。
- [2] 王恺:“‘文革’以来中国经济:各种票证涵盖生活各方面”《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0期,总406期。
- [3] 纪琮:《十年细事漫录》;沈麟轩:《“文革”时期的上海商品供应》,《天益网》、《博客日报》、《春秋战国》、《二闲堂文库》等网站。
- [4] 2008年8月7日,在由熊月之教授主持的“知青运动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会间隙,笔者向与会者提出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不凭票的问题,当场遭到大多数“知青人”的质疑和反驳。小说家叶辛以“在贵州农村曾十一个月没吃肉,回家路经弄堂时闻到肉香,馋得向母亲提出要吃肉,却因肉票限制,不能如愿”等记忆和家藏《票证大全》中有印着一头猪式样的票据可证,申明绝对不认同此说;高博特公司总经理张刚则当场打电话询问原三角地菜场负责人,回话肯定“文革”期间使用肉票。笔者强调此说为档案和方志记载,并针对性地声明:此项研究不是延伸性地得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
- [5]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
- [6] 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73—74页记载:1975年春节后,外省生猪到货开始锐减,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上海市区库存量最少时不足3天销量。于是,采取压郊县、保市区的办法。整个第二季度优先往市区调运生猪达59万头,比1974年同期增加15万头,支援了市区供应。至1976年4月,上海市区猪肉濒临脱销,其中“4月5日,市食品公司冻猪肉库存仅904吨。除组织郊县突击调运,并派员分赴各省催调货源应急外,市场销售每天限额投放300吨上下,卖完为止”。正是在这

种窘迫的情势下,上海紧急实施猪肉凭票供应。至于为什么“文革”临近结束时,外地调入上海的猪肉量锐减?为什么郊县要限时限量调运市区?均是值得追究的问题。

- [7]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 [8] 同上书,第334—335页。
- [9] “警惕坏人捣乱春节供应”《解放日报》1968年1月14日;“本市日用品采购供应量节节上升”《解放日报》1968年6月24日。
- [10] “北京上海天津调拨大量日用工业品供应各地”《文汇报》,1971年1月24日。
- [11] “上海市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解放日报》1974年1月5日。
- [12] “上海市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文汇报》1975年2月8日。
- [13]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 [14] 汪杰:《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 [15] 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 [16]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长期391卷,第004页,《关于再次分配商业部专项拨付饲料粮的通知》。
- [17]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1967年永久52卷。《1966年1—12月精料支出分配表》。
- [18]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长期404卷,第13页。《1976年实绩》。
- [19]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1972年7月26日,短期234卷,《郊县大力收储“二壳一芒”解决养猪粗料》。
- [20] 上海市粮食局档案永久85(2-1)卷。上海市人民政府1985年4月9日《上海市农村调整农村粮油销售政策和价格方案》。
- [21] 据《上海副食品志》第61页,上海市区生猪进货统计:1985年度,郊区调市猪肉73 456吨,占总货源比例28.00%;1990年度,郊区调市猪肉110 381吨,占总货源比例40.07%。
- [22] “坚决粉碎破坏养猪事业的妖风”《解放日报》,1967年2月17日。
- [23] 根据张春桥的批示,《文汇报》1969年11月19日发表报道,介绍上海县梅陇公社牌楼十一生产队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并将菜农种粮上升为“斗批改的方向”,在全郊区推广。结果,上海郊区蔬菜种植面积有所裁减,并引发了市场供应紧张。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菜农不吃商品粮”草草地收场。
- [24] “遵照毛主席指示,多快好省发展养猪事业”《解放日报》1970年10月31日。
- [25] “本市郊区实现‘一人一猪’”《解放日报》1970年10月14日。
- [26] 据1972年2月18日,《解放日报》“上海郊区副食品生产蒸蒸日上”一文称:1971

年,全郊区养猪 530 万头,比“文革”前的 1965 年增长 58%。该年郊区供应市区的肉猪达 260 多万头,如果按市区户口平均计算,约等于每户两头。

- [27] “上海郊区养猪事业迅速发展”《解放日报》1973 年 2 月 7 日新华社消息。
- [28] 当时的口号是:“身在猪棚闹革命,放眼世界看全球,多养猪来多打粮,狠狠打击帝修反”,《解放日报》,1970 年 10 月 14 日。
- [29]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短期 4 卷,第 14—15 页。1959 年 1 月《怎样挖掘城市副饲料》。
- [30]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长期 233 卷。《1965 年 12 月份市区饮食下脚收集情况》。
- [31]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长期 233 卷。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66 年 2 月 12 日,《本市街道里弄收集猪饲料支农情况》。
- [32]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长期 255 卷。1967 年 8 月 9 日,《关于进一步挖掘城市饲料下脚工作中几个问题报告》。
- [33] 1973 年 2 月 7 日,《解放日报》“全市大量收集饮食下脚,支援郊区农村节粮养猪”。
- [34]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饮食下脚 3 卷第 127 页。1971 年《简报》第 41 期,《收集城市饮食下脚支持农业发展养猪》。
- [35]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短期 324 卷。1977 年 4 月 8 日,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地区组《加强收集城市饮食下脚,支援郊区社队发展养猪》。
- [36]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短期 324 卷。1976 年 12 月 31 日,《深揭狠批“四人帮”,多收泔脚支农忙》。
- [37]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饮食下脚 4 卷第 9—10 页。1973 年 12 月 3 日,《关于城市饮食下脚质量问题的汇报》。
- [38] 80 年代以后,因城建、消防和卫生部门强调整顿市容,上海泔脚饲料的收集工作渐趋萎缩。
- [39]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长期 1965—78 卷第 32 页。1965 年 11 月 3 日,《关于提高市区统糠加工质量的意见》。
- [40]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长期 281 卷,第 6 页。1968 年 12 月 19 日,《关于城市糟渣饲料调整分配的通知》。
- [41]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糟浆 3 卷第 64—66 页。1971 年 10 月 25 日,《关于城市糟渣饲料问题的报告》。
- [42] 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短期 245 卷第 7 页。1973 年 6 月 16 日,《关于糟渣饲料减少的情况汇报》。

[43]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6 页。

[44] 同上书，第 55 页。

[45] 据陈东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一文记：当前学术界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评价，主要有“崩溃边缘论”和“有所发展论”。1978 年 2 月 26 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指出：从 1974 年到 1976 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1979 年 1 月 6 日，胡乔木在中国社科院全院大会上说：1976 年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1993 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 1967 年、1968 年。2007 年 10 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同时有资料证明：1981 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46] 据《上海价格志》，第 94 页；《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 328 页记载：1979 年 11 月，根据国务院部署，上海猪、牛、羊、禽、蛋、水产品、牛奶等 7 种副食品同时提价，猪肉零售价格提高为 110 元/50 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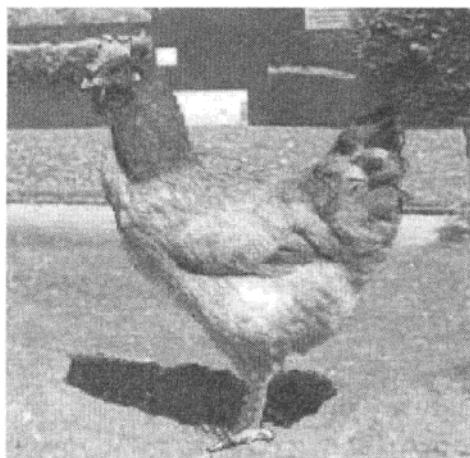
[47] 汪杰：《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4 页。又：2009 年 5 月 30 日，金光耀、金大陆、李逊第三次访谈原写作组成员王知常。王说当时猪肉积货很多，打折卖。张春桥知道后指出这可能是“走资派”搞的阴谋。

[48]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0 页。又：据陆融：《一个上海知青的 223 封家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年 4 月版，第 83、100 页记：1971 年 4 月 25 日和 6 月 22 日，写信回家代班长买猪肉，“寄上四公斤，咸的，最好是肥的”，“如还没有寄的话，再多买三四公斤”。可见，在上海人均猪肉消费量中，有一部分是通过知青的渠道外流的。

附：

上海“文革”时期的禽蛋供应

上海郊区家禽的品种主要有芦花鸡、狼山鸡、萧山鸡、麻栗鸡、浦东鸡(俗称“九斤黄”、“黑十二”，为优良品种)和绍兴麻鸭(蛋鸭)和婺门鸭(肉鸭)等。六七十年代，因国际市场肉用鸡畅销，在外贸部门的促成下，上海陆续引进国外白洛克、红科尼许等品种鸡，并在市郊各公社先后办起7000多个简易肉鸡场，^[1]从此改变了上海地区家禽饲养业的格局。^[2]



上海浦东鸡



引进国外白洛克鸡

60年代初期，上海市曾采取增发工业券、专用券；增购卷烟、食糖等奖励办法，鼓励市郊农民、生产队饲养家禽，交售禽蛋。1973年市禽蛋公司推广川沙县猪棚养鸡的经验，全郊区共有1363个生产队开展猪棚养鸡。但真正有效的措施还是落实饲料粮的奖励和供给。

表一

上海 1966 年至 1977 年禽蛋饲料供应政策标准

文件日期	文件标题	政策标准	有效期
1966. 3. 15	《专拨饲料支持郊区集体蛋鸭生产通知》	每羽蛋鸭年供料 30 公斤, 收购蛋 10 公斤。	1966. 1—12
1974. 12. 25	《关于发展郊区禽蛋生产的请示报告》	社员以 1 只鸡 2 斤蛋为任务, 超交 1 只鸡奖粮票 2 公斤。农场每只鸡年供料 5.5 公斤, 集体留粮 4 公斤。	1975 年
1975. 1. 21	《关于发展郊区禽蛋生产的请示报告》	每羽蛋鸭年供料 30 公斤, 收购蛋 10 公斤。超交蛋 1 斤, 增供 1.5 公斤料。每羽蛋鸡年供料 36 公斤, 交售蛋 8 公斤。超交蛋 1 公斤, 奖售饲料 2 公斤。国营农场每公斤鸡蛋供料 4.5 公斤。	1975. 3—1977. 7

资料来源：上海市饲料公司档案，长期 228 卷；永久 63 卷、长期 563 卷等。

就此，上海的禽料供应于 1974 年达到 3 951 万市斤（1966 年至 1973 年间平均为 1 557 万市斤/年），1976 年甚至达到 6 749 万市斤，^[3]即“文革”后期，上海本地的禽蛋生产才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就总的情况而言，上海副食品市场上的禽蛋货源，主要还是依赖大批量的外省调入。请看表二和表三：



“文革”中后期，上海本地的禽蛋生产有所上升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表二

上海市“文革”时期家禽进销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郊县	166	125	162	196	242	239	312	212	198	299	330
外省	836	468	562	480	363	443	630	493	305	385	246
合计	1 002	593	724	676	605	682	942	705	503	684	576
比例	16.6 : 83.4	21.1 : 78.9	22.4 : 77.6	29.0 : 71.0	40.0 : 60.0	35.0 : 65.0	33.1 : 66.9	30.1 : 69.9	39.4 : 60.6	43.7 : 56.3	57.3 : 42.7

资料来源：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295页。

说明：上海家禽收购，除了“郊县调市”和“外省调入”外，还有“其他收购”，如1969年12万元；1974年111万元等，在此未计算在内。

表三

上海市“文革”时期鲜蛋进销统计表

单位：吨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郊县	675	365	255	230	695	845	975	710	1 000	3 115	5 065
外省	36 840	33 080	28 995	34 120	35 685	34 575	33 005	34 630	28 735	23 685	19 780
合计	37 515	33 445	29 250	34 350	36 380	35 420	33 980	35 340	29 735	26 800	24 845
比例	1.8 : 98.2	1.1 : 98.9	0.9 : 99.1	0.7 : 99.3	1.9 : 98.1	2.4 : 97.6	2.9 : 97.1	2.0 : 98.0	3.4 : 96.6	11.6 : 88.4	20.4 : 79.6

资料来源：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296页。

说明：上海鲜蛋收购，除了“郊县调市”和“外省调入”外，还有“其他收购”，如1969年105吨；1974年80吨等，在此未计算在内。

由表二和表三所知：“文革”十年间，上海从外省进销的家禽比例平均为66.57%，而从郊县进销的比例平均为33.43%；从外省进销的鲜蛋比例平均为95.54%，而从郊县进销的比例平均为4.46%。其间的比差相当悬殊，完全证实了“全国保上海”的路线得到了强有力的落实。如据1967年1月《文汇报》的报道：市禽蛋公司造反派夺权后，建立了生产管理小组，“派人到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采购家禽、

鲜蛋”，“如在山东方面采购到鲜蛋二百万斤，其中一百万斤在青岛待运”，后借用福建水产局冷藏船一艘装运鲜蛋。同时，公司运输队的车辆往返行驶，把“镇江的活鸭、湖州的活鸡源源运到上海”，^[4]如此货源滚滚又车轮滚滚的景象可谓写照。

与此同时，在肯定外省禽蛋调入量占绝对多数的前提下，应十分注意“文革”十年间外省与郊县调入量的相关变化。如1966年时，外省家禽调入量为836万元，郊县为166万元；外省鲜蛋调入量为36 840吨，郊县为675吨。尽管其间存在起伏消长的变化，但总的的趋势是外省调入量渐渐降低，郊县进销量渐渐上升，至1976年时，外省家禽调入量下降为246万元，郊县上升为330万元；外省鲜蛋调入量下降为19 780吨，郊县上升为5 065吨。且外省与郊县的合计调入量也呈现下降的态势，如家禽从1966年的1 002万元→1976年的576万元；鲜蛋从1966年的37 515吨→1976年的24 845吨。这主要是因为外省禽蛋调入量的基数大、权重高，长期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尽管至“文革”中后期，外省家禽调入比例仍占上海供应量的60.2%；外省鲜蛋调入比例仍高达92.9%（1971—1976），终究是牵累全局的。由此，引带出的结果便是市场销售量（居民消费量）的下降。请看表四：

表四

上海“文革”时期禽类蛋品公司市区鲜蛋、家禽销售统计表

单位：万公斤、万只

年份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鲜蛋	2 433	2 323	1 852	2 079	2 131	2 259	2 367	2 625	2 315	1 806	1 750
水平	3.83	3.64	2.92	3.42	3.67	3.96	4.19	4.67	4.12	3.24	3.17
家禽	882	664	663	551	506	529	823	763	626	697	685
水平	1.39	1.04	1.05	0.91	0.87	0.93	1.46	1.36	1.11	1.25	1.24

资料来源：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95—96页。

说明：此处“销售”指供应市场的数量，供应生产和供应出口均未计算在内。

表中“水平”一栏，指年度市场供应水平，其标准鲜蛋为公斤/人；家禽为只/人。

由表四可知：“文革”十年间，上海副食品市场上的家禽销售从1966年的882万只→1976年的685万只；鲜蛋销售从1966年的2 433万公斤→1976年的1 750万公斤。如果说此时的市场销售量与前述的市场调入量的变化是一致的，那么比较同期上海副食品市场上的猪肉批发销量，如1966年的114 122吨→1976年的160 279吨^[5]，不仅可见销售总量上存在逆向反差，更可知当时上海副食品市场上家禽、鲜蛋的供应总量是十分短缺的，人均消费量是很小的。以家禽为例，人均最高消费水平为1966年的1.39年/只，最低水平为1970年的0.87年/只，十年平均消费水平为每人1.15年/只，实际上也就是国定假日的时候，每个家庭才能享受。再以鲜蛋为例，人均最高消费水平为1973年的4.67年/公斤，最低水平为1968年的2.92年/公斤，十年平均消费水平为每人3.73年/公斤。按此供应水平计算，一个城市居民大致一星期可吃一个蛋。偌大个上海，禽蛋真正成了居民餐桌上的“奢侈品”了。^[6]

其实，上海50年代中后期，禽蛋供应已趋紧张。1955年始，上海对医院、托儿所、产妇等实行凭证供应家禽，尤其优待高级知识分子，由市机构核发购货券，保证每人每月吃到2只鸡。^[7]1959年后，上海蛋品由“敞开供应”转为“计划供应”。当年春节凭证供应每户鲜蛋0.25公斤（半市斤）。因全市家禽总货源仅53万只，只得加工成100.8万份，每户供应1份。是年为建国十周年，有关部门只得通过长途采购，才保证每户供应家禽1只，每人供应鲜蛋1只，以此欢度国庆。此后，国庆、春节凭证按户定量供应禽蛋的办法延续了28年。^[8]例如1961年春节，对大户供应冰蛋300克，再制蛋5只；小户供应冰蛋200克，再制蛋3只。1963年春节，蛋品货源有所好转，大户每户供应纸杯装冰蛋750克，小户每户500克。^[9]当然，即便在困难时期，上海面对部队、外宾的特种供应仍常年保持，例如1962年时，全市特供家禽共242万只，占全年市

场总供销量 622 万只的 39%；而 252 万公斤蛋品货源，则几乎全部（249.84 万公斤）用于特供。^[10]1964 年至 1973 年间的九年中（含“文革”期间），上海蛋品实施旺季敞开供应，有时因调运失误，集中到货，“不但菜场里堆满了鲜蛋，南货店、烟纸店、水果店、糖果店都有供应，甚至削价叫卖”；^[11]淡季则限量供应，每户每月一般为半市斤至 1 市斤。1974 年以后，上海全年实行凭证定量供应，鲜蛋一般为每户每月 1 市斤，节假日增加供应；家禽则在重大节日凭证供应。

50 年代时，上海鲜蛋的零售价格逐步上扬。从 1950 年每 50 公斤为 48.88 元（每市斤为 0.489 元）→1955 年每 50 公斤为 59.53 元（每市斤为 0.595 元）。1961 年 5 月，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上海郊县鸡蛋收购价提高为每 50 公斤 85 元，年均收购价为 78 元。1962 年全年收购价稳定在 85 元，鸭蛋收购价则稳定在 83 元的水平。就此，鸡蛋零售价格每 50 公斤上升至 100 元（每市斤为 1.0 元），鸭蛋零售价上升至每 50 公斤 97 元（每市斤为 0.97 元）。

自 1963 年开始，鲜蛋生产得到发展，并恢复季节差价，零售价格稳中有降。至 1966 年时，每 50 公斤零售价回降为 77.62 元（每市斤为 0.776 元）；鸭蛋为 75.42 元（每市斤为 0.754 元）。然而好景不长，1967 年以后，鲜蛋货源大幅减少，零售价格连连回升。当年鸡蛋零售价上升为每 50 公斤 79.29 元（每市斤为 0.793 元）；1968 年又上升为 81.91 元（每市斤为 0.819 元），1969 年再上升为 83.97 元（每市斤为 0.84 元）。同期鸭蛋零售价，分别为每 50 公斤 77.29 元（每市斤为 0.773 元）、79.35 元（每市斤为 0.794 元）和 80.90 元（每市斤为 0.809 元）。70 年代，上海蛋源继续偏紧，因此旺季鲜蛋零售价格停止下浮，执行全年一价。故从 1970 年起，每 50 公斤鸡蛋的零售价为 85 元（1 市斤 0.85 元）；鸭蛋零售价为 82 元（1 市斤 0.82 元）。此价格一直维持至 1979 年 10 月。^[12]

“文革”前半期(1966年至1971年),上海活鸡收购价格为80元/50公斤;零售价格为112.5元/50公斤(1市斤1.125元)。1972年3月,市商业二局革委会发出《关于调整活鸡收购等级价格的通知》,将母鸡由五个等级简化为三个等级,家禽销售一般以二级母鸡(1.25~1.5公斤)为代表品,价格便调整为收购价格90元/50公斤;零售价格每113元/50公斤,即每1市斤为1.13元。^[13]

综上所述,如果说票证是对购买的限制,那么对上海一般收入家庭来说,相对于蔬菜、豆制品、水产品的消费,禽蛋的价格确也是“奢侈”的了。

附:野味供应

上海的富贵人家有品尝野味的传统,由黄浦野味采购站负责经销(所属黄浦区副食品公司浙江路供应站)。六七十年代,野味(野禽、野畜)货源主要来自上海郊县和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甚至派人长驻甘肃、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采购,以快件发运上海加工。据统计,1969年至1975年间,该站共加工野味产品1557吨,其中出口677吨。1974年10月1日,该采购站正式改名为“上海市禽蛋公司野味采购供应站”,继续经营野味产销业务,主要供应外贸出口。鲜冻野禽有公山鸡、光山鸡、野鸭(火红腿、尖尾扒鸭)、野鹅、野鸽、麻雀、禾花雀、沙鸥、春鸟、光稻鸡、稻鸡等;鲜冻野畜有野兔肉、野猪肉、獐、麂等。1969年有7个品种,至1974年达25个品种,销往日、美、法、德、荷兰、瑞士、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14]由此可见,“文革”期间“野生动物保护”问题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整个“生物链”在此发生断裂。

注 释

[1] 张鳌:《上海科学技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页;祝兆松:

《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8 页。

- [2] 此事发生在“文革”时期，却与“文革”运动无关，恰说明在一定的范围里，生产与管理的程序仍在正常运行。同时，应指出肉鸡场多供出口，上市量只为十分之一。
- [3]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第三册，第 3212—3215 页。
- [4] “上海春节禽蛋供应量将超过去年”《文汇报》1967 年 1 月 25 日。
- [5]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0 页。
- [6] 同上书，第 95—97 页。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上海 1980 年市场供应家禽水平为每人每年消费 1.90 只，1985 年为 4.63 只，1990 年为 5.35 只；上海 1980 年市场供应鲜蛋水平为每人每年消费 8.85 公斤；1985 年为 9.41 公斤；1990 年为 12.94 公斤。
- [7] 同上书，第 94 页。
- [8] 同上书，第 95 页。
- [9]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5 页。
- [10]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4 页。
- [11] “坚持调查研究，改善供应工作”《解放日报》，1971 年 10 月 10 日。
- [12] 汪杰等：《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5—118 页。
- [13] 同上书，第 106—109 页；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9 页。
- [14] 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3 页。



第十三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水产品生产和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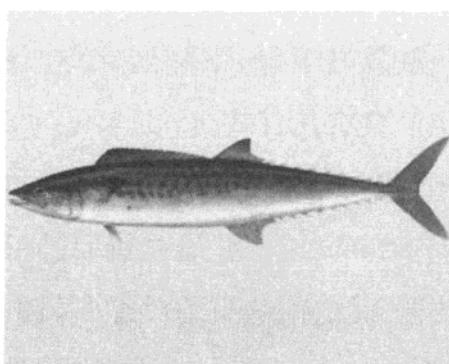
一、资源与资源链的断裂

上海称“沪”(扈),“扈”即为一种捕鱼工具,可见上海地区的渔业历史悠久,渔业资源丰富,其主要构成为海洋渔业资源、长江渔业资源和内河渔业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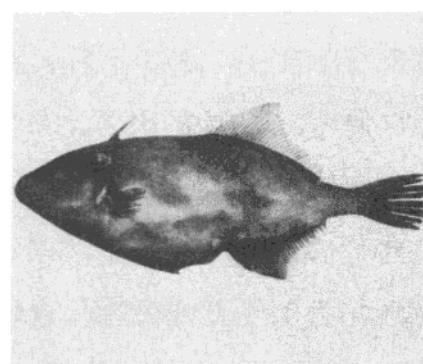
海洋渔业资源: 上海濒临东海,一年四季鱼汛不断,“春有黄鱼,夏有乌贼,秋有海蜇,冬有带鱼”。60年代后期,上海大黄鱼年产量在2 000吨至3 000吨左右,70年代前期,年产量直线上升到4 000吨至8 000吨左右,1975年甚至突破1万吨(然而,这恰恰是“突变前的聚力收缩”)。1976年后大黄鱼产量急剧下降,下降到年均产量1 000吨至2 000吨的水平。80年代年产只有几百吨,1990年仅为50吨。^[1]60年代前期,上海小黄鱼年产量保持在2.2万吨~2.5万吨。60年代后期年产量下降,如1969年为2 000吨。此后有所回升,如1974年为1.5万吨(然而,这恰恰又是“突变前的聚力收缩”),1979年后上海小黄鱼便不成渔汛。^[2]乌贼在5—7月的长江口近海成汛。1964年至1973年产量为1 000吨至4 000吨,此后产量下滑,1974

年至 1977 年,年产量已不足 1 000 吨。^[3]冬季带鱼在长江口海区南侧形成渔场,是上海最主要的食用海水鱼。60 年代年产量为 2.5 万至 6.4 万吨;70 年代上升到 4.5 万至 8.5 万吨(此为 1973 年数据)。然而,这恰恰又是“突变前的聚力收缩”的实证)。因自 1973 年以后,“大条带鱼数量少,带丝相对增加”。^[4]至 80 年代后,上海带鱼产量呈下降趋势,且鱼体小型化显著,1 龄鱼占 90% 以上,带鱼资源衰退。

中年以上的上海居民应该记忆犹新,70 年代初,上海的菜场里冒出了两种水产新品,那就是 1971 年与 1973 年初,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的渔船分别在石东和鱼外渔场,捕获到高网产的青条鱼(网产 2 吨~8 吨)和绿鳍马面鱼(网产 12 吨),并迅速组织投产。据统计,1971 年捕获青条鱼 4 100 吨,占年总产量的 4.1%;1972 年为 4 万吨,占年总产量的 32.98%;1974 年年产绿鳍马面鱼 1.5 万吨,占年总产量的 14%,此后产量逐年上升,1978 年高达 6 万吨,占年总产量的 38.3%。^[5]应该承认,青条鱼、绿鳍马面鱼并不适宜上海人精细的口味,市场还采取了种种优惠的推销措施(同时,大量开发油炸马面鱼瓶装罐头,1972 年达到 911.74 吨;1974 年达到 1 021.40 吨)。就此,上海“文革”期间的海洋水产呈现出传统资源衰退、新兴品种突起的情状。



青条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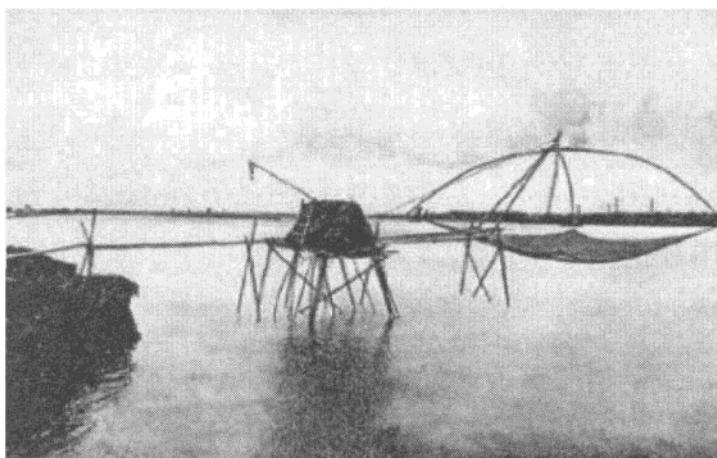
绿鳍马面鱼

长江渔业资源：长江口是著名的河口渔业区，主要水产品有刀鲚、凤鲚（俗称“烤子鱼”）、银鱼（俗称“米丈鱼”）和中华绒蟹（俗称“崇明蟹”）。每年3—4月刀鲚在长江口形成渔汛。据统计，1973年和1974年时，产量分别高达391吨和334吨。1975年时，产量陡降至164吨，此后便逐年下降。接着，每年4月至6月为凤鲚盛渔期。“文革”期间平均年产量为1125吨，如1970年为1266吨，1975年为1017吨，产量虽有起伏，但资源比较稳定。60年代银鱼产量较高，至1971年前基本保持年产200吨至300吨左右，如1965年产251吨，1970年为274吨。1972年起银鱼产量明显下降，多数年份不到100吨，如1975年时只有65吨。70年代以来，由于水质污染严重，捕捞产量逐年减少。^[6]

长江口成蟹捕捞集中在每年秋冬季。50年代至60年代上半期，年产量在100吨左右波动。1967年起急剧下降，至1969年时年产仅1~2吨。此后，市水产局试验人员研究了蟹回游、繁殖、发育、生长等规律，从崇明捕捞蟹苗流放内河天然水域成功，使上海的河蟹产量直线上升。^[7]1971年时，年产量回升至19吨，1975年为45吨，1976年甚至达到114吨。^[8]

内河渔业资源：上海地区水系交错，野生淡水鱼类资源丰富，计有85种。上海内河捕捞主要集中在黄浦江沿岸的松江、奉贤、金山、上海、宝山、川沙等县和青浦西部地区。50年代初，黄浦江水质尚好，年产量为30吨~50吨。至1966年前年产量仍在1万吨左右。70年代开始，黄浦江自龙华以下水质恶化，鱼、虾基本绝迹，“1976年后基本停止黄浦江捕鱼生产”。^[9]苏州河、蕰藻浜的命运亦然。如50年代时，上海黄浦渔民在苏州河上游捕捞鱼虾贝类，仅贝类产量就可达300多吨。蕰藻浜水质丰沛，常年有渔民以捕捞为生。60年代后，皆因鱼虾资源衰竭而停息。上海青浦地区的野生鱼捕捞，也从1965

年的 763.2 吨下降到 1975 年的 284.4 吨。^[10]1973 年农林部召开全国会议,提出“发展城郊养鱼”的要求。上海便着手制定建设精养鱼塘商品基地规划,至 1975 年春上海已建成精养鱼塘 333 公顷(合 5 千亩)。^[11]就此,上海内河渔业完成了从野生捕捞到淡水养殖的格局转化。^[12]



吴淞江上的内河捕捞



精养鱼塘

综上所述,就上海地区渔业资源和生产情况而言,可引出一个令人惊骇的结论——正是在整个“文革”时期(集中发生在 70 年代),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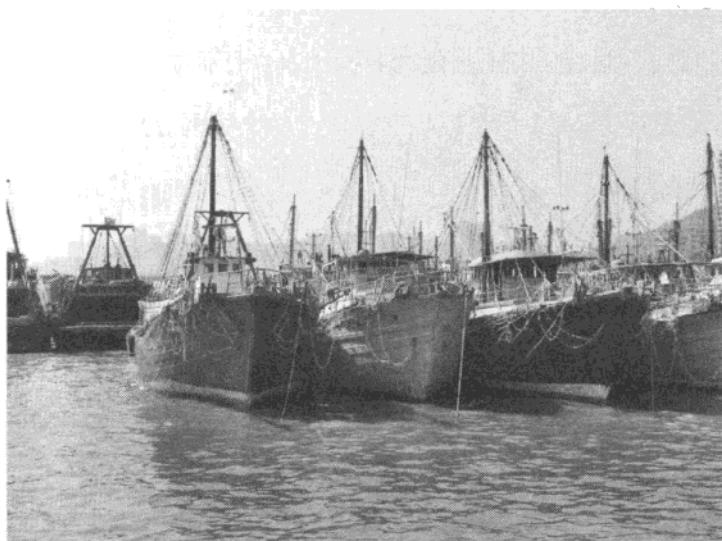
了极少数鱼品如凤鲚等资源相对稳定外，绝大多数的鱼类资源衰退了，甚至枯萎了，且全面发生在海洋、长江和内河等三大水域。那么，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具体指认是物种资源的退化，还是生存环境的恶化，抑或与“文革”运动有什么关联？现以海洋渔业为主说明，看表一：

表一
上海“文革”时期海洋渔业公司船只、产量情况表

年份	单位：艘、吨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船只	211	205	198	187	200	228	263	265	266	255	255
产量	73 042	52 844	54 492	72 803	87 543	100 082	120 307	127 039	112 285	108 691	91 698

资料来源：顾惠庭：《上海渔业志》，第 319 页。

由表一可知：上海“文革”时期海洋渔业的船只数与产量大致呈现正相关的联系。其实，“文革”初期上海海洋渔业公司曾一度“停船闹革命”，直接导致海洋水产品由 1966 年的 7 万多吨下降至 1967 年、1968 年的 5 万多吨。1970 年至 1972 年，上海投资 6 000 多万元新建渔船 84 艘，不仅使所属渔船总吨位达 37 275 吨，更因新建渔船设备齐全，性能先进，全面提高了作业能力。与此同时，上海郊县各渔业公社在国家无息贷款的扶持下，完成了渔船机动化的改造，使海洋机帆渔船数达历史最高的 444 艘。^[13]同期，上海郊县的长江、内河木质渔船开始装备动力机械，数量从 1970 年的 40 艘渔船，快速增至 1976 年的 638 艘。^[14]就此，上海海洋渔业生产拐进了一个“增产与危机”并存的轨道，尤其表现在 1970 年至 1973 年间，年产量由 8 万多吨增至 12 万多吨。下面请看上海报纸的同期报道：



渔船

表二

1970 年至 1973 年上海报纸关于渔业生产的报道

日期	报纸	标题	内容
1970.4.19	《解放日报》	《上半月海上捕鱼生产获得大丰收》	"4月上半月海上捕鱼生产比去年4月全月的总产量增加21%","一对渔船一网就捕到十多万斤大黄鱼","有一网捕到近二十万斤鱼,调运兄弟渔船奋战21个小时,将这一网鱼全部装上船"。
1970.9.30	《文汇报》	《本市渔业工人夺高产迎接国庆》	1970年8月份"月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
1972.2.20	《解放日报》	《本市渔业生产取得很大成绩》	旺季时"放网快,起网快,处理鱼类快,减少停港时间";淡季时,延长航次,增加网次,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遵照毛主席'大风大浪也不可怕'的教导,采取'抢风前,追风尾'的办法,夺得了高产"。
1972.10.15	《文汇报》	《渔业工人破浪前进》	因渔网被推进器缠住,船长带头跳进大海,在大海中奋战9小时,夺回了五千多斤大黄鱼。

(续表)

日期	报 纸	标 题	内 容
1972. 12. 30	《解放日报》	《本市今年海洋渔业丰收》	“全年的生产任务提前六十天完成，海水鱼总产量比去年同期提高 23.1%。市场鱼货充足，出现繁荣景象”，“一天一网捕到五万多斤鱼，可起网绳断，船长等 4 人跳下海去，在风浪中冒寒补网，夺回了三万多斤带鱼”。
1973. 7. 15	《解放日报》	《本市上半年海洋渔业生产夺得丰收》	发现鱼群后，调动 36 对渔船开赴渔场，“日产量达四十万斤，夺得了丰产”。

如报载：多数量、大马力的海上机动船队以及先进的声纳探渔、灯光诱围技术，一网就是“三万多斤带鱼”，“十多万斤大黄鱼”，“日产量达四十万斤”；动辄就是“月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50%”，“全年的生产任务提前六十天完成”；具体还有“抢风前，追风尾”、“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作业……这怎能不使水产品的产量有增无减呢！然而，正是这人的需要（需要孕育着贪婪）面对物的生存；正是这人的聪明（聪明尚且不是智慧）面对物的繁衍，以致当这种需要和聪明转换成无往不胜的技术，面对自然生成的资源时；以致当人的理智尚未遭遇自然生态的报复，而处于背晦状态时，这又怎能不种下导致自然资源衰退的祸根呢！故此，1970 年至 1973 年的“捷报频传”（实为破坏性滥捕），正是 1974 年至 1976 年产量滑落的启动（1974 年后便不见上海报刊的相关报道），甚至是 80 年代后海洋渔业资源面临全面危机的因由。至于同期的长江河口渔业和内河渔业，也因“上海江段水质污染和滩涂变迁，破坏了上海江段的生态”；^[15]乡镇工业的兴起和化肥、农药的使用，导致“大量水域遭受污染”而严重萎缩。^[16]

正是立足在这个时空坐标上，完全可以断言上海地区的渔业资



上海的河口和内河渔业资源曾相当丰富(徐建刚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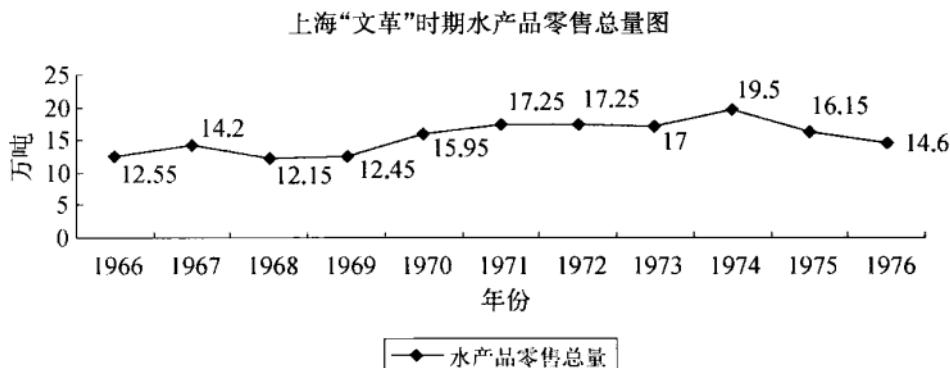
被污染的苏州河

源和生产链,在“文革”时期发生了断裂。当然,这不是指“文革”运动直接作用了、招致了这场断裂,而是指这场断裂的发生机缘与“文革”运动存在着种种间接的关联,如政治上坚持“为革命”、“为路线”生产的原则;生产上为弥补“停船”事故于 70 年代大规模投资更新设备

等。所以,此在的确切说法应该是:多年积累的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发展与自然资源休养生息之间的矛盾,终于在“文革”时期爆发了。

二、供应与票证

生产主导市场,产量决定供应。下面请看上海“文革”时期水产品零售总量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水产局《上海市水产统计资料汇编》。顾惠庭:《上海渔业志》,第243页。

如图:上海“文革”前期的水产品零售保持在年12万多吨。1970年后零售总量直线上升,至1974年甚至达到19万多吨,1975年后便开始下滑。其基本波动线与前述“资源—生产”链的关联相吻合,说明大自然的报复最终是要在“市场—供应”链上表现出来。然而,仔细比对又可发现上海水产品的零售货源量高于产量,比如1968年度,上海海洋渔业产量为5万多吨,零售量则为12万多吨;1974年度,上海海洋渔业产量为11万多吨,零售量则为19万多吨。此中缘由除了长江河口渔业和内河渔业的产量没有计算在内,更主要的是江浙一带的水产品仍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海,“文革”十年间的年度平均比例甚至高达总量的52.2%,^[17]与猪肉、禽蛋等副食品“全国保

上海”的路径完全一致,只是在此不作赘述了。

为了保证市民购买水产品的需要,上海自 1963 年第三季度起,采用按地区人口比例分配的办法,向各区县(菜场)供货。请看表三:

表三

上海 1964 年与 1967 年度各区县水产品计划分配比例表

		单位: %														
区县 年份\	黄浦	虹口	南市	杨浦	闸北	静安	卢湾	普陀	徐汇	长宁	吴淞	闵行	郊区	市店		
		1964	10.4	12.4	11.9	11.5	9.0	9.0	8.0	7.1	6.7	5.5	1.8	1.0	4.9	0.8
1967	10.1	11.8	11.3	12.0	9.3	8.3	7.7	7.9	6.8	5.7	1.9	1.5	5.1	0.6		

资料来源:上海市水产公司供销公司档案;顾惠庭:《上海渔业志》,第 257 页。

说明: 1. 表中 1964 年度为当年 2 月 9 日调整的分配比例;表中 1967 年度为当年 5 月 2 日调整的分配比例。2. 表中“郊区”一栏,具体指宝山、上海、嘉定、川沙四个近郊的城镇供应。3. 表中“市店”,具体指位于福州路的市水产商店。

如表三所示,上海 1967 年的水产品分配比例量,在 1964 年的基础上作了调整,具体比例有所增长的是杨浦(0.5%)、闸北(0.3%)、普陀(0.8%)、徐汇(0.1%)、长宁(0.2%)、吴淞(0.1%)、闵行(0.5%)及郊区(0.2%)等行政区划。有所降低的则是黄浦(-0.3%)、虹口(-0.6%)、南市(-0.6%)、静安(-0.7%)、卢湾(-0.3%)及市店(-0.2%)等行政区划。很明显,在占总量 2.7% 的调整比例中,整个趋动是从中心城区流向边缘城区(以与郊区接壤为标志),或者说是更多地流向工矿企业和劳动人民较为集中的区域,以致与“文革”时期各区人口的位序(杨浦→虹口→南市→黄浦→闸北→普陀→静安→卢湾→徐汇→长宁)保持了较高程度的一致。^[18]

关于上海水产品供应与票证关系的问题,时间跨度为 1959 年 2 月至 1985 年 4 月,长达 26 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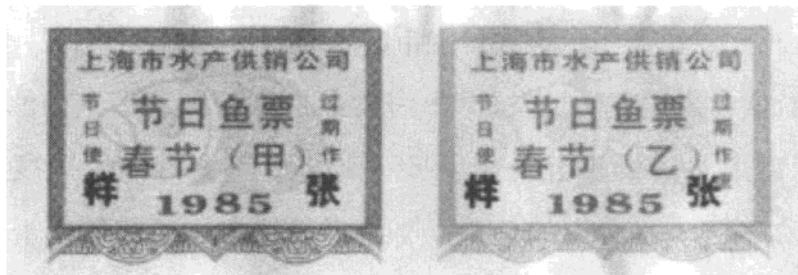
第一阶段:最初的票证。1959 年前,上海水产品货源充裕,全市实行敞开供应。1959 年 2 月下旬(春节),上海开始凭票定量供应,即

每人发鱼票 1 张,每张可买鱼 10 两(16 两制,合 312.5 克)。至 1963 年春节,连续五年均实行凭票供应。此后,因渔业资源与生产情况良好,1963 年 1 月原凭鱼券供应的水产罐头敞开供应;继而 6 月 1 日起,水产熟食品敞开供应,同时,“菜场卖鱼已不凭票或凭票不限量,鱼票回笼率低至 20%”,^[19]故当年 9 月 30 日,上海水产品恢复敞开供应。第一阶段的特征是记录了从“敞开→凭票定量→恢复敞开”的轨迹。

第二阶段:尴尬的敞开。1963 年 10 月后,上海水产品虽然实行敞开供应,但品种比较单调,主要是带鱼和乌贼,居民称之为“一长一短,一白一黑”。冬汛带鱼大量上市时,曾按牌价七折供应,甚至还奖励食油,伙食团则享受批发价(上海食品加工厂则用带鱼为原料,制成调味食用鱼松投放市场)。1966 年下半年,上海渔轮一度因“文革”运动“停产闹革命”,致使第三季度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43%,故从当年 9 月份起,上海水产品供应紧张,有时一天全市上市量仅 50 余吨。至 1967 年 10 月,上海水产品甚至趋于脱销的边缘,市水产品公司只得压缩供应数量,平时每天供应市场 90 吨左右(海鲜 50 吨、咸干品 25 吨、淡水鱼 15 吨),周日为 150 吨,其实此数量尚不到正常年景供应量的一半。所以,尽管此阶段号称“敞开供应”,却因市场供应量严重萎缩,“菜场水产品摊排队最早,队伍最长,居民意见纷纷”。^[20]为解决市场困难,上海自 1969 年 3 月下旬起,曾一度实行由菜场发票对口供应水产品。购买办法的改进,并不能求得供应量的增加。不久因居民有票仍买不到质量较好的鱼,只得取消该办法。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事实上的供应短缺导致了市场紧张。^[21]

第三阶段:有计划的票证。1972 年 2 月下旬起,上海水产品的总体供应已趋缓和,但为解决市民求购优质品种鱼的需要,上海规定居民分区按户、凭证(副食品购买证,即“菜卡”)定点、定量、不定期,每户供应水产品 2 市斤(当年,以海鳗为原料的鱼糜制品水发鱼圆开

始供应菜场,受到市民欢迎)。1973年春节时,市区居民按户发给花色鱼券和一般鱼券各一张,大户每户6市斤,小户每户4市斤,花色鱼和一般鱼各半供应(往后春节供应均参照此法)。1974年起,则取消大小户,实行凭证定点、定量、不定期,每次每户供应黄鱼和花色鱼1公斤(2市斤)的办法,其他品种鱼可随意购买。这种购买办法一直延续至“文革”运动终结,改革开放起始。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凭票证保证节日中优质鱼的供应。



第四阶段：最后的票证。自1980年8月起,市区居民不分大小户,凭证每次每户供应什鱼1公斤(2市斤),伙食团按核粮人数每人250克,一般20天至30天轮吃一次(货源多时,间隔时间缩短)。因凭票供应的水产品均为平价,所发生的政策性亏损,概由财政补贴。据统计,当年财政补贴达549万元。1982年2月起,上海实行计划定量供应与敞开供应相结合;平价销售与议价销售相结合,具体规定市区和郊县市属户口每户每月凭证供应什鱼1公斤(2市斤),伙食团每人每月0.5公斤。计划定量供应的品种是150克以上的鲳鱼,100克以上的带鱼以及梅鱼、鳓鱼、马鲛鱼、海鳗等;敞开供应的是小什鱼、马面鱼、青鲇等。议价水产品主要是优质鱼、虾、蟹等。1985年1月起,因凭证货源短缺,上海重新按常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鱼票1张,每张供应250克。伙食团每人每月0.5公斤。结果,因当年年初市场货源不足,品种较差,许多居民凭票买不到鱼,意见很大。1985年

4月13日起,上海水产品供应终于实行“价格放开,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敞开供应”。因由价格调节供求,市场形成高、中、低多层次消费,上市品种增多,供应趋于平稳,实施多年的财政补贴宣布取消。^[22]第四阶段的特征是记录了票证政策走向解体的轨迹。

三、供应与价格

接着,请通过三张统计表格(表四、表五与表六),看上海“文革”时期水产品供应的价格情况。先看表四:

表四

上海“文革”时期市区水产品零售价格表(附1985年)

单位:元/担(50公斤)

年份	大黄鱼	小黄鱼	带鱼	乌贼	鲳鱼	鳗鱼	青鱼	草鱼	鲢鱼	鲫鱼
1966	39.41	35.00	29.78	24.32	50.27	38.51	84.00	74.00	47.00	84.00
1967	39.64	34.86	29.15	24.39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68	39.71	34.87	29.98	25.07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69	39.67	34.88	29.93	25.17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70	40.00	35.00	30.47	26.00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71	40.00	35.00	30.48	26.00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72	40.00	35.00	30.48	26.00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73	40.00	35.00	30.48	26.00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74	40.00	35.00	30.48	26.00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75	40.00	35.00	30.37	26.00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76	40.00	35.00	30.50	26.00	51.00	39.00	84.00	74.00	47.00	84.00
1985	251.96	158.86	99.68	94.83	163.77	126.23	217.17	165.28	92.84	196.26

资料来源:顾惠庭:《上海渔业志》,第274—278页;汪杰:《上海价格志》,第135—137页。

如表四所示,第一,“文革”十年间,上海水产品价格基本处于冻结状态。除了大小黄鱼、带鱼、乌贼等品种的价格,略有每市斤一二分钱

的调整,如 1966 年大黄鱼每市斤 0.394 元,1976 年时每市斤 0.40 元;1966 年带鱼每市斤 0.298 元,1976 年时每市斤 0.305 元;1966 年乌贼每市斤 0.243 元,1976 年时每市斤 0.260 元等。其余如鳗鱼(每市斤 0.390 元)、青鱼(每市斤 0.840 元)、草鱼(每市斤 0.740 元)、鲢鱼(每市斤 0.470 元)、鲫鱼(每市斤 0.840 元)等均十年一个价,包括季节差价等均不作计算。尽管 1972 年 3 月国家曾统一提高了东海地区黄鱼和带鱼的收购价 5%;1973 年又适当提高淡水鱼收购价,但“购销价格基本保持在 1963 年的水平,导致较长时间水产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23]如此价格水平固然可以认作为不涨价,但联系“文革”时期全民性的低工资制,相互之间的舛误也就在同一个象限里扯平了。

第二,恰恰因为长达十年的价格冻结,就如同压迫的弹簧一旦摆脱,便猛地弹升起来。所以至 1979 年底价格放开后的统计:上海海水鱼零售价格平均提高 28%;淡水鱼零售价格平均提高 38%。本表特列改革开放后的 1985 年上海水产品零售价格以求比照——又是一个十年——海水鱼大黄鱼的价格翻了 6 倍多;带鱼、鳗鱼等翻了 3 倍多;淡水鱼青鱼、鲫鱼等的价格都翻了 2 倍多。然而,其内里价格杠杆的调节和全民工资收入的增长,却使供求更趋平衡,市场更趋稳定。

再看表五:

表五

沪杭宁水产品零售价格对照表(以 1973 年为例)

单位:元/担(50 公斤)

品名	规 格	上 海		杭 州		南 京	
		价 格	比 例	价 格	比 例	价 格	比 例
大黄鱼	375 克以上	40.00	100%	36.14	90.35%		
小黄鱼	125 克以上	35.00	100%	33.34	95.26%		
带鱼	200 克以上	30.48	100%	28.67	94.06%		

(续表)

品名	规 格	上 海		杭 州		南 京	
		价 格	比 例	价 格	比 例	价 格	比 例
乌贼	100 克以上	26.00	100%	23.22	89.31%		
鲳鱼	200 克以上	51.00	100%	41.04	80.47%		
草鱼	1500 克以上(活)	74.00	100%	48.00	64.86%	57.00	77.03%
鲢鱼	500 克以上(活)	47.00	100%	28.00	59.57%	39.00	82.98%
鲫鱼	150 克以上(活)	84.00	100%	58.00	69.05%	66.00	78.57%
鳊鱼	250 克以上(活)	80.00	100%	43.00	53.75%	64.00	80.00%

资料来源：顾惠庭：《上海渔业志》，第 286—287 页。

说明：在此，以 1973 年为例，是比较上海水产品“资源”、“生产”、“供应”和“价格”等综合情况而选定的年代。表六同。

如表五所示：第一，“文革”十年间，上海水产品市场的淡水鱼价格普遍比海水鱼高，如大黄鱼每市斤 0.40 元，带鱼每市斤 0.30 元；而草鱼每市斤 0.74 元，鲫鱼每市斤 0.84 元，即淡水鱼价格甚至比海水鱼价格高一倍。其实，这并非是淡水鱼的口味、营养价值更适合上海人的需要（否则很难解释 80 年代水产品价格放开以后，海水鱼的价格普遍要比淡水鱼高），而是由整个市场的供给情况决定的，即当时海水鱼的生产已全面机械化，单位产量很高，菜场中春节期间凭证供应的花色鱼种和平时敞开供应的什鱼多为海水鱼。反之，直至 70 年代初期（中期后逐渐转向集体养殖），上海的淡水鱼仍以个体渔民野生捕捞为主，且水体污染日益加剧，^[24]产量日益减少，这怎能不使野生淡水鱼的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上呢。

第二，比较长三角上海、南京和杭州三座中心城市的水产品价格，可见在海水鱼方面，上海与杭州有些许的比差（南京缺统计资料）。其实，上海的海水鱼价格是由上海港口船面收购价与批发价组成的，^[25]杭州的海水鱼价格也应是相同的构成，所以，与其说两

者的比差与购批环节相关,还不如说与城市的类别有关。在淡水鱼方面,则明显呈现上海的价格 > 南京 > 杭州的情势,如上海草鱼价格每市斤 0.74 元(1973 年度青浦县城厢收购价为每市斤 0.61 元),鲫鱼价格每市斤 0.84 元(收购价为 0.57 元)。而南京和杭州的此两类鱼的价格则分别为每市斤 0.57 元、0.66 元和 0.48 元、0.58 元。如此地区差价说明江浙一带的淡水鱼资源比上海丰富,产量比上海高,消费需求则不如上海,且产地价格省去了经营损耗,自然会便宜许多。因之,这也促成了“文革”时期上海市民利用出差、探亲等机会,从江浙的价格“盆地”中购得大批的农副产品。^[26]

最后看表六:

表六

上海水产品零售价格与其他副食品比价表(以 1973 年为例)

单位: 元/担(50 公斤)

品名	规 格	价 格	鲜鸡蛋		母鸡(1~1.5 公斤)		生 猪(65~75 公斤)	
			价 格	交 换(市斤)	价 格	交 换(市斤)	价 格	交 换(市斤)
带鱼	200 克以上	30.48	85.00	35.86	113.00	26.97	85.00	35.86
鲳鱼	250 克以上	51.00	85.00	60.00	113.00	45.13	85.00	60.00
鲢鱼	500 克以上	47.00	85.00	55.29	113.00	41.59	85.00	55.29
鲫鱼	150 克以上	84.00	85.00	98.82	113.00	74.34	85.00	98.82

资料来源: 顾惠庭:《上海渔业志》,第 290—291 页。

如表六所示: 上海“文革”时期的水产品零售价格,总体上要比禽蛋、猪肉等副食品便宜,尤其海水鱼的价格,如带鱼甚至便宜 1~3 倍。淡水鱼中鲫鱼价格最贵,但低于家禽,基本与鸡蛋、猪肉持平。由此,联系“文革”中上海猪肉敞开供应,比较这一多一少的货源,比较这低工资制下的高价格,对上海的一般收入家庭来说,如果红烧肉是餐桌上的“富贵”菜,白斩鸡是餐桌上的“珍贵”菜,那么就供应方式

和价格而言,清蒸带鱼、红烧乌贼大概是上海市民餐桌上相当“适宜”的荤菜了。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由本文内容可引出三个结论:

第一,上海海洋、长江和内河的渔业资源链,在“文革”中后期发生了断裂。表面上是1970年至1973年的破坏性滥捕,实际上是多年积累的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发展与自然资源休养生息之间的矛盾总爆发。

第二,自1959年2月至1985年4月,上海有跨度26年的水产品票证史。“文革”期间“尴尬的敞开”和“有计划的票证”,基本与水产品生产情况相吻合。

第三,“文革”十年间,上海水产品价格基本处于冻结状态,所发生的政策性亏损,概由财政补贴。因淡水鱼以个体渔民野生捕捞为主,价格普遍比海水鱼高。针对上海市民的工资和消费水平,比照猪肉、禽蛋的价格,水产品的价格是相当“适宜”的。1985年4月,上海水产品实行“价格放开,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敞开供应”。因由价格调节供求,市场形成高、中、低多层次消费,上市品种增多,供应趋于平稳。

注 释

[1] 顾惠庭:《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2] 同上书,第59页。

[3] 同上书,第60页。

- [4] 同上书,第323页。
- [5] 同上书,第324页。
- [6] 同上书,第61页。
- [7] 张鳌:《上海科学技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页。
- [8] 顾惠庭:《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 [9] 同上书,第69页。
- [10] 同上书,第70页。
- [11] 同上书,第131页。
- [12] 70年代初,郊县养鱼已有所启动。如据《文汇报》1971年12月31日报道:1970年冬天,奉贤县平安公社在海滩围田养鱼,八个月后“共捕到各种鱼、虾、蟹等水产品一千三百余担,大部分运往上海,增加了市场供应”。另据《上海渔业志》第139页记载:60年代中期,上海郊县开始河蚌育珠。据1968年10月的统计,全市共有育珠单位47个,接种珠蚌12.75万只,淡水珍珠产量达25公斤。1969年后,上海郊县河蚌珍珠生产迅速发展,全市接种珠蚌达40万只。1970年年产量超百斤(135公斤);1973年年产量超千斤(1175公斤);1976年年产量达到2056公斤。
- [13] 顾惠庭:《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 [14] 同上书,第194页。
- [15] 同上书,第61页。
- [16] 同上书,第70页。
- [17] 据《上海渔业志》第234页记载:1956年,全国建立统一水产供销系统,产销关系改变为内部计划调拨。外省市计划调拨给上海水产品最多的一年是1974年,计11.50万吨。
- [18] 参拙文《上海1966—1976年人口状况》,《上海研究论丛》第十六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345页。
- [19] 顾惠庭:《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 [20] 同上书,第240页。
- [21] 据《支部生活》1969年7月22日第38期“市水产局一个头头如此忘乎所以”一文称:该年6月的一天,当局革委会一头头派人到渔码头取渔轮带来的黄鱼时,遭到了职工的阻止,并严肃指出“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搞特殊化”。结果,局革委会头头三度派人到码头,以“化整为零的办法,把一百多斤大黄鱼分散从码头上悄悄地拿走,送到了这个头头家里”。后经驻局军宣队调查,这批大黄鱼并

非如局革委会头头所说是“人家送的”，而是托人向当地渔民私自购买后带来的，“局革委会有的常委也拿到了一些，按原价每斤一角四分半收钱”。事后，经过批评教育，该局革委会头头作了检讨：“当前上海鲜鱼供应比较紧张，作为水产局革委会第二召集人，不是首先想到上海一千万人民的生活安排，而是首先想到自己，利用职务的方便，满足个人的享受。”又，据《上海渔业志》第247页称：“文革”时期水产品市场供应偏紧，却发现有些菜场将仍可食用的水产品当作饲料鱼出售，数量每年竟约数千吨。1970年7月时，某区19个菜场销售鲜鱼579吨，作为饲料鱼出售的有131吨，占22.62%。1972年1月，市商业二局、农业局、财政局、水产局联合下达《关于加强下脚鱼经营管理的通知》，规定饲料鱼统一由各区副食品公司水产分配站经营。说明经营部门大手大脚，浪费严重。

- [22] 顾惠庭：《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240页。
- [23] 同上书，第266页。又：汪杰：《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 [24] 1975年，笔者亲见一中学教师委托学生买来野生河鱼，因剖肚后有汽油味而丢弃。
- [25] 据《上海渔业志》第270页记载：1973年度，大黄鱼的港口收购价为27.64元/50公斤；带鱼为20.93元/50公斤。
- [26] 在物质短缺时期，谁有这般机会，都会引得众人的羡慕。反之，香烟、食糖、肥皂、毛巾等则从上海流向各地，其中也包括外地出差者、探亲者携带的渠道。

第十四章 像 章 “问 题”

一、非常的时尚与收藏

“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金店和上海徽章行业曾制作过金质、铜质的毛泽东像章（因年代久远，发售量少，现已成为藏家的珍品）。“文化大革命”中，除了上海联合徽章厂、上海金属工艺二厂、三厂等为毛泽东像章的定点生产单位外（据 1966 年度统计：上海联合徽章厂共生产各类徽章 3 058.8 万枚，其中毛泽东像章 2 004.4 万枚。1967



1952 年上海金店制作的金质毛泽东像章(22K 金)



1953 年上海金店制作的金质毛泽东像章(22K 金)

年至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召开时,以上三厂共生产毛泽东像章 2.05 亿枚),^[1]许多工矿企业、大专院校和部队均自行组织生产,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不仅使那些定点厂难以望其项背,更为毛泽东像章“交换场所”的形成和扩张垒筑了基础。

毛泽东像章从佩戴到收集、从收集到交换的时间跨度很短。从收藏心理的角度说,一般个人拥有了十枚左右的像章,便会萌发收藏的情趣和意识;个人之间或出于喜好、或为了丰富藏品发生的交换则不仅是随机的,而且是频繁的。然而,毛泽东像章的收集和交换作为一种社会的集体行为,即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裹挟其中,并通过在一定的“场所”实施和进行,在上海,至 1966 年的第三季度就已开始形成了,至 1967 年春节前后,便已在全市范围内生长出十二处颇具规模的交换场所。黄浦区有南京路黄陂路口、山西路等五处。还有闸北区的北站、长宁区的曹家渡、虹口区的提篮桥等地。^[2]

固然,由“文化大革命”掀动起来的对领袖的爱戴和效忠,是毛泽东像章在人群中流行的主导原因,它具体表现为社会适时的大量生产和人们趋时的广泛佩戴。据上海报纸报道:1966 年 8 月,上海毛泽东像章的生产量为 18 万枚,9—10 月,月生产量猛增为 1 000 万枚,生产厂也由一家增至九家。工人们还“反复学习老三篇”,日夜加班,大搞技术革新,努力提高毛泽东像章的产量和质量。人们佩戴毛泽东像章已成为“文革”开始以来的一种“时尚”,^[3]甚至有的电影院检票进场时,还得查看是否佩戴毛泽东像章。

其实,导致毛泽东像章流行的契机是“大串联”。大串联的全国性人流互动,尤其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受



上海定点厂生产的像章袋

到领袖接见后返回原地，更是带着一种膜拜的心情，仿效北京的做法。据9月26日团市委召开的“大学团委书记座谈会”记录：复旦大学介绍，红卫兵从北京串联回来后，在“全校搞了三千多块毛主席语录，从宿舍到食堂气氛大变化，校广播台每天宣传六次毛主席语录，每次10分钟，每天早晨每个班级集体朗诵半小时语录”；华东师大介绍“会前读语录”，红卫兵大队部正筹备“我见到毛主席”征文和“我见到了毛主席诗歌朗诵会”。^[4]如果说这是构创着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蔚然成风，那么，大串联使红卫兵们每到一地，都有获得一枚甚至数枚毛泽东像章（或纪念章）的机会，只是供应单位必须在学生证（或红卫兵证、串联证）上加盖“像章已购”的图章。^[5]与此同时，上海也向外地来沪串联的红卫兵供应毛泽东像章，^[6]加上来沪串联的红卫兵不断把外地品种的毛泽东像章带进来，便是直接促成了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和交换。

应该承认，大多数人参与毛泽东像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收藏，这是因为毛泽东像章确实具有收藏的价值。从材质看：有金属类，如铝、铜、合金等，非金属类，如塑料、陶瓷、有机玻璃、大理石等；从工艺看：有机制和手工等；从类别看：有对章、套章、系列章等；从图形看：先多以圆形的毛泽东正面或侧面的头像为主，后出现方形、矩形、心形、旗形、船形、书形、火炬形、灯笼形、五角星形等不同的式样，且铸刻着“红旗”、“松柏”、“红太阳”、“向日葵”等图案和“忠”、“东方红”、“为人民服务”、“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标语。^[7]还有的像章或者为了某次事件，如安亭事件、一月革命；^[8]某次会议，如“九大”而制作。或者背后镌有“中国上海”、“7341部队”、“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等字样。有的则属于纪念章系列，如韶山、井冈山、遵义等主题为“革命圣地”的徽章（这套主题为“革命圣地”的纪念章系列，虽在当地发售，却由上海生产。

因品质精良,很受欢迎),均吸引着人们去追逐、去寻觅、去投放财力和精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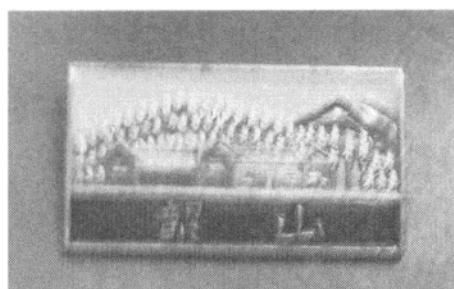
金属毛主席像



塑料夜光毛主席像



陶瓷毛主席像



韶山纪念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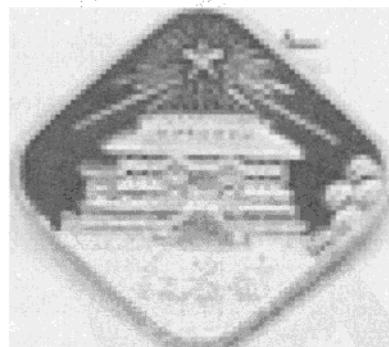
瑞金纪念章



遵义纪念章



延安纪念章



红岩村纪念章

在此,可以认为毛泽东像章的流行,是在一个非常时期里产生的新的收藏门类。从一定的意义上理解,也可认为是从一个非常时期

里孕育出的社会的时尚和社会的审美情趣。尤其是在“古玩”、“集邮”等均遭遇“革命”的情形下,以“热爱”和“崇敬”的名义收藏毛泽东像章,实际上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移,这种转移不是割断——或者只是内容上的割断,形态上的变化——就收藏和审美本身而言,它却是一种延续,一种通过转移而促成的延续。因为一个社会从根本上是不能缺少收藏和审美的。同时,还应进一步看到:对于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和审美,一旦被社会认同和确证后,并非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会持续地把热情和注意力凝聚在它的政治内容方面,即总有一部分人会更加关注毛泽东像章的种类、图案、造型和品相,以满足收藏和审美的需要,这种欣赏和把玩的态度,实际上是疏远着、消散着毛泽东像章所蕴含着的政治意味的——而这恰恰属于正常的社会选择和心态(非常中的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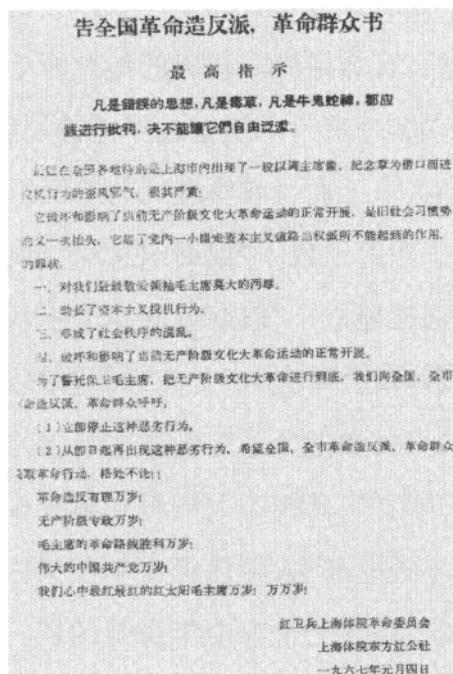
二、交换场所的背后

人们相互之间交换毛泽东像章是很自然发生的,因为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扩大收藏,丰富审美。但这种交换走出了熟人的圈子,走向了社会公共场所——多集中在车站、码头、广场及交通通达之处——形成了匿名人之间的集体交换行为,其发生的机缘和动因,其交换的原则和动机,就不是一般“收藏和审美”的理由可以解释了。1967年1月,上海的工人造反队和红卫兵曾自发地拉起零星的队伍,对正处于发育状态的交换场所进行了冲击,但“由于缺乏领导,问题没解决”。^[9]2月12日,《解放日报》加短评“这里又是一场阶级斗争”发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的来信,来信不仅指出:当前市区十多处像章交换场所,“从早到晚聚集大批人群”,“像北站天目路至河南路一段、南京路江西路至河南路一段等都已严重影响了交

通”；且这种不论对象是谁，怀着各种不同动机的交换“既不是建筑在相互之间革命友谊的基础上，更不是出于热爱伟大领袖的共同愿望”，因此在政治上“是极不严肃和极不负责的”；更指出：这种交换场所已经由自由交换发展为买卖或变相买卖，所以“日益暴露了它是一个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场所，日益暴露了这里有着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一系列的指认是种很醒目的社

会信号，虽然它以造反组织的名义出现，却是首次在大报上披露；虽然它以群众来信的形式出现，却是在事实层面揭示了毛泽东像章交换中的牟利倾向，在政治层面标示了毛泽东像章交换背后的“严重斗争”。

然而，这样的威迫并没有起到作用，交换毛泽东像章的人群继续在市区数十个场所聚集着，活动着（为防止冲击，不少交换者将像章别在袖章上、毛巾上，甚至别在衣兜的内衬里。一遇情况，便可卷进口袋，扣上纽扣，装作路人）。于是，工总司等十八个造反组织发出《紧急通告》，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发出《取缔通令》。2月23日下午，红三司、红上司等红卫兵在公革会的配合下，联合对毛泽东像章交换场所进行了冲击。当时，红卫兵和公革会的宣传车开到现场，立即张贴《紧急通告》和《取缔通令》，“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因事先有冲击者装扮成交换者游走在交换场所，盯住了几个主要人物，冲击一开始，便被扭住。“公安部门揪出了一些混在



其中进行违法乱纪的人。这些人有的在交换场所用纪念章调换其他物品；有的把尚未制成的纪念章毛坯大批带出来交换”。^[10]其实，这次现场冲击行动是经过严密策划后进行的，因为从组织机构看，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造反组织已会同工总司、教革会、新革会、红三司等组成了“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联合工作组”（至3月份，有7个区也建立了“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联合工作小组”）。^[11]从准备工作看，市公革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造反组织已查获了一些“盗窃、诈骗、投机倒把分子”，例如在闸北区有一人用钱或纪念章购买、换取空白介绍信，套购了大量纪念章在交换场所倒卖；还有人用请客吃饭、给零钱的办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内在交换场所卖出两千多枚毛泽东像章；还有七个青少年身带凶器，翻墙越入工厂偷窃纪念章，被捉拿。

红卫兵小将在公革会配合下坚决采取革命行动
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
揪出了投机倒把分子

像著者。二月十二日，办刊列文《要坚忍纪念章实缺善所》的读者来信后，一小小修改就将他几乎仍在进行必须办法，该读者引语青少年之中已犯迷途，“归而不返，生照例不会自己能跑掉”。这几天，红花社小将奔走募捐革命，便起了猛烈狂想，消除除了这几桩政治丑闻。红花社小将革命行动露出苗头，将得使我们警觉支持！我们警觉着那一小撮没倒彻底的坏家伙，如他们还不死心，我们再揭露冤家本末分明的证据，在他们挑拨离间如加声浪的打击。革命的领袖希是毛毛躁的，不懂你们试试看？

本报讯 主日报，红卫兵等小青年挺进广大会堂，聚齐罢课、游行单行军。造反派内鬼负责交班的，煽动了广大的群众支持和鼓励。

红卫兵和小将和企企会的成员在荒地广宣誓：誓死跟上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许多少年团员立下誓言：要当一名好队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群众还合唱了《东方红》、《毛主席万岁》等歌曲。

“一心为公的纯严主又战士兼承粹迹遍属”
照相，中行馆（1927年1月16日，日本原版）

《解放日报》1967年2月24日

时当场追回一千四百多枚等。^[12]从宣传上看，第二天《解放日报》、《文汇报》“本报讯”的文字，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统发稿，并故意张冠李戴地指责，这“完全是旧市委的大阴谋”。只是《文汇报》加了“本报评论员”文章《黑市场不冲不垮》；《解放日报》加了“编者按”，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上海十多处已成规模的毛泽东像章交换场所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为利益所驱动的经济活动,且这种经济活动非常的大胆和放肆,有的甚至踏进了“违法”的行列。再据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记录:1966年12月起,就有某人先后替19个单位加工铝皮630公斤,纪念章13

万枚,通过抽头的办法牟利 600 余元;1967 年 1 月,长宁拉手厂出现一个集团,在武夷路开设“地下工场”,“油漆车间”等分别设在成员家中,大量加工各类纪念章(现场查获 1.3 万多枚)。^[13]殊不知,这正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处于被称为“经济主义风潮”和“一月革命”的时期。一方面造反派呼风唤雨,呐喊天下,标树革命的权威;二方面造反派横冲直撞,抢班夺权,造成动荡的时局。实际上,恰恰就是在这段无政府的乱局中,在这段各种政治势力冲撞的缝隙中,存在于毛泽东像章交换背后的“利益空间”彻底地显露了,并迅速地被一批机敏者和投机者无阻拦地进入、占领。就此,关于毛泽东像章由热爱而佩戴、由审美而收藏的情况,也就迅速地完成了向由利益而交易、而钻营的转化。待到 1967 年 2 月,上海的造反派通过“一月革命”的夺权左右政局以后,再来关注、收拾毛泽东像章交换场所出现的混乱局面,这个局面已很难收拾了。

三、整肃活动

在 1967 年 2 月 24 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的报道和评论中,曾提到上海的“这股歪风愈刮愈大,并且影响到全国各地”。外地红卫兵也反映这“对外地都有很大的影响”。^[14]这说明外地的一些城市也渐渐出现了类似的交换场所,只是行进在其中的风愈刮愈“歪”,上海作为“风源之地”是脱不了干系的。196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商业部、物资部、第二轻工业部发出联合通知,指明上海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为上海地区毛泽东像章业务经营单位,并分配制作像章的铝材 60 吨。^[15]在此,这 60 吨铝材是“给予”,是“输入”;这业务经营单位的指定则是“约束”,是“限制”。这“给予”和“约束”、这“输入”和“限制”,实际上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上海毛泽东

像章的生产和经营,也包括对已出现的毛泽东像章交换场所提出了整顿和管理的要求。

3月11日,市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取缔交换纪念章场所,严格管理纪念章生产的通告》。《通告》共列五条,除了继续强调:坚决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不听劝告者的纪念章一律收缴等,更指出:现在许多工厂擅自设计、开模,有的图形不标准;有的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有的挪用生产原料;有的以协作为名进行私分。“五类分子和投机倒把、流氓盗窃分子从中兴风作浪,破坏文化大革命”。为此规定:凡非法生产、套购、转手倒卖及盗窃者将分别由工商和公安部门处理;纪念章生产统一归市轻工业局、市手工业局负责,其他单位不得开模生产,已生产的应由本单位的革命组织追查,并上交主管部门。

3月20日,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又向市革委会提交了《关于取缔交换纪念章场所,严格管理纪念章生产的请示报告》。《报告》称:二月下旬,工总司、红三司、红上司等群众组织曾集中上千人反复冲击纪念章交换场所,有的已达七八次。一些交换场所范围缩小,个别场所消失。今后打算加强现场的广播和大幅标语的宣传,以固守阵地为主,冲击为副,或者占领与冲击交叉进行(此为取缔丽水路、山西路交换场所的经验。现正对南京路黄陂路口的交换场所试行此法)。目前,市轻工业局、市手工业局所属六十多家工厂负责生产毛主席像章,统一分配供应(数量已达3亿枚以上)。但现在一般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部队机关,大到造船厂,小至生产组,不经审查,擅自生产,挪用、套购原料(有的拆掉机器上的铝制防护罩),提成、私分的面很广(开模、冲床、电化、涂漆等单位,无不按10%~50%不等的扣成索取),协作、采购也要以送纪念章为条件。纪念章乱翻花样,向装饰品和“集邮”的方向发展。一大批纪念章的图形不符合标准,

甚至出现严重的“政治问题”(毛主席头像严重失真,“有的把图形搞成很像刘少奇”)。为此建议本市设立专门的审查机构。同时,因全国解放军很多兵种来沪采购、开模和加工纪念章,也需要有统一的部门管理。

3月21日,市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出《关于严格管理纪念章生产的通知》,并要求各主管部门翻印传达,各基层单位贯彻执行。《通知》十分严肃地指出:凡非专业生产纪念章的单位一律停止开模和生产,并清理(因有出租和外借)、上缴所有模具、成品;原料、电镀等单位一律不得向非专业生产部门提供原料或加工;各专业生产厂按主管局的任务进行生产,不得擅自接受外单位的协作加工。最后强调:“要提高警惕,检举揭发五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的活动。”

从3月11日到21日,短短十天内就有三份关于毛泽东像章的文件上传下达,其态势可谓严重而紧急。确实,这变化了的“严重而紧急”的态势已不突出表现为毛泽东像章交换场所继续存在等问题(尽管造反派屡屡冲击,并创造了“固守阵地为主,冲击为副”、“占领与冲击交叉进行”等经验,也取得部分成效,即南京路黄陂路口、北站、曹家渡、提篮桥等原12处交换场所的“规模缩小了,个别场所甚至消失了”。但事实上,那些交换场所并没有真正消停,而是分散化、游动化、小型化了。因为在这段时期里,全市范围内的毛泽东像章交换场所已增扩至35个)^[16],而是突出表现为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单位及群众组织正在泛滥性地生产各类毛泽东像章,且谁家都有漂亮而充足的理由;谁家都有聪明而通畅的办法。尤其当这些单位、群众组织之间相互攀比,形成了集体认同、集体追逐的社会心态,单位和群众组织的种种资源、渠道和便利,便会被充分地调动和使用。至于其背后的目标指向,不能说全部的制作都是为了“交易”和“利益”,

但同时不得不承认“交易”和“利益”是其中的动力之一,或者说“交易”和“利益”的因素与泛滥性生产互为运动,互为因果,以致形成如此无序的局面。

5月7日,市革委会批转了市革委会经济计划组、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毛主席像章和纪念章的生产、分配和管理问题的报告》。《报告》指示各专业局指定专职干部对所属单位的“纪念章生产”问题实施监督、检查,并责成各专业局负责将收缴的纪念章模具、纪念章半成品上交市革委会。为此,各专业局十分重视,纷纷召开会议研究“制止非法生产”,并制定措施予以落实。

应该承认这次整肃活动是抓住了要害的,因为有关部门在从根本上制止泛滥性生产。相比而言,泛滥性生产是源头,转手、倒卖、套购、盗窃等行为是这种源头的恶性伸展,交换场所仅仅是连接这种源头的外部空间(其内部的交易骇人听闻)。现在堵住了源头,一系列“非法行为”和交换场所自然也就萎缩了。同时应该承认这次整肃活动是动用了权威的,因为从1月份红卫兵零星队伍对交换场所的冲击;到2月份报刊上发表群众组织的来信,工总司等发布有关《通告》及红卫兵有组织地对交换场所的冲击;再到3月份市有关管理部门接连下达各项指令和措施;直至5月份市革委会出面批转了有关《报告》,市革委会作为“一月革命”后的权力机构才正式对“毛泽东像章问题”作出表态(包括5月15日,市革委会邀请驻沪三军及相关工业局共同研究部队生产毛主席像章的问题。容后再议)。其实市革委会是一直躲在背后掌控的,只是它希望通过造反组织和职能部门来解决此类问题,但事实迫使它最终不得不走向了前台。如果说3月11日市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的《通告》,是这次整肃活动的启动;那么5月7日市革委对经济计划组《报告》的批转,是这次整肃活动的高潮。且因指令强力,措施周密,客观上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至6月,各专业局通过清查,共上交纪念章模具416副,纪念章成品、半成品46.6万多枚,原材料300多公斤;社会上共处理纪念章交换者14769人次,收缴纪念章91301枚、纪念章模具63副。处理人员中被公安部门追查的“违法”分子共28人(其中职工13人、青少年12人、小业主1人、四类分子2人),后审查拘留22人、警告2人、教育释放4人。^[17]

四、所谓“拘留者”

现在看一些“审查拘留者”的材料:

长宁拉手厂一集团从厂里盗窃电化设备和物资,开设“地下工厂”。其中朱某一人组织生产纪念章43万只,得利5万只左右。

杨浦公安局交通队民警卫某(称其“解放前曾二次参加反动组织”)利用公安人员的身份套购铝片1231公斤、铝锭206公斤,加工成像章47000多枚,从中获利。家中草房翻造成二层楼房,用像章拉关系,在长阳木行、平凉木料商店购得只供应房修站的砖、瓦和木材。

上海安装公司施工科安全员周某(称其“1957年、1961年两次贪污受处分”)骗得三张介绍信,以东海舰队某部的名义加工像章137650只,卖出49504只,得利3473.64元。周的手法是“虚报成本,克扣原料,抬高价格”,例如1公斤铝板可作“为人民服务”横条550枚,周说只能做320枚;头像加工费2分半一枚,周收5分一枚;圆头像成本5分一枚,周以1角至2角出售。有五个红卫兵参与周的活动。

上钢五厂供应科陆某通过中间关系以一台60吨冲床,与浙江

平湖城关白铁社调换 9 万只像章,以支付运输费为由,每只加价一分,获利 900 元。机动车间原工会负责人陈某与卢湾区税务局张某、王某等,动用生产铝片在车间冲制各种像章 8 万多只,除部分分发给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江浦五金厂会计罗某通过手工业局石某调拨铝锭 659 公斤,加工成铝片倒卖 426 公斤,获利 249.60 元。同时,罗以 220 公斤铝片自制像章 5 万多只,除被涂黄、油漆过程中提成外,得像章 3 万只,售出 18 000 只,获利 500 多元。

市手工业局工具设备公司所属宝华冶炼厂革委会成员夏某盗窃红旗徽章厂送回来炉的不合格像章 1 万多枚,委托外单位电化、点漆后出售,从中渔利。

工总司医工指挥部从宁波搞来 48 000 只像章加价出卖,获利 400 余元。后又挪用生产原料加工成 2 万只像章,获利 600 多元。这些像章从保管到定价都由医工指挥部的第一把手贺某经手。

其他还有无业者祝某(称其“1961 年就贩卖黄金、手表、自行车、票证等”)从事上海与广州、武汉及东北各地区的像章倒卖,有时还坐飞机,生活非常阔绰。^[18]

考查上述事实,可见隐藏在毛泽东像章交换背后搅扰局面的这些人,多是在单位里施工科、供应科、会计科等担任着一份对外联络的工作,见识广、信息灵、关系熟,手头不仅有些资源,还有些运作的机会和权利(有些革委会、造反组织的头头也有这份便利);多有些“贪污”、“贩卖”的经历,胆子大、门路熟;多是通过挪用、调换、套购等手段,直接进入原材料和生产的过程中,大批量地掌握着纪念章的进进出出;多是将手臂伸向外地的企业,通过与外地企业的种种交易,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再从事实出发作进一步的推究,可见这批人

在参与交换毛泽东像章的人群中,甚至在因交换毛泽东像章而受处理的人群中,都只是一个极少数。那么,这“极少数”的人怎么会翻卷起如此大的动静呢?毛泽东像章成为社会的紧缺商品,以致显露出巨大的“利益空间”;这“极少数”的人能量大,掌控着从制作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客观上引导了市场和交换场所的走向。如果说这些因素属于内在的驱动,成千上万的群众或出于热爱,或出于喜欢;或为了收藏,或为了消遣;抑或为了通过投机性地调来换去、买进卖出获取一些实惠,赚取一些差价,而参与到、投入到毛泽东像章的交换和交易中来,实际上是起到了支撑着、托举着市场和交换场所的作用的。在此,这“极少数”人的作用与绝大多数人的作用互动共存,前者带动着后者,后者呼应着前者;前者诱惑着后者,后者成全着前者,这种融混一体的关系确实是很难剥离的。

与此同时,舆论认为毛泽东像章交换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管是主导思想的判断,还是追求宣传的效果,事实上的“阶级敌人”子虚乌有——就连被公安机关追查的 28 人中,列为“四类分子”的只有 2 人。再如前述中上海安装公司施工科安全员周某被虹口公安局拘留,后经公检法军管组批示也只是“交群众批斗,给行政处分”。结果反倒是“上海安装公司的革命群众意见很大,要求(给周)戴上帽子,实行管制”。^[19]看来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阶级斗争”的观念已存在于群众的意识中,群众的激动和愤懑,有时是会超越政策界限的。

五、部队与地方

市革委会对交换毛泽东像章的整肃行动,尤其从源头上制止各单位的泛滥性生产,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在整个毛泽东像章的

交换和交易中,由部队制作而投入的品种,不仅在质量上上乘,在数量上也是巨大的。市革委会及所属部门不能指挥部队,自然也就不能制止部队系统毛泽东像章的生产和流通。



上海警备区制作的像章



东海舰队制作的像章

1967年5月5日,为了统筹性地解决问题,市革委会邀请驻沪三军及轻工业、手工业、各区县工业局共同研究部队生产毛主席像章的问题。会议建议驻沪部队的自行生产由东海舰队、上海警备区、7341部队政治部管理。外地部队委托上海加工,需凭三军政治部的证明,由本市轻工业、手工业局安排。显然,市革委会的“建议”和“安排”是比较圆通的,但因并不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也就只能起到提醒、督促和规范的作用。所以,当时仍有许多部队因相信上海的技术,直接在上海委托企业制作毛泽东像章,有的甚至与联系人之间产生了私下里的交易。在上海的整肃行动中,就曾查处过这样的事例。如市手工业局工具设备公司所属宝华冶炼厂革委会成员夏某,以支援部队为名,调用大量铝锭,先后为十多个部队加工毛泽东像章(这些部队的介绍函件均不完备),其中有六七个部队的人与夏某发生以像章交换生铁、冲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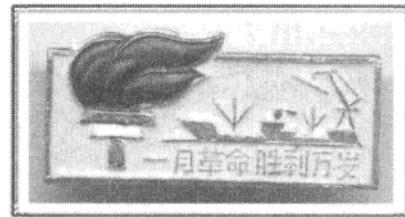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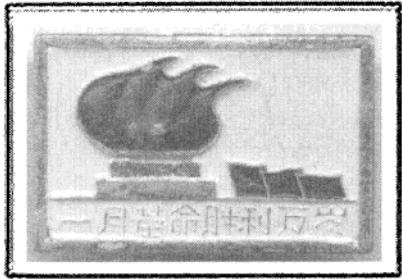
马达等秘密的物资交易，部队的人还将桂圆肉等土特产送至夏家。夏的儿子拿着一大包为部队制作的像章在交换场所出卖时被拘留。江浦五金厂会计罗某通过东海舰队的关系，向铝材二厂套购铝锭 480 公斤制作像章，从中克扣边角料另行生产获取利润。^[20]

或许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部队处于特殊的地位；或许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部队享有崇高的权威，总之，部队在制作毛泽东像章以表示对领袖的爱戴和效忠方面，其规模、其手段，不仅是地方不能企及的，甚至是不敢想象的（自然也是少有管束的）。据市革委会政宣组 1967 年 12 月引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报告：9 月，某部队与上海金属工艺一厂用紫铜定制毛泽东像章 1 557 只，其中镀金 860 只，用去黄金 8 克。镀银 670 只，已全部加工完成。后部队又自备紫铜 78.3 公斤、黄金 57.4 克再定制 8 600 只，结果镀金完成 2 760 只后被有关部门发现并劝止。11 月，某空军部队自行加工镀金毛泽东像章 276 只，用去黄金 14 克。因制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请：“因航空零件镀金，需用黄金 4 克。”上海分行拨出黄金并交上海金属工艺一厂，后发现目的用于镀金加工毛泽东像章，便及时截止。两部队分别用去的黄金 57.4 克和 14 克，均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可见，部队的这些做法已严重违背了中央的有关规定，但是，谁能管得了呢？直至中共“九大”前后，交换场所中出现了许多大号、特大号的毛泽东像章，也多是由部队出品的。

六、从高潮到消歇

考查上海 1967 年下半年及以后几年毛泽东像章生产和流通的情况，据 1967 年 6 月 23 日市革委会经济计划组向市革委会提交的《关于毛主席像章和纪念章生产管理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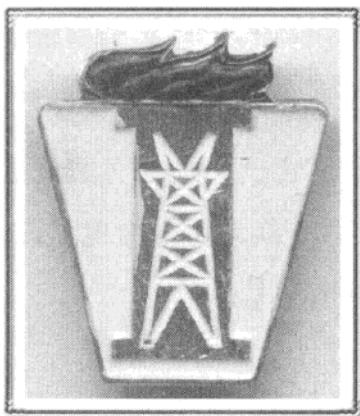
月 7 日报告后,自发生产已停止,非法交换已减少。”其实,这种“停止”和“减少”只是外力压迫的结果,不是内在要素的解散;只是一时的效应,不是长久的治理,所以只是抑制,不是制止。隐匿性的“地下生产”和游动性的交换、交易继续存在。同时,“仍有不少单位和群众组织认为有特殊需要,要求自行设计和加工。如上海合唱团演出交响乐《沙家浜》;上海铁路系统准备搞‘一月革命’纪念章等”。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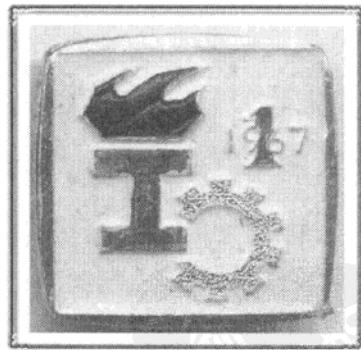
上海工总司铁路系统指挥部制造

上海工总司卫生系统联络总站制造

上海工总司海港指挥部制造



上海工总司电业总部制造



上海工总司上海锅炉厂总部制造

市革委会经济计划组重申“确有全国、全市纪念意义的报市革委会批准,由市手工业局负责生产。外地来沪加工的一律凭省市介绍信,由二轻局负责生产”等。紧接着,1967 年 7 月 10 日,市革委会工交组又

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像章生产管理的通知》。再次强调：未经市革委会批准，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委托本市和外地工厂加工像章；已生产的原材料、半成品一律上缴；特殊需要报市革委会同意。由此可见，整肃了的局面还是相当敏感和脆弱的，它甚至需要市革委会每月都发出一个“需报市革委会批准”的指令，来加以管制和维护。追究其缘由，生产和交换的活动仍在此起彼伏地进行，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变通着出现了造反组织纷纷生产“队徽”、“队章”的情况，更何况群众对毛泽东像章及有关纪念章的需求，继续保持者不减的热情，这确实不是一纸文件就能解决的问题。当时，许多逍遥着的学生、工人甚至把像章当作“赌资”，通过打牌、下棋等手段来赢取。有些沾有流氓习气的青少年发明并练就了一套快速而隐蔽地摘取他人胸前像章的



上海工总司徽章



上海财贸战线革命造反委员会徽章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徽章



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徽章

老物志
PDG



工总司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总部徽章

坚决制止纪念章的非法生产和交易

《文汇报》1967年11月13日

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为市革委会强力扶持的红卫兵组织)：既成事实的问题，可以考虑解决。但此事传开有影响，如果各校找红代会如何回答，建议你们研究，写情况报告中要表明数量概念和引以为教训的态度。三天后，市革委会又发布了《关于制作和发行毛主席像章的几点补充规定》，以权威的口吻再三强调：“未经市革会政宣组批准，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制作、发行像章”，但这种权威到底又能产生多大的威势和成效呢？

手法(靠近他人后,迅速地捏住像章别针的尾部,顺势往上一弹、一抽),以致流行开来。一些来不及制作像章的单位也不甘心,例如 12 月 2 日,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就直接向市革委会写报告,声称:市革委会通知下达后,我校纪念章生产正进行到一半,这样,有的人发到,有的人没有发到,意见很大。希望市革委会批准继续做下去。同日,市革委会回复(同

党的“九大”召开前后,上海和全国一样出现了又一轮制作毛泽东像章的高潮,且这一轮的制作多为欢呼“大好形势”,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所以,在像章的规格和图案上翻出了许多新的花样,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九朵葵花向太阳”等,有的直接就将毛泽东在“九大”作报告的形象铸刻成了画面。上海碳素厂的工人甚至动用黄铜,翻铸了直径为 100 毫米的毛泽东像章。^[21]面对如此状况,市革委会仍然试图“统一管理”,比如 1968 年 6 月,市革委会批准了手工业局、轻工业局所属专业定点厂,“拟大量生产”迎接“九大”纪念章的申请报告。^[22]1969 年 4 月 12 日“九大”召开之际,市革委会发布了《关于定点敬制毛主席像章的通知》——与两年前强调的内容如出一辙——《通知》规定:上海红旗徽章厂、上海金属工艺二厂、三厂、上海日化制罐厂、创新工艺品一厂、上游塑料厂、工农发夹厂和精艺模具厂可以敬制毛主席像章。其他任何单位一律不得自行敬制,一律不得接受任何地区、单位敬制像章的任务。^[23]在此,连续两个“一律不得”,不是反证了许多单位正在“自行敬制”,正在“接受敬制”吗?事实也确实如此,据《支部生活》报道:1969 年 1 月起,上海碳素厂革委会、工人造反队就开始“搞像章”,先后“经手的有 4 万多枚”,3 月还为像章发生了打架事件。尽管局革委会多次批评,4 月 8 日,上海碳素厂仍动用生产车辆去浙江湖州搞像章,结果途中发生严重车祸。5 月 18 日,上海钟厂革委会生产组和冲压车间造反队头头擅自接受了浙江金华制作 6 万枚像章的任务,便利用厂休日叫几个老师傅和女艺徒通宵加班,结果加工到了 1 万多枚时出了工伤事故,只得将原材料和模子转移。同时,南京西路人民公园门口、黄河路等处又滋生出了毛泽东像章交换场所。^[24]如果说围绕着“九大”出现的毛泽东像章制作热潮,与两年前的情况有什么不同,除了像章形式的变化外,那这次大概是基层革委会、造反队出面的多,公开动用生产资料和生产工

具的多,而市革委会及所属部门的种种通告,则显得是老调重弹,形同虚设了。

然而,高潮的到达,也就意味着滑坠的开始。从 1966 年下半年随“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兴起的毛泽东像章热,到 1967 年上半年因发生种种变异而复杂、而迷离、而受到冲击和整肃,其间,尽管也收到阶段性的成效,但其源流未曾断过,直到 1969 年“九大”前后,毛泽东像章热终于在万众的欢呼中走向了高潮。1970 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变化,随着千千万万青少年因上山下乡离开了城市,随着社会心理认知的集体性转移,毛泽东像章的生产和交换,也就渐渐地消歇了。

同年,上海所有的专业定点厂停止了毛泽东像章的生产。^[25]

注 释

- [1] 王定一:《上海二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9 页。再据由月东:《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4 页记载:上海 1966 年第四季度供应毛泽东像章 3924 万枚。1967 年供应达 1.3 亿枚。至 1969 年,按市革委会《定点精制毛主席像章》的通知,商业部门退出经营,由市手工业局工艺美术服务部负责经销。此时,积压在仓库中的各种像章有 634 万枚,价值十余万元。
- [2] 1967 年 3 月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取缔交换纪念章场所,严格管理纪念章生产的请示报告》。
- [3] 夏冬元主编:《20 世纪上海大博览》,文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58 页。
- [4] 1966 年 9 月 26 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大学团委书记座谈会”记录。
- [5] 1966 年 10 月,笔者曾在重庆排队一小时求购一枚毛泽东像章。同时见有机灵者,一人持三份证件,通过同行者的间隔插队,得三枚毛泽东像章。
- [6] 据上海工总司《打倒黑党委》材料和《上海青年志》记录:至 12 月,因原材料短缺,上海毛主席像章的月生产量减产 400 万枚。为了促成外地学生早日离沪,市接待办公室决定向已办妥手续的外地学生赠送别于胸前的有机玻璃语录牌(已不是

金属像章)。11月27日,各基层接待站共领去语录牌24万枚。

- [7] 王懿麟:《文物知识与鉴赏》,中华国际出版社(香港)2002年版,第317页。
- [8] 当时,“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纪念章在上海是十分流行的。据1967年17期《支部生活》王秀珍文章《永远紧跟毛主席》记:1967年5月1日晚,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委会全体成员和上海市(一行八人)、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并合影留念。杨成武把我带到毛主席身边,对毛主席说:“上海代表团的同志向您献‘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纪念章来啦!”我马上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纪念章敬献给毛主席,并激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代表上海一千万人民和二百万造反派队员向您老人家献‘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毛主席接过纪念章,慈祥地笑着说:“给我这么多啊。”我急着说:“不多呀,上海一千万人民,一人一个的话,就拿不下了啦!”毛主席又高兴地笑起来,说:“谢谢,谢谢!”毛主席和我握了握手,我马上说:“我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毛主席继续往前走,我和聂元梓同志挽着臂膀,紧紧跟着毛主席,一边走,一边喊:“我们紧跟毛主席!我们紧跟毛主席!”
- [9]、[11]、[13]、[16]、[17] 1967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取缔交换纪念章非法场所的工作总结报告》。
- [10]、[12]、[14]《文汇报》、《解放日报》1967年2月24日。
- [15] 由月东:《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 [18]、[19]、[20] 1968年市革委会政宣组《报告》。
- [21]《支部生活》1969年第22期。
- [22] 1968年6月,市革委会政宣组《给市革委会的报告》。
- [23]《支部生活》1969年第19期。
- [24]《支部生活》1969年第22、32、33期。
- [25] 王定一:《上海二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第十五章

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

一、一尊毛泽东不锈钢胸像

1966年9月，在“文化大革命”如日东升的时候，上海长宁区刻字社金属雕刻小组的十五位员工联名向中共上海市委倡议：塑造一尊巨型不锈钢毛主席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在一片革命的喧嚣中，这类倡议很快就泡沫化了（以致后来因市委“迟迟不予答复”，竟成为上海最大的当权派“仇视伟大领袖”的佐证）。^[1]“一月革命”中，长宁区刻字社的代表跑到北京，在出席全国工艺美术造反派大会时，再次向参与接见的周恩来、陈伯达提议，并当即得到周、陈的认可。第二天（即1967年1月13日），国务院第二轻工业部便致函上海市手工业局，表示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同意筹建“九米毛主席不锈钢像”工程，并提议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定稿，先试制小样，备齐资料，上报审批。经费开支则暂由刻字社垫付，待后拨款。^[2]由此可见，上海的塑像工程在启动阶段就上下通达了，且打上了“组织委托”的印记。

1967年1月24日，由市手工业局牵头，有市委工业政治部、市委

宣传部、文化局、冶金局、工艺美术公司、油画雕塑创作室、长宁刻字社等 12 个单位参与的“毛主席塑像委员会”宣布成立，并开展了试制工作。试制工作没有专家，仅凭雕刻工、钢模工、翻砂工们的“赤胆忠心”和“深厚感情”在支撑、在操弄，所以送审的 1 米小样被第二轻工业部指定为“内部审稿”，“继续进行表面加工”。^[3]为领袖塑像毕竟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1967 年的领袖被全民抬举着、欢呼着，风发而神圣，其形象岂容丝毫的差失。“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终因“没有能力塑造毛主席的形象，只好采用得奖的办法向全国征稿”。^[4]经过这么一番磨合和整改，“毛主席塑像委员会”于 3 月 1 日开始，正式在上钢三厂开模，首先为上海浇铸一尊毛泽东不锈钢半身胸像。制作过程历时近三个月，其间共试制了 450 毫米、500 毫米、1 050 毫米等 8 尊小样。据报道：正式“浇铸的这一天，当飞舞着万朵金花的钢水注入砂模时，盼望了很久很久的人们，个个扣紧心弦，等到钢水浇完，钢像还处于红彤彤的阶段时，人们就冒着高热，迫不及待地打开砂箱，检查是否符合要求”。^[5]新铸的毛主席不锈钢半身塑像高 1.05 米、宽 1.1 米、壁厚 16 毫米、重 300 公斤，被各类红卫兵造反报称为“全国第一座”。

6 月 5 日，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塑像游行安放仪式。毛主席不锈钢半身塑像围着红绣球，由鲜花和青松簇拥着，端坐在报喜的彩车上。彩车在喧天的锣鼓、爆竹声中从上钢三厂出发，渡江以后沿瑞金二路、淮海路、南京路缓缓地向市革委会所在地外滩前行。一路上，身着白衬衫、佩戴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注意：这身装束并不具有“文革”的特征）举着彩球载歌载舞，红旗方阵气势如虹。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的群众，集合成了数里长的报喜队伍（图一）。队伍到达外滩后，举行了庆贺大会。随即“在万众欢呼声中将不锈钢毛主席塑像隆重地安置在市革委会的正门前”。^[6]



图一

6月5日的上海是激奋而昂扬的，它通过仪式，通过集会，不仅制造了巨大的群众现场，更制造了巨大的社会共鸣。

二、两尊毛泽东金属立像

“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的工作有着北京的背景，其具体任务也是要为天安门广场浇铸一尊“九米毛主席不锈钢像”。这种目标指向自然不能满足上海造反派的意旨，所以1967年3月，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一百多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119工程组”（以工总司成立日期为称号）声称要在人民广场检阅台前，塑造一尊高达12.26米的不锈钢毛泽东立像。5月9日，上海工总司、同济东方红、红三司、红代会（筹）新复旦师、新师大师等造反组织又正式发表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指明这是“一座毛主席身穿军装”的立像，要让它“永远屹立在东海之滨、黄浦江畔，永远屹立在我们的身边，放射出万丈光芒”。^[7]随

即,“119工程组”主持召开了各群众组织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对塑像的建议。群众组织张扬出如此宏伟的规划,且“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的工作在多次要求“慎重”的情况下,正等待着“中央批示”,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促使市革委会办公室于6月29日发出通知:所有的塑像工程“暂停动工”,有待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决议。下表是7月初市革委会办公室为会议准备的材料。^[8]

上海毛主席塑像工程统计表之一

单位	规格	材料	费用	具体用料	备注
塑像委员会	15米	不锈钢	未预算	钢材由上钢三厂解决,石膏模由油雕室提供。已用去5000元	小样试验中。大像待中央批准后动工
119工程组	身高12.26米,底高7.1米,总高19.36米。	不锈钢	未预算	开工准备已用去水泥35立方米,电线120米,自来水管30米,芦席2000张,木料30根,泥40吨,毛竹1600多根,广篾40万根,钢7.5吨	已动工,准备12月26日完成
119工程组钢研所施工组	3.8米	不锈钢头部需用高耐磨材料	10万元	钢水5吨,镍数百公斤,铬、钼等不详。另需设备	原计划7月1日动工,8月18日完工
上海汽轮机厂	身高3.8米	铜	2万~3万元	铜3吨	已动工。争取8月18日完成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B—244—2—108。

市革委会准备的材料还指出:其实,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均缺乏条件和力量,在材料、浇铸、表面处理方面“存在一系列难题”。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组织还相互攀比,相互封锁技术。当119工程组筹建12.26米塑像时,塑像委员会即将原9米高的计划修改为15米。当塑像委员会因力不从心提出合作意向时,119工程组则不予采纳。双方人员间的走访,也尽量遮掩关键技术。在1967年全民崇敬领袖的狂热中,在直接为领袖造像的神圣行动中,竟然存在

着不顾大局与要端,为追求更胜一筹的势派,为炫示超越他人的荣光,而谋虑计策方略,而把玩雕虫小技的情状。可见,人群集体性地升腾在虚幻中,一切都是膨胀的、浮游的。但回到具体的操持中,就必然会发生重重纠缠,遇到种种诱惑。普遍的人性在此才必需是面对的,在此才会是真实的(这即属于“非常”状态中的“正常”)。

7月11日,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了“毛泽东塑像问题”(恰逢毛泽东关于塑像“劳民伤财”的指示下达)。会议认为:在上海市内的重要公共场所(如人民广场、外滩等)拟建若干毛主席塑像,但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划”,“各工厂、学校一律不搞”。^[9]很明显,会议的结论并没有限制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的动作,因为强调了“公共场所”的需要,重申了等待“中央规划”的必要,反而为这两个跨行业组织的存在和活动,提供了更富有弹性的腾挪空间。所以,尽管以后风声趋紧,不时传来中央或市革委会有关“制止”塑像的指示,准备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广场浇铸15米、12.26米塑像的规划,也几乎看不见落实的希望,但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凭借颂赞领袖的时代认同,借助着基层群众的期待和支持,仍在不停歇地为浇铸新的毛主席塑像而奔忙运作。各类红卫兵小报则不间断地向外界传输着这方面的消息,比如:8月15日上海机电工专红卫兵主办的“东方红”报道,上钢三厂的造反派正塑造毛主席头戴军帽、身穿军大衣,挥舞巨手(身高6米、壁厚40毫米)的不锈钢塑像。9月22日“新交大”报道,受国防科委委托,上钢三厂用二炉钢水一次铸成的毛主席不锈钢塑像(高7.1米、重16吨),正在进行抛光,将于国庆节前护送到北京。9月30日,“新交大”第四期刊出的照片可谓确证(图二)。再比如:8月17日上海电专编辑的“文革通讯”报道,高3.7米、重2500公斤的毛泽东青铜立像,已于14日在上海汽轮机厂分二段一次浇铸成功。其他消息也证实,8月17日,这尊毛主席立身铜像在119工程

组展出，共有 5 万人瞻仰。^[10]看来，尽管消息之间在细节方面有些驳杂，但塑像委员会和 119 工程组在 1967 年的第三季度塑造成了两尊全新的金属领袖像应该是确实的。



图二

9月2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向上报告，因仍有单位继续毛主席塑像的施工，“我们口头、书面劝阻均无效果”，故建议市革委会成立“毛主席塑像工作组”，进行“统盘考虑”。结果，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后作出严肃批示：“现在一律不造”，因此“不必成立工作组”。徐景贤还特地在批示中加括号注明“包括 119 工程和塑像委员会的铸像”。^[11]但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说了等于白说，做了就是做了，这多少具有冒犯和嘲讽的意味。

三、第一尊校园塑像

1967年5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报了新华社专稿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立即在上海的校园里产生了强烈反响。同济、复旦、华师大等校师生奔走相告，纷纷贴出倡议书，要“让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也永远矗立在校园”。^[12]

同济是最早行动的，5月15日晚由军训团和东方红兵团确定初步方案，16日即选址破土，17日师生们便抬举着1米高的塑像模型在全校游行。确实是边设计、边施工、边庆贺。当时，曾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提出“伟大不等于巨大，巨大未必伟大”，“根据我校条件，搞个三四米的就行了”的意见，^[13]这不仅引出了一场批判，以正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了”，更激发了“革命小将”的斗志，因为“我们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完全有胆略、有信心、有毅力、有能力”，“高水平、高质量、高速度地建成毛主席巨型塑像”。^[14]这便直接导致参与该项工程的全是普通的工人、学生和青年教师，竟然“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一个权威”。^[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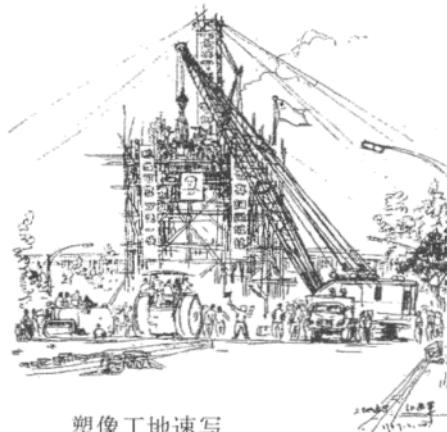
为毛主席塑像是盛大的节日，设计组通过向全校征询意见，采纳了解放军“毛主席身着军装”和外国朋友“让军帽拿在手里”（因为“毛主席宽大的前额集中了全人类的智慧和理想”）的建议，完成了设计稿——毛主席巨型塑像耸立在同济校园的中央，像高7.1米，基座高3米，由晚霞色花岗岩砌成。基座正面嵌着林彪“四伟大”的题词，背面是十面红旗和万年青浮雕，这“象征着我们千秋万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向着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海枯石烂不变心”。^[16]

施工是跃进式的，至5月31日，开工半个月的泥塑工作已基本完成。因为第二天是同济校革委会成立的重要日子，“泥塑工地上一片欢乐，参加劳动的工人和同学怀着喜悦的心情，忙着整理场地。下午五时三十分，突然泥塑后身开裂，裂缝迅速扩大，同学们奋不顾身抢修无效，终于整个泥塑全部塌下了”。^[17]这在当时是一件天塌地陷

式的大事,不仅仅在于明天政要们要来出席会议,更在于为毛主席塑像的行动所寄寓着的政治意义。经检查,造成塑像轰然垮塌的原因,是“运用了强度不够的木骨架”。这在以建筑为专长的同济大学,也应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确实,这是没有专家、权威参与工作的灾难,同时,幸亏没有专家、权威参与其中,也就消解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敌人破坏捣乱”的猜疑和恐惧。

工人、同学们擦干眼泪,一遍遍地学习“老三篇”,“闻讯而来的革命师生员工纷纷送来鼓励书、请战书,送来一段段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18]精神的照耀作为那个时代的法宝,固然可以重新集聚队伍,昂扬斗志,但终究不能替代科学的规律。经研究,工程组决定电焊钢骨架。于是,“电焊工人夜以继日地战斗,仅仅一夜工夫就把高达七米多的钢骨架竖立起来”。接着,又两天两夜“把十三吨胶泥一块块抛上脚手架,扑打在钢骨架上”,^[19]至6月7日,新的毛主席泥塑成型了,师生员工们敲锣打鼓,声称“创造了世界雕塑史上的奇迹”。12日,工程完成了壁厚8厘米的石膏模上浆。后又用1000根钢筋,2万根细铅丝进行绑扎,且工艺规定钢筋骨架与石膏模内壁间的距离,必须严格控制在3~5厘米内。施工队连续奋战三天三夜,在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的任务后,激动地在塑体上写下一条大标语:一切归功于毛泽东思想!^[20]从塑像的垮塌到再度树立,其间的痛苦、委屈和艰难终于在此刻消融了,消融在一条伟大的归因中——其实,在那个嚣浮的时代,这种思想和情绪的归因是很容易就可以攀援,就可以划入的,且越伟大越容易攀援,越容易划入——那就是简洁思想、沸腾情绪,让自我丧失在这种归因中。反之,当这种归因成为集体认知,或者说表达了普遍心声时,它留下的社会悲哀又会是很深刻的。

6月22日,总高10.1米的壳体式毛主席塑像工程进入混凝土浇



塑像工地速写

注工序。决战时刻，场面繁忙而热腾，人们紧张而激动。层层升高的作业台上，挂起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高扬起的塔架上，披上了毛主席的巨幅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炊事人员到达现场，医务人员到达现场，文艺小分队到达

现场，广播台一遍遍情绪激昂地播送着“老三篇”。浇注混凝土需多方配合，连贯运作。经过长达 40 多小时的高强度作业，至 23 日凌晨，“当东方喷射出万道光芒的时候，当广播台高奏起雄浑的‘东方红’乐曲时，整个混凝土浇注工作胜利完成了”。^[21]

7月1日上午7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四十六周年的日子里，同济大学8000师生隆重举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型塑像落成典礼”。令人诧异的是：与两个月前新华社全面报道“清华大学建成毛主席巨型塑像”的消息形成鲜明的反差，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竟然没有对此作点滴的报道。

四、其他的塑像

同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于7月1日落成时，由劳模蔡祖泉挂帅的复旦大学毛主席塑像筹备组、交通大学毛主席塑像筹备组、华东师大“九一五工程组”等正率领着师生员工在校园中积极工作，比如：承担塑像任务的复旦“红画笔”不仅将各种毛主席像拍成照片，画成样稿，组织全校讨论，还专赴青浦淀山湖寻找上等黏土。^[22]殊不知，因清华的造像运动在全国引起了大规模的效仿，同时也引发了中央

的隐忧,所以此时关于塑像的风声已开始悄悄地变调了。7月5日,毛泽东作出正式批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23]7月1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不仅传达了“最高指示”,更强调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24]

在此前后,市革委会有关部门曾对上海的塑像情况作过调查。下表是7月初市革委会办公室所汇总的部分材料。^[25]

上海毛主席塑像工程统计表之二

单 位	规 格	材 料	费 用	具 体 用 料	备 注
同济大学	身高7.1米、基座3米,总高10.1米	钢 筋 混凝土	3万多元(不含建筑费)	水泥10吨(估有误)、花岗石22吨、大理石5.3吨、过滤沙3.8吨、石膏粉6吨、木料10立方米、钢筋4.5吨、毛竹数百根	7月1日已完成
复旦大学	身高7.1米,底高5.16米,总高12.26米	钢 筋 混凝土	预计2万元	不详	5月中旬动工,目前工程进入泥塑阶段,估8月18日完成
华东师大	身高7.1米,底高5.16米,总高12.26米	钢 筋 混凝土	预计2万元	石膏5吨、水泥39吨、黄沙20吨、石子20吨、木料10立方米、泥15吨、钢料数吨	泥塑像已完成。目前正准备用水泥喷枪喷铸
机械、水产、体育、外语学院	身高6.3米、底高3.5米,总高9.8米	钢 筋 混凝土	1万元左右	因为四学院联合,用料省,花钱少	已动工,9月初完成第一座

(续表)

单 位	规 格	材 料	费 用	具 体 用 料	备 注
交通大学	身高7.1米、底高3米，总高10.1米	铸 铁 外 喷铜	不详	不详	准备搞
戏剧学院	4~5米	钢 筋 混 凝 土	不详	不详	准备搞
中医学院	身高4米、底高2.5米，总高6.5米	钢 筋 混 凝 土	1万元左右	计划用料：石膏4吨、640元，白水泥8吨、1440元，钢筋10吨、300元，青水泥2吨、80元，黄沙5吨、70元，石子5吨、100元，白石子及颜料1吨、100元，木料2立方米、250元，照明设备500元，机械施工费500元，模型费2000元，其他费2700元及毛竹50根等	已递交报告
华东化工学院红旗派	身高10米	钢 筋 混 凝 土	预计3万元左右	钢筋、水泥已备齐	已动工
华东化工学院野战军派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准备搞
陆行中学	身高3米	纸筋石膏	100元左右	不详	4月份已完成
南洋模范中学	3.60米	纸筋石膏	100元左右	不详	7月1日已完成
上海机床厂	身高7米、底高3.78米，总高10.78米	钢 筋 混 凝 土	1.3万元左右	水泥80~100立方米，白云石12吨，石膏粉6吨	5月16日动工，7月8日完成泥塑
川沙县	身高6米、底高2米，总高8米	钢 筋 混 凝 土	不详	不详	已递交报告，准备搞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B—244—2—108。

PDG

据统计,其他“准备搞”的高校还有第一医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工业大学、科技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中等学校还有化工学校、轻工业学校、江镇中学等;企业还有上海滚珠轴承厂、有色金属厂、上海工具厂等;郊县还有南汇县。总之,当时全市共有 32 个单位有所行动(含跨行业的“119 工程组”等),且已完成塑像的单位有 4 个,正在建筑中的有 11 个,筹备动工的有 17 个。^[26]

但是,这些数据不是凝固的。一方面,因“贯彻毛主席批示”,故停止或取消工程;二方面,因强调“为毛主席塑像”,故加速或增加工程。例如:经劝阻,华东化工学院对立的两派均已停工;四校联合工程中的体育学院、外语学院尚未开工而取消计划。反之,上海教育学院在中央通知后,不仅建立毛主席塑像工程队,还“开夜班突击”。市革委会政宣组发专文申令“立即将工程停下来”,“在中央未批准前,不应动工”。^[27]只有声势,没有举措,且有“对领袖无限热爱的心情可以理解”的屏障,怎么可能有效地起到“制止”的作用呢!复旦、华东师大、水产学院等正处于进行中的工程,则默默地朝着竣工的目标行进。

7月底,市革委会向各区、县、局、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并特别提示“正在筹建毛主席塑像的单位”正式转发中央“七一三”指示,严肃指出“上海一定要坚决贯彻”,“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时,市革委会又以徐景贤的批示“已建立的,不采取批准手续;未建立的,暂不建立;继续向群众做说服工作”为口径,^[28]向中央发出请示报告。一切似乎都在按照部署平稳地进行,但局面并未发生明显的改观。

9月13日,中共中央追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通知》承认“七一三”指示下达后,“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直接给中央送来报告,要求兴建毛主席大型塑像。目前,有的正在施工,有的积极备料”。《通知》重申“无条件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

并在第三条中作出具体规定：

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毛主席塑像的，严格按照“七·一三”指示办事，由省市领导机关或军管会认真检查，不合格的坚决拆除；“七·一三”指示后计划或动工建造主席塑像的，立即停下来。^[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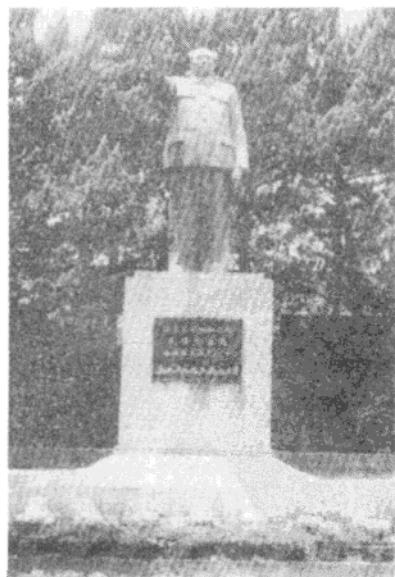
事实证明，恰恰是这第三条规定非但没有成为有效的禁令，反而成为各地继续“兴建毛主席塑像”的借端。其一，因为出现了“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的提法，也就在“未建”、“准备建”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客观上为前者的合理“存在”赢得了辩解的空间。其二，因为要求有关领导部门实行检查，“不合格的坚决拆除”，也就将“建与不建”的问题，演变成了对“像与不像”的裁判。“像”即“合格”；“合格”则不拆。其三，因为规定“七·一三”指示后建造的塑像“停下来”，那么该指示前或计划、或动工的项目，自然也就不必“停下来”了。何况，对指示前后的认定，是很富有伸缩性的。

上海方面的情况可谓例证。据 10 月 22 日市革委会政宣组上交的《关于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的毛主席塑像如何处理的请示报告》称：^[30]“目前已建成毛主席塑像的有十多个单位”（其间，复旦大学的塑像于 8 月 5 日落成；华东师大的塑像于 9 月 15 日落成）。这不仅影响很大，使“原来已经停下来的单位，又继续动工了”（例如华东化工学院），这些单位的有关人员还经常手持中央“七·一三通知”到政宣组来，指着第三条的内容“吵着要政宣组派同志前去审查”，并要求“报销经费”。同时，根据北京市革委会已组织二十多人规模的塑像检查组开展工作的情况，市革委会政宣组认为“我们不过问是不恰当的”，故特此建议由政宣组、群运组、文教组、工业组、经济计划组，并“可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成立上海市毛主席塑像检查



上海交大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该塑像于交大百年校庆时拆除

组。对此，徐景贤作出如下批示：“我们没有责任批准他们报销经费”；“检查只是为了拆除不合格的，这项工作矛盾必大，可暂缓进行”，“如发现有严重歪曲损害主席形象的，可临时组织检查小组专门处理”。^[31]徐的态度是有些迟疑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回避的。半个月后的11月9日，政宣组再次向市革委会报告上海建造毛主席塑像的情况，“目前继续加紧施工的有机械学院、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第一医学院、上海橡胶厂等单位”，“他们相互串连，相互效仿，相互支持”。^[32]同时，有些单位明知中央通知的精神，干脆不作汇报，擅自动工造像。报告特别提及工总司安亭兵团无中生有地宣称“经过市革委会同意，工总司支持”，在嘉定安亭筑建起一座毛主席立像。还有专业单位上海油画雕塑室在“七·一三”指示前，



工总司在上海安亭建造的毛主席塑像(1968年10月1日立)，已拆除

已建成四座3.8米高的毛主席塑像，“目前又擅自建造，虽加制止，效果不大”，甚至还准备向有关单位出售这些塑像。^[33]

那么，为什么“关于毛主席塑像”的禁令一直不通畅呢？

看来，在“为毛主席塑像”的使命面前，人们的情感和精神，正是通过对物质材料的把握和雕塑而倾注于其中、凝聚于其中的；同时，也正是这种充满情感和精神的运作，才使塑像神圣化、光辉化了，以致不仅可与人们的情感产生交流，更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支柱。且用于塑像的物质材料是坚固的，即塑像将成为永驻的、不朽的存在，^[34]这一切怎能不使人们因热爱而执着，因景仰而向往呢！所以，即便有领袖的谕示，有中央的指令，但降临到民间时，民间的理喻和接受，还是产生了偏离、产生了倾斜。

历经了近四十年的风雨，上海的这些毛泽东塑像今安在（80年代后期，称为“全国校园第一座”的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拆除了）？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交通大学的塑像已在百年校庆时拆除了；工总司在嘉定安亭筑建的塑像，因是全国唯一以见证“文革”事件为目的的，也已被拉倒了；同济、复旦、华东师大、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水产学院（现址已归入上海理工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现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和上海机床厂的毛泽东塑像仍屹立在校园（厂区）中。

五、荒诞与失当

综观上海的整个造像运动，其内里的荒诞与失当也是值得记的。

以1967年5月清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为标志，全国兴起了大规模的造像运动。因此时全国的“文革”形势正处于“全面武斗”的

阶段,也就出现了不少同一单位树立起两座塑像的情况。上海市区的“文革”运动基本没有经历“全面武斗”(此课题容后研究),但个别基层单位的派别冲突,围绕着“为毛主席塑像”的重大事权,仍不免乱腾地发生争斗。前述中的华东化工学院两派就曾拉开阵势,企图对峙地塑像(后改筑一尊)。上海中医学院的A、B两派也曾上演过这么一出荒诞剧。当时A派率先于6月21日在校门口贴出筹建毛主席大型塑像的倡议,并敲锣打鼓,报送喜讯。但B派却“不闻不问,没有写出一张喜报和标语”。^[35]第二天上午,A派打电话给B派,请看以下的对话实录。

A派:“想问一下你们对校门口那个特大倡议的看法?”(作者注:竟然不直接说出是为“毛主席塑像”的事宜,可见心态之别扭)

B派:“这个问题——我们很早就提出建议了。所以,你们现在是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A派的传单上有“戳一枪”写道:“恬不知耻,贪天功为己有”——这是当时典型的用语)

A派:“你们的建议?怎么我们都不知道?”

B派:“有好多事情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A派:“为毛主席塑像,我们就是要大喊大叫,打一场人民战争!”(因为主动,便把道理讲得圆满)

B派:“对!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使全院的革命造反派在我们的领导下,共同来筹建毛主席塑像。”(可见要害不在于事情,而在事权)

A派:“我们希望联合起来筹建一座光焰无际的毛主席塑像。如果你们执意同我们分裂,我们建造下去的决心是下定了。”

B派:“那是你们的事。”

通话结束。[36]

6月23日,A派宣布成立了上海中医学院“毛主席大型塑像筹建委员会”,并联合附近工厂的造反队召开了“毛主席塑像开工典礼大会”。与此同时,B派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声明》,强硬指出:A派“想在建造毛主席塑像方面捞稻草,想借此证明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完全是枉费心机的、徒劳的。我们警告你们,你们根本无权建造。我院只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建造此塑像”。^[37]在这派言语中,哪还存在着“为毛主席塑像”的热情和忠诚呢!24日上午,A派去同济大学塑像工地取经。中午回院后即用白粉在大楼中心草坪上划出了塑像筹建区。B派一负责人当即与工人发生争执,并撕扯筹建区的牌子。下午,B派动用高音喇叭集合队伍,再次与工地上的A派发生争吵。以后,待到中央的指示下达了,这所学院的毛主席塑像也就没有建起来。

在此,不仅是记录了“为毛主席塑像”而发生的一段史实,更是为了说明“为毛主席塑像”这般神圣的行为和主题,也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阐释而发生衍变的——以致或者使之悬置起来,变得庞大而不落实,落实的却是派别的需求;或者使之粉饰起来,变得迷离而不真实,真实的却是集团的功利。于是,“为毛主席塑像”的行为和主题,在一片拥护和歌颂中,尽管不失外在的“神圣”,内质里却已经渐渐地被标签化,甚至被工具化了。这是“为毛主席塑像”的荒诞和悲哀。其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荒诞和悲哀都是可以通过这类小孔而窥见的。

“为毛主席塑像”作为一项工程,总要发生原料和资金问题。在政治意义与经济成本的比量中,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和集体认知肯定偏重于前者的,尤其因单位的参与不涉及个人的投入,这种认知更是可以无限量地放大,其所导致的行动更是可以无顾忌地放开。

据市革委会的有关“情况汇总”披露：同济大学、华东师大造像用的各 10 立方米木料和大量钢筋、水泥“都是从国家的仓库里拿出来的”；同济大学所用的 22 吨花岗石是部队送的，不作价计算；“119 工程组”钢研所施工组准备动用的几百公斤镍和铬，是“国家统配的军用物资”。^[38]

与此同时，财务管理也违反纪律，很不规范。许多学校挪用了教学科研经费；上海机床厂将 2 万元塑像费用打入生产成本；“119 工程组”钢研所施工组准备将试制所需的 10 万元算作技术措施费。^[39]部分财会人员一方面害怕，害怕戴上“不热爱毛主席”的帽子；一方面委屈，委屈“一路开绿灯”的失职。有关的中央指示下达后，上海的很多财会人员坚持原则，忠于职守，比如当上海长宁区人民银行了解到“毛主席塑像委员会”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且“实际成本不明”时，便在收到国防科委向“毛主席塑像委员会”汇来 272 300.66 元委托制作的款项后，立即作出“暂不提取”的决定，并数次向有关部门要求“审查该组织的账目”，直至市革委会政宣组正式向市革委会提交报告，建议“审查账目”，撤销“毛主席塑像委员会”。^[40]当然，有时却也造成了较大的误解和冲突，比如机械学院的财务干部拒绝为塑像付款，红卫兵就到处借用，并扬言“全校都同意，就财务科不同意。待像造好了，要揪他们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41]的确，在“毛主席塑像”工程光焰闪耀的背后，存在着一些或灰暗、或混沌的角落。^[42]但在当时为了普天同庆，为了万寿无疆，这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的“正常”呢。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忽然想到相比于徜徉在同济、复旦等校园里，仍可抬头观望的毛主席塑像，那几尊金属的毛主席塑像今在哪儿呢？是被切割回炉了？还是废弃在哪个仓库里？真盼望还它们文物的面目和价值。^[43]

现存上海各校园(厂区)中的毛主席塑像



同济大学中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于1967年7月1日



上海理工大学(原上海机械学院)中的毛主席塑像



上海机床厂中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于1967年7月8日



复旦大学中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于1967年8月5日



上海航空工业学校中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于1968年7月1日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原上海教育学院)中的毛主席塑像



华东理工大学(原华东化工学院)中的毛主席塑像



上海水产大学(原上海水产学院)中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于1971年7月1日



华东师范大学中的毛主席塑像，
落成于 1967 年 9 月 15 日

注 释

[1]《解放日报》1967年6月7日。

[2]上海档案馆,B-244-2-108。

[3]同上。

[4]同上。

[5]《红钢战报》1967年6月14日。

[6]《解放日报》1967年6月7日。

[7]《火线报》1967年5月16日。

[8]上海档案馆,B-244-2-108。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

[12]《新复旦》1967年5月17日。

[13]《东方红》1967年7月1日。

[14]同上。

- [15] 同上。
- [16] 同上。
- [17] 同上。
- [18] 同上。
- [19] 同上。
- [20] 同上。
- [21] 同上。
- [22]《新复旦》1967年5月17日。
-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68页。
- [24]上海档案馆，B—244—2—108。
- [25]同上。
- [26]同上。
- [27]同上。
- [28]同上。
- [29]同上。
- [30]同上。
- [31]同上。
- [32]同上。
- [33]同上。
- [34]据市革委会毛主席著作印刷发行工作办公室1969年12月报告：“文革”开展三年来，全市各单位塑造的毛主席石膏像有21种，近60万座。但是有的创作粗糙，有的形象失真，有的已自然破损。现普陀、黄浦、南市、川沙等革委会都存有群众上交的已破损毛主席石膏像，仅普陀区就有2000多座。为此，特提议由上海标本模型厂回收处理。已破损的纸质、塑面板、印铁的毛主席画像、语录由新华书店回收处理。
- [35]《情况纪实》，上海中医学院红卫兵传单。
- [36]同上。
- [37]同上。
- [38]上海档案馆，B—244—2—108。
- [39]同上。
- [40]同上。
- [41]同上。

- [42] 据《支部生活》1968年第59期,第16页记:1967年11月,华东化工学院“红旗”一派在院内大草坪上筑起了巨型毛主席塑像,并署上了“红旗全体战士和全院革命师生”的字样。结果,对立派“新化工”1 000多人竟然9个月不去大草坪毛主席像前请示、开会。直至1968年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化工学院,经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后,才决定将塑像的署名改为“院革命委员会”,日期定为“1968年8月25日”,即毛泽东发表“工人宣传队永远领导学校”的日期。
- [43] 据《北京青年报》1995年1月报道:1968年由国家航空工业部华安机械厂制作的铝镁合金毛泽东塑像(高2.85米,重1.65吨),已于1993年被位于武汉的毛泽东像章城收购,并正式展出。

附：

来自北京的消息

作者说明：2009年5月12日，我的电脑里出现了一条来自北京的消息，署名“成文军”。成先生说：“三年前我在网上拜读了您撰写的关于上海毛主席塑像的文章，受益匪浅。此后，就上钢三厂铸造的第一尊不锈钢塑像历史，做了更进一步探寻。最近整理出文字稿。文中就‘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等内容，引用了您的文字，不知可妥。”原来，成先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创办城市雕塑公司，近十年来一直关注全国的大型毛主席塑像，“除港澳台外，我在全国范围内找到了近200尊毛主席塑像（其中1970年以前建造的140余尊）。”接着，读了成先生的文字稿后，发现引用我的研究，固然构成“证实和补充”；但成先生文中的一些内容和照片，不也是对我的研究构成“证实和补充”吗？现征得成先生的同意，将其文字稿（删去我的“引文”，并加写标题）刊登如下：

第一尊大型不锈钢毛主席塑像诞生记

成文军

这是中国第一尊大型不锈钢铸造的毛主席塑像，也是中国第一件大型的不锈钢雕塑。

这尊塑像由当时上海的“毛主席塑像委员会”主持制作，1967年9月在上海第三钢铁厂铸钢车间铸造加工完成。现立于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大院中。

塑像创作者为何中令先生。何先生1964年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在沈阳城建局园林处工作。1966年被借调到辽宁省工业展览馆（现辽宁省展览馆）创作，1967年创作了这尊毛主席塑像。2008年和2009年，我在沈阳两次采访了何中令先生。他向我回忆了

当年创作和制作这尊毛主席塑像的前后经历。

20世纪50年代末,雕塑家曲乃述先生为辽宁省工业展览馆前厅制作了一组毛泽东与钢铁、煤炭和纺织工人在一起的群雕。“文革”前夕,有人提出这组塑像已显陈旧,建议重新创作一件相同题材的雕塑以替代之。时任展览馆馆长的苏风首肯了这一建议,随后,便安排职工拆除了这组雕塑。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苏风的这个拆除毛主席塑像的决定招致了厄运,她被冠以破坏领袖光辉形象的罪名,成为沈阳市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子”。具体负责雕塑拆除工作的展览馆雕塑创作干部张玉礼(195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也被扣上了帽子划入另册。

不久,展览馆的造反派们指示张玉礼“戴罪立功”,创作新的毛主席与工人的塑像。由于群雕的工作量大,时间紧迫,张玉礼就将在沈阳城建局园林处的何中令、鲁美雕塑系的易振瀛、庞乃轩和沈阳硅酸盐研究所的李朝中、郭振和等人召集借调到展览馆,组成了创作组。

1967年春,群雕创作组收到了一份从上海发来的征集毛主席塑像的文件,发文的单位是“毛主席塑像委员会”。据何中令先生回忆,文件大致内容是“塑像委员会”向全国六大美术学院以及有雕塑创作能力的机构发出征集毛主席塑像稿,中选的稿子将被制作成大型塑像并安放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文件中还说明了这个决定已经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

正在展览馆制作群雕的几位雕塑家拿着征稿文件一商量,认为能将自己创作的毛主席塑像放置在首都“心脏”的位置,那是无比荣光的事情。为此,他们还提出一个构想,若是稿子被选中,报酬将分文不取,届时只请“毛主席塑像委员会”多复制一尊,放在辽宁省工业展览馆。几位雕塑家的想法,先后得到了展览馆领导以及“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的认同。这样他们停止了原来群雕的创作,集中精力于上

海的创作征集稿。

何中令先生说，他以“四个伟大”为主题，做了一个戴军帽挥手的稿子，庞乃轩和张炳田分别做了两个背手姿态的稿子。他们带着这三个1米高的稿子，以辽宁工业展览馆的名义去了上海。鲁迅美术学院在收到上海的征集塑像稿的文件后也投入了创作，之后学院派田金铎、杨美应和孙家彬三人带着几件稿子也前往上海。

何中令先生述说了到上海后的情况：上海“毛主席塑像委员会”把从全国征集来的55个小稿陈列在一个展厅里。经过评比，何中令先生创作的稿子中选。“毛主席塑像委员会”还将入选的稿件拍了照片，印制成一本小册子，何中令先生的作品被印制在封面上。“毛主席塑像委员会”还要求所有送稿的雕塑家写一篇创作感想，何中令先生至今还记得他写的文章题目是《要塑造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来不得半点“私”字》。

无独有偶，2009年4月，我从北京一处古玩市场的二手书店里，看到了何中令先生提到的这本小册子，并以数百元的价格将这本当年定价只有三毛钱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塑像交流审稿特刊》买下。该《特刊》为16开，正文38页，其中印有26尊塑像的图片。这26尊塑像的创作者署名，均为作者所在单位。这些单位是：广州美术学院（12件）、鲁迅美术学院（5件）、北京建筑雕塑工厂（6件）、上海玉石雕刻厂（1件）以及辽宁工业展览



入选塑像的1米稿印在《特刊》的封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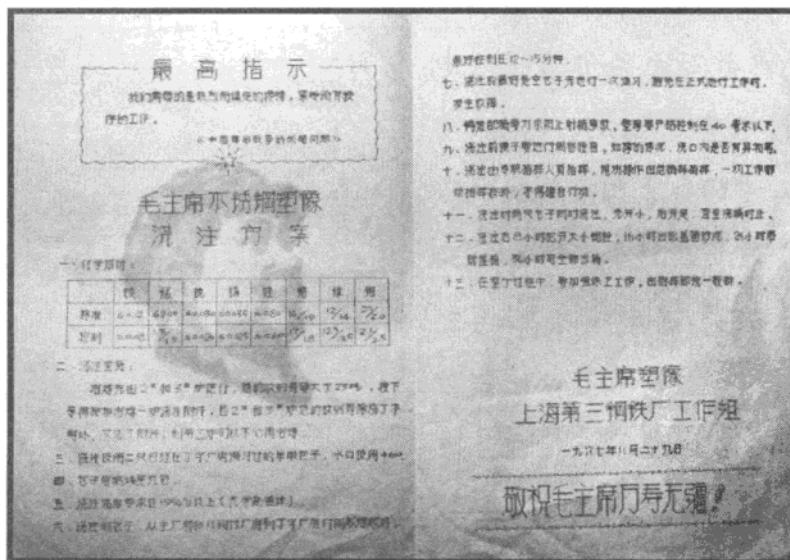
1967年夏，放大泥稿工作现场

馆(3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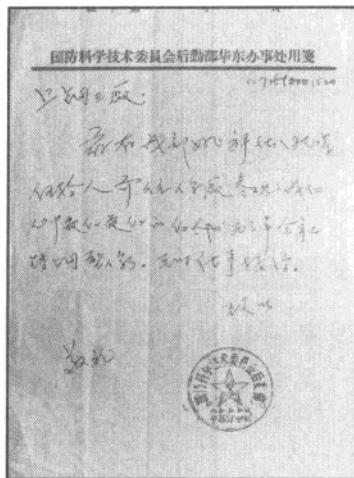
何中令先生的稿子选中后，立即回到沈阳做7.1米的放大稿。为抢时间，他将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的鲁美同学孙大衡也请到沈阳参加雕塑的放大工作。工作的场地还设在省工业展览馆前厅。

在放大的泥稿上翻制出玻璃钢模具后，迅速由沈阳发往上钢三厂。这尊7.1米高的塑像由两炉钢水一次性浇注完成，经过初步的打磨修正后，9月中旬开始接受人们有组织的参观。从我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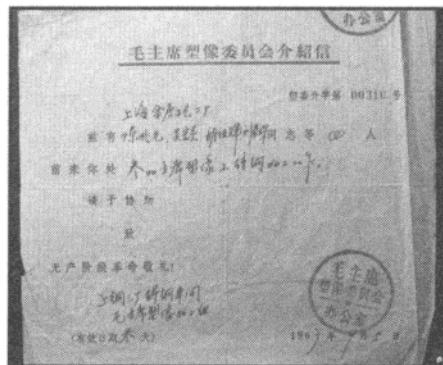
藏的两本由学生练习簿做成的参观留言簿中看，参观人员来自工农商学兵，还有来自兰州、武汉等外地的参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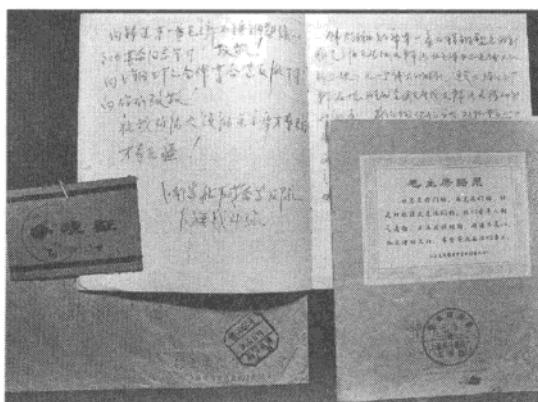
当时，“毛主席塑像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作组”制作了一份8开油印的说明书，向参观者介绍塑像材料的化学成分和生产加工工艺。



这是国防科工委后勤部华东办事处开具的参观证明



此为“毛主席塑像委员会”开出的介绍信，介绍上海金属工艺二厂的4名技术人员，前往上钢三厂参与塑像的打磨修整工作。据何中令先生回忆，上海船厂曾派出数位8级焊工参加焊接工作



此为“毛主席塑像委员会”使用的信封、参观证和留言簿。信封上标明“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的地址是南京西路 612 弄 22 号

该座塑像在接受了数万人参观后，“用棉花包裹再附好外包装，由三厂的运输队拉到码头装船，从海路运到天津港，再由陆路进到北京”。2008年11月，我在上海周家渡上南公园里遇到一位上钢三厂退休工人，他这样向我说。

何中令先生说，运塑像的卡车从天津港直接开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在这里将塑像卸下。



塑像由上海运抵北京

而此时在北京，“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的人，不再提及塑像安装在金水桥前的事了。何先生说他也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是感到上海来的人神情非常沮丧。但他们得到通知，有关部门将安排塑像参加国庆游行。在临近国庆节的一个夜晚，游行队伍进行了彩排，第一辆彩车是国徽，第二辆车就是这尊塑像。周恩来总理观看了这次彩排，但不知为什么，这尊不锈钢的毛主席塑像竟没有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当彩排结束后，周恩来突然又问及塑像的事情，他要求载有塑像的彩车再走一遍让他看。当时，在观看彩排现场的何中令先生

距离周恩来总理很近，他听到周恩来在大声喊“不锈钢、不锈钢”。但是，迟迟没有见塑像彩车出现。事后何先生才知道，由于彩车都已密集地停放，最先停放的塑像彩车被后面的彩车紧紧地围在里面，根本无法移动。

然而，更失望的事情还在后面，有关部门通知“毛主席塑像委员会”，塑像参加国庆游行的安排取消，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塑像重量数十吨，如果汽车抛锚，靠人工推行会很困难。我却认为，车抛锚的因素还是次要的，一尊高达7米又如此重的金属雕塑，若不用绷绳整体捆绑，仅靠在塑像底盘与车厢板连接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侧倾，说不定会连车一起带翻。危及人身安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当然是否还出于其他什么原因而取消塑像游行，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塑像又被运到历史博物馆前卸下。何中令先生说，为了不让毛泽东看到塑像，还特别用几株松柏将塑像挡住。国庆节后，塑像拉到国防科工委安装，何中令和孙家彬以及上海来的工人们又对塑像做了进一步修整。半个多月完工后，他们各分南北。

此后不久，陈伯达被打倒，因而由他首肯成立的“毛主席塑像委员会”也被责令解散，“塑像委员会”给辽宁工业展览馆复制一尊塑像的许诺也成为泡影。然而恰好此时，曾欲到上钢三厂取经学习塑像铸造经验，但吃了闭门羹的齐齐哈尔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厂找到了辽宁省展览馆的塑像创作组，请他们另行提供模具来铸造塑像，并答应多复制一尊送给辽宁展览馆。辽宁工业展览馆的造反派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也汲取了在上海的教训，与一重厂签订了合同。一重厂最终兑现了合同。

何中令先生创作的这尊毛泽东塑像，被许多地方复制。但究竟被复制了多少，连何先生自己也说不清，他说反正那个年代不讲名

利,更不讲版权。在我所看到的塑像中,长沙博物馆、长春电影制片厂、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辽源矿务局,以及通过查阅资料所知已被拆除的大连火车站、长春南湖公园的毛主席塑像都是出自何中令先生创作的这个版本,此外,与这尊塑像姿态和衣纹近似的塑像,现存的不少于 10 尊,如黑龙江省军区、武汉剧院、黄石电厂、新疆喀什人民广场等地的塑像。

一次与何中令先生通电话,我说道:何老师,在全国您的这件作品可能是被复制最多的。何先生听罢笑答道:这都是我干的“坏事”,劳民伤财。当然也不完全是我的错,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第十六章

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一、四类报刊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报刊”，而不是官方(或称“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是力图显明它在缘起上属群众组织或群众创办的报纸。至于为什么不依凭它的性质称为“造反报刊”？那是因为 1967 年 1 月以来，《文汇报》、《解放日报》也已属“造反报刊”系列了。^[1]

1966 年 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简称“上红大专总部”)成立后，随即出版了 4 开铅印报纸《红卫兵》。这是上海“文革”运动中第一张由群众组织主办发行的报纸。^[2]接着，由红革会、红上司主办的《红卫战报》、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主办的《新闻战士》、上三司(红三司)主办的《革命造反报》、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主办的《革命战斗快报》、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以及由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创办的《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新北大》、《红旗》(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主办)等纷纷出笼。从表面上看，这些报纸均属某一组织的出版物，宣传上也多



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创刊号

留有“声明”、“通告”之类的组织印记。其实，这些报纸多是所属组织通过造反行动，获得有关部门的批示后，由解放、文汇、晚报及出版局下属工厂代印的，所以有套红、有照片，字迹清晰，版式正规，有的甚至纳入了邮发的渠道。据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报告：因大量印制革命传单和报纸，出版局于1966年12月供应纸张162吨，1967年1月增加到272吨，所用经费已达38.6万元。^[3]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革命战斗快报》创刊号



上三司《革命造反报》创刊号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新闻战士》创刊号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工人造反报》创刊号

与此同时,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或者利用已建立的权威;或者利用已抢占的校内资源,迅速编辑出版了所属的报纸和刊物。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创刊的主要报刊有同济东方红兵团的《东方红》;交大反到底兵团的《反到底》;复旦红革会的《新复旦》以及《新师大》、《新科大》、《二医战报》等。因大学的资源比较丰厚和齐备,这些报刊多是铅印的,且排版等也都很有模样。只是它们一般不通过邮局订阅,多在校内散发和进行大范围的校际交流,但有时也上街外卖。

如果说《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等市级群众组织的报刊;《东方红》、《反到底》、《新复旦》等高校红卫兵组织的报刊,确因其组织地位



《新复旦》



1967年1月8日,《上海学徒》创刊号

的显要,产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而成为高悬着的舆论风向标。那么,作为“文革”中群众报刊之基础而存在着的,是上百份由区、局系统的造反组织和一般市级组织编发的报刊。例如由工总司海运局联络站主办的《海运战报》;工总司南市总指挥部主办的《火炬报》;由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主办的《上海学徒》;上海聋人文化革命联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一九四九年四月 八河东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红色聋人
《红色聋人》编辑部 上海华山路25号1号
创刊号 1967年4月10日 星期一

1967年4月10日,《红色聋人》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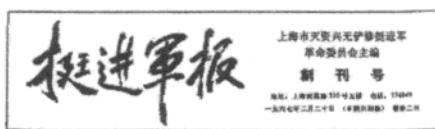
络委员会主办的《红色聋人》等。这些报刊因主办方能掌管或调度一定资源,也都是铅印发行的。同时,这些报纸因主办方规模、能力等诸因素的局限,以及政治形势的错综变化,除少量的报刊品质尚佳外,一般均质量平平,发行不正常,有的甚至只发行了几期就夭折了。至于各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所编发的油印小报,在全市估计有数百份,有的相当精致,有的则不堪入目。但它们确实在底层共同构筑起了上海“文革”群众报刊的基础。

综上所述,上海“文革”运动中存在着三大类报刊:第一类为《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等公开发行的官方报刊,以及后来由市革委会批准出版

的《红小兵报》、《学习与批判》、《朝霞》等；第二类为工总司、红代会等市级群众组织和主要高校的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第三类为各区、局系统和广大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编发的报刊。然而，这种格局在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全国大武斗和全国大批判牵动整个舆论关注起“首长讲话”、“各地消息”、“幕前幕后”的时候，便悄悄地异变出了第四类报刊——由某些人群自发组合编印的“地下报刊”。



1967年2月10日,《红全球战报》创刊号



1967年2月20日,《挺进军报》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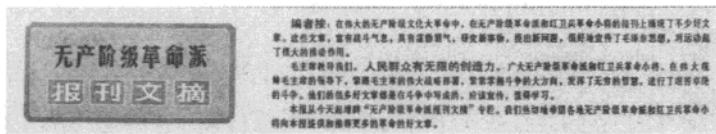
固然，这与整个形势的演变相关。据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称：自4月1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各单位“到市革委会印刷接待站要求印刷批判资料的人日益增多，4月3—12日，共用纸5 114.5令印刷各种小报和宣传、批判资料”。^[4]再据5月10日的报告称：“最近不少单位到政宣组来要求出小报、通讯（所列单位有交大红卫兵师、高校大批判联络站、师院、工学院革委会、上海重型机器厂等），有的差不多天天来，一谈就是几小时，有的不能满足要求就大发雷霆，提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5]正是因为这种大批判的气焰甚嚣尘上，再加上各地大武斗的消息骇人听闻，上海的部分第二类报刊和绝大部分的第三类报刊（包括不断面世的新报刊），均以极大的热情，较大的篇幅搜寻、刊登此类来自四面八方的“小道新闻”，复旦、华师大、上外、铁道学院、体院等院校的“简讯”几乎一天

一期,四个版面也大致固定为“首长讲话”、“中央文件”、“各地消息”、“上海见闻”等。应该承认,这类报刊的消息因为假借了“权威”,通达了“四方”,揭示了“幕后”而赢得了广泛的市场——然而,恰恰又因为这种“市场”的形成和存在,终于催生出了第四类报刊,即“地下报刊”的怪胎。

二、第一类报刊与第二类报刊的沟通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曾针对“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对报纸宣传问题作出有关规定。例如地方报纸应接受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参照《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不许刊载戴高帽子、罚跪的图片和使用“砸烂狗头”、“油炸”的词语等。^[6]其实,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策源地,且《文汇报》、《解放日报》均是上海“夺权”的急先锋,所以上海两报非但不是告诫的对象,还是各地的样板。当时,上海两报的许多社论被中央转载,例如为配合前述中提及的戚本禹的文章,4月2日《文汇报》即发表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人民日报》随即转载,并将题目改为“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7]。

确实,从全国范围看,上海的“文革”运动不仅是超前的,而且是独特的(容后研究)。具体表现在新闻管理方面,在全国按照中央意见开展整肃群众报刊的时候,上海却同时指示《文汇报》、《解放日报》要重视向红卫兵小报学习。1967年8月14日,姚文元还专程从北京写信,再次强调上海两报“要重视广大群众中的新事物,要看红卫兵的报纸”。^[8]于是,报社制订计划,开展了“搜集、阅读、运用革命群众



《文汇报》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文摘”专栏

组织和红卫兵小报的工作”。《解放日报》指定专人与上海的群众报刊联系，并指派 2 人赴京，与北京的群众报刊挂钩；《文汇报》除了对全体采编人员进行动员外，还邀请部分红卫兵报负责人座谈，了解各报的宣传打算，并于 9 月 7 日起增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文摘”的专栏。^[9]

看来，上海方面在某个时段中，是有目的地维护红卫兵类群众报刊的独立位置和发展空间的。因为正是此类报刊代表着某些群众组织的利益和观点，才能时时表现出“革命性”和“造反性”，才能不断地与《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形成互动和互补。这即是说，一方面群众报刊可以显露造反派的锋芒，并给予官方报刊以造反派的鞭策和补苴；二方面官方报刊不便声张的消息（例如查封沪办“12·7、12·8”行动等），则可通过群众报刊进行宣传和报道。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不仅证实当时的第一类报刊和第二类报刊是相互沟通的，确实也是上海“文革”期间新闻管理的重要特色。

三、对第二类报刊的整顿

据 1967 年 4 月 20 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称：目前，全市群众组织出版的报纸有 34 种，已登记未出刊的有 26 种。中央分配给上海的全年纸张总量为 25 930 吨。由于“文革”运动需要印制大量的批判资料和传单，文汇、解放夺权以后发行量增加，估计 5 月份时印制《毛选》的纸张将供应不上，9、10 月份时出

版文汇、解放的新闻纸将断档。为此，政宣组曾召集各群众报刊负责人会议，在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前提下，提出联合办报的思路，具体建议：1. 工人方面办一张《工人造反报》，其他司令部和单位的报纸均取消；2. 中学、大学红代会（筹）各办一张报纸，中学系统各组织的报纸均取消，各大学的报纸作为校刊存在，纸张自己解决；3. 由版司、上艺司、上体司等合办一张文化类的报纸；4. 《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因工作特殊，同意在系统内发行。^[10]

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再次提出《意见》，明确指出工总司所属《工人造反报》（每周二期，大报四版，15万份）、大学红代会（筹）所属《上海红卫兵》（每周一期，大报四版，15万份）、中学红代会（筹）所属报纸（五天一期，小报四版，10万份）、版司等筹办的文化类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10万份）、各大中小学校教师造反组织筹办的一份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万份）以及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等共7份报纸经批准外，其他群众报刊“一定要出版，我们均不负担纸张和安排印刷”。《意见》报请市革委会审批，并要求批转各群众组织和有关单位。^[11]应该承认，这两份文件针对膨胀的群众报刊与紧缩的纸张供应，既摆事实，又讲道理；既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原则，又提出缩减造反报的对策，确实有理有节，煞费苦心。然而，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政宣组的指令并不通畅，以致时时地发出无奈的叹息，例如政宣组在4月20日的《报告》中抱怨：关于联合办报的建议，“由于认识不统一，至今还没有一张报纸联合起来”；^[12]在5月9日的《意见》中坦言：除批准的群众报刊外，一律“由各革命群众组织自己负责”解决出版事宜。^[13]在此，是政宣组的权威失缺呢，还是遭遇到群众组织的挑战？事实上是夺权以后的局势，决定了政宣组站在了社会管理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发出清理和整顿的指令；而各群众组织则站在了小团体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在形式

上继续保持革命造反的姿态，在内质里却坚决维护革命造反的阵地和利益。这种出于不同位置、不同需求的僵持，是需要整个形势发生格局性的转变才能解脱的。

7月初，市革委会政宣组曾对上海的群众报刊作过一次摸底探查，报告的结论是：全市共有各类群众报刊 256 种，铅印发行的报纸 50 多种，刊物 65 种。其中由市印刷接待站承印报纸 25 种，刊物 36 种。^[14]可见，政宣组“压缩”群众报刊的计划，“不承印”群众报刊的表态，均没有得到执行和落实。反倒大量的第三类报刊充斥着、搅动着整个上海的报刊“市场”。确实，第二类群众报刊不压缩，怎么可能阻止第三类群众报刊的滋生呢？政宣组只得借助“上海增产三百万套《毛选》的纸张没有着落”，“供应上海的宜宾、江西造纸厂因内战激烈，已停止生产。福建南平纸厂因运输阻塞，无货来沪”，已影响《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等理由，再次向市革委会申诉“群众组织的报纸、通讯、资料品种繁多，印数很大，重复浪费”，并重提了原先的压缩建议。^[15]然而，尽管当时社会已呼吁“归口联合”、“复课闹革命”，有些系统和单位的革委会也宣布建立（所谓新的“权力机构”），各群众组织的风头有所减弱，基础有所松懈，甚至地位有所摇动，但其构架仍在，活动继续，政宣组的这类申诉和建议仍然不能达到“压缩小报出版”的目的。

1967 年 8 月 4 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强力围剿上柴联司，并迅速翦除社会上的异己势力，隨即便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谋划成立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进一步在全市掀起“九月大联合高潮”，指令工总司各机构限时统一归口。9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主要产业系统和十个区的工人群众，基本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专题报道。其他系统和高校的群众组织也都裹挟在这种趋势中，通过反复而艰难的谈判

宣布联合。例如 9 月 13 日,出版系统的“版司”和“版联”宣布联合;9 月 19 日,复旦、交大的红卫兵组织宣布联合。这种以工总司为主轴的整合各群众组织的运作,在集中权力、增强权势的同时,大大削弱了各群众组织的规模和实力,甚至使之出现了躯壳化的倾向。与此同时,因 5 月 14 日中央发出文件,指出各地群众报刊存在着“反军”、“泄密”、“庸俗低级”等问题,上海也曾采取了检查行动(容后研究)。由此,政宣组“压缩小报出版”的转机,即形势的“格局性转变”终于发生了。

10 月中旬,政宣组向市革委会递交了《关于加强对革命群众组织报刊领导的请示报告》,以果决的口吻指出:“基于前一时期社会上各类小报杂志的出版、发行的混乱状况”,“完全有必要对全市报刊重新作一次全面规划”。其原则为“主办单位必须是市一级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大联合组织,区、县、局机构基本不办报刊”。《报告》提出可办 12 种群众报纸,4 种群众杂志,“其他一律停止”。^[16]

12 月 1 日,市革委会政宣组下达了根据批复后修订的《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宣传品的出版、印刷、发行的若干规定》。除了将《工人造反报》升格为“三报一刊”的系列外,正式同意出版以上所列的 15 种“群众报刊”。同时,《若干规定》强调“市革委会各组和已联合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经常加强对报刊工作的领导”,并为“报刊配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政宣组则负责“对群众组织报刊的政治领导和督促检查工作”。^[17]上海的第二类报刊终于被压缩了,第三类群众报刊更是土崩瓦解。1966 年时的狂放,1967 年时的繁杂,检索 1968 年时的“文革”报刊资料库,除了可见这几张被指定的报刊在飘摇中作着支撑外,其余的均失去了踪影。固然,这是政宣组屡屡努力的结果。其实这更是上海的群众组织渐渐走向式微的表征,是上海的“文革”运动从无政府的“群众造反”,渐渐走向有政府的“组织革命”的佐证。

1968年1月18日,市革委会召开领导成员会议,确认当年上海用纸缺口10738吨,并制定了《文汇报》每天70万份,《解放日报》每天50万份,《工人造反报》每期16.5万份的印数计划。会议重申对小报“必须尽量紧缩和严加控制,不得冲破限额”的意见。^[18]与此同时,市革委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也针对全市9000多个工矿企业中“用公费订阅《工人造反报》的,已达75000份,平均每厂公费订阅7~8份,一年财政支出28.8万元左右。中学红代会也打报告,要求按班级公费订阅《红卫战报》,全市中等学校1802所,约25000个班级,计公费订阅需3万份左右”的情况,提出“各革命群众组织一般订阅本系统编印的小报,并订阅在厂、校一级”,“公费订阅的份数按照单位大小确定,主要用于公共阅览场所的张贴,班组由私人订阅”的意见。^[19]一方面出于政治形势的演变,需要加强组织管理;二方面出于经济形势的逼迫,需要进行资源调控,仅存的十几份群众报刊的阵容,也因种种多变的原因在不断地缩小。例如1月13日,上海铁路局军管会宣布,已编印74期的《铁路工人造反报》停刊;^[20]《教卫战报》也宣布暂停出版。



《教卫战报》

下面请看1968年2月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承接印件日报表(有关群众报刊部分):

印单号	群众组织名称	印件名称	开本	字数	印数	自来纸(令)	代纸(令)
4043	上海农口造反总部	农业战报(20)	4	2万	2万		10
4044	上体司	体育战报(37)	4	2万	3万		15
4045	出版联合指挥部	造反(36)	4	2万	1.5万	8	
4046	中学红代会	红卫战报(16)	4	4万	4.5万		45
4047	上海政法系统	政法战报(21)	4	2万	3万		15
4050	上艺司	文艺战报(43)	4	2万	4.5万		23
4053	教育革命编辑部	教育革命(3)	16	6万	1.7万		35
4054	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大批判(45)	8	1万	2万		5
4061	大专院校红代会	上海红卫兵(9)	4	2万	3.7万		19

说明：已公开发行，但没有列入该份“日报表”的群众报刊还有《财贸战报》、《中小学大批判资料和动态》。

接着，1968年4月25日，由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上海红卫兵》与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主办的《红卫战报》宣布合并，开始从“忠1号”起出版新的《上海红卫战报》，且采编人员也进行了更换。



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
《上海红卫兵》创刊号



红革会、红上司《红卫战报》创刊号

应该承认,这是政宣组整顿群众报刊工作的继续,也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情——它告诉社会,告诉所有已临近分配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的旗号仍将传接下去,但当年“风起云涌,呼唤天下”的身份和威风,已一去不复返了。其间,由红代会主办的《教育革命》也停刊。8月下旬,市革委会有关领导又批示:《财贸战报》停出,由《工人造反报》提供一定的篇幅反映财贸战线的斗争,请政宣组按此原则整理其他小报。^[21]于是,政宣组举办了仅存的十家群众报刊负责人学习班,学习中央二报一刊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流毒在小报中的反映”。同时,政宣组还召开了工人、贫下中农、教师、红小兵等座谈会,听取意见后于9月16日上报了整改方案:《上海红卫战报》、《农业战报》继续出版;《教育革命》、《大批判》、《中小学大批判资料和动态》停刊;《文艺战报》、《体育战报》、《造反》合并后筹办一份反映“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报纸。^[22]通过这次整顿,至1968年底,上海的群众报刊已所余无几了。

1969年4—5月间,《上海红卫战报》和一直在高校里作为校刊发行的《华师大战报》、《复旦战报》等宣布终刊。就此,作为群众报刊起家,而后纳入“三报一刊”系列的《工人造反报》,似是而非地成为唯一的存在了。



《上海红卫战报》

两年以后的1971年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因“上海一地报刊过多,内容重复,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23]4月15日,《工人造反报》发出终刊号,自此,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史画上了句号。

四、对第三类报刊的整肃

那么,面对主要由第三类报刊构成的丛杂的小报(即区、局系统和基层单位群众组织编发的报纸),上海是如何整肃的呢?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意见》肯定了群众报刊在“文革”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指出了现在这类报刊“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改进意见”:1. 一律不许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及中央内部文件;2. 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3. 必须迅速制止群众报刊的泄密现象;4. 着重从政治上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搞“黄色新闻”、“马路新闻”等。^[24]

在此,将中央的《意见》与同期上海的《报告》、《意见》等比照辨析,可发现中央的《意见》主要强调了群众报刊宣传中的失误,所以要进行“改正”;上海方面的文件则着重申明资源紧张,所以要进行“压缩”。那么,是否上海的群众报刊不存在中央《意见》中所指出的“失误”呢?上海从来不是一块净土,只是当时政宣组的着眼点在于压缩第二类群众报刊,而暂缓了对丛生于基层的第三类报刊的整肃。考察上海的群众报刊,中央《意见》指出的“失误”确实广泛、庞杂地存在于第三类报刊中。不久,市革委会政宣组便根据中央《意见》的精神,对各群众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查。

据1967年7月10日政宣组披露的检查情况称:1. 有的报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例如工总司纺织系统翻印的宣传资料中出现了“红太阳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中漏字、漏句。2. 有的报刊擅自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经核实,未经公开发

表的指示、讲话。例如《新上医战报》刊登了“毛主席对批判刘少奇的几点意见”。3. 有的报刊擅自刊登未公开的中央文件。例如同济《东方红》通讯、新上医《红卫兵》通讯等刊登“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等。4. 有的报刊传布各地“揪叛徒”的情况。例如交大《反到底通讯》刊印了“安子文叛徒集团简介”，公布了有关人员的姓名和职务。5. 有的报刊渲染各地武斗的残酷景象。例如《交大通讯》称“西南师范学院策划惨绝人寰的大血案”，“刺刀将两名因伤女战士活活挑死，二百多人高呼‘毛主席万岁’全部跳楼，大多壮烈牺牲”。6. 有的报刊传布政治谣言“为美蒋张目”。例如《文革通讯》称“美国派遣2~3千间谍抵香港，专门窃取我文化大革命情报”；新上医《红卫兵通讯》称“台湾消息：蒋匪一雷达系统设施移至我沿海”。7. 有的报刊编写马路新闻“迎合低级趣味”。例如有“刘亚楼之死”、“陈丕显与雪茄烟”等。^[25]看来，上海的第三类报刊编织各路“小道消息”的渠道和功能，不仅是通畅的，而且是齐备的。政宣组在分析原因时，承认“缺乏对群众报刊工作的领导”；各群众组织负责人没有“认真重视，放任自流”；编辑人员“受资产阶级新闻观影响”，并坦言出现了“同人办报”的情况。^[26]

其实，更为严重的情况是这第三类报刊在不断编造出笼的同时，还因其披露了传言和内幕，充斥着新奇和刺激，以致既符合人们关心运动发展的探求需要，又迎合人们搜罗“齐东野语”的猎奇心态，而不断地流传于社会，最终形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市场。有意的是，5月14日中央《意见》下达后，最先对此作出反应的不是政宣组，也不是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而是正处于被“压缩”中的第二类群众报刊。它们振振有词地发表文章，谴责主要由第三类报刊构成的“小报交易”市场（其间，多少有些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感觉）。下面编辑几段报摘，以求反映当时的交易情况和舆论倾向。

1967年6月1日《赤卫军》文章《狠狠打击交换材料黑市场》：“继取缔纪念章交易的黑市场以后，最近又出现了一股材料交换的歪风。在市区内比较集中的交换场所有好几处。”“在马路上，三五成群，东一堆，西一堆，挤得满满的，连交通都堵塞了。少数坏人还利用人多拥挤，进行偷扒、盗窃、诈骗、流氓阿飞活动。”

1967年7月4日《体育战报》革命群众来信《坚决抵制交换材料这股歪风》：“近来在静安寺、上海美术馆隔壁弄堂等地，我们经常看到聚集着人群，他们带着各种材料、文件、报刊在交换。他们有的拿在手中叫换，有的放在自行车后垫上等换，有的干脆铺在地上摆书摊。他们不仅互相调换，有的甚至做起买卖，最盛行的是一种搭货法。”“交换材料的大多数是青少年。在交换场所中，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从中牟利等种种资产阶级手段都有——有的职工也迷恋于换材料。”该报《编者按》指出：“这次调换材料歪风，比调换纪念章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希望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配合公安部门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取缔交换材料场所，严办投机倒把分子。”

1967年9月20日《工人造反报》赵毛头等造反队员来信《坚决取缔买卖非法印刷品的自由市场》：“近来，在南京路市中心一带，叫卖自编自印的所谓‘动态’、‘消息’、‘资料’等小报小刊的越来越多”，“看到他们席地而坐、沿街叫卖，一些老工人尖锐地说：这‘同旧社会的黄色小报有什么两样呢？这种沿街叫卖的样子就像卖《大美晚报》一样。”该报《短评》指出：“新闻工作是一场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有些同志天真地以为，这样抄抄写写，搞这么一份小报刊，就是在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贡献’，殊不知正好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还有些组织搞一份小报小刊，据说是为了赚一些钱，解决一些组织经费。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在你的头脑里找到了‘根据地’。”

1967年9月21日《上海红卫兵》读者来信《立刻制止买卖“小道消息”！》：“最近一个时期，在南京路等地，每天有一堆一堆卖小报的人，从早到晚，风雨无阻，热闹非常，真可谓成了买卖小报的市场”，“小报出售的价钱很贵，这些小报的大小只有晚报的一半，照理只应收一分，可一般都要收二分一份。”该报《编者按》指出：这些“小道消息违背大方向，混淆革命群众的阶级视线，有的则不知不觉当了阶级敌人、美蒋特务的情报员，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很明显，1967年第二季度以来，上海的小报“交易市场”就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且以南京路为“主轴”——从浙江路到西藏路，再从美术馆到静安寺进行运转，并放射到四周的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闸北区、徐汇区等热闹地段。其实，当时不少群众小报的编辑部埋伏在南昌路、威海路、瑞金二路、石门二路、陕西北路等附近的路段里，消息来源通达，发行流通便捷，具有很强的运作功能和机动性，以致这类小报“交易市场”始终显得很活跃。

然而，在此可存有一疑问：明明5月14日，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为什么直至9月份，《工人造反报》、《上海红卫兵》仍在反映“南京路市中心一带”，小报交易市场“风雨无阻，非常热闹”？诚然，正如政宣组在前述的检查中承认存在着“缺乏对群众报刊工作的领导”等因素，但更本质的原因应该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天下大乱”（全国许多地方表现为“全面武斗”）的时期，各级各类群众组织通过造反夺权，确立了生存的“合法性”后，还得通过继续造反及与其他组织的角逐，来争夺生存的空间和位置。于是，便不断地需要向社会表达态度和立场，不断地需要采择各种有利的社会信息来渲染和涂抹自身，编印群众报刊之类无疑是重要的手段。所以，当中央《意见》自上而下传达时，各群众组织就

会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辨析和阐释，继而有针对性地接受和采纳。这种传达和接受的过程，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理解和执行，实际上却是一种选择和博弈——在选择中，自上而下的《意见》一定程度地发生了分解；在博弈中，自上而下的《意见》一定程度地发生了变异——由此，5月14日的《意见》下达后，怎么可能会获得“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正如政宣组“压缩”第二类报刊，有待于9月份整个形势发生了“格局性”转变，才得以奏效。政宣组整肃第三类报刊，也必须等待“8·4”行动后的“九月大联合高潮”，客观上削弱着各级各类群众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时，才可能采取行动。

1967年9月11日，张春桥指示整肃上海小报、印刷品交易的混乱状况。第二天，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即对所属基层厂下发“紧急通知”，宣布“未经市政宣组印刷接待站或本部同意，不得擅自承印各群众组织、各单位的印件”，并一律严禁印制“动态、简讯、通讯等一类小报”和“描述武斗，有死伤、打砸等照片的内战传单”。政宣组也通过《简报》反映情况，积极筹划整肃行动。9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禁止非法印刷、设摊买卖宣传品的通告》。《通告》严厉指出：最近本市街头出现的各种简讯、动态、资料等“种类繁多，问题很大”，“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转移斗争大方向”，“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危害”。故特此规定：简讯、动态、资料、传单等宣传品，“一律停止出版，进行整顿和清理”；经批准同意出版的刊物，“严禁私自在街头设摊贩卖和进行非法交换活动”；利用简讯等宣传品造谣惑众、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严加惩处”等。^[27]与此同时，政宣组和工总司等群众组织也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印刷宣传品的暂行规定》和《紧急声明》，连同市革委会的《通告》一起张贴在大街上，各主要街道上的有线广播和游动的宣传车则开足马力，大造声势，构成了强力的整

肃态势。

9月23日晚，在政宣组的部署下，黄浦区出动了由区革委会干部、市场管理所干部、中小学教师、中学红卫兵等三百多人组成的突击检查队（注意：这支队伍的身份构成已不同于“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了），对南京路闹市地段（从浙江路到西藏路）的小报“交易市场”进行了冲击，当场取缔交易摊头30个，没收全部交易品24个种类，其中有上海文艺界音舞批联站编印的《音舞简讯》第8期（刊登中央文件）；红反会和各省驻沪办事处联络站合编的《文革通讯》第92期（刊登首长讲话），以及外地刊物《常州红卫兵》第13期、《浙江通讯》第8期（刊登武斗和部队调动等消息）等。交易人则经教育后当场释放。在这次试点性的行动中，检查队与红三司所设的摊头发生争执。当时，红三司正设摊叫卖《反逆流战报》，并强调该报是经市革委会同意出版的。后经检查队“讲清道理”，才“勉强同意”将报刊留下（后发还）。^[28]

9月24日下午，全市十个区采取统一行动（卢湾区上午已开始），共出动由干部、教师、红卫兵等组成的1500多人规模的检查队，在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外滩、静安寺、北站、曹家渡、徐家汇、中山公园等处，取缔小报“交易市场”。据统计，当天共清除交易摊点55个。因联合行动“声势强大”，这次“取缔贩卖宣传品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29]只发生了三四起争执事件。其中有同济东方红兵团在曹家渡等地出售《东方红》报，市场管理干部和红卫兵上前检查时，他们竟出示了王少庸（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朱锡琪（时任市革委会政宣组负责人）签名同意印制的信件。检查人判断“他们是有意携带这份信件的”。^[30]后经反复宣传《通告》内容“严禁私自在街头设摊贩卖”，他们才同意留下报刊（后发还）。同时，23日晚遭查处的红三司又派出几个小组在闹市地区叫卖《反逆流战报》，并与检查队发生冲突。据

了解,红三司尚有 10 万份报纸未脱手,他们着急地在沿街吆喝:“要买《反逆流战报》,请到吴江路 54 号!”^[31]

应该承认,9月 23—24 日行动摧枯拉朽般地整肃了第三类报刊,其过程不仅是顺利的,其结果也是富有成效的。诚然,这与形势变化和政宣组策划的行动周密而有力相关,第三类报刊一般没有厚实的组织支撑(有的确属“乌合之众”)则应属根本的缺陷。否则,怎么行动中仅有的几次争执都是发生在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组织之间呢?这反证了只有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倚仗着自身的组织背景,才敢于面对整肃行动作出类似“抵制”(甚至存在“故意”的倾向)的行为。属于第三类报刊的组织者和编辑者,只能作鸟兽散了。

为了巩固 9 月 23—24 日行动的成果,市政宣组联合市财务监督清理小组、市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分别于 11 月 14 日、12 月 1 日发出了《关于处理停止出版的宣传品和非法宣传品若干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关于禁止非法印刷、设摊买卖宣传品的若干实施细则》。这两个文件主要强调各群众报刊停刊后,“应立即清点账目、财产,主动报所在区(县)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进行清理”;^[32]“对存放在仓库或加工单位的成品、半成品、原料、纸型、铜版、锌版、模子等,进行收缴封存,或就地封存”。^[33]应该承认,这两个追加的属善后性质的文件是及时而有力的,比如对由交大反到底兵团主办的《反到底》报(属第二类报刊)派生出的《反到底通讯》(属第三类报刊)进行清理,发现该小报共发行 55 期,均在校内外出售,收入 49 987.19 元,加印收入 1 696.42 元,总计 51 683.61 元。但总支出为 54 257.03 元,银行存款及现金结余共 811.19 元,显然与账目不符。支付款项中存在问题的有赠送纪念章 400 元;未发“兵团成立一周年”纪念章万枚共 800 元;为同学购买戏票暂借款(估计不能收回);兵团驻北京、汉口、宁波联络站报销的经费(全部白条)等。同

时,交大反到底兵团还有印售《马恩列斯语录》、《成语典故》等其他收入。^[34]情况明了,收缴措施到位,《反到底通讯》只能寿终正寝。经济的清点、用具的封存均属最后的围击,正是这致命的一招,终于使那些被整肃的群众报刊再也不能动作,再也不能复生。

进入 1968 年,第三类报刊确实无影无踪了。

五、对第四类报刊的查处

第四类报刊属“地下报刊”。这主要是有一些非组织,或非正式组织的人群,既借助上游庞杂的小报信息;又利用下游猎奇的群众心态,经过摘编包装,拼凑成一份“报刊文摘”,以赢利为目标,混迹于“小报交易”市场。

现在请看当时遭到查处的三个案例。

案例一：1966 年 12 月,上海市东风中学高二(六)班某学生发起成立“东风造反兵团”,后吸收卢湾、力进、二十二等中学的少量学生,改称“红卫兵上海市东风造反兵团”杀向社会。兵团规模 18 人(后退出 6 人),总部设于瑞金二路金谷村 14 号。1967 年 2 月,兵团获得市印四厂免费铅印的 20 万份《毛主席和其他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材料。向社会散发 1 千份左右后,其余以 2 分或 3 分一份出卖,所得大量款项留作兵团经费(当即购买了两辆自行车。后又增添两用自行车)。就此,该兵团即组织人员搜罗材料,编印铅字版《文革通讯》,每周 2 期,每期 2 万份,每份售价 2 分,雇用 2 百多名小学生到淮海路、南京路、陕西路等闹市地段叫卖。除厂方扣除成本外,每期收入达 100~200 元。同时,该兵团还联合红卫印刷厂大量印售《毛主席诗词》、《炮打刘少奇》等材料。为

追求利润,该兵团还翻印“群丑图”等漫画,翻印剧本《清宫秘史》时,特意加印故事梗概和演员表,均以高价在校内外广泛出售。该兵团人手一张公交月票,白天游公园、拍照片;晚上学开车,经常上点心店,先是阳春面,以后是汤团、馄饨、蛋糕,手头十分宽裕。为了建立社会联系,该兵团经常请印刷厂青年工人吃饭,互赠像章。6月份,上体司曾派人登门检查,该兵团准备集体撤离上海,到杭州寻求发展。^[35]

案例二:1967年7月底,上海染料七厂半工半读学校两学生(一人曾少教)纠集人员,占据武康路113号巴金家中的小客厅,成立了《前锋通讯》编辑部(刊物所登地址为武康路213号,实际上武康路上没这个门牌,后经有关部门向邮局查询,才知该编辑部设在巴金家中)。8月下旬,《前锋通讯》出版第一期,至9月中旬,共出正刊4期和副刊1期。每期《前锋通讯》均在第一版抄摘来路不明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最高指示”,并整版刊登各地武斗的消息,有的栏目直接叫“枪林弹雨”,例如第一期刊印12条新疆武斗的内容,特别渲染了上海支疆青年的遭遇。该刊还十分注意“部队动态”,例如第二期报道“广州白云机场的空军已取消休假,珠江舰队已调往虎门”等。《前锋通讯》每期印数2~3万份,纸张在上海购买,然后运往浙江平湖、海宁印刷。小报每期定价2分,除在上海出卖外,还分销浙江杭州、绍兴、海宁和江苏苏州等地。《前锋通讯》编辑部共有20多人,多数为青年学生,多数参与上街兜售。每次上街兜售时,除车票可实报外,还有每人每餐4角的误餐补贴。为此,市政宣组建议市政法指挥部出面取缔,对为首分子进行审查。^[36]

案例三:1967年9月,卢湾区二十二中一代课教师和育才中学一学生借助为红革会中学部编辑《红革会中学文革通讯》的机会,发现市场上文摘小报销路好、利润高,便着手编印《红卫兵快讯》。《红卫兵快讯》为八开小报,印数2万,只发行了2期,大部分内容为“首

长讲话”、“各地动态”；消息来源主要是转摘其他小报和抄摘内部资料。小报委托浙江海宁印刷厂印刷，纸张则是开白头发票从海宁红三司处购买。编辑部有2位老师和10多个同学帮助发行。9月24日，政宣组派人对《红卫兵快讯》进行了清理，编辑人员承认办小报“可获得较高的利润，可用这部分资金开展基层活动”。经审查，《红卫兵快讯》编辑人员无政治问题，费用支出控制较严，开支较合理，故予以结案。^[37]

由三案例可知：当时的“地下报刊”多发生在市中心的中学生群体中，一则因为“小报交易”市场多分布在闹市地段，耳濡目染，近水楼台，必然引发附近中学生的参与冲动；二则因为当时有不少中学生回避学校的“斗批改”运动而游荡在社会上。无所事事时可逍遥，适逢其会时即可披上“革命小将”的衣装参与行事；三则因为中学生的身份不太起眼，不太容易被追究，也就提供了蹦跶的空间；四则因为中学生大多不知天高地厚，也就胆敢为谋利而涉足此类非法交易。当然，这不是说大学生群体、工人群体中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9·23—9·24”行动中，静安区就查获国毛七厂一造反队委，假借首都红代会简报组名义编发《“文革”简报》，获利1300多元。卢湾区查获一人，以“战地黄花编辑部”名义，编印《砸烂裴多菲俱乐部》出售，涉嫌投机倒把活动），^[38]而是表现得不如中学生群体那么集中、那么彻底，或者说所办小报并不具备典型的“地下报刊”的特征。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地下报刊”呢？

确实，所谓“地下报刊”的内容、版式等，跟各级群众组织编发的注重“小道消息”的第三类报刊如出一辙，并无二致。如果说这是两类报刊的“共同点”的话，那么之所以能从第三类报刊中分蘖出第四类的“地下报刊”，或者说这两类报刊的“差异点”正在于：一、前者终

究是有组织背景和组织依托的,后者则属自发的组合,或假借一个无系统归属的组织;二、前者有的(时)出售,有的(时)发送,后者则全部出售;三、前者的目的一般多为筹款,收入多用于组织活动,后者的目的一般多为创收,收入多用于自身享受。比如前述中提及的《反到底通讯》,尽管清理中账目不符,但它在组织体系上隶属于交大反到底兵团,印售小报的全部收入归入兵团,由兵团统一掌控、统一使用,就不能认定为“地下报刊”。反之,文中案例一、二中的小报,既没有组织归属,又将所得钱款收入囊中,应为典型的“地下报刊”。案例三则假借红革会中学部,虽也赢利,但管理严格,不为私人受用,也就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入“地下报刊”之列。由此可见,当同时满足以上三项条件时,“地下报刊”的指认就成立了。

显然,“地下报刊”之所以能够出世,是源于对利润的发现和追逐。首先,有人能够发现“小报交易”中不仅存在着利润的空间,还存在着获利的可能——原来小报是可以抄摘拼凑的,纸张印刷是可以买卖的,印成的小报是可以兜售的——从“小报交易”中来,再回到“小报交易”中去,利润就实现了。应该承认,这种发现是通过对市场的透彻观察、对机会的敏捷把握才达到的,其中既有商业的意识,又有取巧的心机,还不失狡黠的判断和决策。在这方面,上海人确实先天地多了一份灵光和聪慧,“地下报刊”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交易”中不会是一种偶然^[39]。

至于有人追逐,那是利润的诱惑——尽管口号正在呼喊,革命正在进行,但对更广大、更普通的人群来说,商品仍在交换,生活仍在继续。所以,与其说利润的诱惑是炫目的,不如说是原初的和现实的。有人为此产生追逐的冲动和胆力,那就是不顾一切地投身进去,并进行强力运作。应该承认,这部分“地下报刊”的经营者是有相当能量的,从编辑到发行,从上海到外地,构筑起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创利的

网络。相比之下,当时大学红代会主办的《上海红卫兵》等不少第二类报刊都是亏本运作的(每期印发 9 万份,实际收入 2 700 元,印刷费、发行费支出 2 640 元,余 50 元,加上赠送和交换的份数,就出现亏本)。在此,联想到案例一中受利润驱动的《文革通讯》竟“雇用 2 百多名小学生到淮海路、南京路、陕西路等闹市地段叫卖”的情景,是承认这构成了对《上海红卫兵》报的嘲讽呢,还是承认这些“地下报刊”的主办者确实富有魄力和钻营精神? 只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指向了为“我”的赢利,而不断地被政宣组的文件指认为“非法”——然而,需要明示的是:恰恰是正在开展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毁坏了国家的根本大法,才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孕育“非法”的温床——这应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本章梳理了上海“文革”运动期间“群众报刊”的演变史,除了为上海新闻史补缺,更为了通过推开“群众报刊”这扇独特的窗口,观察当时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至于“文革”期间“群众报刊”的版式、内容、语言、文风等,则属未来的研究。

注 释

- [1] 1967 年 1 月 3 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并于次日刊登《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社,《文汇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1 月 5 日,《解放日报》造反派宣布夺权。1 月 8 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指出:“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文新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第 388—390 页。
- [2] 1966 年 12 月,“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被红革会等造反组织查封,《红卫兵》报停刊。
- [3]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给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建议》。

- [4] 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7期称:特别是10—12日三天内,前来要求印刷的人络绎不绝。印刷资料的有959批,品种有《刘邓一百例》、《炮打刘少奇》1—3集、《砸烂刘家王朝》1—6集、《刘少奇档案处理》、批判《论修养》、《陶铸罪行录》等40多种,共547 863份,用纸1 706令。印刷小报和大会专刊9种,共38万份,用纸277.5令。
- [5] 1967年5月1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报告《最近要求印刷报刊、刊物的情况急增,急需设法解决》。
- [6] 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1页。
- [7] 文新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第394页。
- [8] 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06期。
- [9] 同上。
- [10] 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 [11] 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
- [12] 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 [13] 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
- [14] 1967年7月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 [15] 同上。
- [16] 12种报纸为《工人造反报》、《财贸战报》、《教卫战报》、《体育战报》、《上海红卫兵》、《红卫战报》,属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及文艺(文化、电影)、出版、科技、政法系统各办一份。4种杂志为《教育革命》(大专院校)、《红卫东》(团市委)及普教、文化(电影、出版)系统各办一份。后市革委会分管领导王承龙作出批复时指出,《工人造反报》属“三报一刊”之内。
- [17] 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36—41页。
- [18]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沪革(68)第13号。
- [19] 1968年1月23日,市革委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关于基层单位革命群众组织订阅各种小报的请示报告》。
- [20] 《上海铁路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上海铁路史志资料卡68—2—1。
- [21] 1968年8月28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整理本市小报、小刊的请示报告》(初稿)。
- [22] 1968年9月1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整顿小报、小刊的请示报告》。
- [23] 《支部生活》1971年4月16日第15期,第2—3页。
- [24] 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4—6页。

- [25] 1967年7月1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41期《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 [26] 同上。
- [27] 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17—21页。
- [28] 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
- [29] 同上。
- [30] 同上。
- [31] 同上。
- [32] 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32—35页。
- [33] 同上,第42—46页。
- [34] 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清理交大书刊的情况报告》。
- [35] 1967年6月28日,市革委会文教卫生组编,《文教卫生简报》第55期。
- [36] 1967年9月15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编,《政宣简报》第109期。
- [37] 1967年10月21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编,《政宣简报》增刊第26期。
- [38] 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编,《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
- [39] 本文曾入选2006年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当笔者在分会场报告后,北师大郑师渠教授回应说:当年,曾作为北京红卫兵的一员到上海,也曾在上海办过红卫兵小报,在北站等街头叫卖。但从未想到如何动用所收到的钱款,而是全部寄回了北京总部。中国社科院汪朝光研究员回应说:当年,曾在南京编过小报,但从未想到可以到街头上去卖钱。

附表：**表一****上海“文革”运动中主要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1	红卫兵	上红大专总部、上红总部	1966.9	上海人民广场观礼台大楼	294425	1966年12月，因所属组织被红革会等查封，报纸即停刊
2	红卫战报	红革会、红上司	1966.10.17	圆明园路169号311室。第42期后地址为东湖路17号	378587	“1·28”炮打后由红上司主持。总第42期时始称“红1号”。曾出过两个第43期。后归口中学红代会。邮发
3	造反有理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6.11	乌鲁木齐中路166弄10号	371461	
4	革命战斗快报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1966.12.6			
5	红旗战报	大专院校红卫兵红旗造反司令部	1966.12.8			
6	毛泽东主义战报	红东北	1966.12.13	东体育会路119弄27号。富民路210弄8号	663101 378743	
7	革命造反报	上三司(红三司)	1966.12.15	延安西路399号	921850	
8	文艺战士	上海革命文艺战士联合造反总部	1966.12.17	巨鹿路675号	375450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9	新闻战士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6. 12. 26			
10	工学运动	上海炮司	1966. 12. 26	巨鹿路 691 号		
11	工人造反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6. 12. 28	创刊于巨鹿路 691 号。第 5 期后地址中山东一路 14 号。第 46 期后地址汉口路 274 号。第 53 期后地址圆明园路 50 号		1967 年 2 月公开零售。8 月邮发。按中共上海市委 1971 年 4 月 9 日决定，该报于同年 4 月 15 日终刊。共出 445 期
12	红医战报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6. 12. 28	瑞金二路 207 号	375056	
13	文艺战报 (风雷激)	上艺司	1966. 12. 28	南京西路 325 号		1967 年 9 月 2 日第 26 期邮发。1968 年 9 月停刊
14	井冈山战报	红卫兵上海中专技校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 1. 5			
15	上海学徒	上海市学徒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 1. 8	淮海中路 1974 号	561942	
16	体育战报	上海体育在线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 1. 13	南京西路 150 号		第 40 期邮发。1969 年 5 月停刊
17	红卫军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	1967. 1. 16			
18	小教造反报	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7. 1. 20	永嘉路 750 号	371272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19	战到底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1967.1.27			
20	沪农造反	上海农口革命造反总部	1967.1	延安西路 28 号,后在蒲西路 166 号	563050-449	
21	上海公社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	1967.2.1	威海卫路 727 弄 15 号。第 2 期至愚园路 579 弄 40 号	925337	
22	狂飙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三兵团	1967.2.2			
23	文艺造反报	上海市文艺兵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工人业余作者)	1967.2.5	巨鹿路 675 号。第三期起为上海工人文化宫(西藏中路 120 号 528 室)	291282	1967 年 4 月 29 日第五期后宣布休刊。定价 0.02 元
24	赤卫军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赤革会)	1967.2.6	南京西路 519 弄 110 号	531702 532825	定价 0.02 元
25	公安战报	公革会	1967.2.6			
26	红工战报	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2.6	乌鲁木齐中路 9 弄 11 号		
27	战到底	上海革命归侨造反委员会	1967.2.9			
28	华东聋人战报	华东聋人文 化 革 命 委 员 会	1967.2.10	皋兰路 25 弄 1 号		
29	财贸战士	上海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	1967.2.18	华山路 370 号	563050-446	第六期起改为《财贸战报》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30	教工造反报	工总司教工市联络站	1967.2.28	陕西南路 105 弄 8 号	372234	
31	财贸造反报	工总司直属财贸总部	1967.2.28			
32	中教造反报	上海市中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7.3.1	五原路 73 号	375657	
33	反逆流	大专院校反逆流委员会	1967.3.12	交大革命三楼 324	370147 - 222	
34	中学运动	红中技、红西南、红东北	1967.3.15	富民路 210 弄 3 号	374007	
35	大会会刊	联合版编辑部	1967.3.17	汉口路 274 号	211914	0.04 元
36	红医兵团	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总部	1967.3.27	宁波路 120 弄 22 号。第 2 期后至多稼路 1 号	210955 770381	
37	红联通讯	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委会	1967.4	陕西北路 500 号	566940	
38	上海红卫兵	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	1967.5.1	陕西北路 500 号。总 21 期 (红 1 号) 后在四川中路 49 号; 总 29 期后在中山东一路 29 号	219817	邮发。按市革委会教卫组指示, 因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停止工作, 1967 年 9 月 29 日宣布停刊
39	教育革命	上海市大专院校教育革命联络站《教育革命》编辑部	1967.5.31	华师大物理楼 116 室	548461 - 238 370117	1967 年 11 月 15 日第 8 期起迁至淮海中路 1517 号。由新华书店发行, 1968 年 9 月停刊
40	大批判通讯	上海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1967.6.12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281586 289837	邮发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41	新闻批判	上海新闻批判联络站	1967.6.24	圆明园路 50 号	217307	定价 1 角
42	上海科技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上海科技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1967.6.25	南昌路 47 号	282140 - 8	
43	教卫战报	上海教卫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7.1	石门二路 134 弄 9 号	531077	邮发
44	红卫兵战地	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大批判组	1967.8.6	汾阳路 92 号	375835	0.04 元
45	反逆流战报	红三司、财革会等	1967.8.7	江西中路 349 号 306 室	210107 538294	1967 年 9 月 6 日 迁至吴江路 54 号
46	红革会通讯	红革会大批判联络站动态组	1967.9.16			
47	上海红革会	红革会大批判大联合联络站	1967.9.18			
48	电影战线	上海市革命电影工作委员会、上艺司电影分部	1967.9.27	淮海中路 796 号	372154	上海报刊发行处 发行。邮发。 0.20 元
49	上海红卫战报	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上海中学学校红代会	1968.4.25 (忠 1 号)	东湖路 17 号	378587 530619	由《红卫战报》与 《上海红卫兵》合 并。邮发。定价 0.04 元。1969 年 5 月停刊
50	文革通讯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新华印刷厂《红旗》战斗队		长乐路 560 号， 泰兴路 445 弄 26 号	372345 531631	第 36 期起，与北 京大学红卫兵站 上海兵团合作； 第 45 期起，与工 总司徐汇区联络 站合作；第 52 期 起，红反会自办； 第 71 期起，与《新 北大》驻沪办事处合作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51	政法战线	上海政法界 斗批改联络站		华东政法学院 八一楼。第 12 期 成都北路 360 号。第 13 期 江西中路 170 号 309 室	922249 - 40 532355 215380 - 575 212570 - 575	1968 年 4 月 10 日第 32、33 合刊 后宣布停刊。 (0.04 元)
52	财贸战报	财革会		南京西路 612 弄 15 号。第 23 期后地址江 西中路 349 号 306 室	537041 210107	1968 年 8 月停 刊。邮发
53	教育革命	市红代会 《教育革命》 编辑部		陕西北路 500 号	531337	
54	农业战报	上海农口革 命造反总部		华山路 370 号	563050 - 348	
55	毛泽东思想 宣传小分队	上海市革命 群众文艺 小组		江西中路 200 号	218916	
56	红代会战报	上海中专中 技半工半读 红代会筹		陕西北路 500 号	563567	
57	造反	上海出版系 统造反联合 指挥部		绍兴路 7 号，后 迁往 5 号	379489	新华书店发行， 第 48 期后邮发。 1968 年 9 月第 60 期后停刊
58	中小学大 批判的资 料和动态	上海市教育 局东方红 公社		铜仁路 333 号	564792	第 23 期后移铜仁 路 257 号。邮发

表二

上海“文革”运动中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铅印版)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1	红色造反报	第二军医大学红纵	1966. 10			在北京创刊
2	红交大	上海交大文革筹委会	1966. 12. 20			
3	东方红	同济东方红兵团	1966. 12. 26			
4	铁道战报	铁道学院红革会、赤革会	1967. 1. 1			
5	反到底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交大反到底兵团	1967. 1. 8			定价 0.02 元
6	新科大	红卫兵科大革命委员会	1967. 1. 8			
7	新复旦	复旦红革会	1967. 1. 10	4—208		前身为《红色造反报》。先油印，后铅印
8	新师大	新师大公社	1967. 1. 17	办公楼 213 室	548461—191	
9	二医战报	二医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1967. 1. 19	口腔研究所	288760—92	后二医革委会办
10	复旦工人	复旦大学革命造反大队	1967. 1. 20			
11	红色风暴	二军大红色工人造反队	1967. 1			
12	交大造反报	交大革命造反指挥部	1967. 1			
13	革命造反	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交大革命造反团	1967. 2. 10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14	新化工	华东化工学院红联会	1967.3.1			
15	东方红	同济东方红总部材料组	1967.3.28			
16	红复旦	红代会(筹) 新复旦师	1967.4.10	6—127		
17	反到底通讯	交大反到底兵团	1967.4	交大革命三楼 217室	370147— 408	
18	大破大立	复旦《大破大立》编辑部,后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	1967.5.7	复旦 0363 信箱。 复旦学生会、复旦新村 213 幢 7 号	618510—	与《新复旦》并 刊,不定期
19	文艺战线	市红代会(筹)、市文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	1967.5	华山路 630 号 戏剧学院内	923434— 15	
20	交大通讯	交大红卫兵师(筹)联络组、工总司水产联络站	1967.6.16	中山东一路 18 号 4 楼、交大革命三楼 102 室 (发行)	217952 370147— 404	
21	反修战士	上外《反修战士》编辑部	1967.7.23	上外 110 信箱	660251— 93	
22	工学运动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科大联络站	1967.7.25	科大	950932— 187	
23	文革简讯	上海工学院东方红兵团、市印六厂造反大队	1967.7	冶金楼 224 室	660271— 56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24	文革风云	红卫兵上海工学院革委会、上海机修总厂造反兵团	1967.8.1	延长路 149 号 工学院 3 号楼 203 室、宁国路 379 号	660271 - 99 452680 - 46	
25	反修	上海反修战线联络总部	1967.8.8	上外 190 信箱	660231 - 102	
26	指点江山	复旦《指点江山》编辑部	1967.8.10	复旦 0465 信箱	618510 - 44	
27	文革动态	交大红卫兵通讯社、上海市红医兵团	1967.8.10	交大造反楼 29 号	370147 - 265	
28	反到底 朝阳通讯	交大反到底兵团朝阳通讯社、上海公交造反总队	1967.8.19	交大基础部四舍 405 室。第四期在图书馆 3 楼	921905 - 17 921905 - 14	
29	红旗	华东化工学院红旗总部 战上海纵队	1967.8.20	康平路 152 弄 17 号	373538	
30	雷达哨通讯	上海新师院、新半师 红革会动态组	1967.8.26			
31	红旗文革资料	上海财经学院东方红兵团	1967.8.31		376753	定价 4 分
32	新复旦文选	红卫兵新复旦师	1967.9.4			
33	红卫兵	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	1967.8	四川中路 270 号	214923	
34	文革动向	上海财经学院接管临时委员会、《新财经》	1967.9.5	中山北一路 369 号	663086 - 22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35	文革快讯	上海工学院 红革会第二 动态组、新 科大革命造 反司令部、 工总司公交 汽车一场造 反大队	1967.9.5	延长路 149 号 工学院 3 号楼 203 室	660271 - 99	
36	新复旦快报	上海红卫兵 新复旦师	1967.9.6			
37	反到底简讯	交大反到底 东风五七公 社、工总司 公交公司联 合委员会	1967.9.6	交大南二楼。 发行：延安东 路 34 号 5 楼	211200	
38	文革风雷	上海科大红 色造反团、 版司新华印 刷厂造反 大队	1967.9.10	科大红色造反 楼 304 室	950932 - 140	
39	新交大通讯	上海交大教 联 站、联 反会	1967.9.13	交大革命三楼 325 室		
40	新师大战报	华师大革委 会、红代会 新师大师	1967.9.15	办公楼 214 室		1969 年 5 月 2 日 第 129 期为告 别刊
41	东方红	同济《东方 红》材料组	1967.9.17			
42	斗批改通讯	上海二医斗 批改联络站	1967.9.18			
43	大批判简报	新科大、新 纺专红革会	1967.9.18			
44	复旦战报	复 岛 8.18 红卫兵师	1967.9.25			1969 年 5 月 7 日 终刊
45	新师院	新 师 院 红 革会	1967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46	教育革命	华师大革委会、新师大师	1968.1.1	新力斋 104 室	548461-184	
47	新交大	上海交通大学革委会	1968.4.1			
48	东方红通讯	华东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兵团		华纺教研大楼 218 室 150 信箱	922849-59	
49	情况交流	红卫兵新复旦师				
50	大批判	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大批判联络站		同济胜利楼 228 室	455290-232	定价 1 角
51	新财经	上海财经学院接管临时委员会		中山北一路 369 号	663086-22	定价 2 分
52	通讯简报	红代会(筹)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				第 71 期后改为《革命楼通讯》
53	井冈红旗	铁道学院井冈山兵团				
54	新上医战报	一医红卫兵师、革委会			567260-43	先油印, 第十二期后铅印
55	新工大	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		九江路 41 号	216656	定价 0.02 元
56	教育革命	同济教育革命组		胜利楼 206	455290-344	
57	火线报	红代会机械学院革造会		造反楼 324 室		
58	上海师院	上海师院革委会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59	战斗报	水产学院革命造反总部				
60	红色造反者	科大红色造反团、红卫兵上海科大红三司				
61	交大红卫兵	交大红卫兵师(筹)				
62	化工战报	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师				
63	新贸院	外贸学院革命造反总部		古北路 620 号	938181 - 4	
64	政法革命	华东政法学院编辑部		办公楼 218 室	922249 - 48	
65	新上医	上海一医革命到底委员会、东方红红卫兵反逆流联络站				
66	上海高校	上海市大专院校大批判联络站		四川中路 49 号 110 室	218291	
67	卫东快报	华东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兵团、红革会司令部		华纺 36 信箱	922849	
68	新上工通讯	上海工学院红革会第一动态组、赤革会联络组				
69	长缨在手	师院《雷达哨》编辑部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70	五湖四海	交大红卫兵师(筹)对外办公室				
71	文史哲批判	华师大革委会、红卫兵新师大师		中文系斗批改办公室	548461-110	
72	红卫兵通讯	上海一医红卫兵通讯社		7号楼 107 室	567260-139	
73	井冈山	师院、半工半读师院				
74	新师大通讯	红代会筹新师大联络组				1967.9.28 停刊
75	红旗通讯	华东化工学院红师(筹) 红旗总部			389061-404	
76	文革通讯	《外贸战报》编辑部、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				
77	文革简讯	财经学院新四军、赤卫军				
78	文革简讯	上海科大红色造反团		造反楼 304 室	950932-140	
79	文革资料	红卫兵新中医团、上海中医学院斗批改联络站		零陵路 530 号	372632	
80	文艺传单	市红代会(筹)、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				
81	外语曙光	上海外国语学院		183 信箱		

表三

上海“文革”运动中各系统、单位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铅印版)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1	出版战线	出版系统红卫兵、赤卫队	1966. 12. 24	绍兴路 54 号	378586
2	水产造反报	工总司水产联合兵团	1966. 12. 26		
3	风雷激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	1967. 1. 4		
4	风雷	市教育局直属系统造反联络站	1967. 1. 5	永福路 123 号	377093
5	江南造反报	工总司江南造船厂队部	1967. 1. 15		
6	复课闹革命	上海市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 1. 17	淮海中路 1285—43	368511
7	工学战线	印刷二厂造反队、同济东方红兵团工学联络处	1967. 1. 19	许昌路 5 号	456820-25
8	文革简讯 黄浦江	上海《黄浦江》编辑部、财革会粮食局革委会、炮司	1967. 1. 23	南京东路东海大楼 565 室	293401
9	执勤战报	上海市执勤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 1. 27		
10	文教战线	红革会校友兵团、教革会等	1967. 1. 30	永福路 123 号	
11	海员造反报	工总司海运局造反大队	1967. 1		
12	红钢战报	工总司上钢三厂直属兵团	1967. 1		
13	职教战报	上海市职工业余学校教师革命委员会	1967. 1	重庆南路 205 弄 62 号。第十期起为同弄 11 号。第十三期起为同弄 10 号	280415 定价 0.03 元
14	邮电造反报	工总司邮电总指挥部	1967. 1	四川北路 61 号	240300 定价 0.02 元
15	火炬报	工总司南市总指挥部	1967. 2. 1	中华路金家坊 81 号	
16	起宏图	工总司静安区分部	1967. 2. 1	陕西北路 457 号	
17	农民造反报	上海市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 2. 4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18	野战报	工总司野战兵团	1967.2.6		
19	看今朝画刊	工总司美术战线联络站、上海市美术公司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2.7	上海延安西路238号	924102
20	红全球战报	上海红全球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2.10		
21	红色无产者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教卫系统总队	1967.2.16	南昌路209弄3号	372257
22	机电造反报	工总司机电一局联络站	1967.2.19		
23	机电战报	一机部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2.19	永嘉路630号	378588
24	挺进军报	上海兴无灭资铲修挺进军	1967.2.20	南昌路310号5楼	374049
25	革命报	上海文艺体育红卫兵联合战线军部	1967.2.23		
26	黄浦造反报	工总司黄浦区联络站	1967.2		
27	红色工人	上海市卢湾区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2	复兴中路587弄7号	371805
28	红画兵	工总司教工市联络站	1967.2		
29	红画笔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红画笔》战斗团	1967.3.6		
30	造反军战报	上海革命学徒总司令部	1967.3.12	南昌路102弄8号	285991
31	红卫东	团市委机关红卫兵造反兵团、上海批团联络站	1967.3.22	岳阳路45号。第11期至陕南路5号	370020 374837
32	红峰通讯	工总司虹口区联络站	1967.3.25	武进路250弄1号	
33	红峰	工总司虹口区指挥部、上体司虹口区指挥部	1967.3.28		
34	红接战报	红色接班人革命委员会	1967.3	天宝路534号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35	海运战报	工总司海运局联络站	1967.3	广东路 20 号	219600 - 151
36	大破大立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红旗兵团	1967.3	安福路 284 号	372636
37	工学战线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工总司物资战线联络总站	1967.3		
38	动态活页		1967.4.5	邯郸路 440 号	618820
39	红色聋人	聋人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	1967.4.10	皋兰路 25 弄 1 号	
40	文艺简讯	市文化局“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1967.4.14 (9.29 停刊)	巨鹿路 709 号	378290
41	在险峰通讯	市教育局设备服务处(第 26 期起标示)	1967.4.20	河南中路 130 号	217980 214904
42	风雷激资料		1967.4.20	绍兴路 7 号	377194
43	看今朝	工总司教工、出版系统联络站	1967.4.26	陕西南路 105 弄 8 号	372234
44	中学文革通讯	《上海公社》编辑部	1967.4.28	愚园路 579 弄 40 号	925337
45	工学潮	《工学潮》编辑部	1967.4.30	上海戏剧学院 306 信箱	
46	美术通讯	上海轻工学校《反修画笔》、上海美协机关革命造反兵团	1967.4	邯郸路 440 号	
47	红大刀画刊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工总司物资联络总站	1967.4		
48	新上海通讯(旬刊)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工总司化工总部	1967.5.15	威海卫路 12 弄 20 号 四川中路 110 号 25 室	565298 215530 - 29
49	东方红战报	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	1967.5.15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话
50	驱虎豹	工总司杨浦区联络总站、文化革命经验交流站	1967.5.26	齐齐哈尔路 921 号	453317
51	半工半读消息	上海人民公社红卫兵半工半读红色造反委员会	1967.5	陕西北路 188 号	539021
52	纺织动态	工总司纺织系统联络总站	1967.6.1	中山东一路 24 号 121 室	371118
53	文革简讯	财革会《财贸战报》编辑部	1967.6.12	南京西路 612 弄 15 号	562375
54	简报	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工总司科研系统联络站	1967.6.16		
55	文革动态	红卫兵上海市半工半读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上海教育学院红联合会战上教五四战斗团	1967.6.23	沪南：漕溪北路 45 号 沪中：西藏北路 381 号 沪北：中山北一路 420 号	393641 295511 287622
56	上海“五·七”杂志	革新复旦师、赤革会、上海市中等学校、中专中技红代会(筹)等	1967.6.29	淮海中路 1285 弄 44 号	
57	民办中学大批判资料	上海市“民办”中学斗批改联络站	1967.6	黄陂北路 195 号	562472
58	半工半读斗批改	市中学红代会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筹委会教育路线斗批改联络站	1967.6	铜仁路 333 号	531892
59	美术战线	上海美术界批黑线联络站、上艺司美术战线指挥部	1967.6	延安中路 567 号	374169 378024
60	教育革命	上海育才中学《教育革命》编辑部	1967.6	育才中学内	
61	斗批改通讯	上海轻工业学校八一〇红卫兵	1967.6	邯郸路 440 号	618820
62	惊雷	工总司半工半读联络总站	1967.7.1	陕西南路 105 弄 5 号	376081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话
63	批判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斗批改联络站	1967.7.1	复旦中文系	
64	红卫兵团	黄浦区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处	1967.7.1	福州路 539 号东二楼	293105
65	音舞简讯	上海市文艺界音乐舞蹈批判联络站	1967.7.6	延安西路 238 号。 发行处南京西路 612 弄 59 号	
66	陆海空战报	上体司陆海空军团斗批改联络站	1967.7.7	北京东路 239 号	219862
67	南汇造反报	南汇革命造反派临时联合指挥部	1967.7.8		
68	红卫兵通讯	红西南、嘉定县红代会(筹)	1967.7.13	汾阳路 92 号	375835
69	满天红通讯	上海半工半读学校教工革命委员会	1967.7.13	威海卫路 727 弄 21 号, 发行南京西路 769 弄 8 号	539941
70	建工战报	工总司建工系统革命联络站	1967.7.17	宛平南路 75 号	372093
71	国际红旗	上海外事战线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1967.7.20	巨鹿路 845 弄 1 号	373201
72	东方红报	上柴东方红总部、东方红工学革命造反团	1967.7.20		
73	外事战线大批判	上海国际关系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1967.7.20	巨鹿路 845 弄 1 号	373201 372858
74	斗批改	上体司陆海空斗批改联络站	1967.7.25	北京东路 239 号	219862
75	浦江风云	浦江风云通讯社	1967.7.25	威海卫路 48 号	562851
76	春来报	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	1967.7.27	中山东一路 18 号 106 室	
77	大批判通讯	工总司嘉定地区总指挥部、科大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7		531263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址	电话
78	简报	红卫兵上海半工半读革命委员会	1967.7		
79	动态	工总司普陀区分部	1967.7	武宁路 51 号 1 号楼	533056
80	科研战线	工总司科研系统联络站	1967.7	永嘉路 590 号	377520
81	长缨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筹)	1967.7	绍兴路 5 号。后长乐路 207 号	370399 370670
82	外贸战报		1967.7	圆明园路 169 号 514 室	210630 电挂 0062
83	房地战线	上海市房地系统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筹)、华东化工学院红旗总部战房地纵队	1967.7		
84	海区动态	工总司北方区局联络站、交大反到底战海区纵队	1967.7	东大名路 378 号	455200-227
85	评弹战报	上海评弹界斗批联络站、工总司上海树脂厂 32111 造反大队	1967.7	南京西路 834 弄 1 号	563480
86	机关文化革命 (内部阅读)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1967.7		
87	从头越	上海半工半读印刷学校中华分校	1967.7	澳门路 477 号	567316-45
88	点火简讯	《点火简讯》编辑部	1967.8.5	威海卫路 48 号	
89	上海文革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市西中学总部	1967.8.7		
90	科影简讯	科教毒草影片批判组	1967.8.10	复兴中路 1315 弄 44 号	
91	红一月通讯	上海红一月通讯编辑部	1967.8.19		
92	红旗漫卷	工总司杨浦区联合指挥部	1967.8.20	平凉路 818 号	456450-134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93	红卫战刊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	1967.8.22	威海路 12 弄 44 号	530588
94	工学通讯	工总司 7029 联络站、上海工学院东方红兵团	1967.8.23		
95	绿色电波	工总司邮电系统联络站 《邮电造反报》、上海晚报 《千钧棒》	1967.8.23	四川北路 61 号	240300
96	追穷寇简讯	红西南上海化工局第二技工学校	1967.8.24	皋兰路 13 号 2 楼	371532
97	新上海	红卫兵上海中专技校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8.25	淮海中路 1288 号	
98	通讯简报合刊	上海半工(农)半读红反会、上丝六厂造反有理红卫兵	1967.8.26	康定路 1007 号	924379
99	文革通讯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一八革命造反军上海市总司令部	1967.8.26	22 中	379482
100	黄浦通讯	黄浦通讯编辑组	1967.8.26		534583
101	市政批判	工总司市政组大批判联络站	1967.8.28	青海路 100 号	
102	文革消息	各部、各省驻沪办事处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	1967.8.29	汉口路 110 号 307 室	211180-130
103	辞海批判	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	1967.8	陕西北路 457 号	565270
104	财贸斗批改通讯	上海财贸系统斗批改联络站	1967.8	天津路 2 号	217249
105	前锋通讯	上海前锋通讯编辑部	1967.8	武康路 213 号(实为 113 号巴金家中)	
106	资料	轻工系统司令部战上海红艺兵	1967.9.1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话
107	东方红通讯	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第一委员会、东方红工学革命造反团	1967.9.2	陕西南路 488 弄 1 号	371935
108	中学交流	上海中学运动串联会	1967.9.3	交大附中、南洋模范中学	
109	军内文革通讯	驻沪三军院校、科研设计、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7.9.4		
110	文革简报	工总司崇明联络站农垦联络组	1967.9.5	西藏路 632 号 5 楼、崇明南门港工总司崇联站	
111	卢湾区大批判	卢湾区革委会大批判宣传组、各系统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组	1967.9.5	复兴中路 532 号	378551
112	首都通讯	《首都通讯》编辑部	1967.9.6	平凉路 2049 号	431000-28
113	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编辑部	1967.9.6		
114	科教电影战报	上海市科技界大批判联合委员会工农兵电影制片厂《红旗公社》	1967.9.7	斜土路 2567 号，复兴中路 1315 弄 44 号	389121-123 375379
115	教育批判通讯	上海市中小学教育批判联络站	1967.9.8	永福路 123 号	377190
116	红色公安	上海市各区县公安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红卫兵市公安学校革委会等	1967.9.8		
117	电影东方红 原名《电影东方红通讯》	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毒草影片筹备组、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革委会	1967.9.9 1967.9.23	漕溪北路 595 号	380504
118	红卫兵快讯	红革会《中学文革通讯》编辑部	1967.9.10	威海卫路 727 弄 6 号	
119	工司卫通讯	工总司卫生系统联络总站	1967.9.12		
120	战地黄花	《战地黄花》编辑部	1967.9.14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址	电话
121	情况交流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静安区司令部	1967.9.15	上海七一中学红上司 209 室	
122	长缨通讯	红代会(筹)大批判联络站、工总司版联革命出版社造反队	1967.9.15	瑞金二路 272 号	374706 372338
123	文革消息	《文革消息》编辑部	1967.9.15	淮海中路 1285 弄 39、44 号	378536
124	观察家	上外《文革简讯》编辑部	1967.9.15	建国西路 56 弄 31 号	
125	动态简报	工总司基础公司联络站	1967.9.17		
126	反帝怒潮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9.17	中山东一路 23 号	266782 217466-23
127	新航校	航空工业学校《新航校》编辑部	1967.9.17	航校南大楼 303 室	455090-82
128	文革简讯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崇明联络站	1967.9	崇明供电所 105 室	298298-245
129	通讯简报	上海半工(农)半读红反会	1967.9	康定路 1007 号	924399
130	动态	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总部、上海轻工业学院火线指挥部	1967.9	宁波路 476 号	290316
131	儿童文学战线	少年儿童出版社惊雷大批判纵队	1967.9	延安西路 1538 号	924315 921712
132	史学批判	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	1967.9	漕溪北路 40 号	393762
133	红缨枪	上海文艺批黑线联合站美术分站	1967.9		
134	千钧棒	工总司上海晚报革命造反指挥部	1967.11.7	圆明园路 50 号	217307
135	外事批判	上海外事战线、国际关系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1967.11	巨鹿路 845 弄 1 号	371801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136	上海交通报	《上海交通报》编辑部	1968.1.20	上海邮电大厦 311 室	246097
137	红印兵	上海中华印刷厂革命造反队总部	1968.7.10		
138	新科研	工总司科研系统联络站	(1967.9.30 停刊)	永嘉路 590 号	377520 375385
139	中学通讯	《上海公社》编辑部通讯组		愚园路 579 弄 40 号	925337
140	争朝夕	上海市中专、中技、半工半读学校教工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南京西路 1522 弄 4 号	531847 (0.02 元)
141	设计系统革 命造反报	上海市设计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		北京东路 130 号	211719
142	房产工人	上海房地局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		淮海路 469 号	283504
143	红旗战报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革命造反兵团			(0.02 元)
144	拼刺刀通讯	上海科技学校新革会、红三司			
145	燎原周刊	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兵团		宜川路 400 号(甘泉中学内)教南 303	660437
146	新师院附中	上海师院附中炮打司令部联络站			
147	音乐舞 蹈专辑	上海合唱团《东方红》、《红旗》、《一反到底》；上海实验歌剧院革命造反指挥部；工总司东方红印刷厂工人革命造反队		黄浦路 20 号	245224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148	工农兵电影	上艺司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红旗公社》		斜土路 2567 号	389121-380 389121-469
149	工业系统大批判通讯	上海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批判联络站		南京西路 591 弄 126 号	533672 536062
150	大批判资料选编	内刊反修兵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151	文化革命资料	上海文化革命资料联合编辑部			375816
152	美术批判资料	上海美术界大批判资料编辑部		汾阳路 150 号(上海中国画院)	372265 373805
153	火线战报	上海青浦县反复辟指挥部			
154	红卫兵	上海市红代会(中等)纺织系统联络站		中山东一路 24 号	211820
155	红色校对	上海出版系统校对斗批改筹备小组		中华印刷厂三楼	567316-34
156	沪农战报	上海农口革命造反总部		华山路 241 弄 7 号	563050-466
157	斗罗专刊	上海地区斗争罗瑞卿联络站		淮海中路 1285 弄 39 号	
158	新嘉定	嘉定工司、农司		嘉定城中	950897
159	消息汇编	红造会《半工半读消息》编辑部		南京西路 612 弄 29 号	
160	前卫战报	上海公安局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161	反逆流简讯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中学部直属兵团		上海外岗工业学校	959656-766
162	革命参考文献	上海东方红编辑部		上海 5049 信箱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址	电话
163	文学风雷	上海作家协会		巨鹿路 675 号	375450
164	上海公安	上海公安局消革会、义革会等		河南中路 280 号	
165	农垦造反者	工总司农垦系统联合总部			
166	文化革命通讯	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红西南徐汇区指挥部		太原路 317 号	
167	文革通讯报导	红卫兵上海市东风造反兵团		瑞金二路 132 弄 14 号	369885
168	争朝夕	宝山县革命造反联办			
169	批联动专刊	工总司造纸联络分站、红反一会		陕西南路 488 弄 1 号	371935
170	代代红	工总司教工市联络站		常熟路 113 弄 11 号	372202
171	新上音	上海音乐舞蹈系统大批判联络站		汾阳路 20 号上音反修楼	371389
172	警雷	上海轻工业学校反修画笔		邯郸路 440 号教育大楼 127	
173	造反快报	工总司南市区总指挥部			
174	工农兵美术	工农兵美术工作者联合兵团		巨鹿路 314 号	565016
175	工学通讯	工总司化工系统革命造反总部			
176	《点火》月刊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印刷分部、工总司点火文学社		延庆路 149 号	372529
177	工人文艺	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		永嘉路 389 号、汾阳路 112 弄 2 号、愚园路 483 弄 22	370699
178	邮电大批判简讯	工总司邮电系统总联络站大批判联络站		北苏州路 230 号	240069 - 203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179	无产者报	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			
180	斗批改通讯	工总司教工市联络站		陕西南路 105 弄 8 号	372234
181	红卫兵通讯	红西南第一动态组		汾阳路 92 号	370841
182	中学文 革通讯	红革会斗批改联络站、红 西南徐汇区分部		愚园路 579 弄 40 号	925337
183	冶金通讯	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 总站		江西中路 181 号 502 室	772149
184	铁路工人 造反报	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		上海铁路局内	
185	交通战报	工总司交通局系统联 络站			
186	上柴东 方红报	上柴东方红			
187	文艺革命	文艺革命社出版		巨鹿路 675 号	375450 (邮发 0.20 元)
188	革命造 反通讯	工总司普陀区分部		安远路 188 弄 18 号	534021
189	外贸通讯	工总司外贸指挥部		中山东一路 18 号、 27 号 526 室。发 行: 31 号 3 楼	216773 217350- 16
190	文革简讯	上海(半)红造会杨浦区 联络站		怀德路 260 号	454429
191	文革消息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浦东 联络站		海运学院	840040
192	快讯	红卫兵新华东化工学院 师(筹)、工总司化工联络 站化肥农药分部			
193	房地战报	房地产战线工人革命造 反联合总司令部		淮海中路 469 号 5 楼 77 号	282706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址	电话
194	海涛通讯	工总司海运系统大批判联络站、华东化工学院红旗总部		东大名路 378 号北方区海运管理局东楼 302 室	455200 455455
195	大批判专刊	上海师院附中炮司联络站、上海 1127 通讯组			
196	北海战报	工总司北方区局联络站、交大反到底战海区纵队		东大名路 378 号	455200 - 227
197	新海区通讯	北方海区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东大名路 378 号	455200 - 227
198	联司战报	上柴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199	版代会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筹)			
200	教卫通讯	上海市卫生系统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大专院校大批判等			
201	海员战报	《海员战报》编辑部			
202	闵行(简讯)	工总司闵行联络站		闵行 1 号路 291 弄 3 号	356341
203	纺织战讯	上海纺织工业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		中山东一路 24 号	215879 - 134
204	农村科技小报	上海市科协		南昌路 47 号	282040 - 36
205	动态	工总司虹口区总联络站、上体司虹口区司令部、化工学院红旗兵团		梅陇路 130 号	389061
206	动态通讯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总革委会			
207	动态报	工总司办公室			
208	动态	工总司卢湾区教工大队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209	动态	红反会上海轻工学校八一〇红卫兵		邯郸路 440 号	618631-30
210	动态	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		上海 252 信箱、南昌路 272 弄 14 号、威海卫路 420 号	
211	征腐恶	红三司成都中学联络站、版司新华印刷厂造反大队			
212	云水怒 红造会通讯	上海人民公社红卫兵半工半读红色造反委员会		陕 西 北 路 188 号 2 楼	539021
213	简报	上海科技单位革命造反司令部			
214	文革动态	红卫兵上海市半工半读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		襄 阳 路 北 55 号 云 南 中 路 373 号 西 藏 中 路 381 号 来信及资料共和新路 3101 号	295511 291485
215	教育革命	教革会		淮 海 中 路 1285-43-45 号	370248
216	农业教 育革命	上海市属农校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农业学校		华 山 路 241 弄 7 号	377923
217	红卫通讯	红卫兵上海市半工(农)半读革命造反委员会		威 海 卫 路 727 弄 19 号	563590
218	黄浦造 反简报	工总司黄浦区联络站、黄浦区财贸系统联络站		南 京 东 路 486 弄 11 号	294611 290484
219	科技造反报 (原《科技大批判》)	上海市科技单位革命造反司令部		南 昌 路 47 号	282140 (0.14 元)
220	险峰简讯	工总司华东物质局指挥部		南 京 东 路 66 号	
221	爱卫战报	市爱国卫生运动第一线指挥部		汉 口 路 193 号 145 室	212382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222	激扬文字	上海京剧院无产者联战队		绍兴路 9 号	375983
223	激扬文字	市文化局机关卫东联合战斗兵团		巨鹿路 709 号	378290
224	越剧战报	上海越剧院八一公社		复兴西路 10 弄 16 号	378422
225	情况交流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宝山县指挥部		江湾中学 第 14 期 起设第二发行处南 京东路 233 号大楼 底层(周 4、5 值班)	661331 211180— 149
226	工学简报	工学简报编辑部		成都北路 262 弄 15 号	566637
227	红卫兵通讯	嘉定县红代会(筹)		嘉定城厢镇南大街 321 号	950335
228	东方红通讯	红卫兵上海化工学校第三司令部			
229	文革动态	上海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总部		宁波路 120 弄 22 号	210955
230	红旗通讯	首都红代会北外红旗编辑部、红卫兵上海纺织工专平型关军团		长宁路 1187 号	925275
231	革命文艺			武宁一村 15 号 208 室	
232	技术革命(原《技术交流》)			江西中路 181 号 2 楼 康定路 359 号	217316 564010
233	海港战报				

表四

上海“文革”运动中外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在沪主办的报刊(铅印版)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1	红旗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	1967.1.1	广元路 160 号	374654	
2	首都红卫兵(上海版)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1967.1.1			1967.3.6 停刊
3	红色造反报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1967.1.6 创刊。1967.9.1 复刊	延安西路 28 号。第四期起地址为巨鹿路 687 弄 8 号	530281 377383	2月28日 停刊 (0.02元)
4	风雷激通讯	北航红旗、西安军事电讯学院文革临委会、天津大学“八一三”、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1.7	绍兴路 7 号	377194	
5	新北大评论	新北大驻沪联络站	1967.1.17			
6	东方红报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沪联络站	1967.1.22			
7	人大红卫兵	人大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1967.1.29			
8	新军电(上海版)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1967.2.1	威海卫路 910 弄 99 号	536079	
9	劲松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1967.2.7			
10	“八一三”红卫兵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1967.2.8	交大东风楼 206 室	371721	1967 年 9 月 8 日,与航空工业学校红三司合作复刊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11	新上海	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纵队	1967.2.13	交大向阳楼 400	370147- 209	
12	八·一八战报	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战斗团驻沪联络站	1967.2.15			
13	红旗	北京矿院革命到底公社驻沪联络站	1967.2.20			
14	井冈山报	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	1967.2			
15	电影风雷(上海版)	首都批判毒草电影联络站、上海工总司出版系统联络站	1967.6.26			
16	文革简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上海记者站简报组	1967.6	东湖路 56 弄 53 号		
17	首都红卫兵通讯	首都中学红代会上海通讯组	1967.7.21			
18	文革通讯	上海《外贸战报》、半工半读工业大学红卫兵师、首都红代会外贸学院新东方公社驻沪办事处	1967.7.29	圆明园路 169 号 513 室	210630	电报挂号 0062
19	新疆通讯	新疆红二司赴沪学习调查团、上海航务东方红新疆问题联络站	1967.8.12			
20	苏南火线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沪联络站	1967.8.18	华师大数学馆 216 室。 第 4 期为重 庆南路 205 弄 19 号	548461- 233	
21	新疆文革	兵团文革联络站誓与王恩茂血战到底大会战上海战区、红卫兵上海新师大战新疆兵团	1967.8.23	巨鹿路 695 弄 8 号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22	战苏南	上海《科技战报》编辑部	1967.8.25			
23	在险峰通讯	江苏无锡主力军、红代会驻沪六三〇联络站	1967.8.31			
24	湖南通讯	湖南工联、湘江风雷、井冈山驻沪联合兵团、上海高校支湘联络站	1967.8	交大革三楼 314室		
25	红卫兵师	首都红代会外贸学院新东方红公社驻沪办事处	1967.8	圆明园路 169号 514室	210630	电报挂号 0062
26	新疆风暴	红反一会、打倒王恩茂新疆驻沪火线指挥部、南汇县红代会(筹)	1967.9.1			0.02元
27	石市狂人	石家庄红二司河北师大东方红公社赴沪宣传组	1967.9.1			
28	新疆惊雷		1967.9.3			
29	揪刘火线专刊	首都红代会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上海图书馆革命造反兵团、交大反到底兵团等	1967.9.4	余姚路 698号	924689 370147- 503	后移至交 大反修楼 203室 (0.03元)
30	红卫兵通讯	苏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新轻工学校革委会支苏兵团	1967.9.4			
31	北斗星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华东调查组	1967.9.5			
32	苏州火线	苏州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办事处	1967.9.5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33	革命到底 (上海版)	安徽省淮南炮轰派 《革命到底》(上海 版)编辑部	1967.9.13			
34	新八一通讯	首都红代会建工新 八一战斗团、工总司 高桥化工厂造反队、 上海财经学院东 方红	1967.9.16	南京西路 1 号 213 室 浦东桂家村	291083 618346- 227	
35	大江南北	江苏省驻沪办事处 革命造反联络站	1967.9.16	中山东一路 29 号 204 室	216363- 6	
36	无锡曙光	无锡市无产阶级革 命派赴沪指挥部	1967.9.17			
37	东方红	同济东方红兵团延 安通讯社、工总司水 泥厂全无敌通讯社	1967.9.17			
38	长征大批 判通讯	《版司》印刷分部大 批判组、首都红代会 清华井冈山 924 部队	1967.9.18			
39	全国通讯	无锡主力军《苏南快 讯》编辑部、上海市 红代会化工筹委会 动态组	1967.9.19	南昌路 203 号一号信箱	371245	
40	红色通讯	河南二七公社新乡 八一八赴沪宣传组、 上海革命青年造反 军普陀区军部	1967.9.19	上海市大专 院校支左委 员会、工总司 上海纸盒印 刷厂革命造 反队		
41	东方红战报	首都红代会北京工 业学院、地质学院赴 沪教改组	1967.9.22			
42	红色通讯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红色通讯社上海 分社	1967.9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43	风雷	湘江风雷赴沪联合兵团、上海高校支湘联络站	1967.9	交大革命楼 314 室		
44	广州问题专刊	广州工联、红旗工人、红司、新一司、三司、机关红司赴沪联合战斗兵团	1967.9			
45	联合战报	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沪联络站		交大革命楼 三楼 213 室	371873	
46	苏南快讯	无锡主力军、上海半工(农)半读红反会 《红卫通讯》编辑部				
47	浙武造反报	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记者组		河南中路 505 号 113 室	210507 214450	
48	四川通讯	交大红卫兵师(筹)、重庆大中院校反到底派赴沪兵团		交大中一楼 214 号	370147- 284	
49	新疆简讯	新疆军区兵团职工总司驻沪宣传组、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战新疆				
50	东方红通讯	工总司一机部直联络站、首都红代会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				
51	井冈山人通讯	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华东地区联络总站、工总司版联市印四厂造反队				
52	浙江通讯	浙江省联总驻沪记者组、工总司浙江沪办联合大队		河南中路 505 号 113 室	210507	

(续表)

序号	报刊名称	所属组织	创刊时间	地 址	电 话	备 注
53	井冈山通讯	清华井冈山兵团 035部队、工总司高 桥化工厂造反队、大 批判联络站		威海卫路 420号 浦东桂家村	534134 618346	
54	文革通讯 (上海版)	浙江省嘉兴工人革 命造反第三司令部、 上海红三司《迅雷》 编辑部				
55	四川简讯	上海市大专院校四 川问题联络站、工总 司上海纸盒印刷厂 工人造反队		四川中路 320号	218428	
56	武汉“三钢”	武汉“三钢”赴沪 战团				
57	农奴载 (上海版)	南京大学红色造 反队		南京大学外 文系		
58	文化革 命通讯	新北大驻沪联络站				
59	红旗评论	大连毛泽东主义红 卫兵驻沪联络站				
60	体育战线	北京工农兵体院毛 泽东主义兵团驻沪 联络站		黄陂北路 190号(市体 育宫)	560929	翻印北京版
61	文革动态	浙江湖州《红湖怒 涛》编辑部、交大红 师(筹)红卫兵通 讯社				

说明：1967年下半年外地在沪组织所办刊物有两种情况：一、因武斗，外地组织在上海制造舆论，主要是江、浙地区，以及新疆等地。二、外地组织插手上海的“文革”运动，主要是北京红卫兵。

附一：

披露一条史料

金大陆

五年前,我搜索出一条有关巴金的史料,因一直没有机缘开掘它,它也就继续埋藏着。年初,《申江服务导报》吴驷先生为谋划一本著述,约我就上海“文革”中的“群众小报”作一专题论文,这条史料也就在运用中显现了。

这条史料的大致内容是:1967年7月底,上海染料七厂半工半读学校两学生(一人曾少教)纠集人员,占据武康路巴金家中的小客厅,成立了《前锋通讯》编辑部(刊物所登地址为武康路213号,实际上武康路上没这个门牌,后经有关部门向邮局查询,才知该编辑部就设在巴金家中)。8月下旬,《前锋通讯》出版第一期,至9月中旬,共出正刊4期和副刊1期。《前锋通讯》每期印数2~3万份,纸张在上海购买,然后运往浙江平湖、海宁印刷。小报每期定价2分,除在上海出卖外,还分销浙江杭州、绍兴、海宁和江苏苏州等地。《前锋通讯》编辑部共有20多人,多数为青年学生,多数参与上街兜售。每次上街兜售时,除车票可实报外,还有每人每餐4角的误餐补贴。

事实上,当时上海以牟利为主的“地下小报”不止这么一家,有的甚至拥有上百人规模的售报队伍(相比之下,那些通过邮发、印数达9万之多的《上海红卫兵》报等倒是亏空的)。这些人手头宽裕,“经常上点心店,先是阳春面,以后是汤团、馄饨、蛋糕”。然而,《前锋通讯》占据巴金家的前厅作编辑部,其来龙去脉,其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双方共处一屋,人来人往,巴金及巴金的家人如何面对?既然是已发生过的事,都值得研究。

年中,参加《解放日报》胡廷楣先生《相逢1966》的小说座谈会,我

曾当面问过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教授，陈思和说从未听巴金、萧珊和李小林谈及此事，联想到巴金的《随想录》及有关巴金的研究中，似乎也都没有提及这件事。由此，便引发出了“证验”的问题。

恰巧，上海人民出版社苏义宁编辑来谈稿约，我谈及此事，苏义宁竟然说他可以“证验”确有此事（算是应了“投缘”和“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说法）。原来，苏义宁是著名导演陈西禾的外甥，陈西禾导演了电影《家》，自然与巴金有较密切的往来。“文革”爆发，啸聚作乱，陈西禾跟赵丹、郑君里一样，遭遇了“上海电影界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大抄家行动。陈西禾生性荏弱，惊恐而长期不出门。因陈家没男孩，许多搬搬弄弄的家务事也就由初中年纪的外甥苏义宁来承担了。苏义宁说那时文艺界的人士已很少来往，谁家有什么事多由小孩相互上门告知一声。有一天，苏义宁正在舅舅家，突然有一小男孩匆匆进门对陈西禾诉说家被人占了，说完就匆匆走了。陈西禾随口说巴金的家也被红卫兵占据编油印小报了（其实是铅印小报），其中还有“不让

他家人通过”的细节等。我问苏义宁，陈西禾是怎么知道巴金家被红卫兵占据的？是不是也有巴金家的小男孩来告诉的呢？苏义宁说他舅舅没有说。

恰巧，有一次我在外淘换“文革”生活史资料时，蓦然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两份《前锋通讯》，一份正刊，一份副刊，急忙当作“文物”收归己有。《前锋通讯》印得有模有样，果真在显要位置



占据巴金家编辑的地下刊物《前锋通讯》

上标出“本刊对外暂不接待，材

料组(邮箱)暂设通讯点：上海武康路 213 号”的字样，看来占据巴金家的这帮人是蛮有策划和算计的。这意外的收获算是有了证据。

9 月中旬，我给李小林去信，想从巴金的家人处证实这条史料的确切和完整。10 月 1 日下午，李小林打来电话，说自己当时住校，不知此事，今问了李小棠，李小棠说确有此事，并嘱我与李小棠联系。李小林还询问了我查找史料的过程，相互交流了一些看法。不久，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的周立民找到我，说经李小林的推荐，邀请我参加即将在嘉兴召开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欣然答应。

10 月 26 日，我在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场报告会上，作了《披露一条史料》的学术发言，联系陈思和教授在主题报告中述说的“应将《随想录》与思想解放运动相关资料匹配合编”的观点，我提议在适当的时候可编写“巴金《随想录》研究书系”。后来，李济生在自由发言中两次提到我“注重开发巴金研究资料”的观点。会后，许多与会者围上来要求观看我带来的原件(还有两件是：复旦大学一女生的“文革”日记，其中有批判巴金的内容；1967 年 9 月，由复旦大学图书馆编印注明“供批判用”的《巴金著作目录》。殊不知该《目录》竟厚达 40 多页，版本之全，令在场的几位研究巴金的博士生大为惊叹)，倘若将来建立“巴金纪念馆”，我是很愿意提供这些原件的。

原载 2005 年 11 月 24 日《新民晚报》



附二：**一 点佐证**

陆盛华

读了金大陆先生发表在11月24日夜光杯上《披露一条史料》一文后，也想就我所知道的这条史料的情况说几句，为这条史料作一点佐证，供研究者参考。

1967年秋的一天，我去武康路看我的姨妈萧珊。发现底楼小客厅的门关着，门框上还新装了一副搭襻，搭襻上挂了一把小锁。正纳闷间，姨妈告诉我，这里被一个“红卫兵”组织“占领”了。她还告诉我，这些“红卫兵”虽“占领”了这里，但倒还算安静，人也不常来。她甚至还觉得被这批“红卫兵”“占领”了，家里就不会有另外的“红卫兵”再来“占领”了，反倒少了骚扰。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一个地方驻着一个“红卫兵”组织，那么就不会有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再驻进去，除非一个组织将另一个组织撵走。至于他们是如何驻进来的，姨妈没有讲，我也没有问。因为这种非法占领民居的情况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以后几次去看姨妈，也只见小客厅的门依然挂着锁。但有一天的晚上，我和姨妈坐在大客厅里聊天，大约8时多，突然发现小客厅的日光灯亮了，门也打开了（我们并没有听到有人进屋的声音）。我跟着姨妈走了进去，只见里面一个男青年正坐在桌边看一份东西。见我们进去，他叫了一声“阿姨”就与我姨妈聊了起来。我记得姨妈好像叫他“小杨”。已经记不得他们聊了些什么，只记得姨妈说了句“你们不能去打人家的”，他倒是答应得蛮快。看来他们与姨妈相处得还是比较好的。那个男青年20岁左右，看上去文绉绉的，穿着很干净、得体，没有“红卫兵”那种吆五喝六的样子，像个大学生。但从

金大陆先生的文章中得知,这个文绉绉的“红卫兵”,在“革命”刚处在“高潮”的时候,就已经铜臭十足了。那份《前锋通讯》我也见过,纸张大约如A4纸大小,正反面铅印成4版,在当时的小报中属于印得较正规的。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悄悄地撤离了武康路。

据李小棠说,这批“红卫兵”中有一个是住在本街道的“社会青年”,所以对这里的情况“熟门熟路”。刚驻进家里时也不是那样安静的,白天进出的人也不少。因为小客厅里有一架钢琴,还引来了“小分队”在里面唱歌。只是后来逐渐来得少了,才安静了下来。

金大陆先生能在有关资料中找到这样一条“史料”,而且记载这么详实,说明在当时,这件司空见惯的事已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据我的估计,这些资料多半是王洪文、徐景贤手下的游雪涛之类的特务组织调查记录的。其目的无非是希望能找到驻在巴金家中的这个组织与巴金有什么关系的证据,以便将巴金往死里整。

转引自2005年12月19日《新民晚报》



第十七章

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宣传品”

一、从传单到可供买卖的“宣传品”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南下，在上海掀腾起“炮轰市委”、“红色恐怖”等造反行动，并强迫上海的新闻机构免费印制宣传品。9月7日，上海市委责成《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晚报》及5家印刷厂“为北京和全国各地来沪串连学生提供印刷传单、宣传品的方便”。



“革命”小将在外滩散发印刷品
(徐建刚提供)

至15日，《解放日报》已承印传单、宣传品462种，153万字，173万张，用纸471令。^[1]同时，该报还抽调包括正副总编辑在内的32名人员参加接待，但“少数同学因为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发生了关、骂接待人员，冲进工作人员办公室，抢走传单等情况”。^[2]9月17日，《解放日报》决定不再承印各种传单，当日下午就有北京红卫兵冲击报社大楼。为

此,《解放日报》党委于 20 日请示市委,并报中央文革小组,建议报社不宜印刷传单,各学校可提供印制工具;中央负责人讲话未经审阅同意不宜翻印等。10月 18 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马达致函市委,再次建议市教卫部和各区委为学校添置设备,供学生油印传单;报社只承印《红卫兵报》和《红卫战报》及市委交印的通告等。21 日,《解放日报》向市出版局、市委办公厅递交《关于印刷宣传品用纸问题的报告》,宣称至 10 月 15 日,上海各承印红卫兵宣传品的单位,已耗用平版纸、卷筒纸 17.45 公吨。至于费用处理,排印可不计,纸张应由出版局拨还。^[3]

传单、宣传品的效用在“文革”运动中是非同小可的,尤其运动初期,群众的情绪处于懵懂而又亢奋的状态中,满街传单、宣传品的散发就如同煽风点火。红卫兵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会强制报社按照“革命”、“造反”的指令印刷宣传品。其实,《解放日报》等承印单位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尽管处在无奈中,却也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不满和抗争。然而,革命造反的大势,终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使数百万份的铅印宣传品出笼,确也为宣传品的收集、交换和以后的买卖提供了可能。

“一月革命”以后,上海“炮轰市委”、“红色恐怖”的焦点发生了转移,在街道上散发的传单稍有减少,但在各群众组织之间流通的《首长内部讲话》、《资料汇编》等印刷品却日益增多。同时因绝大多数的大众读物已作为“毒草”被查封,出版机构也近乎瘫痪,为补偿社会的阅读缺失,又迎合社会的阅读口味,有群众组织集合能人,也有能人借助群众组织,编制出大量的诸如《毛主席文选》、《毛主席回忆录》、《林彪语录》等读物,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诚然,这些宣传品已不纯粹指对着运动,所以它存在的理由和流通的价值,正在于凸显出了独特的知识性和资料性的品质。即便作为供“大批判”需要的《刘少奇言论集》、《刘少奇档案》等,也因不直接关涉群众组织“革命”、“造



《毛主席诗词歌曲》
赤卫军上海社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编



《毛主席诗词注释》

反”的事务，而起着显扬和参考的作用。这就是说，除了“血案”、“阴谋”、“事件”之类的传单仍在街上（无价）散发外，《首长内部讲话》、《毛主席文选》、《刘少奇言论集》等印刷品，已从具体的运动矛盾中摆脱而出，成为一种公共宣传品。且因这些印刷品有编辑、纸张、印刷等成本，均装订成册，自然也就在群众组织之间、朋友之间及社会交易场所中，成为一种特殊的可供买卖的商品。

据 1967 年 2 月 9 日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制革命传单接待小组的《情况反映》称：“《毛主席回忆录》革命群众都很感兴趣，有些单位多次来接待小组联系，要求印刷——接待同志始终不同意铅印成册，但没隔几天，就发现不少印刷厂已印好了数批。在此情况下，接待同志无法再坚持。到目前为止，这份材料已印了几十万份”，“关于批判刘少奇的材料名目繁多，内容完全一样。托印单位很多，铅印厂在印，胶印厂也在印，总数不下十几万份”，至于《首长内部讲话》、《大字报选》等，托印单位“兴趣很大，非印不可，占用了大量生产力”。^[4]

二、制止与反制止

鉴于以上情况,1967年3月4—28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分别下发了《关于不准私自编印毛主席著作的通知》、《关于制止私自编印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通知》。两项通知十分严肃地指出:私自编印的毛主席著作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几经辗转抄录,谬误很多,极不严肃。个别坏人造谣惑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有的甚至已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用来作为攻击我们的口实”。^[5]所以,今后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准擅自编印此类印刷品;已印好的则停止分发,就地封存,违者予以严肃处理。^[6]然而,尽管通令的口气威严如山,终究难以抵御利益的纠缠。尤其那些造反起家的人物,更是仗恃自身的门道,呼风唤雨,视此类通令为一纸空文。例如1967年4月《支部生活》中有读者报告:通知传达后,某打字社动员工作人员突击装订,转移了3200多册《首长讲话》,并明确告知“给有关部门查封后,经济上就要损失了”。^[7]再例如4月4日,市政宣组已会同工总司中国唱片厂造反队,将一批尚未装订的《毛主席文选》查封于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的办公橱内。结果当12日驻沪空军要求工总司提供有关资料时,潘国平(时任工总司主要负责人)竟带着部队的人,坐着吉普车从徐汇区联络站拉走了670套印刷件,送往市印四厂紧急装订,还欺骗询问的工人是装订机密文件。市政宣组接报后又立即拉回了这批印刷件。第二天,潘国平带着市印四厂的人找上门来索要收据,并满不在乎地声称从未见过什么通知。^[8]

为了掌控局面,市政宣组于1967年4月上旬对上海私自编印毛著和首长讲话的情况,作了一番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情况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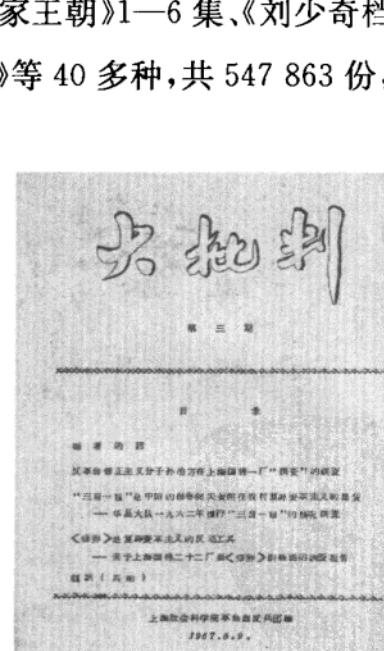
名 称	计划印数	实际印数	发 出 数	存 留 数
《毛主席文选》	29 300 本	3 800 本	3 800 本	0 本
《毛主席讲话》	14 700 本	14 500 本	14 330 本	170 本
《毛主席语录》	10 000 本	10 000 本	10 000 本	0 本
《马恩列斯语录》	43 390 本	42 390 本	30 600 本	11 790 本
《最高指示摘录》	5 000 本	5 000 本	2 650 本	2 350 本
《毛主席关于文革运动的指示》		28 500 本	20 645 本	7 855 本
《毛主席回忆录》		87 000 本	87 000 本	0 本
《重要文选》	20 000 本	20 000 本	18 400 本	1 600 本
《重要讲话》		14 000 本	14 000 本	0 本
《学习材料》	14 000 本	14 000 本	8 235 本	5 765 本
《林彪语录》	11 000 本	11 000 本	11 000 本	0 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集》		10 700 本	10 620 本	80 本
《中央负责同志谈文化大革命》	26 770 本	15 500 本	15 500 本	半成品
《中央负责同志谈文化大革命》		86 000 本	82 000 本	4 000 本
《二月份首长讲话》	91 020 本	68 520 本	56 738 本	11 782 本
《二月份首长讲话》	17 700 本	半成品		已销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1—4	23 000 套	2—4 集 已完成	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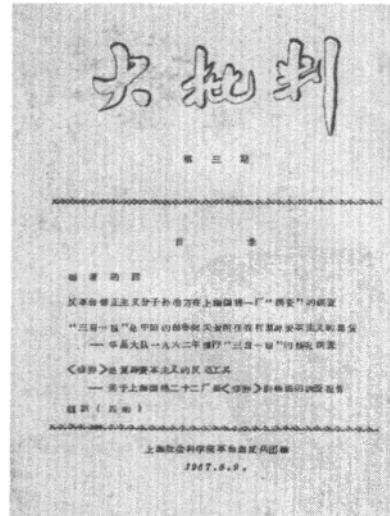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1967年4月11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6期。

由表可知：1967年2—3月间，上海各群众组织编印的宣传品，不仅数量是很大的，动辄就上万本；其流通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动辄就所剩无几。正如前述中已提及的，对编印者来说，这些宣传品多为有价销售，其中有可追逐的经济利润；对阅读者来说，这些宣传品的内容在当时属政治文化方面的稀缺资源。由此，在群体间构成的交易，就显现了强劲的活力。何况这些宣传品的制作一般有着群众组

织的背景，其内容也多为正面的报道和披露，有的还直接穿戴着“歌颂领袖”、“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衣装，于是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即便已被市政宣组的《通知》指认为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又有什么上不了台面呢！

1967年4月1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是公开地在全国吹响批判所谓“中国赫鲁晓夫”的进军号。就此，如果说群众组织编印《毛著》和《首长内部讲话》之类的宣传品，被指责是“极不严肃的”行为，那么群众组织编印大批判资料，则理所当然属于“革命”、“造反”的行为了。市政宣组也承认“自从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开展以后，广大革命群众都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各单位对批判资料的要求也逐渐有增加”，^[9]例如短短的4月3—12日，就有959批次（人）前往市印刷接待站联系印制批判资料（日均100多批次），其中品种有《刘邓一百例》、《炮打刘少奇》1—3集、《砸烂刘家王朝》1—6集、《刘少奇档案处理》、《批判〈论修养〉》、《陶铸罪行录》等40多种，共547 863份，用纸1 706令。^[10]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更是群威群胆，仅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就印制批判资料11种，其中《刘邓一百例》印10万份，用纸250令；《打倒刘少奇》印1.5万份，用纸150令。且都堂而皇之在街上出售（《打倒刘少奇》成本4分一本，出售价为1角）。^[11]面对这种潮涌般的态度，作为主管部门的市政宣组怎能“制止”得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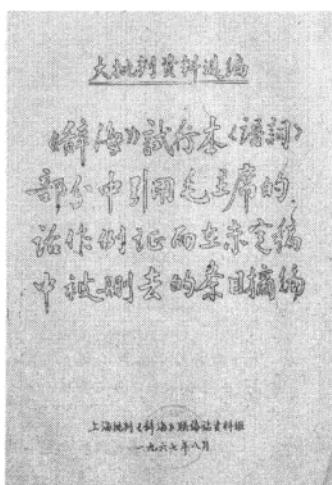




1967年5月9日，上海社会科学

5月9日，市政宣组参考北京市院革命造反兵团编《大批判》第三期

处理群众小报和批判资料的情况，提出了“为了保证急需的重点批判资料及时印刷和保护各革命群众组织的积极性”的几点意见：一、批判刘、邓的资料，由政宣组委托《内刊》等造反派组织统一编辑，刊印《大批判资料选编》。二、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等资料，由市打陈、曹小组统一编辑。三、各群众组织编辑的其他大批判资料，应同上述两单位联系，确实好的，可适当印一些；一般的则不宜印刷。四、属系统、单位的批判材料，均自行解决。同时，政宣组再次强调：毛主席及中央负责人、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一律不准擅自印刷。^[12]很明显，市政宣组的《意见》既无奈——无奈于伴随着大批判运动而形成的大批判资料的泛滥；又恪守——恪守于自身管理和整肃宣传品的职责，所以它的用心、它的口径在认可“急需的重点批判资料及时印刷”的时候，仍强调对该类宣传品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那就是归口于某一两个机构，并通过这一两个机构对全市的宣传品印制实施调控。但是，这毕竟是市政宣组的一厢情愿，大批判运动正处于炽盛期，且各群众组织均有自身的利益和盘算，市政宣组怎么可能实施有效的调控呢？



1967年8月，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资料组《大批判资料选编》



《破黑线》解放出版社
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上海市砸烂古典文学黑线联络站编

所以直至 9 月 22 日,市革委会正式下达《关于禁止非法印刷、设摊买卖宣传品的通告》,及 23—24 日,上海对宣传品交易场所实行冲击行动前,包括《大批判资料》、《领袖文选》、《首长讲话》等在内的宣传品街头交易,以“南京路—西藏路口”为中心点,以“南京路—浙江路—西藏路—美术馆—静安寺”为轴线,并放射到四周的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闸北区、徐汇区等十多处热闹地段,正进行得热火朝天,^[13]而且这些交易均公开或不公开地存在着买卖关系。据 6 月 2 日市革委会《接待动态》第 6 期报告:最近“有一股经济主义歪风”,例如一群众组织刊印宣传品,印数 1.5 万本,投入成本 1 000 元,集体购买每本 1 角 3 分,零售每本 2 角。如全部集体购买为 1 950 元,即可获利 900 多元。^[14]那么,“9·22 通告”及“9·23—9·24 行动”后,上海“买卖宣传品”的情况如何呢?现看 11 月 9 日《支部生活》刊发的群众来信《坚决抵制这类“内部资料”》所透露的信息:“9·22 通告”后,“街上非法买卖宣传品的情况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我们发现在某些机关、工厂、学校单位内,还有人在印刷、买卖各种内部资料”,“而某些群众组织,却担当了义务推销员,在内部代为销售”。^[15]例如上海交大某群众组织总部印制了 1.5 万本《毛主席论教育革命》(1 493.60 元),其中 5 000 本在国毛一厂销售,其余的准备分发给师生。11 月 4 日上午,当市政宣组察访此事时,即与交大军训团联系,提出查封这批宣传品。但中午时分某群众组织就迅速向下分发,待市政宣组人员赶到时,只收回 18 本。看来,那些刊印“武斗消息”、“趣闻轶事”的群众小报被整肃了,但刊登“领袖文选”之类的印刷品却仍在制作流行;那些麇集人流的交易市场被取缔了,但群众间的内部流通和买卖仍在继续。

三、一份调查报告

1967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上海市革委会查获一个非

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通报》称：“该集团非法地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二百余篇，编成所谓《重要文献》，大量出售”，“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中央再次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并首先责成北京、上海两市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16]确实，这是一把尚方剑。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也随即作出“要查明资料来源，管就要管到底”的严厉批示。于是，市政宣组组织力量顺藤摸瓜，首先查明了中央文件指认的《重要文献》中毛著的篇目来源，主要有 1948 年版东北书店的《毛泽东选集》、手抄的《响导周报》、《湖南自治运动史》、延安版《解放日报》等（多抄自人大党史系油印资料和中科院历史研究所藏书）。接着又查明上海的此类宣传品主要在江浙一带印制的线索。

下面请看市政宣组当时重点处理的《在宜兴、丁山非法印刷宣传品》的调查报告。

10 月下旬，市政宣组查获复旦大学、上海图书馆、轻工业美术学校、高桥化工厂、上音附中等单位，在江苏宜兴、丁山非法印刷宣传品。其中复旦大学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内有不少未公开发表的语录）计划印 2 万册，南京工业大学加印 1 万册，已开机印刷了一部分。由上海图书馆、轻工业美术学校、高桥化工厂联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文艺专辑），上册 5 千本已印好，尚未装订。下册已排版，尚未印刷。经初步审阅，该《汇编》中也有不少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指示及中央首长的内部讲话。由上音附中编印的《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印数 1 万，已全部印刷完毕，少数未上封面。上音附中已提走 9 百多本，其余 9 千多本被政宣组封存在宜兴。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市政宣组向当地印刷厂宣传

了中央文件和上海市革委会“9·22 通告”精神,提出三点处理意见:一、凡上海代印的宣传品,立即就地封存,由上海统一处理。二、一律停止排印。三、为了不使上述宣传品流散,先将半成品运回上海。当地印刷厂表示同意,但当正式装运半成品时却受到阻拦,理由是托印单位的钱款尚未付清,并反过来提出,必须在二星期内解决(11月14日前),否则将宣传品就地出售以抵欠款。因外地情况比较复杂,在复旦大学、上海图书馆、高桥化工厂等群众组织的付款尚未弄清之前,为了不致已封存的宣传品再度流失,造成政治上的损失,拟建议市革委会指定有关部门暂时垫付已发生的费用共6千余元。^[17]

11月17日,市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小组再度派人到宜兴、江阴。当地军管会非常重视,指示要向上海同志如实反映情况,并同意将封存的宣传品运回上海处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无锡报》社的会计是上下的牵线人,除了复旦大学、上海图书馆、上音附中等单位托印的宣传品外,还有在宜兴由市教革会托印的《文革通讯》1—3期,及上海某个人(乔世忠)托印的《读报手册》2.5万本;在江阴由上海国防科研系统造反派托印的《毛主席语录、马恩列斯语录》2.5万本(供纸104令,用去93令),及上海某个人(乔世忠)托印的32开《毛主席的生平》1万本。其间,上海图书馆、高桥化工厂等单位多次有人到宜兴,企图将这批宣传品运走或倒卖给南京。18日,上音附中有人提走300本《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关于钱款问题,市政宣组处理小组指出是没收性质,不是买卖关系。后经请示市革委会,才同意垫付不加利润的印工费。但厂方不见印工费则百般刁难,直至见到汇款单后才允许装车运沪。据统计,这次行动在宜兴人民印刷厂没收《汇编》1.5万本;《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5190本,垫付印工费3188.04元。在江阴人民印刷厂没收《毛主席的生平》、《马恩列斯语录》及多余纸张64.6

令,垫付印工费 696.48 元。25 日,处理小组一行到《无锡报》了解情况,原来上海在此搞托印的人较多。^[18]

综上所述,调查报告中有几个关节点是值得注意和梳理的。

一、宣传品买卖的市场在上海,宣传品印制的场所在江浙。原来在上海街头,在上海各单位、各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着的宣传品交换和买卖,其背后存在着一个颇具规模的“制作—供应”的网络。这个网络以上海为主轴,同时连贯着南京、杭州等省会城市,而放射分布在江浙腹地的县、镇一级的印刷厂,便构成了整个网络的铺展。应该承认,这种成系统的“制作—供应”的网络,有人联络,有人调控,使城市和县镇、市场和制作连同一体,是具有相当的生产能力和运作能量的。

在此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大量的宣传品要到江浙去制作?是上海等城市没有这般生产能力吗?是江浙一带的印刷厂价格格外低廉吗?所有的回答归结为一条——尽管上海对印制此类宣传品的管理也有无奈,也有漏洞,但总体上是十分严格的,且上升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无疑就把那些或者是为了宣传“革命”,或者是为了追逐“利润”的编印者们,统统地驱赶出去了。例如交大就在宁波印制《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典故》、《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等。由此,市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在 11 月 9 日的《报告》中,专门向市革委会建议:“有必要派人到江、浙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并“宣传中央的两个文件和市革委会有关规定的精神”,“以使外地印刷厂的革命群众都知道”。^[19]

二、作为宣传品管理方的上海市政宣组更强调政治的影响;作为宣传品印制方的县镇地方印刷厂更追究经济的得失。在市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两次赴宜兴、江阴等地,调查处理宣传品印刷问

题的过程中，市政宣组方面以检查者的身份，一方面反复宣传中央文件和市革委会“通告”的精神，一方面果断地作出“没收”、“封存”、“运回上海”等决定。确实，市政宣组应有这个资格和权威，因为他们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更代表着“革命”的方向。地方印刷厂方面尽管受他人托印，但终究是违反文件和通告精神的，终究是制作者，他们的态度只能顺从和应允。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进入事务的具体处置时，地方印刷厂在“承认错误”、“下不为例”等务虚的方面都是可以签字的；在“印工费”等务实的方面则寸步不让，且态度极其坚定和强硬。于是，在市政宣组与地方印刷厂的较量中，在“政治的影响”与“经济的得失”的冲撞中，“检查方”最终只得按照“被检查方”的意志付出“通行”的费用。这是“地域”方面的胜利，还是“经济”方面的胜利？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只是在这次行动中，上海的“政治”方面没有获得胜利。

三、宣传品的种类发生了变化。检索市政宣组在宜兴、江阴等地经手处理的宣传品，可发现以大批判为主题的《砸烂刘家王朝》、批判《论修养》之类的材料，已悄无踪影了。即便是独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也不再是针对运动的指示和讲话，而是关于文艺方面的资料专辑。这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变化，“大批判”和“首长内部讲话”之类的宣传品已渐渐地不合时宜了，或者说其主题和内容已经受不起屡屡的检查而淡出了。与此同时，可发现在宜兴、江阴等地处理的宣传品中，主要品种是《毛主席语录》、《马恩列斯语录》、《毛主席的生平》、《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及《读报手册》等。

四、“政治影响”与“经济得失”的博弈

应该承认，尽管这类宣传品中存在着文件所指认的“未公开发表

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等,但终究是正面的宣传和歌颂,终究是迎合时代需求的资料和读物,且这类读物明显具有常效性的特征,无疑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缘此,不管是编印者,还是购买者;不管是社会政治方面的认知,还是文化心理方面的感知,“制作(出卖)——(购买)阅读”该类宣传品应该是顺应民意、满足需求的。同时应指出在这“制作(出卖)——(购买)阅读”的背后,隐藏着粗实的利润支撑。所以,在整肃宣传品交换和买卖的行动中,那些刊印“武斗消息”、“马路新闻”的小报可以被扫荡;那些刊登与各地运动相关的《文件汇编》、《首长内部讲话》等可以被清除,唯有以“宣传和歌颂”领袖为体裁的宣传品,不仅难以制止和剥夺,还会不断地在市场中生长出新的品种。

事情的发展证实了这样的判断,也构成了往后处理宣传品“交换和买卖”的主题。请看事实:就在 1967 年 10—11 月间,上海大力清查“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行动的同时,11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严禁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通知》强调翻印和出售这类照片(包括生活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办追究”,“不允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捣乱”。^[20]著作的清查尚未了结,又来了追究照片的任务。然而,追究的效果如何呢?

三个月过去了。1968 年 2 月 13 日,市政宣组通过明察暗访,“拘捕了个别坏人”后,向全市发出了《处理通报》,“特再次重申,凡是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必须负责追缴回收”。^[21]

又三个月过去了。1968 年 5 月 17 日,市政宣组向各单位发出《关于回收上缴未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通知》指出:迄今三个多月来,仍有“照片尚未上缴,如仍敷衍拖延,将严肃处理”。^[22]

又两个月过去了。1968年7月19日,市政宣组发出《关于坚决贯彻回收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通知》认为:“是否认真负责地按中共中央通知的精神回收上缴照片,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表现,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为此,各有关单位要向“群众反复宣传中央文件精神,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追查散发出去的照片有否落到坏人手中”;“各区、县、局革委会要督促、检查下属单位,将这些照片交上来”。《通知》最后强调:最迟在8月中旬收缴完毕。^[23]

又一年过去了。1969年9月13日,市革委会下达了《关于私自编印毛主席讲话、诗词、照片的通报》。《通报》称:“最近发现,市出版印刷公司、市纺织工业局、市文教体育用品工业公司所属印刷厂、华东水电勘察设计院、五四二厂、华东师大、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单位擅自编印和承印各种《学习资料》、《相册》、《诗词解释》、《歌曲选》等,大量收录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诗词、照片、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生平事迹等”,“更严重的,还发现上海某些单位同外地某些人勾结起来,搞非法印刷及贩卖活动,如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有一发行员利用职务从中牟利”。^[24]

诚然,不能说市政宣组持续的工作没有任何成效,也不能说“私自编印毛主席讲话、诗词、照片”的事情已愈演愈烈。在此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此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绵延着、起伏着,不能得到最终的消除和解决——正如在前述中均已提及的——所谓非法宣传品中的“毛主席讲话、诗词、照片”等,均属正面的介绍和歌颂,它迎合时代,满足群众,既填补了社会的阅读缺失,又增添了社会的收藏情趣。加上隐没其中的“经济利润”的因素,谁家(谁人)进入了以后肯轻易地退却呢!

总之,“政治的影响”虽然高高在上,但在“经济的利润”面前,终究是要打掉折扣的!

注 释

- [1] 解放日报社编,《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第334页。附记市委办公厅提供给市委接待站“关于革命群众要求印刷传单的问题”的回答口径:目前,许多外地来沪进行革命串联的同学,要求印刷革命传单。对此,市委是积极支持的。除了各大专学校、中学帮助油印外,特安排解放日报社为大家提供印刷的方便。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克服了许多困难,到十五日止,已印了四百六十多件,一百七十多万份传单。但是,上海印刷工人正在大量赶印《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语录》,人力、设备,特别是纸张供应都很紧张,广大革命师生和群众渴望得到,现在仍供不应求。同时,《解放日报》的报纸印刷任务也十分繁重,不但每天要印四十八万份《解放日报》,还要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每日总印数达一百几十万份。为了使更多的革命群众能够及时获得毛主席著作,为了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解放日报社不得不在印刷传单方面加以一定的控制,不能完全满足大家印刷的需要,希望大家谅解。
- [2] 同上书,第334页。
- [3] 同上书,第336页。
- [4] 1967年2月9日,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制革命传单接待小组《印制革命传单等宣传品的部分情况反映》。
- [5] 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22—26页。
- [6] 同上。
- [7] 《支部生活》1967年第15期,第33页。
- [8] 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7期《最近期间印刷批判资料和小报情况》。
- [9] 同上。
- [10] 同上。
- [11] 同上。
- [12] 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目前印刷情况的意见》。
- [13] 据1967年7月14日,《支部生活》1967年第26期刊登读者陈超良的来信《两个青年的对话说明了什么?》:最近一个时期,在华山路静安寺等地,常常看到拥有一堆一堆调换文化大革命材料的人,从早晨到深夜,风雨无阻,简直成为调换材料的市场。有的人手提包里装着满满的材料,名目繁多。有的嘴里喊叫着“材料调哦?!”有的说:“要派钞票用场,材料让脱,啥人要?”等等。调换材料的人绝

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模样的人，也有少数投机倒把分子，浑水摸鱼，从中牟利。下面，是我亲耳听到的两个青年的一段对话：甲：今朝侬赚多少？乙：三元多。甲：比昨天好。乙：我旧书、旧报纸搭脱多。甲：我《支部生活》搭脱多。乙：侬总比我赚得多。甲：我只有二元多。乙：多搞些文艺材料，脱手快。从这一段对话中，使我感到资本主义思想对青年的严重腐蚀，值得引起警惕。建议有关部门取缔这种非法场所，狠狠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14] 市革委会《接待动态》1967年6月第6期。
- [15] 《支部生活》1967年11月第41期，第29页。
- [16] 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22—26页。
- [17] 1967年11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关于市群众组织在宜兴、丁山非法印刷宣传品的报告》。
- [18] 1967年12月，市革委会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关于在宜兴、江阴、无锡等地调查处理非法宣传品印刷问题的情况汇报》。
- [19] 1967年11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关于市群众组织在宜兴、丁山非法印刷宣传品的报告》。
- [20] 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14—15页。当时，从北京流传出一些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包括生活照），例如有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等。
- [21] 1968年2月13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处理通报》。
- [22] 1968年5月1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回收上缴未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
- [23] 1968年7月1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坚决贯彻回收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
- [24] 1969年9月13日，市革委会《关于私自编印毛主席讲话、诗词、照片的通报》。
见《支部生活》1969年第44期第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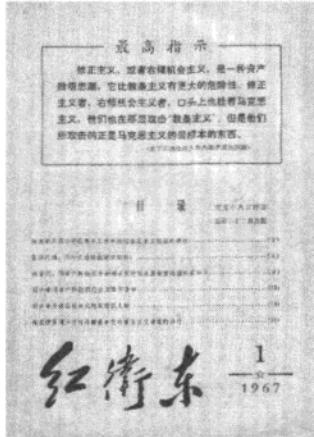
附一：

关于《红卫东》刊和八种批判资料 发行销售情况的调查报告

五兵团二连党支部：

我们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底，对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出版的《红卫东》刊（一至二十三期）和八种批判资料（共十二本）的发行销售情况和账目做了调查和清理。现将我们所调查与清理的情况简报如下：

一、情况



1967年3月22日，《红卫东》1967年第一期

《红卫东》刊，自一九六七年四月创刊，至一九六八年三月停刊，共出版二十三期，发行量为九十四万九千四百余本（其中第20—21期合刊的错误版不计在内），应收回现金六万三千二百八十八元一角七分。发行销售的方法，除门市零售外，向各区县和局的发行，一至六期采取直接销售，用现金支付结账，七至九期通过邮局试销，自第十期开始正式由邮局发行。

八种批判资料自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期间陆续出版，发行量为七万六千八百余本，应收回现金六千七百二十六元二角六分，其发行销售均由门市零售。

《红卫东》刊和八种批判资料印刷出版的用纸量共1516令。

由于刊物的发行量与现金销售量较大，并在现金收入、账目核算和管理手续等方面比较紊乱，漏洞较多。

表现在：

(一) 现金管理紊乱。销售的刊物直接作现金收入的有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四元九角三分。占应收回款近百分之七十。现金收入款一般应当日上缴介入银行,但从某同志的上缴收据中反映,手头现金在两周中积累上缴五、六千元的有两笔,有一笔三千余元是在近两个月中积累上缴的。不经过财会人员的手续,自行动用手头现金收入款四百八十元印制“批三十八条”的资料,而在账面无反映。

(二) 账目结算紊乱。由于没有日销账和按刊按期结账,最后用倒轧账的办法造出结算表。某与某做的结算账面发生多余六十元,当某同志复核时又变为差缺三十多元,即做了亏损报销,并在结算表上任意涂改,既无说明,又无证明。“刘邓黑话”一刊没有进行结算。印刷刊物所用纸张没有到账,经办同志与承印工厂也不进行结算。

(三) 管理手续上的紊乱。对区县和局所销售《红卫东》刊的手续不完备,有些重要的原始凭证失散或丢失;赠送数量在百本以上的有不少是没有开列赠送清单,也无人证明;经营门市销售的同志又兼管仓库和赠送工作。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在调查清理工作上:

(一) 根据现有的原始凭证,重新到账,进行综合结算;(二) 对经办人员和有关同志共十八人(负责发行销售和到账的宋某某同志已病故)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进行调查研究;(三) 调查了九个主要承印工厂的纸张使用和成品出场的数量情况。经过调查和清理,基本上弄清其出版发行销售情况与问题。

二、主要问题和调查清理的结果

(一) 经我们综合结算,差缺 213.70 元。

《红卫东》刊和八种批判资料的总发行量为 1 026 339 本,应收回七万零一十四元四角三分。按其现有的原始凭证,其中上缴款六万一千七百元零四角,亏损,赠送和库存(折算金额)为四千二百九

十四元；发行费三千五百二十九元三角三分，青浦县拖欠款二百七十七元，尚差缺 213.70 元。

上述差缺的金额中，某与某结算亏损赠送账面与实际凭证差缺 107.41 元（内账面多报亏损 74.78 元，账面多报赠送数 32.36 元，周某某领《红卫东》刊第 8 期 300 本送邮局，共 18 元，而邮局结算账上无反映作差额报销），这样尚还有 88.56 元，据有关同志反映与我们的分析，可能属于赠送中有未记账的；库存管理不严而有人零星取走的以及在出场的捆数中尚未发现的少量缺数等情况。

（二）“批党员标准八十五例”一刊进货五千本在账面无反映。

该刊出厂共一万三千本，应回收现金一千三百元，查其账面只出现八千本的回收情况，少上账五千本，金额为五百元。根据调查与分析，某以此款垫付换取印刷出版“批三十八条”一刊，金额为四百八十元。两者相抵，尚差缺 20 元（此数已包括在总的差缺金额内）。

（三）“刘邓黑话”一刊，没有结算账目。

经这次调查清理中，由原经办人某同志缴回了他所保管的原始凭证，并补到了结算账目。根据其结算账目和现有的原始凭证，基本上是清楚的。

（四）十二令半白报纸的下落。

一九六七年九月由某同志购白报纸十二令半送上海市印三厂但一直未用。这次我们在市印三厂仓库的纸张进出账上见到这批纸张于一九六八年七月由某同志领取送上海文化革命印刷厂，但在文化革命印刷厂的进纸账上无反映。该厂有关同志也否认有此事。经我们向某了解，据他本人说明，这批纸张已领回机关，并提供本机关某同志（现在南京 9424 厂工作）了解此事。

（五）关于 2500 元转上海戏剧学院前是否动用的情况。

现了解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某同志曾以收购纸张费开据转账

支票2500元介入当时市革会所属大批判联络站印刷组作为印刷和用纸的押金款。某又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从该组将此款转账至上海戏剧学院做暂存款，于一九六八年七月由该院财务部门转回本机关。现证实该款在转入上海戏剧学院前未流动过，一直存放在印刷组。

根据毛主席关于“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教导，经我们调查和多次复核，我们认为《红卫东》刊和八种批判资料的出版，发行销售和现金收入上缴的情况，基本上是清楚的。现将存在的问题和所差额的金额虽有漏洞和疑问，根据与有关同志的座谈分析，现金收入和到账的主要经办人某与某同志一贯表现较好，在经营期间经济方面未发现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所存在的问题和所差缺的金额主要是源于工作上的缺点和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以及主管财务人员缺乏及时的帮助与监督所造成的。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审阅。

调查人 赵某某等5人

1971.1.11.



附二：

关于上海大批判资料的情况

一、上海一些单位大批判资料的编印情况

目前，复旦大学正在收集刘少奇在安源煤矿，及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反动史实。历史系四年级关于刘少奇解放前反动言论已整理好；五年级正在整理黎澍反动言论。该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收集了刘少奇在国际问题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用毛主席的语录作为照妖镜进行对照的材料，亦已定稿，现正在付印中。

华东师大有几个同学正在整理刘少奇解放后在史学方面的反革命言论。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小组，专门整理翦伯赞的“三反”言论。华东纺织工学院纺织化学工程系四年级几个革命小将，在汽轮机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调查以后，已经写出了《斩断魔爪——评瘟君刘少奇三下闵行》和《要社会主义，不要托拉斯！》两个调查报告。另外，他们还搞了一个《“工业七十条”反毛泽东思想七十例》材料。

前不久，国际关系方面大批判联络站召开有关会议决定：为了更好地交换资料，为大批判提供炮弹，由国际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外事小组和华东师大革命小将组成临时材料组，合编刘少奇在国际问题上反动言论集。

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了专人收集刘少奇在国际问题方面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和赫鲁晓夫的言论进行对照，并加按语，汇编成“唱合录”。

作协已经编印了《关于京剧革命的反面材料》和翻印了“文艺八条”、“彭真在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上的报告”等。

文化局编印了《刘少奇十七年来在文艺方面的反动言论》、《刘

少奇的文艺黑话》等。

市革委会工业组已编出《斩断刘、邓、薄伸向工业的黑手》、《“工业七十条”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两个文件，即将定稿付印。生产技术局编出《关于生产技术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及《陈丕显、曹荻秋、宋季文在工业方面的反动言论》两个资料，市委财贸组正在编《陈、曹在财贸方面的反动言行》的材料。

市总工会编印的资料有：《彻底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工运路线》、《刘少奇在工运方面的修正主义言论摘录》、《刘、邓、彭、杨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关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言论摘录之一》。

《内刊》除了在《支部生活》、《农村青年》已经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反动言论四十例》两个材料外，截至五月二十日止，《大批判资料选编》已经出了十一种。这十一种资料是：《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罪行录》、《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刘少奇与赫鲁晓夫一唱一和一百例》、《邓小平反动言论汇编》、《打倒陶铸》（一）、《打倒陶铸》（二）、《彻底砸烂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薛暮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活动》、《打倒胡乔木》、《孙冶方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上述资料，有的正在市面上发售，有的已发售一空。

二、工人对大批判资料的意见

第三制药厂检修车间金工组的工人同志，对大批判资料提了以下一些意见：要一些揭发具体事实的资料，理论与实际结合，写法上最好有连贯性，叫人一看就知道刘少奇坏在哪里。例如《刘邓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狂人日记》、《在幕后》以及刘涛的揭发材料等，我们很喜欢看。《刘少奇罪行录》也不错。

批判性的材料，如“一百例”那样对照毛主席指示的，很好。《邓

小平反动言论汇编》看了以后觉得有些话自己还不会批判。虽然有按语，但扣不紧，还是“脱空”的。有的人名，如杨尚昆是什么人，最好简单注一下。冷门的字，最好注音。最好有插图。希望编一些适合各行各业看的材料，分门别类，有毛主席的言论对照批判刘少奇。现在都是综合性的材料。希望选编一些中央首长的讲话和好的批判文章。现在的本子太大，带起来不方便。

大批判资料大家很欢迎，一到就抢，问题是数量太少，买不到，做常日班的更没有时间去买。

《资料情况简报》第六期（华东局《内刊》编）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



附三：**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文革”资料出售情况****(1968年4月22日—12月23日)**

日期	单 位	资料名称	单价	数量	金额	邮资	总计
4月22日	杭州大学政治系	《史学革命》	0.18	5	0.90	0.09	0.99
4月22日	华南师院历史系革委会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16	3.36	0.30	3.66
4月22日	青岛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反共老手翦伯赞材料汇编》 《史学革命》	0.21 0.40 0.18	20 20 20	4.20 8.00 3.60	1.95	17.75
4月22日	河南新乡图书馆文献组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2 2	0.42 0.80	0.15	1.37
4月22日	本溪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史学革命》	0.21 0.40 0.18	3 3 3	0.63 1.20 0.54	0.30	2.67
4月22日	新疆博物馆“红军”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17	3.57	0.33	3.90
4月22日	江西省铜鼓县文化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史学革命》	0.21 0.40 0.18	2 2 2	0.42 0.80 0.36	0.21	1.79
4月22日	陕西省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0 10	2.10 4.00	0.78	6.88
4月24日	安徽无为县图书馆	《翦伯赞材料汇编》	0.40	1	0.40	0.09	0.49
4月24日	江苏省昆山县文化馆革命领导小组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10	2.10		2.10
4月24日	浙江省嘉兴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2	0.42	0.06	0.48
4月27日	开封师范学院	《史学革命》 《史学批判》第四期	0.18 0.21	2 2	0.36 0.42		0.78
5月2日	南汇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5 10	3.15 4.00		7.15
5月6日	南京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3	0.63	0.09	0.72

(续表)

日期	单 位	资料名称	单价	数 量	金 额	邮 资	总 计
5月6日	湖南革命历史研究所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3	0.63	0.09	0.72
5月6日	安徽省桐城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2 1	0.42 0.40	0.12	0.94
5月6日	中山大学图书馆期刊组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5	1.05	0.09	1.14
5月6日	武汉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7	1.47	0.15	1.62
5月6日	南京大学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5	1.05	0.09	1.14
5月6日	营口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 1	0.21 0.40	0.09	0.70
5月6日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2	0.42	0.06	0.48
5月6日	甘肃师大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3	0.63	0.06	0.69
5月6日	湖北省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100	21.00	1.92	22.92
5月8日	曲阜师院政治系革委会	《史学批判》第三期	0.14	2	0.28	0.01	0.29
5月10日	广西侗族自治区通志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2	0.42	0.06	0.48
5月10日	江西省广丰县文化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2 2	0.42 0.80	0.18	1.40
5月10日	安徽省巢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0 10	2.10 4.00	0.81	6.91
5月10日	九江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3	0.63	0.06	0.69
5月16日	安徽省泾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0 10	2.10 4.00	0.81	6.91
5月16日	重庆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8	1.68	0.15	1.83
5月21日	兰州大学历史系革委会资料组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10	2.10	0.17	2.27

(续表)

日期	单 位	资料名称	单价	数量	金额	邮资	总计
5月27日	旅大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2	0.42	0.06	0.48
5月27日	贵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11	2.31	0.22	2.53
6月3日	武汉大学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5	1.05	0.10	1.15
6月3日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院	《刘少奇修正主义言论摘编》 《反共老手侯外庐材料选编》 《翦伯赞材料汇编》 《史学批判》第一期 《史学批判》第二期 《史学批判》第三期	0.23 0.23 0.40 0.14 0.14 0.14	5 5 5 5 5 5	1.15 1.15 2.00 0.70 0.70 0.70	0.88	7.28
6月21日	安徽省寿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10	2.10	0.21	2.31
6月24日	南京图书馆	《侯外庐材料选编》 《翦伯赞材料汇编》 《史学批判》第一期 《史学批判》第二期 《史学批判》第三期	0.23 0.40 0.14 0.14 0.14	5 5 5 5 5	1.15 2.00 0.70 0.70 0.70	0.32	5.57
7月11日	长沙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三期 《史学批判》第四期	0.14 0.21	1 1	0.14 0.21	0.01	0.36
7月11日	湖南省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三期	0.14	4	0.56	0.02	0.58
8月1日	中山大学历史系					0.34	0.34
8月2日	北京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三期	0.14	5	0.70		0.70
8月7日	历史教学所	《史学批判》第三期	0.14	4	0.56	0.02	0.58
10月23日	芜湖市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	《史学批判》第四期	0.21	2	0.42		0.42
12月23日	历史教学编辑部	《史学批判》第三期	0.14	4	0.56	0.02	0.58

说明：1968年4月22日—12月23日，上海史学批判联络站共向全国44个单位（其中11所大学、17个省市级图书馆、11个地县级图书馆、5个文化单位）出售“文革”资料8种466册，主要有《史学革命》32册，《史学批判》第四期304册，《反共老手翦伯赞材料汇编》82册等，共得金额（含邮资）124.74元。另有个人购买，如“复旦一人”、“复旦一同学”等。

补记：上海史学批判联络站将《史学批判》第四期1034本交上海书店代售。售价0.21元，按7.5折计款，至1969年1月共出售830本，收回金额130.73元，并交财务入账。

附四：**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通讯录****(1967年11月)**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联系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漕溪北路40号	393731	郭庆昌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学会(社联)	高安路63号	378738、374805	潘松鹤
复旦大学历史系	邯郸路220号	618510×历史系	陈匡时、郭景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山北路3663号	548461×历史系	林绍明
上海师范学院政史系	桂林路	389301×政史系	马洪林、王锋全
华东局《内刊》	建国西路648号	379710×19	肖辅玢
上海市委党校	淮海中路622弄7号	289839	王文娟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黄陂南路374号	285494	陈绍康
上海教育学院	中山北一路420号	661267	胡凤纶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	福州路30号	212810×188	沈斐文
市革会政宣组大批判组	福州路30号275室	212810×79	狄建荣、王修龄
市革会政宣组出版组	福州路30号215室	212810×276	冯春景、胡志宏
市革会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小组	四川中路49号103室	218291	方如君、刘金发
市革会财务监督小组	九江路60号306室	219610×148	刘育长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中山东一路14号	215808	戴立清
教工市联络站	常熟路113弄11号	372202	张香还
市委机关联络站	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5号楼	563050×349	陆龙明

(续表)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联系人
赤卫军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南京西路 591 弄 110 号	532825	金惠良
中学教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香山路 18 弄 1 号	370243、377246	黄时伐、项群
杨浦区教联会	大连路控江路控江二中	455518	张志康、王旭闻
虹口区教联会	武进路 258 号三楼	662157	唐荣俊
徐汇区教联会			顾永富
文汇报	圆明园路 149 号	211410	容申化
解放日报	汉口路 274 号	211300	张中方、石成岳
新华社上海分社	南京西路 1288 号	566350、566357	鲁影、陈毛弟
人民日报上海记者站	南京西路 1288 号	566350、566357	肖关根
工人造反报	圆明园路 50 号	212925	陈作端、何公心
教卫战报	石门二路 134 弄 9 号	531077	蔡友聪
上海红卫兵报	四川中路 49 号		
上海晚报《千钧棒》	圆明园路 50 号		
一月风暴杂志	中山东一路 18 号 106 室		
教育革命杂志	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大内		陆永仁
解放军报驻沪记者	延安中路延安饭店	3777149 × 409	许志成
支部生活	康平路 141 号	379610 × 62	陈祖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东路 2 号	21877 × 11	李志德

附五：

“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收藏图书馆类资料的整理和说明

“文革”时期，上海有关单位曾数次公开征集“文革”史料，且因上海运动中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械性武斗”，故这些“文革”史料在市、区各图书馆、档案馆和主要文化教育单位（如大学、社科院、作协）等，曾有良好状态的收集和保存。但四十多年来，因这些史料长期无人管理，少人问津，加上人员变动，一些单位出现搬迁、撤销等情况，有些单位的史料处于打包、封存的状况；有些甚至处于散乱、破损、流失中。有鉴于此，开展“文革”史料的调查和整理，就具有了抢救的意义。现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革”史料整理中，部分关于图书馆类资料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目录索引》（前期）

“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
《目录索引》（前期）一览表

序号	日期	篇 目	署 名	排 印	页数
1	1967. 4	《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伸向各个领域黑手的著作、讲话目录索引》（第二辑·冯定、李维汉、夏衍、周扬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铅字打印	20
2	1967. 5	《田汉著译论文目录》 (供批判参考使用)	复旦大学图书馆、中文系《学习老三篇》战斗组、中五 10—313、310 部分学生编	铅字打印	20

(续表)

序号	日期	篇 目	署 名	排 印	页数
3	1967.5	《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伸向各个领域黑手的著作、讲话目录索引》(第三辑·陶铸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铅字打印	26
4	1967.5	《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伸向各个领域黑手的著作、讲话目录索引》(第四辑·薛暮桥、许涤新、孙冶方、张友渔、陆定一、罗瑞卿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铅字打印	31
5	1967.6.9	《刘少奇言论目录索引》(1921—1966)	上海毛泽东思想学会联合战斗队(高安路63号)	油印	17
6	1967.6	《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伸向各个领域黑手的著作、讲话目录索引》(第五辑·黎澍、刘大年、侯外庐、杨献珍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铅字打印	22
7	1967.7	《周扬著译作目录》(供批判用)	复旦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合编	铅字打印	13
8	1967.7	《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伸向各个领域黑手的著作、讲话目录索引》(第六辑·胡乔木、冯友兰、周扬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铅字打印	14
9	1967.9	《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伸向各个领域黑手的著作、讲话目录索引》(第八辑·田汉专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铅字打印	16
10	无日期	《巴金著作目录》	复旦大学图书馆	铅字打印	46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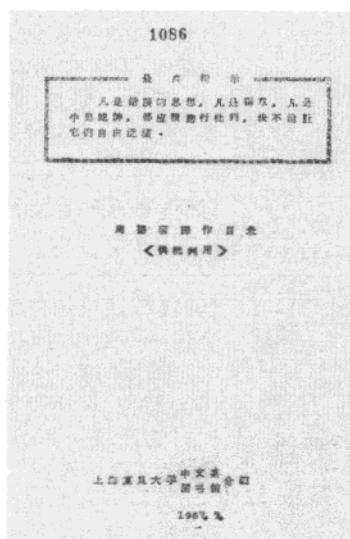
序号	日期	篇 目	署 名	排 印	页数
11	无日期	《毒草集——彭真关于四清运动的几次讲话》 (供批判用,请勿外传)	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图书馆文化大革命资料组	铅字打印 油印	84

说明与分析:

据现有的材料显示并证实,“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及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并没有停止业务工作,尤其在1967年上半年展开的全民“大批判”中,更是紧随形势的变化和要求,调动相当的人力、物力,充分发挥业务专长,编辑成系列的《目录索引》,比如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署名的系列材料,就有《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伸向各个领域黑手的著作、讲话目录索引》,从1967年4月至9月共编辑8辑(现留存2、3、4、5、6、8辑。缺少1、7辑)。



1967年5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老三篇》战斗组、中文系10—313、10—310部分学生、图书馆合编,《周扬著译作论文目录》(供批判参考使用)



1967年7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合编《周扬著译作目录》(供批判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社科院图书馆所编辑的这些《目录索引》，并不是翻印或抄录社会上流行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而是以“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为对象，如第二辑中的冯定、夏衍、周扬等，第四辑中的薛暮桥、许涤新、孙冶方、张友渔等，第五辑中的黎澍、刘大年、侯外庐、杨献珍等，第六辑中的胡乔木、冯友兰和第八辑的田汉专版等（复旦大学图书馆留存的索引有厚达46页的《巴金著作目录》）。

当时，在上海大概也只有社科院、复旦等个别的文科类专业图书馆，有资格、有能力将这些在全国哲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等知名领导和专家的著述目录，开掘整理而出。而当这些目录通过交换、交流传播开来，客观上将引导着“大批判”向纵深发展。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可见当时上海社科院图书馆的这项工作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而现在这些《目录索引》的集合，反倒成了难得的学术积累了。

二、关于《目录索引》(后期)

“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
图书馆形成的《目录索引》(后期)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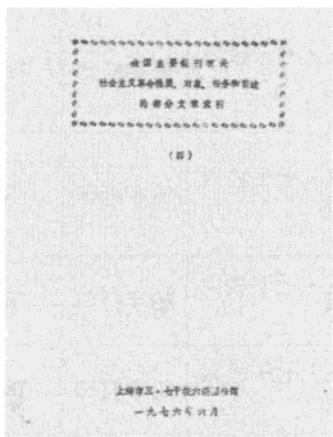
序号	日期	篇 目	署 名	排 印	页数
1	1975.6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剪报索引》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7
2	1975.8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水浒传”评论文章索引》(1963—1975.8)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5
3	1975.9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水浒传”评论文章索引》(二)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6
4	1975.9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水浒传”评论文章索引》(三)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6
5	1975.10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水浒传”评论文章索引》(四)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1
6	1975.10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水浒传”评论文章索引》(五)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4

(续表)

序号	日期	篇 目	署 名	排 印	页数
7	1975. 11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水浒传”评论文章索引》(六)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3
8	1975. 11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水浒传”评论文章索引》(七)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1
9	1975. 12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水浒传”评论文章索引》(八)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6
10	1976. 5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部分文章索引》(三)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9
11	1976. 6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部分文章索引》(四)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0
12	1976. 8	《全国主要报刊有关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部分文章索引》(六)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	铅字打印	10

说明与分析：

“文革”中后期，上海社科院在建制上归入上海市五·七干校六



1976年6月，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图书馆《全国主要报刊有关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部分文章索引》

连。尽管单位的构架和外壳变化了，或者说处于一种“待定”的状态中，但其原有的人员组织和单位功能仍是存在的。所以，当“文革”运动的形势有所需要的时候，已标记“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的图书情报部门，便立即着手开展工作。现可见1975年6月至1976年8月间，六连图书馆为配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共编辑了三类《文章索引》，如《全国主要报刊有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剪报索引》、《全

国主要报刊有关“水浒传”评论文章索引》(1—8)和《全国主要报刊有关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部分文章索引》(1—6)等。

应该承认，当时的这项工作的启动不仅十分及时，更十分专业；不仅在上海市五·七干校，乃至对整个上海市的“学习与批判”运动都起到了推进的作用。依据以往的经验，这些《索引》可能交流到全国各地的社科界，那么，它还可能在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今天留存了这部分《目录索引》，便在“文革”思想史、《水浒传》等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构筑了存在的价值。

三、关于收藏外地图书馆的《目录汇编》

“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收藏外地图书馆《目录汇编》一览表

序号	日期	篇 目	署 名	排 印	页数
1	1966. 5.24	《侯外庐论著作目录》 (一)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图书室	铅字打印	18
2	1966. 5.31	《侯外庐论著作目录》 (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图书室	铅字打印	2
3	1966	《侯外庐论著作目录》 (三)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图书室	铅字打印	4
4	1966	《侯外庐论著作目录》 (四)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图书室	铅字打印	3
5	1967. 2.15	《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 古代文物的倡议书》	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 究所文革小组、革命近 代史所文革小组、图书 馆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 会等	铅印	1
6	1967.3	《三反分子白寿彝毒草 目录》(供批判用)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 社历史系大队编印	油印	10
7	1967.5	《中国最大的党内走资 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 奇言论著作联合目录》 (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 组、北京图书馆印发	油印	20

(续表)

序号	日期	篇 目	署 名	排 印	页数
8	1967. 6	《中国另一个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言论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印发	油印	14
9	1967. 7. 26	《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积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关于图书馆流通工作的倡议书》	北京图书馆全体革命群众	铅印	1
10	1967. 7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20
11	1967. 7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29
12	1967. 8. 1	《刘少奇在江苏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目录》(1940—1965)	南京博物院红色联合战斗队编印	油印	10
13	1967. 8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邵荃麟、陈荒煤言论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29
14	1967. 8	《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朱光潜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18
15	1967. 8	《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22
16	1967. 9	《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侯外庐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26
17	1967. 10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言论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14

(续表)

序号	日期	篇 目	署 名	排 印	页数
18	1967. 10	《陆定一、胡乔木主要言论和著作目录》(大批判资料第二辑)	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编、红色造反者吉林省史学批判联络站翻印	铅字打印	8
19	1967. 11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杨尚昆言论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26
20	1967. 12	《贺龙言论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14
21	1967. 12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言论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油印	16
22	1967. 11	《反共老手翦伯赞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散布的反动言论汇编》(供批判用)	新北大公社《批翦联络站》、《红史兵》	铅字打印	20
23	1968. 1	《教育革命资料目录索引》	南开大学图书馆编印	铅字打印	77
24	无日期	《三反分子方志纯之流报刊主要文章、讲话、回忆录索引》	江西大联筹史学批判联络站、江西师院井冈山兵团历史系资料组	铅字打印	12
25	无日期	《关于国民党伪反省院、感化院等反动机关刊物联合目录》(仅供内部参考)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印发	刻印	8
26	无日期	《翦伯赞讲话录》		油印	100

说明与分析：

经查，“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收藏的外地图书馆《目录汇编》共26份。时间跨度从1965年5月至1968年1月；地域分布以北京为主，兼有南京、天津等地，大致说明在“文革”的前半期，特别是在“大批判”的高潮中，全国各主要的图书馆高度重视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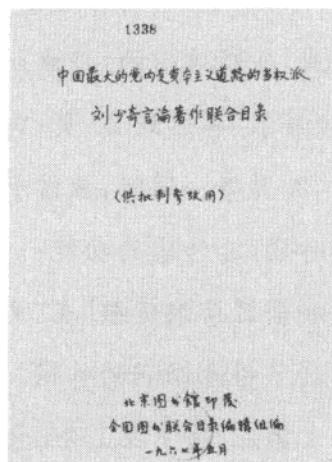
业务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或者说注意业务为政治运动服务,产生了一批颇有学术积累和学术研究价值的《目录索引》。现分三个部分进行说明和分析。

第一,如果说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文化大革命”的启动,那么,1966年6月1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则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期间,从启动到爆发,从学术争鸣到政治斗争,有个渐渐升温的过程。正是在这个临近爆发的关口,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室连续编辑了《侯外庐论著作目录》(1—4)。此时,值得注意的是:编辑者没有在标题中,对侯外庐使用后来类似“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称呼,只是使用了中性的语言。那么,是否就可以证明这是单纯的学术活动,是在为侯外庐作学术总结呢?应该不是!确切的事实是侯外庐已经被列入了有待批判的行列,否则也就不会于1967年有“供批判用”目录出现了。另外,1966年6月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编的材料被上海的同行收藏,说明这两个单位信息和资料的交流,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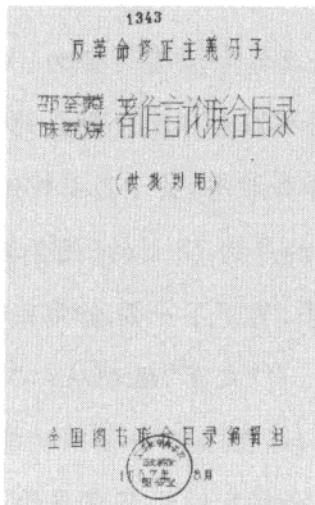
第二,查阅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所收藏的外地图书馆《目录汇编》,可发现一组共达13项的大型工程,即有署名“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辑、“北京图书馆印发”的《联合目录》。由此可说明:在1967年5月至12月间,趁着在全国掀起的“大批判”高潮,以北京图书馆为中心,联合全国各主要图书馆,组成了一个有计划、有指挥,既分工又合作的大型编辑网络,从图书情报系统的角度,对一系列“大批判”人物的著作和言论进行搜索和汇编。

以现在留存的情况看,这项颇具规模的工程向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所谓的“走资派”系列,如《中国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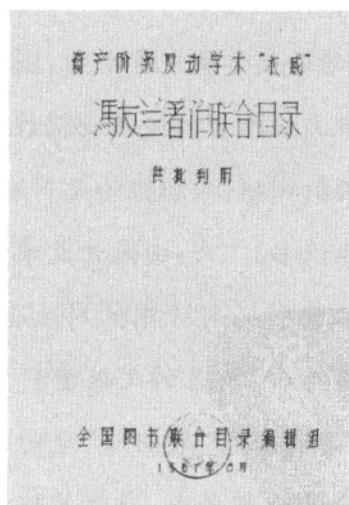
路当权派刘少奇言论著作联合目录》、《中国另一个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言论著作联合目录》、《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杨尚昆言论著作联合目录》、《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言论著作联合目录》等。另一个方面是所谓的“牛鬼蛇神”系列，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著作联合目录》、《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邵荃麟、陈荒煤言论著作联合目录》、《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朱光潜著作联合目录》、《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著作联合目录》等（另外，该编辑组还有一份“仅供内部参考”的《关于国民党伪反省院、感化院等反动机关刊物联合目录》，也应引起注意）。



1967年5月，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印发《中国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言论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参考用)



1967年8月，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编辑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邵荃麟、陈荒煤著作言论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1967年8月，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编辑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著作联合目录》(供批判用)

应该承认,因为是全国图书馆系统的联合运作,资料全面,技能专业,其辑录出的《目录》便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如关于刘少奇、周扬的《目录》各达到 20 页;田汉的《目录》达到 29 页,侯外庐的《目录》达到 26 页等。同时,应该承认当这个全国联合系统向外发散工作结果的时候,其传播的功能一定是巨大的。由此可以断论,这个“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在“文革”“大批判”运动中,主动出击,积极配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除了以上全国性图书馆系统的联合运作外,各地也有一些图书馆注意结合馆藏和地方特点,抽调人力、物力,编印供“大批判”使用的《目录索引》,如南京博物院红色联合战斗队编印的《刘少奇在江苏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目录》(1940—1965)、江西大联筹史学批判联络站和江西师院井冈山兵团历史系资料组编印的《三反分子方志纯之流报刊主要文章、讲话、回忆录索引》、新北大公社《批翦联络站》、《红史兵》编印的《反共老手翦伯赞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散布的反动言论汇编》等。

同时,在这组材料中,还可见到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文革小组、革命近代史所文革小组、图书馆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的《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北京图书馆全体革命群众的《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积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关于图书馆流通工作的倡议书》。又:由南开大学图书馆编印的厚达 77 页的《教育革命资料目录索引》,则从非批判性质的角度着手,留下了一份全面反映“文革教育革命”情况的文献资料。这就证实,当“文革”运动从以“烧书、毁书”为特征的“破四旧”走向“大批判”以后,图书馆的各项功能也处在渐渐的恢复之中,当然其政治指向是符合特定的形势需要的。

由此可见,当这些地方和基层图书馆的工作,与全国及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图书馆系统的合作,形成呼应和互补,便再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时图书馆系统参与“大批判”运动的深度和广度。

四、关于图书馆类的资料、刊物

**“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收藏的图书馆类资料、刊物目录一览表**

序号	日期	篇 目	署 名	排印	页数
1	1967.8.16	《倡议书》	上艺司、工总司上海图书馆革命造反派；同济、交大、复旦、华师大、化工学院、财经学院、政法学院革命造反派	铅印	1
2	1967.8.29	《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积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关于图书馆流通工作的倡议书》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大专院校科学院组翻印自北京图书馆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倡议书》	铅印	1
3	1967.9.19	《彻底肃清反革命两面派陶铸两本书流毒大会特刊》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	油印	28
4	1967.9.20	《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办馆路线大会特刊》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	油印	46
5	1967.9	《图书馆战报》第2期	同济大学图书馆大批判联络站	油印	10
6	1967.11.7	《图书馆战线》第4期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公共图书馆组	油印	22
7	1967.11.27	《图书馆战讯》第1期	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主办	油印	8
8	1967.11	《图书馆通讯》第4期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大专院校科学院组	油印	38
9	1967.11	《图书馆通讯》第5期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大专院校科学院组	油印	26
10	1967.12	《图书馆通讯》第6期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大专院校科学院组	油印	32
11	1968.1	《图书馆通讯》第7期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大专院校科学院组	油印	24
12	1968.3	《图书馆通讯》第8期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大专院校科学院组	油印	18

说明与分析：

“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图书馆类资料、刊物现存12种，其中资料类4种，自编刊物类8种，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资料类。现存两份《倡议书》和两份《大会会刊》。《倡议书》分别由工总司、上艺司市图书馆系统革命造反派、同济、交大、复旦、华师大等高校革命造反派发出，以及有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翻印来自北京图书馆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倡议书》等。《倡议书》认为：“为了配合大批判、大斗争，我们要把应该流通的书籍送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送到红卫兵小将中去。对于某些坏作品或有错误的书籍，就应该由他们来分析、来鉴别、来批判，藏起来加以禁止，是不妥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由此，《倡议书》提出：要积极做好图书流通工作，建立毛主席著作阅览室，举办批判毒草报告会等，“除涉及国家机密书刊、黄色书刊、反动分子著作凭机关介绍信借阅外，其他书刊都可以公开借阅”。两份《大会会刊》则记录了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召开的会议，尤其《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办馆路线》一册，汇集了“上海图书馆革命造反兵团”、“松江县图书馆”、“上海工人俱乐部文化宫大批判联络站”等单位，分别针对城市、郊县和工人等图书馆“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而展开的批判和讨论。当然，不能简单地说这些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它在表达“文革”运动进行“斗批改”阶段后，图书馆系统所发生的情况和变化方面，却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作用。

第二，自编刊物类。现存8份共四个种类，其中有同济大学图书馆大批判联络站编印的《图书馆战报》第2期；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公共图书馆组编印的《图书馆战线》第4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战讯》创刊号；以及有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大专院校科学院组主办的《图书馆通讯》第4、5、6、7、8期等。这个如

此密集的由各图书馆自编刊物的布局和阵势，说明自 1967 年下半年起，上海图书馆界的政治批判活动和业务活动开展得相当活跃。



《图书馆通讯》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
站大专院校科学院组主办

现以《图书馆通讯》第 4、5、6 期的目录为例：

第四期

1. 上海市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革命造反派
负责同志会议胜利召开 本刊通讯员
2. 图书馆革命造反派也要在复课闹革命中立新功 本刊社论
3. 同济大学图书馆为复课闹革命服务情况汇报 同济大学图书馆
4. 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情况汇报 复旦大学图书馆革命委员会
5. 华东师范大学代表发言纪要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6. 谈谈我们如何为复课闹革命服务的 上海水产学院图书馆
7. 我们如何对毒草图书进行消毒的？ 上海外语学院图书馆
8.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办馆路线 上海财经学院图书馆

9. 上海高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革命造反派负责同志

讨论“复课闹革命”会议纪要

10. 上海市大专院校科学院图书馆斗批改联络站

最近工作安排和活动初步打算

第五期

1. 上海市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流通阅览工作

会议胜利召开 本刊通讯员

2. 高校图书馆革命派要在教育革命的大风浪中奋勇

前进 本刊编辑组

3. 关于研究所图书馆如何进行斗批改的一些粗浅看法

.....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图书馆

4.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流通工作的情况汇报

.....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

5. 上海机械学院图书馆流通阅览工作在

复课闹革命中起了那些作用 上海机械学院图书馆

6. 把珍贵的文化大革命资料搜集起来——华东纺织工学院图书馆搜集革命文献的一些体会 华东纺织工学院图书馆革命造反派

7. 图书分类法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大破大立

..... 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中外文分编组

8. 上海市图书馆斗批改联络站大专院校科学院组召开各馆流通阅览负责同志会议(记录稿摘要)

第六期

1. 上海市大专院校科学院图书馆采编工作会议胜利召开

..... 本刊通讯员

2. 采编工作必须大破大立,为教育革命服务 本刊编辑组

3. 同济大学图书馆采编工作批改情况 同济大学图书馆

4.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采购路线 …… 上海机械学院图书馆采编组
5. 肃清修正主义办馆路线在我馆图书分类上的流毒
……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采编组
6. 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馆采编工作中的流毒
…… 复旦大学图书馆采编组
7. 对“科院法”的批判与增补——略谈过程、体会及教训
…… 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中外文分编组
8. 向上海图书馆界革命造反派学习
…… 浙江农大、医大、杭州大学参观代表联合发言
9.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文化大革命资料工作简报
…… 华东师范大学文化革命资料组
10. 彻底斩断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伸向全国高校
图书馆的黑手…… 新华东纺织工学院革联指图书馆联合革命造反派

如果说以上资料类《倡议书》方面的内容,只是大概地说出了当时图书馆界开展“斗批改”的设想,那么,通过自编刊物类《图书馆通讯》第4、5、6期的目录,则可全面地看到了以上海图书馆界为典范的活动情况,其具体表现为:1. 上海图书馆界已分系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组织构架,如成立了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并下设公共图书馆组、大专院校科学院组等。2. 虽然这个组织构架暂时没有党政系统的关联,却在“文革”运动非常态的情况下,出于“斗批改”的政治需要,仍积极地召开了许多会议,开展了许多活动,如上海市大专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组就召开了流通阅览工作会议、采编工作会议等,在业务和学术层面上做了许多调整、加强和推进的工作。3. 在开展的各类活动中,不仅注意同行间的平行交流,还注意走出去和请进来,如复旦大学图书馆就组织人员到北京、天津去考察;浙

江各大学图书馆也组团派人到上海来学习。4. 在以各大学为主的图书馆开展的具体活动中,有政治批判性质的,如“肃清修正主义办馆路线”、“对毒草图书进行消毒”等;有服务性质的,如介绍如何为“教育革命”和“复课闹革命”服务的经验;有业务探讨和改进性质的,如研究图书采编、分类和流通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有开辟新领域性质的,如华师大、华纺、师院等院校重视对“文化大革命”资料的搜集和开放等。

综上所述,当所有这些工作层面展示在同一个平台上,便可立体地显示出上海图书馆界的多重面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这批图书馆类的资料和刊物,可为将来研究和撰写“文革”时期的图书馆史,提供宝贵的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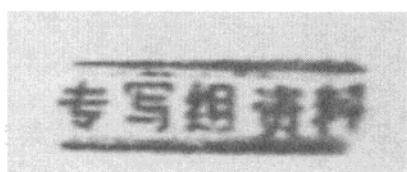


附六：

“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交换资料中的印章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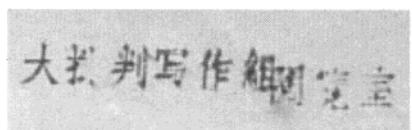
一、上海印章举例

1. 专写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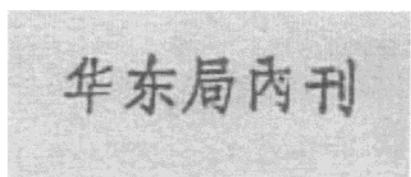
《刘少奇在党的组织路线上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北京矿院东方红批斗刘邓陶专案组，1967年3月4日。

2. 大批判写作组



《刘少奇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工贼》，上海市总工会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宣)，1967年5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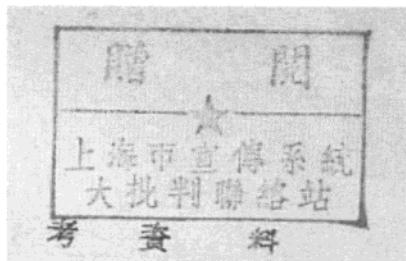
3. 华东局内刊



《刘少奇反动的资产阶级“建国纲领”——“天津讲话”评注》，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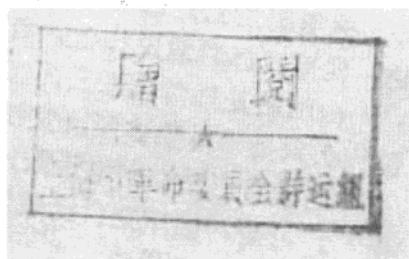
大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血战到底》战斗队翻印,1967年4月6日。

4. 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联络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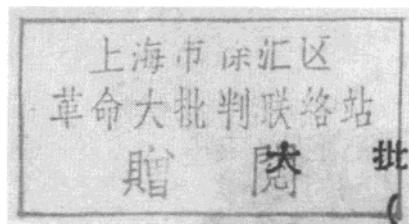
《参考资料》，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联络站印，1967年10月27日。

5.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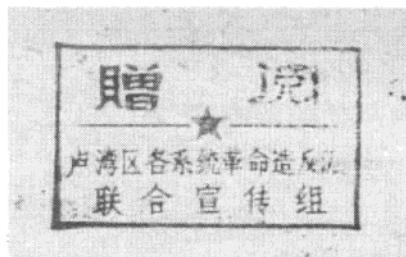
《刘少奇在华东地区的代理人魏文伯最近交出的假检讨》，华东局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印，1967年8月。

6. 上海市徐汇区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简讯》第 12 期,徐汇区教育系统革命造反派大批判联络站,
1967 年 10 月 27 日。

7. 卢湾区各系统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组



《大批判资料汇编(卢湾区宣传栏第 13 期)》,卢湾区革命委
员会大批判联络站宣传组、各系统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组。

8. 长宁区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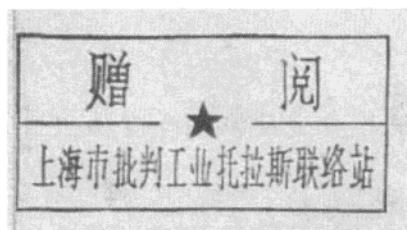
《大批判通讯》第 3 期,长宁区革命大批判联络站编印,1967 年 9
月 5 日。

9. 上海教卫战报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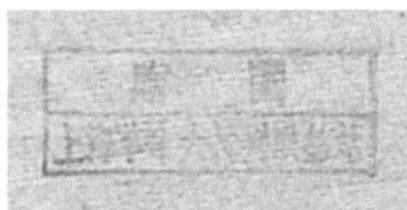
《教卫战报——郭仁杰问题专刊》,1967 年 8 月 20 日。

10. 上海市批判工业托拉斯联络站



《刘少奇在海南的“政治经济学学习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纪要》

11. 上海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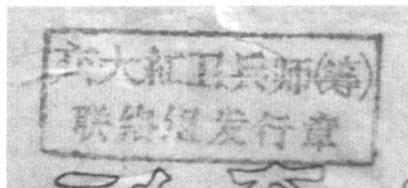
《大批判专栏资料选编(第一集)》,上海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12.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总部材料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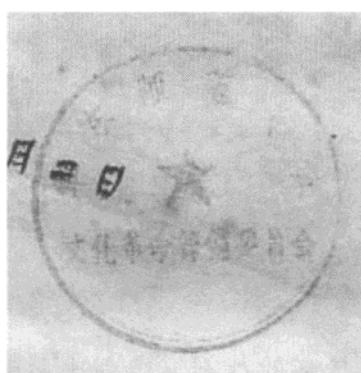
《毛主席的革命活动简介——韶山陈列馆馆长马楚清同志的报
告》,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总部材料组,1967年3月。

13. 交大红卫兵师(筹)联络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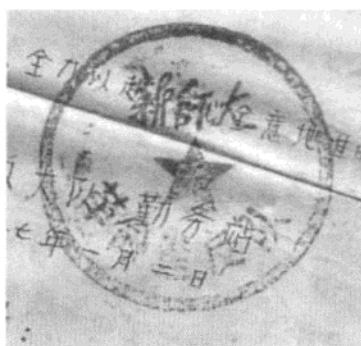


《动态报》第 29 期,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师(筹)动态组编,1967 年 6 月 1 日。

14. 华东师范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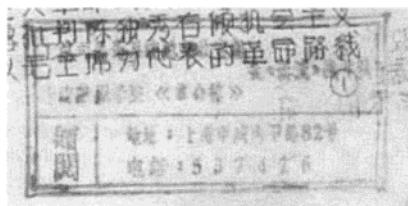


15. 新师大革命造反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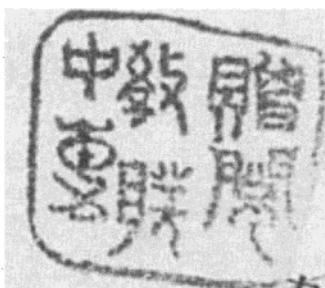
《关于革命造反队集中整风学习的紧急通知》,新师大革命造反大队勤务站,1967 年 1 月 2 日。

16. 工总司房管系统总部、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批《洪流》战斗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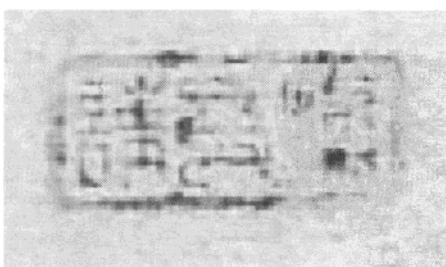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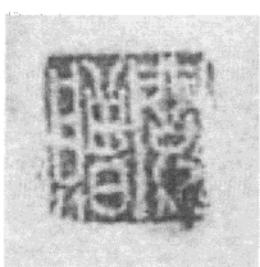
《不许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评反动电影<革命洪流>》

17. 中专教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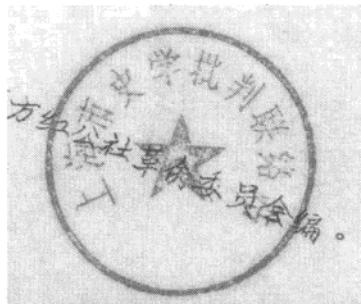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争朝夕第30期),上海市中专技半工半读学校教工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主办,1967年9月5日。

18. 《教育批判》编辑组



《教育批判》,(参考资料)第3辑,上海革命教育出版社革命造反战斗队《教育批判》编辑组编。

19. 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



《三反分子夏鼐文章中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考古研究所
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编，1967年5月10日。



《批判翦伯赞文章拟目》

20. 上海社会科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历史研究所革命造反队



《毛主席论理论工作(试编本)》，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
1968年7月。

21. 上海社会科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历史所反修战斗队



《“走资派”杨永直在局电影系统搞假“四清”的部分反动言论摘要汇编》，社会科学院、东方红电影厂打杨专案小组，1967年8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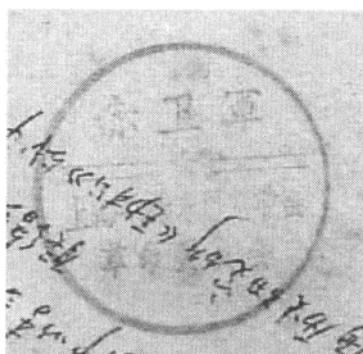
《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上海社科院革命造反兵团印，1967年1月25日。

22. 上海社会科学院革命造反兵团



《请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尹达的真面目》，中国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革命历史研究所文革办公室，1966年10月25日。

23. 赤卫军上海毛泽东思想学会革命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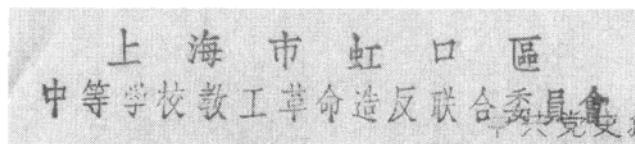
《“北京饭店会议”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揭开北京饭店会议的内幕》，市委办公厅行政研室，1967年10月12日翻印。

24. 上海市经济战线大批判联络站



《榆林港的秘密——揭开刘修〈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的内幕》

25. 上海市虹口区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中共党史批判资料——关于党内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资料选编》

26. 松江县级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广播站战斗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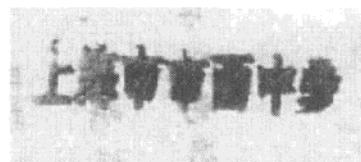
《揭发控诉旧县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扼杀广播事业的滔天罪行》

27.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市曹杨五中永向前战斗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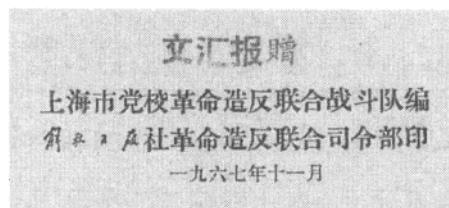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第1集),上海市曹杨五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永向前战斗队编,1966年12月22日。

28. 上海市市西中学



《张平化、王任重、陶铸通知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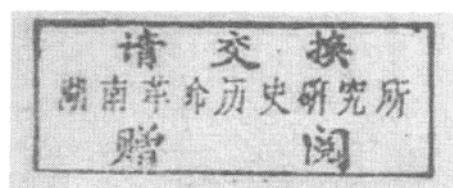
29. 文汇报赠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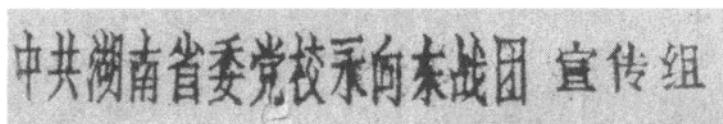
二、外地印章举例

1. 湖南革命历史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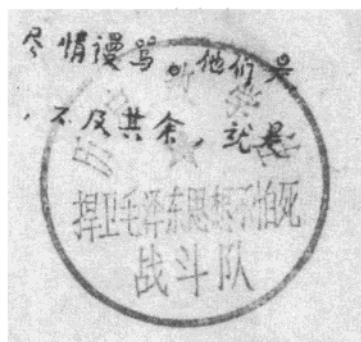
《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摧毁“省无联”围剿黑三线》(批判学习资料之三),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支左办宣传组编印,1968年3月。

2.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永向东战团宣传组



《彻底批判“省无联”的反动〈纲领〉和〈决定〉》,1968年。

3. 天津《历史教学》社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怕死战斗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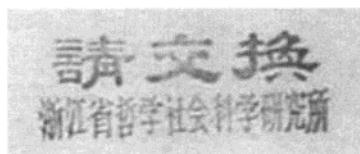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梁寒冰在天津的四次黑讲话》,历史教学社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怕死》战斗队,1967年5月。

4.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革命联络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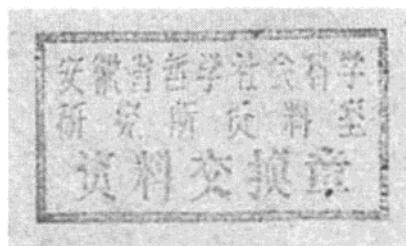
《彻底清算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山东的代理人尊孔复古的滔天罪行——揭开孔子讨论会的黑幕(发言稿)》,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等编,1967年7月。

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院研究所



《毛泽东诗词学习资料汇集》，1968年2月。

6.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资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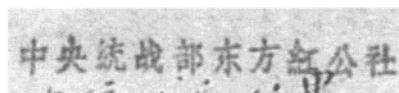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院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委会编印，1967年底。

7. 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总站史学分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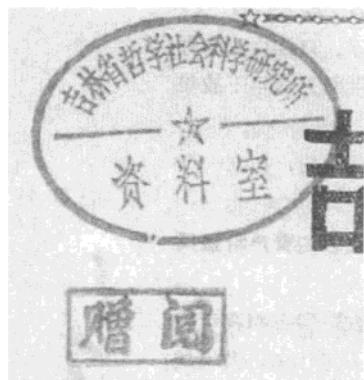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新北大历史系《遵义》战斗队，1967年4月。

8. 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



《声讨刘邓黑司令部的重要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冰的滔天罪行》

9.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吉林省斗批改简报》第 35 期(总第 105 期),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1967 年 11 月 14 日。

10. 红色造反者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宣传部



《给全国各省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告别信》,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宣传部。

11.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潘复生同志谈文化大革命问题》,1968 年 3 月 13 日。

12. 内蒙语委、哲学社会研究所东方红鲁迅兵团



《乌兰夫的黑报告、黑文章目录》，斗批乌兰夫文史联络站编印，
1967年7月。

13. 南京大学八·二七兵团对外作战部



《感谢信》，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红色造反兵团，8月
30日（纪念八·二七1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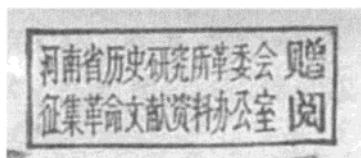
14. 捍卫毛泽东思想苏州交电公司红色造反指挥部



浦江文庫
老舊書
PDG

捍卫毛泽东思想苏州交电公司红色造反指挥部传单

15. 河南省历史研究所革委会征集革命文献资料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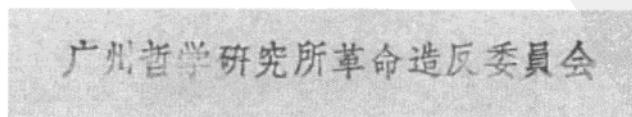
《史学风雷》第三期、《史学战线》第四期(合刊)。

16. 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第玖中队部



《以刘子厚为首的河北省委以万晓塘为首的天津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五种表现形式》，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等印。

17. 广州哲学研究所革命造反委员会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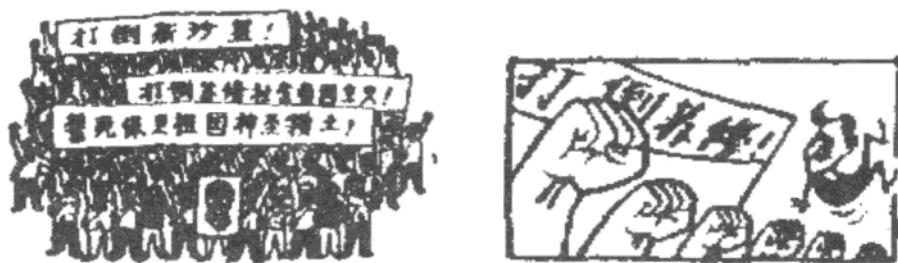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深挖洞”——以上海 1969 年至 1978 年的人防工程为中心

一、缘由与背景

1965 年“文革”运动前夕，因援越抗美的形势需要，按照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各区均建立人民防空办公室，以致形成了市、区两级的人民防空指挥体制。据统计，至 1968 年，全市共修建人防工程达 17 余万平方米。^[1]“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深挖洞”运动，缘起于中央高层对 1969 年国内外形势的综合判断，以及处于“文革”运动中的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参与。

1969 年 3 月，中苏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2]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爆发了排山倒海般的示威游行，“打倒新沙皇”立即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认同和口号。4 月 1 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引用了毛泽东对国际大势的判断“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3]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们要准备打仗”，“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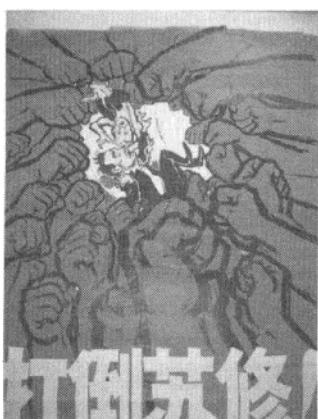


1969年3月19日《红小兵报》

“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为了胜利(此处指打仗)，就是要人多一点了”，“各方面的人，不管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接着，毛泽东列举了山东、山西、云南、贵州、四川及华东等地“文革”两大派的冲突问题，表示“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毛同时又指出地富反坏那班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4]由此，毛泽东在号召“准备打仗”的时候，极其用心地利用外在的矛盾，既提出消弭内在矛盾的要求；又揭示内在矛盾的要害所在。那就是将国外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的危险，与国内地富反坏迎合的可能联通起来，进一步迫使各地区的派别冲突趋于和缓。其实，这是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重要思想定位，即各省市的派别冲突，在本质上不是“阶级斗争”的构成和表现(性质上属“人民内部矛盾”)；“阶级斗争”对外表现为“战争”的可能，对内表现为地富反坏“破坏”的可能。所以，现实的任务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此间，苏军屯聚人马，集结边境(以往苏军在蒙古没有驻军，后增加至八个师)，修建一系列空军和导弹基地；苏方领导人也一再放出随时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的战争言论；连英、美报刊也报道，苏方已向华盛顿等试探，要“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5]⁶

月，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8月，毛泽东先后批准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八·二八”命令》。《命令》共列九条，以极其严厉的措词正告一切群众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实行大联合；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则“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等，总之，“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6]接着，9月8日，毛泽东在审阅国庆二十周年口号时，亲自就“准备打仗”追写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7]同月22日，全军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8]23日、29日周恩来又亲自指挥，连续成功地进行了两次核爆炸，以显示粉碎战争挑衅的必胜信念。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是在一片刀光剑影中，上海全城紧急动员，开展了“深挖洞”运动。

然而，半年过后的 1970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中，却对形势作出了转折性的判断。他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9]同年 11 月，毛泽东在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的批示中，也只谈了具体的意见和办法，而没有再说“世界大战的危险”等之类的话题。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潇洒而轻松地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当谈到中国与俄国（苏联）的关系时，毛泽东又幽默而轻巧地说：“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10]此时，剑拔弩张的态势如同音乐变奏般地陡然舒缓起来，但“深挖洞”运动并没有停息，仍然在上海等各大城市平稳地开展着。

1973 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新年献词》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新近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是毛泽东借助《明史·朱升传》的故事，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就此，“深挖洞”运动一直在上海等各大城市延续性地进行着。直至 1978 年，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明确要求“人防工程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单建式人防工程基本停建，“深挖洞”运动才告终结。

二、“深挖洞”的三个阶段

上海的“深挖洞”运动大约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9 年秋冬)：紧急动员与开挖临时简易掩体阶段。

1969 年 8 月下旬，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

告》(27 日)和《“八·二八”命令》(28 日)下达。如果说此前“要准备打仗”的口号,更多地具有宣传动员的色彩;此次消息却是自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以来,正式向群众发布的战备动员令。31 日,全市以文化广场为中心会场,举行“响应中央‘八·二八’命令”的有线广播大会。据历史学家谭其骧《“文革”日记》该日记载:回校听广播“四时后游行,至五时”;以后 9 月 1 日至 5 日“上午天天读,学习 8·28 命令”。^[11]战争似乎一步步逼近了,一种激昂夹带着紧张;紧张夹带着忧烦;忧烦夹带着惶恐的情绪,迅速地在这座城市的各类人群中流传着、扩散着。上海砂轮厂的青年职工听完传达后,立即上挂刘少奇的“活命哲学”,批斗了厂里的一个叛徒。他们认为砂轮是工业的牙齿,希特勒进攻苏联时,首先炸毁砂轮厂。于是,有的青年主动退掉公交月票住进工厂,声称要“保卫工厂,保卫生产”;有的女青年当场剪掉长辫子,表示“打起仗来没包袱”;有的青年甚至直接到工厂所在的闸北区武装部要求参军。当然,也有人议论纷纷,如第一人造纤维厂的部分青年职工认为:“中苏都是大国,苏修还要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要大打是不可能的”,“要打也打不到上海”(可谓“小打在边疆,大打在北方,上海在后方”)。十六漂染厂有年轻母亲忧虑地说:“自己在战争中被打死,小人怎么办,想想真不安”;卫星铁木家具厂有一青年公开说:“打仗很吓人的,真打起来,我就勿敢上班。”^[12]9 月 16 日,上海工总司在直流电机厂召开“战备教育现场经验交流会”,向全市各区、局联络站宣讲该厂一学(结合形势,学毛主席论述,学党中央号令);二忆(忆阶级苦、民族恨);三批(批苏修、刘少奇的谬论);四找(对准战备要求,找差距)的经验,以求端正思想,振刷精神。^[13]但社会上仍然传言四起,空气紧张而凝重,按当时的话语体系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又在蠢蠢欲动,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吹阴风,点鬼火,配合帝修反的战争叫嚣。他们有的利令智昏,散布种

种政治谣言，蛊惑人心，制造混乱；有的公开为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帮腔、辩护”，以至社会上出现了“群众盲目抢购物资，囤积生活用品”的情况。^[14]

1969年10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通知》，决定将上海市人民防空委员会改为上海市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并从驻沪三军和地方抽调人员组成上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地址为复兴中路593号）。同时要求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建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指定专人负责）。18日，市革委会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传达林彪在苏州发出的“加强战备，防止敌人袭击”的动员令（即“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并迅速在各基层单位组织传达和讨论。“德国袭击苏联、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袭击”等宣传资料，不仅连连刊发在报章上，^[15]更在各种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正是在这种临战的气氛中，大约自10月下旬起（不少地方18日晚即挑灯动工），上海的各企事业单位、各街道居委会紧急发动，广泛出动，寻觅房前屋后的各种空地、荒地，包括院落、操场、堆场、绿地，甚至天井、过道等，开挖战时防空壕和掩体。有的单位则着手清理、修整原有的防空洞和地下室。以地处闹市的黄浦区为例，在这一时期共开挖简易掩体1774个，计2.6万平方米；防空壕137条，计4000平方米。整修大楼地下室5万平方米；改造大楼隔水层、半地下室4万平方米等。^[16]再见此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文革”日记》，其中11月1日记：“工作至下午三点半，回寓吃点心。四点四十到四幢楼旁工地集合，五时四十开工，参加建筑地下室工程，至夜半十二点一刻收工，至中灶食堂吃半夜饭而回，就寝时已一时许”；11月7日记：“下午防空演习，约一小时”；11月10日记：“上午天天读后挖防空洞，中间上楼，结束河南幅定稿登记”（谭正在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工作）；12月4日记：“劳动，挖防空洞”。^[17]1969年秋

冬之际,为了战备防空,整个上海到处可见青灰的堆土,到处可见忙乱的人群(11月,南市区王家嘴角里委发生掩体塌方,一里委干部身亡)。至年底,全市(市区)共挖掘各种防空壕沟和掩体 50 万平方米,架设防空警报器 100 多只,疏散人口 20 多万。^[18]上海郊县则因地域开阔,更是效果显著,如金山县至年底共挖防空洞 61 674 个、防空壕 6 422 个。^[19]

然而,所有这些防空壕和掩体都是临时性的,都是在匆忙和慌乱中挖掘的,尽管其构造上有“丁”字、“人”字、“E”字、“S”字等型,但毕竟既没有水泥的基础,又没有钢筋的支撑,总体上十分粗糙和简陋。所以,当空袭并没有降临,严冬却渐渐地降临时,这些简易防空壕和掩体也就很快地在冰雪和寒风中废弃了。

第二阶段(1970 年 1 月至 1972 年 11 月): 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阶段。

1969 年秋冬由“加强战备,防止敌人袭击”的紧急动员令引发的危机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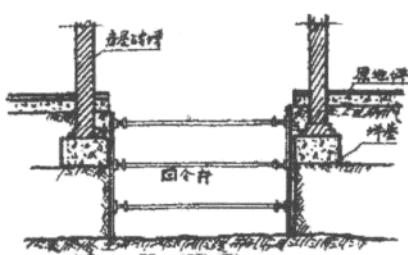
一种“大炮还没响,何必太紧张”、“听听紧张,看看平常”的情绪开始在群众中传染性地扩散。为此,报刊的“工农兵论坛”、“评论员文章”等在指出“我们有些同志的战备思想却像温度表里的水银柱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时,反复批判“形势紧张就惊慌,形势缓和就麻痹”;“战备像个橡皮筋,长点短点不要紧”等和平思想;反复强调“即使千日不打,不可一日不备”;“思想上时刻准备打,工作上经常落实打,作风上随时适应打”,真正“自觉地用战备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20]这一套充满“文革”韵律和“文革”色彩的宣传语言,不仅鲜明地为那个时代留下了痕印,确也说明当时上层对战备形势的认识。

1970 年 1 月 13 日,根据市革委会的指示,上海市人防办组织各职能部门的干部远赴北京、天津考察,吸取首都等城市人防战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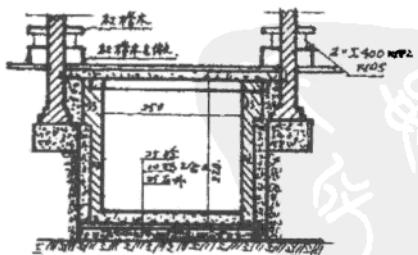
的经验。^[21]2月27日,市革委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上海的人防战备工作。会议在听取市人防办的总体汇报后,对进一步修建上海人防工程等事宜作出了决定和部署。3月8日,市革委会、市人防办联合在人民大舞台,召开“上海市赴京、津学习人防战备工作经验汇报会”,号召全市各单位以“自建”为原则,发动群众,因地制宜,修建半永久、永久性的人防工事。自此,上海的“深挖洞”运动进入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阶段。

上海这一阶段的“深挖洞”运动,具体表现为“房子底下挖洞”和“砖混结构式地下通道掩体工程”等两种类型。

当时(1970年2月),黄浦区长沙路街道新桥居委的7户居民,根据市区大楼密集的特点,利用大楼隔水层(地垅)将住屋地下挖掘连通成室内防空掩体,这一经验率先在黄浦区推广,甚至在全区兴起“房子底下挖洞热”。^[22]同时,虹口区横浜桥街道也利用上海老式住宅在底层地坪构筑“隔水层”的特点,前后在229幢(间)不同结构的房子底下挖洞,从小面积的通道到大面积的地下室;从单间开挖到整幢房子开挖;从2米深挖到3米深,共构筑了4500余平方米的防空工事。黄浦区、虹口区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市人防办的批示赞同。经摸底调查,全市可供利用整修大楼隔水层(地垅)修筑防空工程的使用面积10多万平方米,^[23]例如静安区就借助该经验,由区房地局组



开挖时支撑示意图



60平方米房间开挖及扛撑剖面图

1970年房子底下挖洞施工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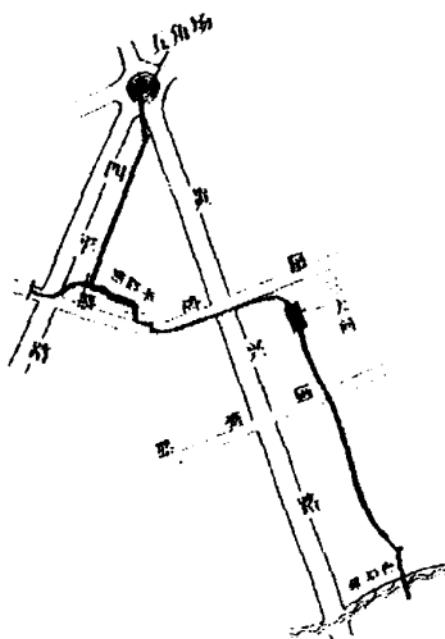
摘自《上海人防志》,第223页

成工程队在房子底下挖洞 150 个,使用面积达 15 770 平方米。^[24] 1974 年,上海这一结合城市特点,构筑人防工程的经验曾向全国作了介绍和交流。

当然,这一阶段更主要的还是“砖混结构式地下通道掩体工程”的构筑。自 1970 年 3 月份起,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各街道居委等就以“单位包干”的形式,组织动员群众性施工。

因上海地区土质松软,固结变化低;加之整个工程为配合政治形势,而求数量、求速度、求覆盖面,强调依靠群众,强调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故这些地下通道掩体工程均资金投入少,科技含量低,多以基坑开挖式施工为主,即人工用锹、镐等开挖,用箩筐、推车等运土,就地取材,建造小窑炉,烧砖作料,辅以砂石、水泥和钢筋等,构筑号称“半永久、永久性的人防工事”。1970 年 8 月,市人防办制定了《关于上海市构筑人民防空工事的规划》。规划按市区 600 万人口和郊县 70 万城镇人口计算,尚需构筑人防工事 170 万平方米,其中,市区街道居民新建 100 万平方米,工厂、企事业单位、机关、大学增建 50 万平方米,郊县城镇构筑 20 万平方米。^[25] 所以,在此前后许多地区、许多单位投入人力、物力,有组织地开展新一轮“深挖洞”运动。例如 1970 年 4 月,黄浦区民兵结合“房子底下挖洞”,将南京路等四条干道开挖贯通,形成跨越 26 条马路,穿越 28 幢大楼,连通 116 家商店、45 个单位的地下通道式布局。^[26] 同月,徐汇区华山路一条街工程(长 850 米,面积 1 020 平方米);徐镇路街道工程(长 600 米,面积约 9 090 平方米)宣布开工。^[27] 9 月,南市区组织 1 000 余名民兵,动员各基层单位 7 000 余人次参加施工,构筑自陆家浜路到高雄路全长 1 600 米的钢筋混凝土防空洞,总面积 7 000 平方米。^[28] 11 月,虹口区乍浦路、横浜桥、长春路三个街道及有关单位,合力构筑四川北路、天潼路至虹口体育场的地下通道工程(简称“1127 工程”),全长 5 210 米(后

因故未挖至终点)。^[29]同年,闵行地区采取工厂、地区共建,分段分块负责施工的方案,其人防通道工程始于沪闵路、江川路口,向西延伸至东风一村、汽轮、电机、红旗新村;向南扩展至闵行老镇,力图修筑一个完整的地下构造。后因资金、材料等问题,该工程只修筑南至体育场的一段等。^[30]与此同时,全市性的重点人防工程,如江湾五角场地区利用日伪占领时期遗弃的大型排水道改建的“01”地下工程,由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调集兵力秘密施工(1972年4月竣工。南起松花江路,北至五角场中心花坛,西至四平路平昌街,全长2610米,总建筑面积13844平方米,总使用面积10803平方米)。^[31]肇嘉浜路人防疏散干道工程经批准上马后,则组织300余单位的30余万人次参加劳动(1971年3月开工,1972年5月竣工,东连卢湾区、西至徐家汇,全长3400米,高宽各2米,建筑面积11490平方米,使用面积5984平方米),^[32]均快马加鞭,积极完竣。



1969年12月“01”工程示意图
摘自《上海人防志》,第260页



1969年人民广场通道工程示意图
摘自《上海人防志》,第224页



徐汇中学人防工程开工誓师大会(马学强提供)

1970 年 10 月,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曾来上海检查人防工程建设质量,在巡视了人民公园、“01”等人防工程的“三防”设施后,以军事需求和城市安全为标准指出:上海的人防工程“数量不多,质量不高”。为此,王洪文(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提出:一、人防工作也要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二、前阶段的人防工作是有成绩的。三、要不断提高人防工事质量等应对性的意见。^[33]但是,整个上海人防建设的规格定为“隐蔽工事”,强调的是“人海战术”、“土法上马”。尽管市区的人民公园、虹口公园、蓬莱公园、静安公园等多数园林,为敞开开挖地道的空间而长期闭园;尽管人民群众群策群力,前仆后继,甚至在徐镇路人防工地发生死 3 人、伤 6 人的重大事故,^[34]事实上却一直没有规划、资金、科技和机械等方面的保证,又怎能真正做到实质性地提高工程质量呢!

1971 年 7 月,第二次全国人防工作会议确定人防战备工作重点是城镇(上海市确定为重点城市),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便持续发展。例如据谭其骧《“文革”日记》1971 年 10 月 6 日记:“下午工作至五点,布置明天挖防空洞”;10 月 7 日记:“今起挖防空洞,下午七时半至十一时一刻”;10 月 8 日记:“继续挖防空洞,三点毕,上保健科”;10 月 9 日记:“继续挖防空洞,三点毕,劳累甚,腰痛,回家即僵

卧。”^[35]一个大学的著名教授,一个体弱的老人,必须不例外地进入挖掘防空洞的现场,直至“僵卧”,这不仅是当时群众性施工的真实写照,更是这一群众性施工阶段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特征。

第三阶段(1972年11月至1978年10月):统筹型投入资金,提高规格,注重利用的阶段。

如果说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仍属临战时的应对措施,确实不能保证人防工事“半永久、永久性”的质量,那么,1972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人防工作所需经费、材料解决办法》和财政部有关分配人民防空经费指标的精神,规定了国家预算拨款资金的落实,确实为提高人防工程的规格,并注重对人防工程的开发利用,注入了一些生机和活力。其实,这一战略措施的改变,与整个国际局势的趋动有关,即中美关系的建立,迫使中苏从边境冲突、军事对峙走向谈判。1973年元旦,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的国家战略定位。以致多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战备工作,开始由中心型向日常型发展;由突击型向常备型变化。

据统计,1969年以前,上海没有统一的人防工程经费。1970年,上海大力推进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阶段时,开始为修建地下防空工程下拨专款,每平方米建筑面积40元。^[36]1972年,国家预算为人防工程建设投入资金,上海年度为3500万元。为此,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组、财贸组、市人防办核准当年人防工程造价,“一般每平方米使用面积可控制在70元左右”。^[37]结果,当年上海防空经费支出3223万元,完成了人防工事38.4万平方米,^[38]平均每平方米造价达83.9元。正是在资金投入方面有了成倍的增长,上海开始有计划地修建了一批单建式人防工程。例如1974年4月,江南造船厂运用沉井式施工筑建防空地下室。该工程长43.1米,宽22.1米,高12.8米,下沉深度13.15米,顶部覆土0.7米,

总建筑面积 2 925 平方米, 总使用面积 2 231 平方米, 可容纳 2 000 人。工程上层为一个单元, 中、下层为另一个单元, 各有 600 平方米的大厅。工程有数个出入口, 可进出担架。工程还有比较完善的生活、工作设施, 设有机械通风、内外水、电源、水冲刷厕所, 有线、无线通信广播、报警装置等。^[39]一些民用建筑也开始按地面建筑面积 7.5% 由基建单位投资, 不足部分由人防投资的方式, 修建永久性的防空地下室。同时, 市人防办于 1975 年和 1976 年两次委托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举办人防工程设计短训班, 由全市各人防工程骨干单位派员参加, 历时 3 个月, 以提高技术水平和专业素质。^[40]由此, 上海的人防工程建设在“资金—技术—质量”的互动方面, 形成了良性循环。

因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受制于种种局限, 重战时、轻平时, 多为简易工程。建成后又少维护, 多损坏, 闲置在一边。1972 年, 静安区延中街道陕北居委会率先改建 680 平方米简易人防工程, 开办棉毛衫整理加工场, 成为全市开发利用人防工程的第一家。静安区人防办迅速向各单位推广此经验, 梅龙镇酒家也将大楼底下的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860 平方米, 使用面积 647 平方米)装修成仓库、办公室和对外营业的地下餐厅。^[41]1974 年 10 月, 上海仁济医院又首创利用人防工程开设普外病房, 内设 33 张床位, 一个药房间。^[42]后全市 94 所医院利用人防工程面积达 28 800 平方米, 设立 3 130 张病床。据 1974 年 12 月的统计, 当年上海累计平战两用工程达 33.92 万平方米, 比 1972 年增长了 5 倍。^[43]应该承认, 上海城市用房的局促, 使上海人对空间的利用, 具有特别的敏感和聪慧。所以, 如果说相比而言上海因水位高、土质松软, 在同等投入的条件下构筑人防工事时无甚优势, 但在利用人防工事方面却一定是独到而富有创意的。1975 年 7 月 16 日, 市人防办召开全市人防工程平战两用经验交流

会,听取静安区饮食公司等 10 个单位介绍经验,会议还组织现场参观了 18 个平战结合的典型,大大推动了全市人防工程的开发利用。在杨浦区,白洋淀人防工程共设 16 个单元,其中 8 个单元开设白洋淀旅馆;在虹口区,四川北路西湖饭店改建 200 平方米的人防工程用作营业,生意兴旺;在黄浦区,扬州饭店、鲜得来排骨年糕店、人民饭店均开设地下餐厅;在徐汇区,斜土路街道人防招待所一年接待旅客 3.06 万人,效益良好;在卢湾区,淮海中路一条街共修建“平战两用”人防工事 33 处,使用面积达 2 466 平方米。市重点地下防空“01”工程,经评估后储存水果,种植蘑菇。上海的人防工程普遍被用作旅馆、商铺、食堂、仓库、教室、会场、饮食店、办公用地、医疗场所、生产车间、文体娱乐活动场所等,既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以缓解城市用房紧张;又有所收益,使工程得到维护和修缮,以至成为上海人防工程建设的重要特色。^[44]

综观上海 1969 年至 1978 年“深挖洞”运动的三个阶段,可见在“文革”中后期,人民群众围绕城市战备工作的表现和作为。1978 年 3 月,市人防办向市委、市革委会报送了《关于加强上海市区人防工程建设的报告》,正式提出:今后一律建钢筋混凝土结构防空地下工事,标准不低于五级,做到“建一平方米、用一平方米”。^[45]同年 10 月,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提出“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方针,要求人防工程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就此,上海的人防工程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人力、物力与财力

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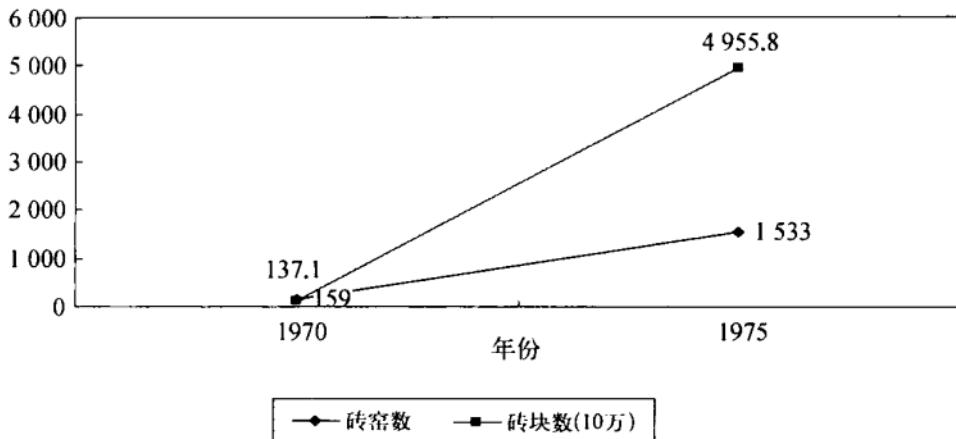
1969 年 10 月,自上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组建后,各企事业单位

都指定专人负责防空事务。随着上海的“深挖洞”运动进入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阶段,即各企事业单位,各街道居委全都各就各位,承揽责任,分工包干。1971年2月,市人防办作出规定:各区、县人防办设主任1人(兼),副主任1人(专职),工作人员10人,电话员4人。如果说这是对领导和指挥部门的充实,以健全机构,加强管理,保证上海的“深挖洞”运动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么,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以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奋战在遍布于大街小巷的人防工地上,才真正构成上海“深挖洞”运动的主力队伍。

其实,在上海“深挖洞”运动的第一阶段,广大群众就为开挖临时简易掩体紧急出动了。当时的情势似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都会出现在头顶上;炸弹、伞兵似乎随时都会从天而降,紧张、恐慌还夹杂着少许激动的社会情绪,使家家户户出动人马,急急匆匆地寻觅空旷、空闲、空隙之地开挖掩体。到了“深挖洞”运动的第二阶段,自发型的群众出动变化成了组织型的群众出动,那就是各单位(多以职工为主)、各街道(多以里弄加工厂的女工为主)组织动员群众开赴人防工程第一线,例如仅1971年2月,徐汇区肇嘉浜路人防工程就发动53个工厂、学校、街道、里弄等20万人参加义务劳动。闵行、吴泾街道的人防工程也组织万人规模的义务劳动。与此同时,因1970年以后,上海实行“砖混结构式地下通道掩体工程”需要大量的砖块,起初是发动群众找砖、献砖,致使一些好端端的砖墙、拱门都被拆掉了;后来是推广静安区江宁街道利用人防积土做砖坯,可燃垃圾当燃料的造窑烧砖经验(静安区各街道共建土窑19座),至于砖坯制作则“包干到户”,由街道居委将统一的木制砖模借给居民,每户按人口数制作砖坯上交。这样全民动员,聚沙成塔,不仅有效地解决了砖坯的供应问题,更是在社会上形成了“条条里弄搞战备,男女老少做砖坯”的热烈景象。

下面请看 1970 年(5 月)至 1975 年上海建窑烧砖情况统计图：

1970 年(5 月)至 1975 年上海建窑烧砖情况统计图



资料来源：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5 页。

据 1970 年 5 月的统计：全市共有 13 个街道、10 多家工厂、学校、医院建砖窑 159 座，烧砖 1 371 万块。至 1975 年时，全市建砖窑已达 1 533 座，烧砖 49 558 万块(按 1 000 万人口计，平均每人烧 5 块砖)，分别比 1970 年高达 9.6 倍和 36.1 倍。如此大幅度的数据上涨，固然是“深挖洞”运动规模扩大的证实，但它的内在正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投入和参与，正是以人民群众为主的劳力构筑了这庞大的地下工程。

物力：

人防建设的物资来源除了砖块由人民群众通过献砖、烧砖等办法解决外，其主要构成的钢材、水泥、木材、设备和机具等，则由市人防办根据工程规格和质量的需求，统一制定使用标准，统一控制发放定额。一般先由市人防办根据年度工程建设任务列出所需的物资计划，经统一平衡后上报。市人防办接到上级分配的指标数额后，便凭调拨单据到物资部门采购、下拨，经费则从有关人防工程经费中开支。

表一

1969—1976 年国家、上海市拨给人防工程“三大材”统计表

年份	钢材(吨)			水泥(吨)			木材(立方米)		
	合计	国家拨	上海拨	合计	国家拨	上海拨	合计	国家拨	上海拨
1969	101		101	409		409	133		133
1970	1 587		1 587	24 238		24 238	1 465		1 465
1971	2 167		2 167	42 510		42 510	1 071		1 071
1972	3 056		3 056	58 610		58 610	1 845		1 845
1973	5 112	3 150	1 962	58 140		58 140	2 600	2 500	100
1974	6 400	3 150	3 250	51 500		51 500	2 824	2 500	324
1975	6 402	3 150	3 252	39 000		39 000	3 000	2 500	500
1976	6 000	3 150	2 850	42 940		42 940	2 548	2 500	48
总计	30 825	12 600	18 225	317 347		317 347	15 486	10 000	5 486

资料来源：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7 页。

由上表所知，1969 年紧急动员与开挖临时简易掩体阶段时，上海有关方面下拨钢材 101 吨、水泥 409 吨、木材 133 立方米，数量均极少，这正印证了此阶段所开挖的简易掩体遭到废弃的必然性。1970 年上海“深挖洞”运动进入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阶段时，有关方面下拨的建筑材料不仅大幅度地增长，比如钢材数达 1 587 吨，是 1969 年的 15.7 倍；水泥数达 24 238 吨，是 1969 年的 59.3 倍，且逐年有所提高。至 1972 年国家投资后，因上海的下拨数基本不减（除木材），整个“深挖洞”运动的建筑材料用量叠加性地达到了较高的位数，比如 1975 年时的钢材数 6 402 吨（国家 3 150 吨、上海 3 252 吨）、水泥数 39 000 吨、木材数 3 000 立方米（国家

2 500 立方米、上海 500 立方米)。其间,上海还拨给人防工程建设 2 吨汽车 220 辆,推土机 1 台,挖土机 10 台等。由此,上海构筑地下工程的用料标准有所变化,例如 1972 年时,市人防办制定的标准为每平方米工程耗用钢材 8 公斤、水泥 300 公斤、黄沙 600 公斤、石子 700 公斤、砖 800 块。至 1975 年时,该用料标准为每平方米耗用钢材 40 公斤、水泥 500 公斤、黄沙石子 1 000 公斤。相比之下,钢材用料标准提高 5 倍,水泥用料标准提高 1.7 倍,说明因投入的增加、物力的增强,建筑材料的规格有所改善,工程建设的质量相对有所提高的事实。

上海“深挖洞”运动的物质来源除了国家、上海统一调配外,还有各承建单位自筹的部分。据统计,1972 年至 1974 年,除大量砖块、沙石料外,上海自筹钢材 27 769 吨、水泥 285 452 吨、木材 9 313 立方米。^[46]殊不知,这些自筹的建筑材料的总量甚至多于同期上级统一调配的量(同期上级调配钢材 14 568 吨、水泥 168 250 吨、木材 7 269 立方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般特异的情况呢?一是因为上海终究基础雄厚,国营大中型企业、高校等相对集中。二是因为上海主要采用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方式,即各单位(含街道)承揽包干。正是这两个因素的衔接和互动,当上级统一调配或不足、或迟缓、或坏损时,一方面单位有积存;一方面工地有需求,这些单位自然以自筹的名义动用固有的物资资源了。立足在这个角度,可知上海的各单位不仅为“深挖洞”运动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还贡献了大量的物力。

与此同时,因上海的人防工程建设强调“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方针,^[47]各单位在自制材料、机具方面也开挖潜力,有所作为。请看表二:

表二

1970—1975 年上海市人防工程建设清运土方、利废、自制材料工具统计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清理工事泥土	人次	4 016 417	12	市民献砖	万块	1 583
2	运土	吨	8 205 318	13	自制土水泥	吨	241 480
3	利用废水淬渣	吨	39 873	14	建烧砖窑	只	1 533
4	模型废砂	吨	127 842	15	烧砖	万块	49 558
5	利用废电石糊	吨	36 567	16	制砖机	台	586
6	钢渣	吨	163 406	17	劳动车	辆	20 432
7	石灰下脚	吨	669	18	土吊车	台	625
8	电炉粉	吨	10 273	19	拌和机	台	229
9	收集三合土	吨	415 731	20	挖土机	台	73
10	收集黄沙	吨	395	21	井点抽水机	套	157
11	收集石子	吨	191 898	22	抽水泵	台	2 334

资料来源：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8 页。[48]

表二所示，当时承接人防工程的各单位确实看到了工程任务与单位职责的一致性，即工程任务（包括建筑资金和材料）是上级下达的，但区域（包括未来受益权）和责任在于单位。这种实际的境况和利益自然促使各单位清扫库存，修旧利废，于是，一方面通过改造陈旧、闲置的设备，为“深挖洞”工程添置搅拌机、土吊车、抽水泵等机械；一方面通过利用工业废料，为“深挖洞”工程提供钢渣、电炉粉等辅助用料，且总和数量是巨大的，例如 1970—1975 年间，上海自制的土水泥达 241 480 吨；由单位提供的抽水泵达 2 334 台。事实上，机械设备的运用大大地提高了人防工程的进程和效率。当然也有专家评估，大量工业废料的掺和使用，在节约资源、降低人防工程造价的

同时,确也存在降低人防工程质量的隐患。应该承认,这些行为(含单位自筹、自制建筑材料和机具等)发生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等单位,一定存在着合理性和必然性,那就是其产权的公有性与任务的公共性的一致性。在此,应提请注意:第一个层面的“一致性”(工程任务与单位职责)是具体的,操作的;第二个层面的“一致性”(产权的公有性与任务的公共性)是抽象的、本质的。前者是后者的表达;后者是前者的根据。

财力:

本文前述中已交代,1969年以前,上海没有统一的人防工程经费预算计划。1969年“深挖洞”运动开展以后,因工程建设的需要,经单位申报和市人防办复核后,相关经费由财政部门下拨。其间大致经历“上海拨给”和“国家拨给”两个阶段,如表三:

表三

1969—1976年上海市人防建设经费统计表

金额单位:万元

上海市人防建设经费拨给统计		国家拨给上海人防建设经费统计	
年代	人防建设经费	年代	人防建设经费
1969	43	1972	3 500
1970	480	1973	3 500
1971	335	1974	3 500
		1975	3 300
		1976	3 300

资料来源: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说明:1. 1972年至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未拨款。2. 自1972年起,上海市人防建设经费列入国家预算,通过国家人防办拨给。

如表三所示,1969年至1971年为第一阶段,即由上海市拨给相关人防建设经费。据统计,1969年只下拨43万元,完全是临时应对

性质的。1970 年市革委会批转了市人防办《关于防空工事经费开支和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当年下拨经费有所增加，达 480 万元。然而，就人防工程在全市全面铺展开来的阵势和企业、事业、街道、学校等不同类型的复杂情况而言，这区区 480 万元如何拆分和下拨呢？原来，《报告》规定各工厂、企业单位构筑防空工事的经费，可在福利费、少部分更新资金中开支；各行政、事业单位可先使用本单位预算外资金，再在已经分配的经费指标中调剂解决；市区街道里弄、中小学，在街道集体积累资金、学校勤工俭学积累资金中开支；郊县城镇则由城镇集体企业积累资金支付等。所有“不足部分”，先经各级审批，再由财政部门审核后，适当予以拨款（街道里弄、中小学最多不超过经费总额的 50%）。很明显，在人防工程财力运作的第一阶段，“上海拨给”是辅助的，即上海各单位人防工程建设的基础资金、先期资金均是自行解决的，上级的拨给只是一种“补贴”。这确实是上海“单位自主型的群众性施工”阶段的特征和表现。它一方面形成了多方投入、多方参与的积极态势；另一方面也会因多方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而导致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有所差异。

1972 年至 1976 年为第二阶段，即由国家拨给相关人防建设经费。据统计，1972 年至 1974 年，国家下拨的经费为年度 3 500 万元；1975 年至 1976 年为年度 3 300 万元，均属大幅度地增长。同时，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文件就此规定，人防工程建设资金来源应为四个渠道：国家预算拨款、地方财力安排、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提取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自筹等。^[49]如果说这依然是鼓励多方负责、调动多方积极性的思路和措施，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文件还明确规定“国家补助的防空经费主要用于中央确定的重点市镇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防护工事的基本材料费用”；^[50]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和里弄居民的人防工事基本材料费，则“采取国家、集体、发动

群众参加劳动相结合的办法解决。积累较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可适当负担 10%~30% 的所需经费,其余由财政部门补助;积累较少和资金确有困难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其所需经费可全部予以补助,经费可在财政部分配的人防经费指标中解决”等。^[51]很明显,在人防工程财力运作的第二阶段,“国家拨给”是主导的,即市区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全部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部分(含中央确定的郊县 34 个重点城镇)人防工程

经费,经上报市人防办统一平衡后,由市财政部门拨款。这确实为上海后期的“深挖洞”运动,在“提高规格、注重利用”方面提供了支撑。然而,“国家拨给”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划下一条政策性的界线(从政治的角度注重所有制的差别,而不考虑人防工程的功能,对不同所有制单位人员的生命安全却是相同的),恰恰是替那个时代作了略显荒诞的注解。

关于防空工事经费开支的请示报告

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九月市革命委员会批转了《关于防空工事经费开支和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后,两年多来对促进本市各单位、各地区搞好防空工事发挥了积极作用。现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人防工作所需经费、材料解决办法和财政部《关于分配一九七二年人民防空经费指标的通知》的精神,结合上海具体情况,对防空工事经费开支等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构筑防空工事必须贯彻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勤俭搞战备的方针,人防工事要确保质量,做到坚固、适用、经济,防止贪大求洋、铺张浪费。国家补助的防空经费主要用于中央确定的重点市镇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防护工事的基本材料费用。经费使用要贯彻统筹安排,保证重点,合理使用的原则。当前应以解决人员隐蔽工事为重点,同时要尽量做到战时能用,平时也能用。

二、凡本市市区和市指定的郊县三十四个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包括中央在沪单位)的人员隐蔽工事基本材料费都在财政部分配的人民防空经费指标中解决,不要挤入成本。

1972 年 11 月 11 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防空工事经费开支的请示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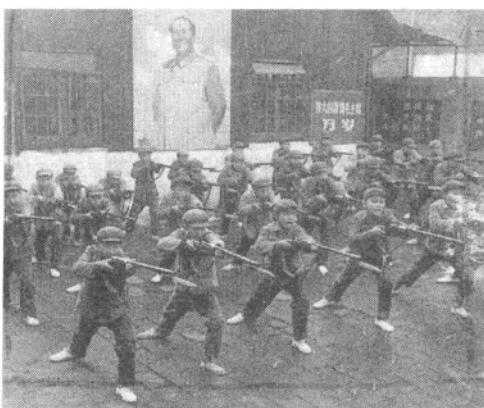
四、演习记录

作为整体性的战备工作,“深挖洞”运动不仅落实于构筑防空工事,还表现于举办各种展览、演习等活动,以全面提高群众的战备意识和战备素养。1965 年底至 1966 年初,因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空袭步步升级,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就曾编辑了成套的人防教育

图片，在 10 个区、3 个县举行巡回展，其中静安区参观者 6.4 万人次；卢湾区 10 万人次；虹口区 8.7 万人次等，至 1966 年 3 月底的统计，全市共接待了 85.2 万人参观。^[52]1969 年“深挖洞”运动开展以后，各区人防办也都通过当时惯常的展览会、学习班、讲用会等进行防空战备教育。因形势变化的因素，这一轮次的战备教育颇有规模和声势，例如虹口区至 1971 年时，接受该项教育的普及面达 340 万人次。^[53]1971 年 4 月，市人防办、上海警备区后勤部联合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举办面向全市的“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教育图片展览会。整个展览会历时半年，不仅有计划地组织全市的人民群众参观，还要求全市的各级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到场，以示对“深挖洞”运动的重视。

其实，1969 年秋冬季节，为了对付随时可能爆发的“侵略战争”，各单位就组织了多种类型的军训和演习。例如据复旦大学一女红卫兵的《“文革”日记》1969 年 9 月 18 日记：“到学校的第一课是军训（指参加“战高温”回校）。毛主席伟大的动员令成了我们行动的指南。带着敌情观念练习刺杀，只见操场上整齐的队伍，杀声震天”；10 月 4 日记：“下午军训、投弹。看来要加强战备观念，带着阶级仇恨去练，否则流于形式。”当然，高校的此类活动终究还是丰富多彩，部署精巧的。再据该《日记》10 月 22 日记：“凌晨，天尚未明，紧急集合的哨音把我从梦中唤醒，以最快速度起身披衣，奔向大操场。然后手执‘手榴弹’、‘木枪’，快步奔向战斗的阵地，到了树木葱茏的老工会，队伍四散，机警地搜索‘空投特务’。战果是俘虏二名，自首一名”；10 月 23 日记：“下午，进行防空演习，怎么说好呢？戴着柳枝编的防空帽，一会儿卧倒隐蔽；一会儿奔跑前进；一会儿又是——也许是和平观念吧！我对这些兴趣不大，我希望能学学枪炮使用，到时候，背上枪与手榴弹上前线”。^[54]显然，军训、演习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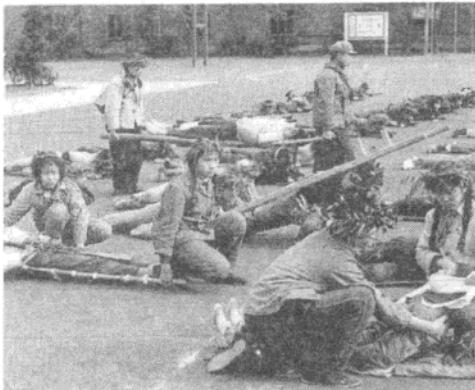
严肃的,但“流于形式”的感觉,或者在一种“上前线”的浪漫主义情绪的烘托下,或者在一种“无所谓”的轻视心理的支配下,也在慢慢地滋长,这大概是当时社会上的年轻人较为普遍的心态。例如1969年底,上海量具刃具厂举行防空演练,“唯独有几个青工若无其事”,她们倚在窗口看着“文攻武卫战士‘全副武装’向‘战斗阵地’奔去;消防战士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拉着器材向‘起火地点’奔去;‘白衣战士’抬着‘负伤’的战士,向隐蔽处奔去;有一个文攻武卫战士提着一只沉甸甸的油桶过来了,不慎被大石头绊了一下,摔倒在地——有几个人在那里掩口而笑——”。^[55]由此引出一番批评和“平时为战时,战时靠平时”的议论。与此同时,街道组织的演习则格外认真,如同为1969年底,黄浦区广东路街道进行演习。当时,“有中小学生、职工、营业员、里弄工厂生产人员及居民2836人参加。警报响起,演习人员分别在2.5分钟到5分钟内,疏散到达36个隐蔽点,专业队在2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动作要求迅速、准确”。^[56]这说明为了适应紧急状态下的战备形势,上海“深挖洞”运动第一阶段时的演习,多以防空疏散为内容,多以基层单位而展开。



中小学生防空演习



中小学生防空演习



中小学生防空演习



中小学生防空演习

上海“深挖洞”运动进入第二、第三阶段以后,因整体的规模、布局和功能等要素不断向纵深发展,城市型的立体防空体系趋于构成和建立,以致市人防办在继续指导各基层单位进行救护、疏散、抢险等演练外,还在全市范围联合市民兵指挥部、市卫生、交运等系统,分门别类地策划、组织了各大项目的演习活动。简介如下:

指挥程序演习

1969 年 12 月,市人防办在全市部署更新双翼卧式警报器后,正式下达了上海地区防空警报信号规定。^[57]为检验警报效果和各有关单位的应急反应,1970 年 1 月 2 日,市人防办地下指挥所举行人防系统防空警报信号传递演习,全市共有 37 个单位参加(10 个区、25 个局及公检法军管会、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等)。结果,杨浦区、虹口区、静安区、粮食局及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等,均以 1 分钟接收演习警报信号的成绩名列前茅。冶金局、交运局、仪表局则以 5 分钟接收演习警报信号瞠乎其后,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接收时间为 4 分钟,令人不可思议。^[58]

1972 年 8 月,市人防部门统一配备防空警报唱片(每套 2 张,第一张正反面均为紧急警报;第二张正面为预备警报,反面为解除警报)。同年 12 月 21 日,市、区人防办全体工作人员,部分街道人防指

挥所率所属里弄群众、少量防空专业人员联合进行的指挥程序演习，即每区各率领一个街道人防指挥所、一个里弄的部分居民，配以一两个防空专业人员；市民兵指挥部率领一个民兵高炮团、一个摩托车连及少量治安队伍；市防空医疗组率领一个医疗救护队、市防疫站“三防”侦检队及少量群众消防队等。为此，市人防办拟定《空袭航线图》、《情况诱导及实施想定》等材料，并对全体演习人员提出要求。演习设定：以蓝军对我国实施突然袭击为战术背景，由市人防办统一命令，实行逐级指挥，使用有线通信，实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市人防办人员则随现场检查、评估。^[59]

人员隐蔽疏散演习

自1970年1月23日起的一个月时间内，市人防办会同市商业一局、黄浦区人防办，在南京路市百一店，连续五次进行防空和人员疏散隐蔽演习。市百一店共有职工2000余人，分两班营业，平均每班800余人；共有营业楼面五层（包括地下室），总面积17670平方米，平均每层楼面3534平方米。当时市百一店每天接待顾客约10万人，高峰时滞留店内顾客约四五千人。前三次演习在商店职工中进行，取得经验后，再组织工作人员带顾客一起演习。第一次带顾客演习在两个楼面进行，参与顾客780人。第二次全店进行，参与顾客2640人。演习开始，空袭警报发出2分钟内，商店指挥员和防空专业队伍到达执行演习任务的岗位；4分钟内，各层楼面的顾客按照划分区域集中完毕，由商店人员带领顾客进行疏散；11分钟内，顾客和工作人员全部进入地下室隐蔽。^[60]

1970年10月6日，市人防办、市卫生防疫站会同闸北区、宝山县人防办（组织群众1328人）、市城建局西区污水灌溉工程指挥部，分别在闸北区汉中路（东至华盛路，西达苏州河底。该区域管道为直径2米圆管，长度800米）和宝山县盛桥镇（北至五岳河1公里。该区域

为宽 3.6 米,高 2.50 米,呈马蹄形管。长度 1 000 米)的“平战两用”污水管道内,进行了防空疏散隐蔽演习。演习时,先将管道内的污水抽干并进行清理,市区汉中路段需 70 个人工/12 小时;郊区盛桥镇段需 100 个人工/34 小时。对管道内空气进行检测和对比,结果 10 个采样点中,4 个测出含有硫化氢,浓度为 0.05~0.5 毫克/立方米(卫生标准最高允许浓度为 10 毫克/立方米);5 个点测出含有氨,浓度为 0.5~1.7 毫克/立方米(卫生标准最高允许浓度为 30 毫克/立方米),检测 6 个点均未发现氰化氢,即经清理后管道内的空气完全符合卫生标准。演习人员进入管道 1 小时后,普遍感到胸闷不适。3—4 小时后,由医生选择 30 人(男、女各 15 人,其中妊娠妇女 1 人、儿童 4 人、体质较弱者 4 人;年龄最大为 78 岁,最小为 11 个月)进行身体测试,结果被测试人员的体温、脉搏、呼吸均有所上升,而血压均有所下降。演习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有:抽水时间较长;出入口太少(每 1 000 米设一个),不利疏散;圆形管道不安全,需加铺平板;管道内没有照明、通风和厕所设施,不适宜隐蔽等。^[61]



防空演习。(徐建刚提供)

“三防演习”(防核武器、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

1971 年 5 月 20 日,市人防办会同市公用事业局、静安区人防办

在电车一场人防工程内进行“三防演习”(工程面积 693 平方米,参加演习 1 045 人,演习时间 8 小时)。此为上海首次“三防演习”,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然通风 2 小时:打开人防工程内的防护密闭门和通风孔口,组织演习人员进入工程内部静坐隐蔽。演习人员自我感觉正常。第二阶段隔绝式防护 1 小时 30 分:关闭人防工程内所有防护密闭门和通风孔口。1 小时后工程狭窄部位和人员拥挤部位蜡烛自然熄灭,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平均为 3.15%;温度由人员进入工程前的 19 摄氏度上升到 25.4 摄氏度;相对湿度为 86.9%。此时,隐蔽人员感到闷热,个别人头昏,一心脏病人不适感明显。第三阶段过滤式防护 1 小时 30 分:在人防工程继续处于密闭的状况下,采用滤毒通风。经 30 分钟后,隐蔽人员自我感觉正常;60 分钟后,闷热感消失。^[62]

1971 年 9 月 19 日,市人防办会同南市区人防办在新肇周路人防工程内(编号 929 通道)进行“三防演习”(工程面积 5 034 平方米,由区机关干部率领斜桥、半淞园、唐家湾 3 个街道和 2 个民兵团及附近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等 8 657 人参加演习,其中年龄最大者 82 岁,最小者 7 岁。演习时间 6 小时)。此为上海最大规模的“三防演习”。当天上午 8 时发出空袭警报后,演习人员在干部、民兵带领下,有秩序地进入人防工事疏散隐蔽。同时,区机关各组室在人防工程内办公;斜桥、唐家湾街道 6 个生产组在人防工程内生产;林荫中学、斜二小学师生在人防工程内上课。斜桥街道团支部在人防工程内进行炊事试验,用 75 分钟将 25 斤大米煮成熟饭。接着,转为隔绝式防护 1 小时后,工程内出现二氧化碳升高和氧气不足现象,演习人员有闷热感,少数出现头昏,个别人甚至发生昏厥;转入 2 小时的过滤式防护后,人防工程内的二氧化碳明显下降,演习人员感觉恢复正常。^[63]

1971 年 12 月 23 日,根据市人防办和市卫生局革委会的指示,由

卢湾区防空医疗救护组、卫生防疫站、上海电机综合研究所,联合组织卢湾区五里桥街道居民和医务人员 153 人,集合在一个 82 平方米,平均密度为 1.85 人/平方米的小型人防工程内,进行持续 4 小时 30 分的科学实验型“三防演习”。第一阶段:自然通风为 30 分钟,即利用工程出入口和通风孔口进风,隐蔽的演习人员感觉正常。第二阶段:隔绝式防护 2 小时 30 分,即关闭人防工程的通气口,此时经检测,人防工程内的平均气温由演习前的 14.8 摄氏度升高到 22.2 摄氏度(平均升高 7.4 摄氏度);平均相对湿度由演习前的 66% 升高到 78.3%;空气中二氧化碳由演习前的 0.14% 上升到 2.8%;氧气则由演习前的 20.7% 下降到 18.2%,以致工程内不能划火柴点火,蜡烛也自然熄灭。与此同时,演习人员中的少数人出现头昏、头痛、头胀、胸闷、嗜睡、面部潮红等现象。经检测,隐蔽人员的体温由演习前的 36.8 摄氏度升高到 37 摄氏度;脉搏由演习前的 78 次/分升高到 82 次/分;呼吸由演习前的 20 次/分升高到 23 次/分。第三阶段:过滤式防护 1 小时 30 分,即在人防工程继续处于密闭的状况下,先使用脚踏式风机和带滤毒罐进风,以 30 次/分,风量为 630 立方米/时,进行 15 分钟后,改用机械进风,风量为 1008 立方米/时。经检测,过滤式防护进行 1 小时 15 分时,人防工程内二氧化碳为 0.7%,氧气为 20.3%;过滤式防护进行 1 小时 30 分时,人防工程内温度平均下降 1.3 摄氏度;相对湿度平均下降 5.7%。此外,人防工程内部空气细菌(杂菌数为 902~4 390 个/立方米;链球菌 54~160 个/立方米)含量测定稳定在清洁指标内。^[64]

防空救护专业演习

1974 年 5 月 20 日,市民兵指挥部、市人防办、市卫生局革委会联合在虹口体育场进行的战地救护演习。由全市 12 所市级医院、24 所区、县级医院、4 所企业医院等 1 500 多人,组成了 3 个武装民兵连、2

个民兵卫生连、80 个群众性救护队、40 个野战医疗队。市革委会各组办,各区、县、局大专院校负责人及人防、民兵等代表 8 千余人观摩了演习。演习开始:“敌机”进行轰炸,在炮火的袭击下,跟随部队的民兵卫生员抢救和搬运伤员;参加演习的 40 所医院的 40 个野战医疗队迅速搭起自带的帐篷,发动自带的小型发电机,在帐篷里架设起临时手术台;群众性医疗救护队向地方卫生部门开设的野战医院运送伤员;医院开始收容伤员,并对伤员进行手术治疗等。按照要求,所有的手术器械、药品、X 光机、化验、麻醉、敷料、照明、消毒等医药物资,均由各个野战医疗队自备,有些医疗队还结合战地需要,制造了一物多用的器械。演习中的手术则严格按照无菌的要求,以狗和羊为替代进行了 40 台手术。结果,全场仅一台手术失败。^[65]

抢险抢修专业演习

1974 年 9 月 20 日,市人防办、市民兵指挥部在有关部队的配合下,联合组织民兵和人防抢险抢修专业队伍,在黄浦江米市渡 274 米的江面上,进行了水泥驳浮桥架设、铁驳钢浮桥架设及抢渡的军事演习。参加水泥驳浮桥架设的有城建局民兵团、交运局民兵师和松江、上海、奉贤、金山四县的民兵、人防抢险抢修专业队伍共 1 080 人。参加铁驳钢浮桥架设的有港务局民兵师及人防抢险抢修专业队伍 250 人。此外,还有担负警戒、保卫和封锁港口的民兵 1 000 余人。指挥部由人防、民兵、部队三方人员组成,按照统一制订的方案指挥调度。演习开始,江面上驶来上百条水泥驳船和数十艘铁驳船,并迅速汇集排列,架设桥板。结果,民兵步兵、野战医疗队、摩托分队(110 辆)、高炮(16 门)、高射机枪(8 挺)、汽车(31 辆)共 17 个连队 1 498 人及部队步兵、炮兵各 1 个营,坦克 1 个排(含 3 辆中型坦克)全部安全通过浮桥。^[66]

防核袭击演习

1975 年 5 月 20 日,市民兵指挥部、市人防办、市卫生局革委会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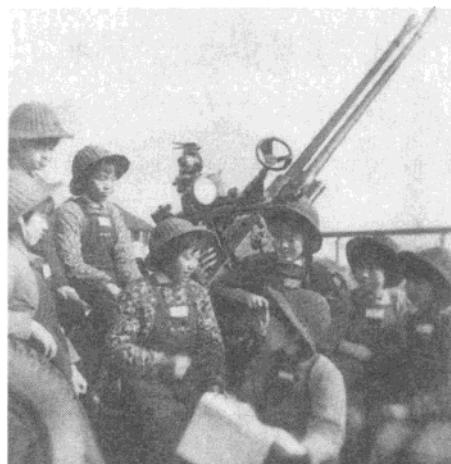
合普陀区革委会，在月浦靶场进行了一次遭受核袭击后的防化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市肥料公司车队，市、区卫生防疫站和普陀区所属工厂、医院、公交公司车队等 25 个单位的民兵、人防防化专业队伍 700 余人，并配有摩托车 43 辆，洗消车、救护车 13 辆。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驻沪三军、各区、县、局领导；南京军区和安徽、江苏、浙江有关负责人；以及民兵、人防防化专业队伍 4 000 余人观摩了演习。上海警备区和第七军医大学对演习进行了指导。演习内容包括：核武器袭击条件下的步兵动作；摩托化分队快速通过沾染地带；民兵、人防防化专业队伍对沾染地带侦检、区分沾染程度并作标志、组织洗消；抢救分队对伤员进行救护；医疗专业队伍开设战地医院等。当假设原子弹爆炸后，在统一指挥下，步兵分队快速戴防毒面具，穿防毒衣，卧倒在地待命；摩托分队头戴防毒面具，穿防毒衣，快速通过沾染地带；防化专业队伍进入沾染地带侦检，区分沾染区域，插黄色小旗作为标志；医疗救护专业队伍进行战地救护、包扎、止血、固定、搬运伤员，并就近开设野战医院收容伤员等。^[67]

综上所述，作为“深挖洞”运动有机构成的人防演习，除了在各区基层单位均有落实和展开外，例如 1970 年时，卢湾区共组织 33.11 万人进行了 236 次防空演习，其中 4 个街道和 22 个区域的群众集体参与；^[68]同期，长宁区也组织各种演习 281 次等。^[69]全市性的人防演习，从指挥通讯到隐蔽疏散；从战地救护到抢险抢修；从常规防空到防核袭击，确实筹备周密，颇具规模，不仅科技含量增加，且专业性强，机动性强，从而构架起了一个完整的演习体系，以达到全面提高有关人员军事素养的目的。据 1975 年时的统计，经系统训练和演习，全市共组建专业性的防空队伍近 10 万人，具体有消防 33 625 人、救护 12 582 人、抢修 32 561 人、治安 15 386 人、运输 747 人、通信 536 人、防化 1 387 人等。^[70]况且，开展此类演习时，因其指对的“敌

人”，是虚拟的“帝修反”，而不是现实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人们的是非辨析和情感投入非但不紧张，反而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张力；又因此类演习多属大场面运作（如在体育场，在黄浦江），有场景、有器具、有程序、有氛围，参与者兴奋，观赏者期待，往往构成社会关注的焦点，以致产生很强的宣传和示范效应。总之，上海的人防演习是相当精彩和成功的。这是由上海的城市地位和城市特征所决定的战备需要；这是上海人善于策划、善于运作、善于构造社会事务的智慧和能力，在特定条件下的充分表达；这也属于上海“深挖洞”运动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上海工人防空演习



上海工人防空演习

五、一条弯曲之道

上海的“深挖洞”运动历经三个阶段的推进（1969年至1978年），共修建人防工程达200多万平方米。1979年，市人防办对全市所建

人防工程进行了普查鉴定,以求摸清底数,为分类治理(开发利用、维持现状和报废拆除)提供依据。

经普查,全市计各类人防工程 17 790 个(1978 年以前所建),建筑面积 296.1 万平方米、使用面积 211.6 万平方米,其中按照工程抗力和质量标准共设三等六类。第一等为五级人防工程,具体又分五级甲(工程结构强度、“三防”设施和平面布置等均达标和完备),全市共 60 个(使用面积 1.8 万平方米),占普查总数的 0.34%;五级乙(工程各项指标符合要求,个别部位需稍加改造)550 个(使用面积 15.2 万平方米),占 3.09%。第二等为简易人防工程,具体又分简易丙(工程各项指标均不符合要求,需加固改造后上升为五级工程),全市共 506 个(使用面积 11.4 万平方米),占 2.84%;简易丁(不容易、不值得改造的工程)9 645 个(使用面积 131.3 万平方米),占 54.2%。第三等已不列入正式统计数,具体分为保留类(结构尚可的地下建筑物),全市共 4 823 个(使用面积 35.8 万平方米),占 27.1%;报废类(结构单薄,严重渗漏水)2 196 个(使用面积 15.8 万平方米),占 12.3%。原来,整个上海的人防工程达到五级标准和经加固后可上升到五级标准的只占 6.37%;难以改造,或保留、或报废的人防工程则为 93.6%。^[71]这真是一项令人惊诧的统计,它简直在证实历经十年的“深挖洞”运动,起码在工程质量和效果方面,走了一条弯曲之路。

再看有关区的统计资料,以求佐证:

杨浦区:至 1978 年,全区共修筑人防工程 1 200 个,22.7 万平方米。其中五级工程有 93 个,达 2.5 万平方米,占统计总数的 7.75%;简易人防工程 1 107 个,达 20.25 万平方米,后因结构质量不高,防水性能差,或封存,或报废。^[72]

虹口区:至 1978 年,全区共修筑人防工程 643 个,建筑面积 16.2 万平方米,使用面积 13 万平方米。其中五级以上工程只有 35 个(建

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使用面积 1.5 万平方米),占统计总数的 5.44%;简易人防工程为 608 个(建筑面积 14.4 万平方米,使用面积 11.5 万平方米),占统计总数的 94.6%。^[73]

静安区:至 1978 年,区内群众性构筑各类人防工程 1 045 个,使用面积 14 万平方米。其中房子底下挖洞 150 个,使用面积 1.6 万平方米,其余为大楼地垅(隔水层)、砖结构拱顶通道式、方(圆)形沉井式、钢筋混凝土平顶式全地下人防工程。多数为简易人防工程,质量标准较低。^[74]

卢湾区:至 1978 年,全区建砖混结构、通道掩体为主的人防工程 642 处,使用面积 10.5 万平方米,其中五级工事 31 处,达 1.1 万平方米,占统计总数的 4.83%。^[75]

徐汇区:据 1979 年 6 月的调查统计,全区共有各类人防工程 19.56 万平方米,其中大多数为煤渣砖、三合土等材料构筑的简易工事,五级工程仅 67 个,占工程总数的 9.3%。1979 年以后,工程质量普遍提高。^[76]

闵行地区:至 1978 年的统计,闵行地区共构筑人防工程 252 处 3.8 万余平方米。大部分系单建工事或通道式半地下工事,狭窄低矮,材料为土水泥、煤渣砖,施工技术又不合规格,渗漏严重,多数不能用。1979 年以后,闵行区结合基本建设,构筑了 30 处人防工程,不少系五级或五级以上平战结合工程。^[77]

显然,各区的统计情况与全市的普查结论是一致的,即大多数的人防工程构建粗糙,质量低劣,“不但战时难以发挥战备效益,平时使用效益也较差”。^[78]那么,历时十年,曾轰轰烈烈地发动,曾浩浩荡荡地投入,怎会至 1979 年才恍然发现和揭破这一后果呢?确实,群众性的“深挖洞”运动招致了广泛的社会参与,这恰属“文革”运动群众的阵势和格局,其社会动员功能的标树甚至比构筑工程更重要。由

此,施工队伍重数量,重场面;轻质量,轻专业,人员变化多,流动大,技术力量薄弱。同时,又因“深挖洞”运动特别强调“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等,这恰属“文革”运动的政治路线落实于工程建设时的主导思想,其社会意义的显示甚至比工程质量更紧要。由此,各单位忙于找料、献料、制料,还大量利用工业废料,以致在一片的报喜声中,遮掩了降低工程质量的隐患。

如果说施工队伍非专业、施工用料非正品是两项具体的原因,那么,检查上海“深挖洞”运动的整个过程,“各个时期对工程建设的要求不同,其质量参差不齐”,^[79]才是根本的原因。事实上,1970 年时,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就已指出上海的人防工程“质量不高”,但因上海的“深挖洞”运动长期处于“应急”、“应战”状态,目标近,战线长,投入少,规格低(多为简易工程),直至 1972 年国家资金有所投放后才稍有改善(对偌大个城市来说,年度投放 3 500 万元,又有多少力度呢)。推本溯源,这缘于当时国家高层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战略判断,即“革命”与“战争”是社会的不二主题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以致上海的“深挖洞”运动完全丧失了长远的规划,基本没有与上海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相结合。

当然,这也不能否认上海的“深挖洞”运动终究留下了近 30 万平方米质量尚佳的地下建筑,且因上海人的灵巧和聪明,在改建装修、空间利用方面形成了一些很有独创价值的项目和成果。正是这众多因素的比照互动,直接促使了上海于 1978 年正式提出往后的人防工程标准“不低于五级”的方针。立足于这个基点,可以认为“文革”在本质上缺乏“建设”和“发展”的路线,是导致“深挖洞”运动产生重大质量失误的主要根由;而之所以在“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才提出崭新的质量标准,上海的人防工程建设走上了健康的道路,也就不是偶然的因由了。

注 释

- [1]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0 页。
- [2] 至 1969 年初，中国边防军对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1月 25 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 3 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 19 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选择重点，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反击，速战速决，不予以纠缠。毛泽东同意予以反击，并批准了总参报告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也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至 2 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击战问题作了周密的安排。终于，3 月 2 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爆发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参见李丹慧《政治斗士与对手：1960 年代中苏边界关系》，载 2007 年第 2 期《社会科学》。转引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9、320 页。
-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 页。同页：此前，1968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说：“请你考虑一下，世界上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
-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8—39 页。
- [5]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第 1561 页。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61 页。
- [7] 同上书，第 66 页。
- [8] 《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2 页。
-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6 页。
- [10] 同上书，第 179 页。
- [11] 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第 191 页。
- [12] 1969 年 9 月 3 日，市革委会组织组编《组工简报》第 49 期“团员、青年学习党中央‘八·二八命令’情况”。
- [13] 1969 年 9 月 17 日，《工人造反报》“落实党中央最新战斗号令，加强战备教育”。据《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8 页记载：9 月 3 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指出八·二八命令发布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

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
“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因此,上海的战备宣传由《工人造反报》承担,《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均无此类报道。

- [14] “不许阶级敌人兴妖作怪”《工人造反报》1969 年 11 月 13 日。
- [15] “牢记历史经验,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工人造反报》1969 年 10 月 26 日。
- [16] 周太彤:《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84 页。
- [17] 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第 197 页。
- [18]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2 页。如 10 月份,上海交大师生就“战备疏散”到奉贤县农村。上海疏散人口的情况详见附录。
- [19] 朱炎初:《金山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2 页。
- [20] “战备思想为啥时高时低”;“文攻武卫战士谈战备”《工人造反报》1970 年 2 月 15 日。
- [21] 京、津及华北地区一直是战备的要地。早在 1966 年 3 月,周恩来就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指出:一旦有事“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见《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 页。
- [22] 至 1978 年的统计,黄浦区全区共构筑人防工程 653 个,70% 是房子底下的工程。
见周太彤:《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81 页。
- [23]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 页。
- [24] 史济良:《静安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86 页。
- [25]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1 页。
- [26] 周太彤:《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81 页。
- [27] 萧一华:《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2 页。
- [28] 孙卫国:《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9 页。
- [29] 王明辉:《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82 页。
- [30] 徐尚武:《闵行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7 页。
- [31] 笔者青少年时正居住在该区域,曾见证文攻武卫的森严。一次出于好奇,爬上土堆向“01”工程张望,立即被高度警惕的文攻武卫捉拿,先交代成分,再留下地址,最后被呵斥出门。又:因“01”工程属秘密施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抽调人员的程序十分机密,下见原件两份:1. 通知 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加速战备工程建设,根据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指示,要我区立即

抽调×××人组建一个民兵连参加××战备工程的施工工作。这是一项重要的战备任务,经区指挥部研究,决定从你单位抽派民兵1人参加此项工作。人员条件:①政治可靠,觉悟较高的民兵同志,最好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或五好战士。②身体健康,能胜任重体力劳动的男性民兵。人员使用时间:70年11月—71年春节止。希各单位领导做好抽派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于10月31日下午3时前将名单报区指挥部作训组(附登记表)。报到时间:11月2日下午2时在区指挥部(思南路41号)办学习班,报到时只带毛主席语录及工作本。上海市文攻武卫卢湾区指挥部(盖章)1970年10月29日。2.××××厂党组织、革命委员会、民兵:你单位×××同志自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日参加市××战备工程施工,现已光荣完成任务,定三月拾壹日回厂报到,建议给予安排休息肆天。此致 革命敬礼! 上海市文攻武卫卢湾区指挥部(盖章)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

- [32] 萧一华:《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
- [33]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 [34] 萧一华:《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 [35] 葛剑雄:《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 [36]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 [37] 1972年11月11日,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组等《关于防空工事经费开支的请示报告》。
- [38] 王渭泉:《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 [39]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 [40] 同上书,第331页。
- [41] 同上书,第240页。
- [42] 周太彤:《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85页。
- [43]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 [44] 同上书,第228页记载:1987年7月,国家人防委授予上海市“全国人防建设平战结合先进城市”称号。进入90年代,市民防办改变以往行政管理的模式,招商引资,对人防工程进行第二次投资,改建成商场、饮食店、停车场所、文体娱乐场等,使全市人防工程利用率达61%。
- [45]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 [46] 同上书,第357页。
- [47] 1972年12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对《关于防空工事经费开支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 [48] 据1970年11月20日《支部生活》署名“徐镇街道革委会几个工作人员”的文章

《滥发报表的情况又多起来了》指出：“上级一个部门发下一份‘战备工作统计表’，共有二十四个项目，其中有这样几项：砖坯做了几块，工人参加地区劳动有多少人次，自运材料几吨等等，统计时间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十月。这份表格发到各个里委、学校、商店填写，要求在三天内统计完毕”。文章对此现象持批评态度，认为“真是劳民伤财”，有关编者也表示应“切实做到精兵简政”。然而，恰恰是有了这份繁杂的估量表，才为上海的“深挖洞”运动留下了资料。

- [49]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 [50] 1972 年 11 月 11 日，市计划统计组、财贸组、市人防办《关于防空工事经费开支的请示报告》。又：1973 年 1 月，市财政局革委会对构筑防空工事的“基本材料费”作出认定：一、钢材、木材、水泥、黄沙、石子、砖头和照明材料等；二、工程施工时需要的小型工具（不构成固定资产）；三、运送土方所发生的汽油和车辆维修费；四、经主管部门批准，临时雇用少数建筑技术人员的工资等。参见《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0 页。
- [51] 1972 年 11 月 11 日，市计划统计组、财贸组、市人防办《关于防空工事经费开支的请示报告》。
- [52]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1 页。
- [53] 王明辉：《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80 页。
- [54] 复旦大学一女红卫兵的《“文革”日记》未刊稿。
- [55] “一堂深刻的战备教育课”《工人造反报》1970 年 2 月 15 日。
- [56] 周太彤：《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83 页。
- [57] 据《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4 页记：预备警报：连续发出 3 次声音，响声每次 40 秒，间隔每次停 22 秒。紧急警报：连续发出 15 次短音，响声每次 6 秒，间隔每次 6 秒，持续发放 3 分钟。解除警报：一次长音，持续发放 3 分钟。关于上海市防空警报器安装情况见表：

1965—1980 年上海市防空警报器安装情况表

年 份	1965	1970	1973	1975	1980
市 区	76	83	87	87	95
郊 县	27	79	89	95	113

资料来源：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1 页。

- [58]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9 页。
- [59] 同上书，第 155 页。

- [60] 同上书,第 157 页。
- [61] 同上书,第 158 页。
- [62] 同上书,第 153 页。
- [63] 同上书,第 154 页。
- [64] 同上书,第 154 页。
- [65] 同上书,第 155 页。
- [66] 同上书,第 156 页。
- [67] 同上书,第 156 页。
- [68] 胡瑞荣:《卢湾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06 页。
- [69] 齐允海:《长宁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13 页。
- [70]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3 页。同时,上海委托杨浦区组建民兵表演队,向来访的外宾展示军事训练的成果。据《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6、728 页记载:1966 年 7 月 30 日,由沪东造船厂、上海电缆厂、上海自行车三厂等市属大厂和杨浦区房地产管理局等单位共同组建民兵对外表演队,先后为亚非拉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团、缅甸、巴基斯坦国家元首,以及罗马尼亚、朝鲜等外宾进行军事表演。周恩来、李先念等陪同外宾到上海时,曾观看军事表演,接见表演队。1970 年,上海民兵开始装备武器,并进行多兵种技术训练。1971 年 4 月,上海民兵高炮实弹射击表演连、炮兵表演连和工兵表演连成立。据统计,1971 年 4 月 15 日至 1976 年 9 月 26 日,表演连先后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法国三军参谋长梅里上将等进行了对空射击、城市人民防空、82 迫击炮、75 无后座力炮、82 无后座力炮、连环雷、对空抛手榴弹等多种军事表演。与此同时,1970 年 6 月,上海确定人民广场和电车一场人防工程对外开放。至 1976 年 6 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外贸部副部长李班,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尼日尔共和国副主席西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南非非洲国民大会党主席坦博,比利时政府首相德曼斯,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以及在上海的外籍专家等一百多批外宾参观了人防工程。
- [71]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3—234 页。
- [72] 施叔华:《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35 页。
- [73] 王明辉:《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82 页。
- [74] 史济良:《静安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86 页。

- [75] 胡瑞荣：《卢湾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07 页。
- [76] 萧一华：《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1 页。
- [77] 徐尚武：《闵行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7 页。
- [78] 相守荣：《上海军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1 页。
- [79]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3 页。



附：

上海“深挖洞”运动期间人口疏散情况 (1969年至1974年)

1969年秋冬，全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后，市人防办会同市公检法、市下乡上山办公室、市劳动局、民政局、财政局、粮食局、公用事业局革委会等八个单位联合制定了《关于疏散城市人口几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解决疏散经费、口粮、户口、转学等意见。当时，为了摸索经验，市人防办布置各区选取一个街道，试点性地开展人口疏散工作。具体情况见表：

1969年上海市10个区试点街道疏散人口统计表

区别	街道名称	街 道 人口总数	1969年9月至1969年 12月疏散人口数		1970年1月疏散人口数	
			长 期	临 时	长 期	临 时
合计	10	612 302	3 042	4 188	691	2 540
长宁	江苏	72 605	441	336	70	251
静安	江宁	52 439	519	279	187	252
南市	露香	62 892	212	613	44	75
卢湾	打浦	51 550	370	1 266	38	49
闸北	青云	65 211	382		96	676
虹口	虹镇	59 663	393	577	128	363
杨浦	控江	68 284	43	620	59	140
普陀	沙洪浜	57 307	144	12	6	43
徐汇	徐镇	56 396	204	125	38	297
黄浦	广东	65 955	334	360	25	394

资料来源：宋元鹏：《上海人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说明：长期疏散人口数系指迁出户的人数。

由该表所知，全市10个区试点街道的总人数为612 302人，占市

区总人口的 5.6% (以 1969 年底全市人口总数 1 094 万人为准), 其中长期疏散, 即动员回乡及投亲靠友的共 3 733 人(指迁出户口), 占试点街道总人数的 0.61%, 占全市总人口的 0.03%; 临时疏散的共 6 728 人, 占试点街道总人数的 1.1%, 占全市总人口的 0.06%。经过试点后, 作为战备的一项内容, 上海的人口疏散工作继续进行, 具体再见下表:

1969—1974 年上海市人口疏散统计表

年 份	疏 散 人 数 (人)	年底全市人口总 数 (万人)	其 中	
			市 区 (万人)	郊 区 (万人)
合 计	857 526			
1969 年第四季度	42 006	1 094	608	486
1970 年	320 587	1 073	583	490
1971 年	144 676	1 065	569	496
1972 年	188 503	1 064	564	500
1973 年	81 178	1 070	562	508
1974 年	80 576	1 069	560	509

资料来源: 宋元鹏:《上海人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9 页。

由该表所知, 上海自 1969 年第四季度试点性地启动人口疏散(及单位组织的集体疏散), 至 1975 年全市停止该项工作,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 共疏散人口 85 万多。其中, 最高年份为 1970 年, 疏散人口 32 万多, 占当年全市总人口的 2.99%, 此后则呈现下降的态势。应该承认, 就疏散人口的方式和总量而言, 尤其与邻近的苏州、无锡等城市的情况相比(许多经强制性动员后举家迁往苏北农村), 上海不仅是比较妥当的, 且疏散的人口也是绝对的小数。然而, 对每一个个人和家庭来说, 一旦被列入疏散的对象, 特别是必须向外省市迁移户籍, 其承受的艰难就是具体的、实在的, 所造成的许多后继的麻烦就是难以克服的, 以至 80 年代时, 还有不少当年的疏散户为回城而四处奔波。

第十九章

“野营拉练”——以上海 1970 年至 1974 年的“野营拉练”为例

一、野营拉练的缘起

距离 1970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庐山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三个月；距离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葬身温都尔汗 10 个月，即在这之间的 1970 年 11 月 24 日，毛泽东一改多年对军队工作备加称赞的态度，就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批示林彪并黄永胜（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1]

显然，这是毛泽东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借军事训练一说，从政治上敲打林、黄。^[2]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想到了广大的学生与工人，

他继续批示：

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3]

显然,这是“文革”初期(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关于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4]在“文革”中期的重申和再现,并要求结合形势之变化,予以执行和落实。



《红小兵报》1971年3月24日

于是,中央当即召集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和河北等地的代表,就野营拉练的问题进行座谈。12月6日,周恩来接见进京出席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强调开展野营拉练“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自觉自愿”,“当前既要搞好野营训练,又要做好各项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使两者结合起来,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5]在此,如果说毛泽东的批示是政治的指点,偏重于方向的把握;那么,周恩来的强调则是事务的叮嘱,侧重于运作的关注。两者的身份定位和角色特征是

确切而又清晰、清晰而又相契的。接着，周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的通知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以严厉的态度作出第二次批示：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6]

应该承认，庐山会议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小组派，以及所把持的上海正处于政治上得逞、有利而又敏感的位序上，以致消息传来，上海各单位立即飞针走线地向下传达。据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文革”日记》1970年12月7日记：“天天读后全校大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拉练指示。会后学习讨论”，“晚6:30—8:30续上午谈体会，表决心”；12月14日记：“天天读后听传达中央关于拉练指示，至十点二十工作。”^[7]一周间，两次全校规模的传达，且首次时间在周恩来接见座谈代表的第二天，可谓有力而迅捷。12月15日，上海市革委会依照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市发出《关于实行野营训练的通知》，并宣布成立上海市野营训练指挥部。此间，各区、县、局革委会有的率先呼应，有的紧紧跟随，纷纷迅速反应，迅速行动。如12月13日，黄浦区



拉练誓师大会

革委会召开直属单位干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区野营指挥部；^[8]14日，南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区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区野营训练指挥小组；^[9]17日，虹口区“野营拉练”领导小组成立；^[10]21日，上海县（面向浙江的门户）为配合市区拉练队伍外出，宣布成立“支援野营训练

指挥部领导小组”,^[11]并在朱行等地设立接待点。上海的这种态势说明接受中央拉练的指示是顺畅、积极而一致的。固然,其间有政治响应的因素,蓦地在长期的人与人斗争的运动疲劳中,注入一份人与天地斗争的刺激,自然引起一阵社会的兴奋和骚动。



拉练誓师大会



拉练讲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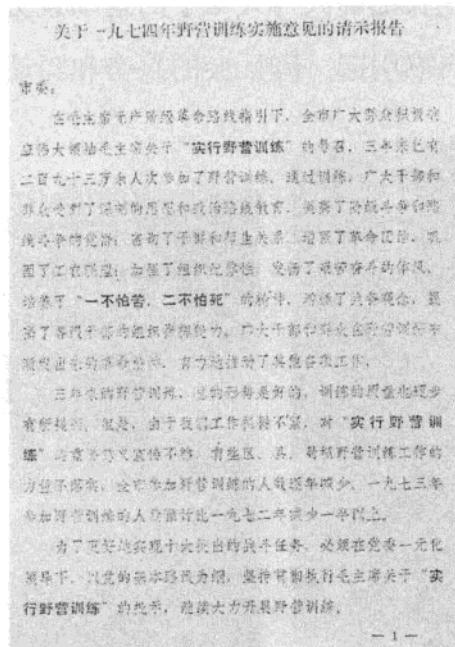
12月16日,市革委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作了关于拉练意义的动员报告,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则就具体开展拉练活动作了布置。会后,上海掀起了热气腾腾的拉练高潮。

二、高潮与高潮的退落

高潮兴起,其持续的趋动如何呢?因目前尚不掌握具体的统计材料,^[12]只能依凭几个总结性的数据,来推断和展示上海拉练运动的规模和走势。

第一,据1973年12月,上海民兵指挥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称:

三年来(作者按:此处应指1971年至1973年)已有293万余人参加了野营训练。[13]



1973年12月,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

第二,同《报告》称:

全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逐步减少,一九七三年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预计比一九七二年减少一半以上。[14]

第三,据1973年1月,上海民兵指挥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称:

一九七二年的野营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市有106万人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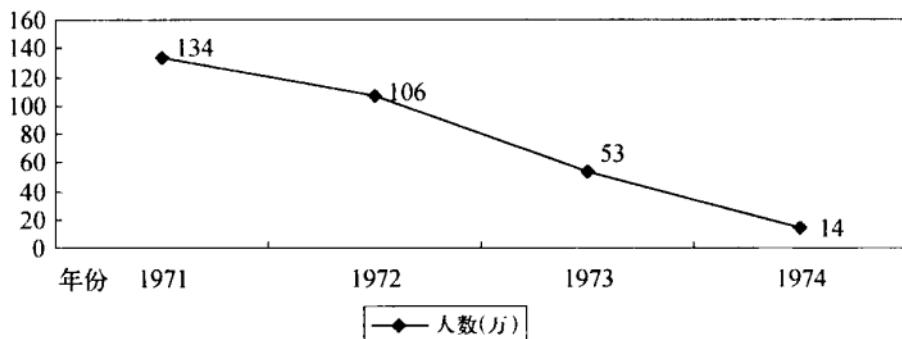
了野营训练,40 万人参加了就地军训。[15]

第四,据《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称:

截至 1974 年 11 月底,全市共有 307 万人参加了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16]

现将四处有关上海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统计串联起来,可知 1971 年至 1973 年为 293 万余人;至 1974 年为 307 万人;1972 年为 106 万人;1973 年比 1972 年“减少一半以上”应约为 53 万人;1971 年便应是 134 万人[293 万-(106 万+53 万)];1974 年便应是 14 万人(307 万-293 万)。作图显示如下:

上海 1971 年至 1974 年参加野营拉练的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等。

说明:驻沪部队的野营拉练不在本统计内。

由图可知:上海的拉练运动在 1971 年时占据高潮位,总人数达到 134 万。这主要是因为上有领袖的号召,且具有绝对的权威;下有群众的响应,且具有盛大的忠诚,以致这两个方面的合力迸射出强烈的社会激情和社会行动。例如仅据 1971 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市就有

46万中学生参加了野营拉练;〔17〕同期上海县全县接待过境野营拉练人员达71.3万人次。县内学校、县属工厂则有7万余人参加军训。〔18〕这种阵势在1972年时继续保持着,尽管其在整体上已开始呈现下坠的趋动,总人数仍达106万。在总结当年全市的“野营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时候,市民兵指挥部又明确指出“有的局、县抓野营训练工作的力量不够落实”。〔19〕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总结报告的批评只提及有的“局和县”,而没有提到“区和大专院校”。〔20〕这多半是因为各局承担着生产任务,精力分散,重视不够;郊县则因地理环境的特点(多田野),一般不显现野营训练的价值而有所忽视。自然,这便从侧面证实上海各区(中小学归区管辖)、各高校是有所落实的,而上海拉练的主要对象是学生群体。如果说这属客观的事务性因素,那么,1972年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为“上海民兵指挥部”,〔21〕即野营拉练的职能归口于民兵指挥部,表面上看是更规范了,更权威了,实质上却因取消了独立指挥的权限,反而是削减了,弱化了。

这种“机制—职能”的变化,鲜明地表达在1973年全市拉练人数的统计上,那就是迅速地下坠至年度53万人次。此刻,牵引出的追问是:难道毛泽东“最高指示”的效能也会因此类的变化而“削减”和“弱化”吗?从现象上看,确实如此,或许还存有初期的激情终究要被时间和现实消磨等因素。但从内里探究,应是“文革”运动的情势发生了移易,导致野营拉练的权重发生了倾斜。1973年3月4日,已进京的王洪文打电话到上海,告知“主席最近多次谈到上海民兵”、“主席要军委给上海民兵发20万支枪”。〔22〕4月,王洪文返沪主持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上海工人阶级要用枪杆子武装起来”。〔23〕接着,6月8日上海市委向党中央、国务院送呈《关于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报告》,声称“派出1000余支民兵小分

队，深入里弄”等。^[24]7月 27 日，根据王洪文的旨意，市委写作组完成了《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首次提出“要把民兵当作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工具”，并称上海的工人武装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不挂牌的派出所”，“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等。^[25]至 1974 年，上海民兵更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充当先锋。很明显，此时的上海民兵不仅被装备了（潜在的“第二武装”），更直接承担着开展城市阶级斗争的责任，甚至参与某种特殊的行动（如 1974 年 6 月中旬，市民兵指挥部组织一批人冲击上海警备区大院，张贴大字报）——1972 年后，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性质和职能高度地政治化、任务化，哪还有精力关注和操持野营拉练呢？尽管 1973 年底，市民兵指挥部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中仍切切呼吁，原则要求“各级党委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计划上有安排，工作上有要求”；具体布置“各区民兵指挥部要切实加强对野营训练工作的领导。各县野营训练办公室要健全机构，充实力量。市各局也要安排一定的力量分管野营训练，加强检查督促。请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大力支持，密切配合等”。^[26]上



武装上海工人



武装上海工人

海市委也作出了“原则上同意报告的意见”的批示。^[27]但事实上至1974年的统计，上海全市参与野营拉练的年度人数只剩下区区14万了。

从1971年的134万人次，到1974年的14万人次，如同此类突击性的活动多半呈现虎头蛇尾的样态，上海的野营拉练被不断地空虚化、边缘化也是条必然的路径，其间有集体心理逐渐疲劳的因素，更有社会政治加剧变乱的根由。因之，野营拉练终究成为“文革”运动中一段特别的插曲。

三、不同的拉练队伍

毛泽东作出“拉练”的批示后，1970年12月6日，中央军委即下达《通知》，要求全军至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28]上海警备区、空军7341部队、海军上海基地，以及刚从重庆调防来的第七军医大学等驻沪部队均立即行动。以上海警备区为例：

上海警备区1970年至1971年野营拉练情况一览表

次数	时间	队伍	人数	行程	任务
1	1970.12.20—1971.1.23	师团机关、8个连队	1664	3000公里	围绕上海周边的行军训练及教育。进驻8个点，途经7个县
2	1971.2.27—1971.3	师团机关、5个营、18个连队	1920	500公里	军事训练、学习、教育及群众工作
3	1971.5.15起	3团、4团各2个连；摩托2连			分别进驻嘉定姚家宅、青浦师农场、宝山潘桥进行野营训练
4	1971.12.5起	2团1营		进驻吴泾	野营训练并维修国防工事

资料来源：周祥根：《上海武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5页。

如表，以上海警备区为代表的驻沪部队的拉练，不仅反应迅捷，行动规范，更显著的特征是任务明确，那就是符合中央军委“根据各

自情况组织拉练”的要求,将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紧紧结合;将野营拉练与管辖职能紧紧结合,以致上海警备区的野营拉练或者是围绕着上海周边运动,或者是进驻上海郊县的某些区域,既“全面锻炼了部队”,又“密切了军民关系”。^[29]



《驻沪部队某部野营来到大场公社南大队》《文汇报》1974年1月
26日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再次提出“加强战备”的口号,^[30]但此时社会上却吹拂着一片和平的气息:“锣鼓敲,红旗飘,外宾天天到,形势这么好,打仗谁想到。”群众普遍认为美帝国主义“过去是对手,现在是握手,不会再动手”;针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则普遍认为“在珍宝岛挨了拳头,吃了苦头,再敢动我们? 又不是‘寿头’(上海话为‘傻瓜’)”。^[31]具体在群众性的野营拉练方面,正出现参与人数急速下坠的态势。为此,上海警备师分别于1973年7月至8月(夏季)、10月至12月(冬季)组织三团一营和七十个连队规模的野营拉练,并从冬季拉练中派出1522人次,帮助地方训练民兵3770人次。^[32]但部队的率先响应终究属于军事行动,或者说是部队职能的必要体现,它只可能产生影响和示范,却不能带动和扭转已退落的群

众性的野营拉练重新崛起。正如前述中的分析,上海工人、学生参与的拉练活动的高潮仅仅保持在1971年至1972年间,所以,1973年部队的突进性行动只能是独树一帜了。



上海警备区在野营中派出战士训练民兵



上海警备区在野营中派出战士训练民兵

那么,上海工人、学生的野营拉练呈现怎样的特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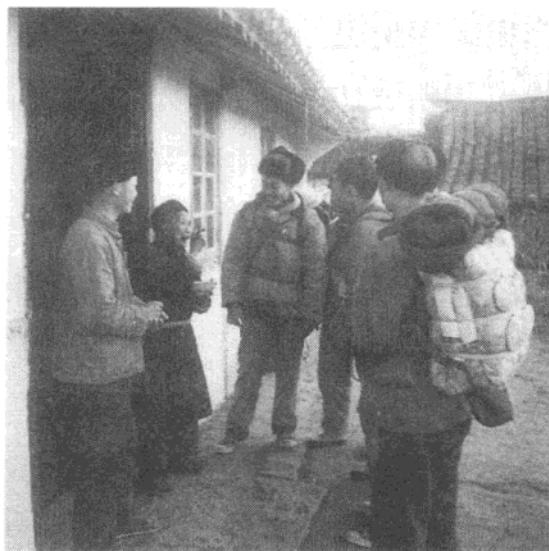
汗湿工装心欢畅,
放下扳手金谷淌。
马达声声明不尽,
工农一家情意长。

“兵民一家亲——上海民兵在野营训练途中”《文汇报》1972年6月8日

先看上海工人的野营拉练活动。在“生产不能减少”的原则下,上海市区工矿、财贸、企事业单位职工的野营拉练活动,一般根据生产和季节的特点,采取“全年轮流、分期分批”和“定线定点”的方式进行。组织实施一般以民兵(基干、普通民兵)为主要对象,吸收青壮年职工参加,领导指挥则“可以区为主、由局配合,有的也可以局为主、由区配合”。^[33]同时,工矿企业单位到郊县野营拉练,恰巧可“帮助社、队修理农机具”。^[34]这样,上海工人的野营拉练活动就具有“支农”和“与民兵训练相结合”的特点。

工人野营拉练既有系统承办,如市工交系统曾组建大型野营训

练团,持续 15 天,穿行五个县,“走一地,访一地,住一户,问一户,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35]也有单位组织,如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就配备由 20 名党员和干部参加的百人野营拉练连等。根据形势和任务,除了惯常的政治要求(1971 年至 1972 年间的主题是“结合批修整风,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各单位还针对城市工人下乡军训,特别制定了类似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野营拉练连“四不准”的规定(即“不准从城里带东西到乡下吃;不准从乡下带东西回上海;不准在路上或宿营地随便买东西;不准与民争利”)。同时,工人野营拉练队多带有工具,“一路上,他们修马达,修车床,修脱粒机,修广播、电灯等”,计算机厂的拉练队还在嘉定方泰修好了一座濒临废弃的自来水设备,深受贫下中农的赞扬。^[36]这是城市工人的技术优势,在特殊境况下的显示和表达。其实,这只是一种顺带和方便,抑或是一种义务和服务,但因革命的需要而赋予了政治的含义,就被抬举到“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工人野营拉练中的“支农”行为便变得热门和紧要起来了。



巩固工农联盟

上海工人野营拉练“与民兵训练相结合”是必定的路径,从现象上看,因为前者的功能与后者的职能是契合的,从本质上看,那是因为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自“康平路事件”后,^[37]就以绝对的优势和权威占据着上海的政治舞台,由此派生出的“文攻武卫”组织(即“上海民兵”前身),自然要通过训练强化自身,健全自身,倡导野营拉练恰好提供了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不仅上海整体的野营拉练由“上海民兵指挥部”统辖,在工人野营拉练方面,更是直接要求“充分发挥民兵组织在训练中的作用。武装基干民兵单独组织进行野营训练”等。^[38]例如 1970 年至 1973 年间,上海烟草工业印刷厂民兵营下设 3 个普通民兵连、2 个直属排和 1 个基干民兵连(共有民兵 450 人),每年组织开展一二次野营拉练活动,先后共组织 10 多批。^[39]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可以说上海工人野营拉练既有提高军事素养的需要,更有提高政治地位的谋求。此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决定上海民兵一方面加强武装,重点操作各种武器的射击;^[40]一方面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派出大量的民兵小分队进入里弄,^[41]从而创造出了“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队伍”,“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即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城市民兵建设的新经验”。^[42]所以,截至 1973 年 9 月的统计,“两年多来,全市有四十多万民兵参加了野营训练”。^[43]在此请注意,原来上海工人(民兵)参与野营拉练的人数并非很多,只约占总量的六、七分之一。恰如前述中所提及,这是因为上海工人野营拉练与民兵军事训练相结合,即野营拉练成为民兵军事训练的主要选项,便在 1971 年至 1972 年间构成了热潮和主题。而后,上海民兵的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武装力量)和任务(战时参与保卫城市;平时参与城市阶级斗争)或增强了,或提升了,或转向了,野营拉练作为初期的一种徒步行军式的训练手段,也就渐渐地降低了权

重，渐渐地被闲置了。

再看上海各大学的野营拉练活动。“文革”运动中，能够对各种政治信息作出敏锐而快捷的反应，且率先有所行动的应该是大学。1970年12月17日，即上海召开野营拉练动员大会的第二天，复旦大学就组织全校1300余人进行了拉练。^[44]这应该是上海正式外出拉练的第一支队伍。一般情况下“大专院校师生员工的野营训练，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在训练中，本单位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与市民兵指挥部联系”。^[45]所以，有些规模较小的院校，如上海中医学院（今上海中医药大学）就从部分工、军宣队和干部、师生中抽出300余人编成一个大队，于1971年2月春节后，直接参加徐汇区武装部组织的第三批野营团，去金山、松江一带拉练，行程数百里，历时两周。^[46]规模较大的院校，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则因人数多、队伍齐，均自行组织实施，如1970年12月25日清晨，华东师大野营拉练团1500人出发。拉练团历时一个月，途经苏、浙、皖三省，行程1100余华里，于1971年1月23日返回学校；1971年2月5日至3月6日，同济大学组织1232名师生进行了一个月的



1971年复旦大学部分师生长途拉练1500里

野营拉练训练,途经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3 省 1 市,步行 585 公里;^[47]同年 2 月,复旦大学 1 700 余名师生围绕太湖进行拉练,历时一个多月,行程 1 500 余里,途经 3 个省。^[48]据《谭其骧日记》记载:3 月 15 日,“早七点到校门口迎接拉练返校队伍”,一直等到“八点半始到”。^[49]在清晨的寒风中,让一批老弱病残的知识分子排成迎接的队伍,^[50]站立等候一个半小时,然后,手摇小旗,面带笑容,念念有词,此番风景真是难能可贵了。

关于大学野营拉练活动的一般情况,请听复旦大学化学系姚子鹏教授 2000 年接受访谈时的口述:

除了少部分正在完成上面下达的科研任务的科研人员外,复旦绝大部分师生、干部、群众参加了一次历时约一个月、行程 1 500 里的伟大拉练。这些被时代的洪流打得昏头转向的人们中,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属于高分子系的一位教授。当时他已有 50 多岁,却不得不与年轻人一起接受改造和再教育。很难想象,他是怎样背着沉重的背包,走过城镇的大街小巷,走过乡村的坑坑洼洼,甚至走过一根根水泥管。幸运的是,这位老人至今仍然健在,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于同隐教授。

28 年过去了,常熟→无锡→会山→乌龙镇→宜兴→广德→湖州→嘉兴,这些地名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身负 15 斤以上的重物(有棉被、衣服等日常用品和必不可少的《毛泽东选集》等宣传学习材料),深一脚,浅一脚,疲惫不堪地走了一个月所经过的地方怎么会轻易忘记呢?无论天晴下雨,我们这支两人固定为一排的队伍每天不得不走完甚至跑完几十里路程,最多的时候达百里也不稀奇。晚上突然来个紧急集合亦属正常,忙乱之中打不好背包的人只好格外艰辛地在急行军的队伍中,想方设法把散了的背包带到目

的地。脚扭伤了也不许休息，更不许回去，你慢慢地跟在队伍后面走吧；昏倒的人也有，最“仁慈”的处理就是把你送到收容车上；路上不准玩，不准买东西，而那些义正辞严地训导师生的工宣队头头们却一路游山玩水，优哉游哉。

至于伙食，那时能偷吃一个大饼，就觉得味道很好了。沿途有两辆自行车跟着，负责膳食的伙夫会提前到达宿营地，用这两辆任重道远的自行车去采购食品。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员能为复旦师生每人提供几捆稻草垫着睡已属不易，哪还敢奢求枕头、床铺？疲于奔走的我们辛苦了一天也不能立刻休息，政治学习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内容。我实在佩服那些被卷入这场动乱的无辜的人们所具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次拉练中，复旦师生与当地群众饶有兴趣地进行篮球比赛，我就参加了七场篮球赛；还曾与途中偶遇的解放军比赛行军速度。那次拉练是走了不少偏僻的地方，看到了别处看不到的景色。^[51]



拉练夜行军

由此看来，大学的拉练活动保持着整建制行动的特点，尽管时间很长，路线很长，但整个行动始终是按计划、有纪律地进行；尽管困难

重重,一路疲惫,但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一种有弹性的节奏——在每天几十里路程的行进中,不仅“两人固定为一排的队伍”,还间有“紧急集合”;还常有“政治学习”;甚至还时有“篮球比赛”。诚然,这体现出了部署和指挥的优势,实际上与大学师生的年龄构成、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文化素养是息息相关的。

最后看上海中学的野营拉练活动。按照规定,中学师生的野营训练“可以在寒、暑假期间分批进行”,“以区教卫组为主,与区民兵指挥部共同负责组织实施”。高小师生的野营训练则“一般采取早出晚归的方法进行,由街道和学校组织实施”。^[52]上海有数千所的中小学,要动员和组织如此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外出野营训练,不论其教育内容和行程设计,仅就其后勤供给和安全保障,都是很大的难题。然而,在1971年上半年滚滚如洪流的拉练热潮中,有哪所学校能不趋之若鹜呢?于是,不同的学校或采取凌晨出发,下午回归;或采取夜晚出发,清晨回归(夜行军);或采取往宝山、往川沙、往嘉定等近郊,在外宿营一两天的拉练方案。当然,也有学校联合组团,举行长达数周的远郊野营拉练。



徐汇中学红卫兵讨论拉练方案(马学强提供)

关于中学野营拉练活动的一般情况,请看几段报刊文摘:

我们学会了用背包带将一条 4 斤的棉被打成一个方块形状，用背包带扎成“井”字形，一个水壶，一个挎包，交叉地背在身上，用一根武装带在腰际一束，便是一个军人的装束了。队伍在出入市区的时候会迈着整齐的步伐，间或，有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回传达着命令。宣传队在路边打竹板：“同学们，快点走，前面就是大八寺。”这竹板的词儿是从电影《突破乌江》里搬来的。这样的表演叫人觉得好玩；到了市郊，大片的田野。干农活的农民一看见“野营部队”，便一个个支着手中的农具张望。往往在这个当口，通讯员飞骑赶到，一路高呼：“空袭警报，赶快隐蔽！”大家就地卧倒，不管是在泥地还是在马路上。田野里的老百姓都看得明白，“整齐来唠”，他们用本地话赞叹道。^[53]

“野营拉练中的笑话其实很多。那时伙食少油水，吃得再多也不顶饿。一天半夜，忽然听见角落里传出声音，接着就是一阵怪叫。我们赶紧摸出手电筒循声照过去，不由大笑起来。只见一女生半夜里摸点心吃，不想却摸着一块工农牌肥皂！肥皂已经被她咬掉一口了，她的嘴角像螃蟹一样正在冒泡泡呢！”；“班里有个皮大王，平时就皮得让老师头痛。有一次他上茅厕，见里面已蹲着一男同学了，就捡了一块大石头用力丢进粪缸里，想把粪水溅到那个男同学的屁股上。不想他用力过猛，结果他自己随着惯性扑进了粪缸。茅房里的男同学吓了一大跳，提着裤子就跑出来叫人。后来皮大王是抓着农民的粪勺爬上来，浑身上下都是粪水，人和衣服臭得几天也洗不干净。”^[54]

“1971 年 3 月底至 4 月 10 日，成了我们这些不要读书的中学生的‘盛大的节日’。上海静安区的中学生几乎倾巢出动，在市西中学举行出征誓师大会。那些调皮的同学欢呼雀跃，奇迹般地瞬间学会了打背包，然后在明媚的春光中向着郊外挺进。在两周不到的时间内，我们沿着卫家角→赵巷→佘山→朱家角→赵屯→白鹤→

香花桥→重固→纪王庙→北新泾这样一条弧形线，跨越青浦、松江、上海三县，行程约 400 公里。头天晚上，我们在卫家角宿营，因极度兴奋，十几个男生深更半夜还在空旷的公路上唱歌、吼叫”；“为了显示革命的朝气和学习解放军的艰苦朴素，我们特意使用一大嘴巴同学的脸盆盛饭菜，也即洗脸洗脚吃饭全靠它。每到开饭时，这位一口可以吞下两只汤团的同学，边敲脸盆边发出‘狮吼’。奇怪的是，十几天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拉肚子。清明节傍晚，我们宿营赵屯，一位同学一口气连讲了几个鬼故事。孰料，半夜里他自己倒吓出高烧来了，又适逢阴雨绵绵，我们只好去找赤脚医生来给他打针、服药”；“野营拉练中最苦恼的是我们温文、纤弱的老师，脚上起了泡，仍要一瘸一拐地咬牙前进”；“老师整日整夜提心吊胆地怕学生出事，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赵巷时，一座独木桥横亘在我们面前，一些女生望着桥下的潺潺河流竟吓哭了。后来，女生们总算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诚惶诚恐地过了桥。更吓人的是从佘山向朱家角行军途中，炊事班的一包大米不幸掉入河中。我们班的‘摔跤大王’立马一个猛子跳入河中去‘救米’。他将米‘救’上岸后，又返回河中游个欢畅，引得两岸同学齐声喝彩，而老师则面如土色，惊呼‘摔跤大王’赶紧上岸”。^[55]

由此看来，相比于工人民兵、大学师生规范整齐的行动，中学生的野营拉练是最富有情节和情趣的。这一群体可以在公路上，把“练好铁脚板，踩死帝修反”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可以在田野里，把“空袭隐蔽”的演习进行得栩栩如生。但这只是教导、训练和演示的结果，当这一群体进入野营拉练“吃、住、行”的实际过程中的时候，即从单调而逼仄的城市街区来到丰富而开阔的乡村空间；



中学生拉练队伍



中学生拉练队伍

从日复一日重复的城市生活转换到时时、处处新鲜的乡村境遇，其孩童时代的活泼、顽皮乃至恶作剧，皆因极度兴奋无拘束地发泄而出、表达而出甚至创造而出。经典的一幕是：经询问数十位这一年龄段的男女中学生（已非“老三届”，为 1970 届至 1974 届），无不在农民家的客房里、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宿营时，有学“鬼”叫、讲“鬼”事、



野营战士心最红，野营战士志最坚，
毛主席教导记心中，千难万险只等闲，
今日苦练铁脚板，迎着寒风挺起胸，
明天踩死帝修反。高举红旗永向前！

“小学生拉练队伍”《红小兵报》1971年3月24日

唱“鬼”歌、扮“鬼”相的共同经历。至于上房捉鸟，下河捕鱼；至于有男生打群架，有男生帮女生背包，女生帮男生缝补，以互为示好，也时有所闻。其实，这是中学生群体的生活常态，是青少年天性率真而精彩的呈现。它集体性地将一个政治行动生活化了，童趣化了，快乐化了；集体性地将一个政治行动演绎成了一场青春的游戏。

考察上海的野营拉练，从部队将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与管辖职能紧紧结合，到上海工人强调“支农”、“落实于民兵训练”的主旨；从大学反应迅捷、行动规整的整建制行动，到中小学充满青春气息的田野活动，在同一个政治命题下，各条线的队伍各有特点、各有发挥，共同记录了“文革”运动中这一段插曲的旋律和内容。

四、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说“野营拉练”是“文革”运动中的一段插曲？

插曲应是相对于主调而言的。就“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来说，用当时的话语表达是“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用后来的话语总结是“祸国殃民”、“浩劫灾难”。在此，暂且悬置其前后的因果演变，终究是一场时间漫长、规模巨大、关系错杂、内容扑朔迷离而又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始终贯穿的纲纪是“阶级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值得提醒的是，在整个“文革”运动的具体推进中，事实上却又在不断地分蘖出、派生出新的阶段性的运动主题，以“野营拉练”时的前后为例，大致就有“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整党建党”、“批陈整风”、“批林批孔”等等。应该承认，这些阶段性的运动不仅是整体运动的构成，也具有相当的声势、规模和明确的任务，且在主题方面紧紧地附着于“文革”运动的政治纲纪。比照而言，虽然“野营拉练”也有政治性质的触发因素，但本质上既没有那么重要的政治指对，又没有那么紧要的政治权重，它只是动员群众参与到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中去，且主题也并不直接对应“文革”运动的政治纲纪。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如果说“文革”及其不断派生出的类似“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等运动，它所展开的斗争内容、它所强调的政治纲纪是一种主调的话，那么，“野营拉练”的过程就只能是“文革”运动中的一段插曲了。^[56]

第二，“野营拉练”与“五七指示”的关联如何？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批示“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时，“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57]这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工农兵学商”的联合体，描绘了一幅全民“有主有从”，“调配适当”的理想化蓝图。^[58]然而，这个萌生于“文革”初期的设计和描绘，并没有随

着“文革”运动的开展显露其美好的塑形,反而被“文革”运动的残酷斗争搁置在一边,成为一种景观和寄托。所以,至“文革”中期(1970年11月),当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的报告作出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批示的同时,即指示工人、大中小(高年级)学生“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59]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有关方面也确实要求这些非军队的拉练者应“学会行军、做饭、宿营、警戒;学习防空、防毒、防原子弹等军事常识,进行战地救护、包扎等课目训练”,并进一步“结合教学改革、学农或社会调查”等。^[60]很明显,这是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接续,这是对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一次学习和实践。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来理解,再联系“文革”中后期的“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等内容,可以认为“文革”运动从初期始就存在着一条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为主轴的线索(至于这条线索的特征和性质,则另作评论),这条线索曾多次寻求粗壮和伸展,但因受到了“文革”运动中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挤压,长期不得成功发育,就只能显得那么苍白和细弱了。

第三,如何看待一条现成的评价?

《中共上海历史实录》认为,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61]显然,这是一条负面性质的评价,是一条附和“全面否定‘文革’”论断的评价。它在因果关系上,似乎也与野营拉练难以持久相关联。正如前文论述,上海的野营拉练在1971年度达到134万人次的高潮,如据当年黄浦区的统计:“全区共组织工人、中学生、高小生、机关干部66个团,146 812人参加野营训练,占可参加训练人数187 099人的79.5%”;^[62]南市区“全年有131 529人参加了野营拉练。中、小学均完成拉练计划”。^[63]此后,上海的野营拉练便节节滑坠,至1974年度只有14万人次了。^[64]那么,这是否由于扰乱了“正常秩序”和浪费了“人力、财力、物力”造

成的呢？也如前文论述，上海野营拉练人数连连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中后期政治形势的加剧变乱，尤其野营拉练的指挥权归入上海民兵指挥部后，上海民兵的任务高度地职能化，即直接操弄先进的军事装备，直接参与社会阶级斗争，哪还顾及初级形态的野营拉练呢？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来理解，可以说《中共上海历史实录》此在的结论，是假借了“否定‘文革’”原则的笼统性套用。事实上，野营拉练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十分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强调向社会学习，特别是部分长期浸沉在“读书无用”思潮中的中学生，反倒是在野营拉练的进程中显示出勇敢、机敏、能干的品质，增进了师生与同学间的友谊。况且，野营拉练在时空和事务方面不断地变换着主题和内容，不断地增添着种种新意刺激，以致给每一位经历者留下了有意味的记忆。因此，关于本问题的准确说法不应是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而是整个“文革”的大环境、大动乱造成了“混乱”和“浪费”。

注 释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5 页。
- [2] 在 1970 年 8 月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因陈伯达、吴法宪、叶群等提出“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引发了毛泽东所说的“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震怒。当时，黄永胜留守北京，不仅打电话声援陈伯达等，还赶赴庐山，准备发言。会后，陈伯达遭到批判，吴、叶作检讨。11 月 13 日，毛泽东批评黄永胜：“你黄永胜是总参谋长，是个头儿。你一天到晚不抓大事，只抓小事，不参不谋，路线问题、团结问题你就抓不住。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转引温乐群、郝瑞庭，《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7 页。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年版,第 155 页。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4 页。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8 页。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5 页。
- [7] 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第 232—233 页。
- [8]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7 页。
- [9] 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党史征集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党史大事记》,1999 年 10 月内部版,第 194 页。
- [10]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征集办公室:《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7 页。
- [11] 王孝俭:《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1 页。
- [12] 根据笔者对上海“文革”资料的知悉,可以判断关于上海拉练人数的统计,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完整、详细的。这将有待后人开发。
- [13] 1973 年 12 月,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第 1 页。
- [14] 同上。
- [15] 1973 年 1 月 9 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
- [1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2 页。
- [17] 吕型伟:《上海普通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6 页。
- [18] 王孝俭:《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1 页。
- [19] 1973 年 1 月 9 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第 2 页。
- [20] 至 1973 年 12 月,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总结中,提到“有些区、县、局抓野营训练工作的力量不落实,全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逐年减少”。
- [21] 1972 年 2 月 6 日,根据王洪文的指示,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

部”联合向市委、市革委会和警备区党委写了《关于文攻武卫同野营训练两个机构合并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市委常委批示同意。由此，各区率先行动，例如8月8日，黄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区“野营拉练指挥部”合并，定名为上海民兵黄浦区指挥部；9月9日，闸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区“野营拉练办公室”合并。9月10日，“上海民兵指挥部”正式取代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页；周太彤：《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曹一丁等：《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22]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66页。

[23] 同上书，第568页。

[24] 同上书，第571页。粉碎“四人帮”后，该文件被撤销。

[25] 同上书，第572页。同年12月，中央向各省市批转该报告。1979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撤销该报告。

[26] 1973年12月，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第5页。

[27] 1973年1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抄告单第1096号。

[28] 宋永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通知》概要。《通知》要求部队“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

[29] 宋永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通知》概要。

[30] 1973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务必加强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31] 沪团委1973第72号，《团市委六届三次全会扩大会议情况报告》，“讨论青少年战备教育问题”。

[32] 周祥根：《上海武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5页。

[33] 1973年1月9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

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第 2 页。

[34] 同上，第 3 页。

[35] “胸怀朝阳向前进，风雨途中炼红心”《工人造反报》1971 年 2 月 28 日。

[36] “野营途中加强党的工作”《支部生活》1971 年 2 月 22 日第 9 期。

[37] 1966 年 12 月 30 日凌晨，在张春桥的指使下，王洪文调集 10 多万工人造反队员，对康平路市委机关里的赤卫队进行围攻和殴打。

[38] 1973 年 12 月，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第 3 页。

[39] 董浩林：《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9 页。

[40] 据 1973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上海城市民兵，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阅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武装工人，改造城市民兵的请示报告》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文攻武卫”，人数不多，没有发枪，每人手拿一根棍子或长矛。到今年三月，已发展到八十多人（其中专业复员军人七万八千多人，有一万四千多人是打过仗的），拥有各种武器二万三千七百余件，高炮三百二十四门，建立了十个武装基干团，十八个高炮团，五个独立高炮营，三个高射机炮连，一个摩托团，此外还有工兵、防化、通讯、运输等一批专门兵种队伍。以一九七二年为例，参加军训民兵达三十四万七千余人次，其中有七万三千参加了各种轻武器射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有二百零五个高炮连一万五千余人次参加了火炮连的实弹射击，成绩良好。另外还有对排以上干部分别进行了集训，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今年还办了两期反坦克训练。

[41] 据 1973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上海有一千多条里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流氓、阿飞，经常利用里弄人口密集管理不严的弱点，兴风作浪，破坏治安。上海民兵派出一千一百七十多支分队进入里弄。两年多时间，全市民兵小分队共破获了各种案件二千余起。

[42] 1973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

[43] 同上。

[44] 《复旦大学百年纪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4 页。

[45] 1973 年 1 月 9 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第 4 页。

[46] 《上海中医药大学志》，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 页。

[47] 袁运开、王铁仙：《华东师范大学校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5

- 页;《同济大学志》,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02 页。
- [48]《复旦大学百年纪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5 页。
- [49] 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3 页。
- [50] 因中央文件规定“老弱病残者可不参加训练”。然而,谭其骧教授等挖防空洞却未能幸免。据谭其骧《“文革”日记》1971 年 10 月 9 日记:“继续挖防空洞,三点毕,劳累甚,腰痛,回家即僵卧。”
- [51]“70 年代全校拉练总动员”《复旦青年》2000 年 1 月 1 日总 89 期。
- [52] 1973 年 1 月 9 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第 4 页。
- [53] 程小莹,“拉练”《青年报》2005 年 10 月 4 日。
- [54] 张谨,“三十年前的野营”《新民晚报》2002 年 4 月 20 日。
- [55] 秦维宪,“野营拉练记”《新民晚报》2006 年 5 月 7 日。
-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3—54 页。
- [57] 同上。
- [58] 同上书,第 54 页。
-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5 页。
- [60] 1973 年 12 月,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第 2—3 页。
- [6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2 页。
- [62]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2 页。
- [63] 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党史征集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党史大事记》,1999 年 10 月内部版,第 198 页;孙卫国:《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 页。
- [64] 其实,野营拉练并没有就此中断,一直持续至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只是后期的野营拉练多是中小学结合学农、扫墓等进行的活动。所见报道如 1975 年 11 月 19 日《红小兵报》“脚穿草鞋去拉练”、“一次有意义的夜行军”;1976 年 5 月 12 日《红小兵报》图文版“普陀区长寿路四小红小兵,野营拉练到师大二附中,向被批准去西藏农村干革命的红卫兵小姐姐学习,并献上了大红花”等。

附：

《野营进行曲》两首

野营进行曲

1=G $\frac{2}{4}$

上制五厂
工人创作组词
工人阶级的曲

男往宣前，进行速度

1. 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火红的
2. 我们顶着风雨雷电，战斗的
1. 7.6 | 1.1.5 | 3 - | 2.6 | 2.3 |
被旗高高飘扬，胸怀抱祖国
意志无比坚强，“一不怕苦，
4.3 2.1 | 2.6 | 5.4 | 3.2 | 5.5 6.7 |
放眼世界，我们前进在革命的大道
二不怕死”，毛主席的教导牢记心
(副歌)
1. 5 | 1. 5 | 1. 2 | 3 - | 3. 3.3 |
上。前进！前进！前进！紧跟
6.6 6.5 | 4.4 4.3 | 2.3 1 | 5 - | 5 6 |
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前闯。
2. 3 | 4. 5 | 6 - | 6. 3.3 | 2. 1 |
进！前进！我们苦练
5.5 5 | 6.6 5.3 | 2. 5 | 1. 0 |
铁脚板，狠狠打击帝、修、反；

《工人造反报》1971年1月26日

野营进行曲

1=A $\frac{2}{4}$

打背包包红马枪，千里野营
斗志昂，踏上红军
长征路，高举红旗向太
阳，燃起思想，练作风，
一颗红心忠于党，跟着毛主
席，团结向前进，跟毛主席，
胜利向前方。

《工人造反报》1971年2月28日

第二十章 题旨和结论

现在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只是第一部，后面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打开如此规模的一幅历史长卷，并非因为制作的式样和技巧的需要，恰恰是“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这块“处女地”广袤而深厚。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1]这大致是针对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发端于 1966 年，^[2]且在论著、课程和资料库等方面均有建设和积累。然而，我认为国外“文革”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从起始时政治战略研究的角度向当今史学研究的方向转型，并由此在学术价值层面获得展开和确立，尚缺乏根本性的支撑。这里，除了大量深部和细部的“文革”史料尚未开掘，外国学者对“文革”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难以树立“中国式的体悟”是关键的因素。所以，我坚持认为：只有依靠中国学者（近年，从国内出去的一批学者显得较活跃），甚至只有取决于国内学者作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文革”研究确实具有成为世界“显学”的品质）。

于是，在向出版社交出这第一部书稿的时候，联系本书所标树的“非常与正常”的研究题旨，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伸展性地申说和

阐明。

一、“文革”研究的“两个支点”

“文革”研究伴随着“文革”爆发和“文革”终了均已数十年了，缘此“文革”研究本身已构成了研究的对象。立足在这个视角，回溯并检证以往的研究，可见有“浩劫灾难”说、“权力争斗”说、“路线斗争”说、“社会冲突”说、“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等种种的理论构架(或称“范式”)，且多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动因”、“刘少奇案”、“林彪案”等重大问题，企求给予确定的解答(甚或解决)。

应该承认，这是多年来“‘文革’研究”垒筑起来的平台，并使之达到了一定的研究高度，然而，当它继续展开的时候，有两个萌动的倾向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集体犯罪”说；第二是“人类遗产”说。如果说前说是一种终极性的批判思路；那么后说便是一种颠覆性的辩护思路。^[3]再仔细辨析，可发现这两个倾向充满着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当代中国政治的趋动也紧密勾联，且着眼于宏大叙事和逻辑推演，力图在惯常的政治学的框架内得出结论。我并非是说这两种研究倾向的路径是梗塞的，它们在学理上各有存在的价值。但我同时认为：“‘文革’研究”的未来走向，应是以十分严肃的姿态进入史学学术之中。因之，便引出“学术至上”和“史料为本”的话题。

先说“学术至上”：固然，“文革”运动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特征，甚或就是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4]那就是既以“意识形态革命”为引导；又以“意识形态革命”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研究”就难以回避“意识形态革命”的特征和影响，即不可避免地要搅扰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漩流中——因为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立场”、研究的“方法”是可以剥离的。这就是说，即便“意识形态革命”是凸

显的主题,是重要的内容构成,却不可以是研究的“引导”和“目的”(强调是“历史学”,而不是“政治学”的研究)。在此,剥离不仅是学术的技巧和学术的智慧,更应是学术的自觉。尤其对一代“‘文革’亲历研究者”(或称“亲历性的研究者”)而言,或许剥离是艰难又痛苦的蜕变,但不剥离是拖累的、陷落的、狭隘的;剥离了则是自由的、卓立的、宽畅的。因为只有坚持学术的立场,只有坚持以学术的态度审读史料和史实,只有坚持将“意识形态革命”的主题和内容,降落到历史学的文本中去粉碎、去梳理、去陶铸,才可能真正产生具有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作品。

再说“史料为本”:毫无疑问,坚持“学术至上”的立场,必然坚持“史料为本”的方法。检索时下诸多的“文革”著述,或者凭依一些传单、小报;或者指靠一些回忆、口述;或者基于自身的“经历—经验”和“感觉—感悟”,便把握“文革”运动的政治路线和大关节目,大而化之地进行逻辑推演,牵强附会地进行理论构建——这怎能不造成浮泛的“虚相”呢?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文革”著述,摘编转抄,东拼西凑,毋宁说丧失了严肃性,还闹出不少的错乱和笑话。大凡察验这两类著述的注释,不是回避交代资料来源,就是十分的零碎和单薄,全然没有在资料的深部和细部,认真而艰辛地做过开掘、爬梳和考订等工作。我以为这是“‘文革’研究”是否能够迈入史学学术层的根由所在。自然,舆论会指认因政治敏感,档案禁闭,并非研究者不认知、不期盼、不努力。但面对现实是等待开放的指令降临,现成的史料铺展在面前,还是主动出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却是判然不同,天差地远的选择。^[5]“‘文革’研究”最终要依据深部和细部的史料说话(包括各类简报、动态、通知、信件、报告、报表、批示、总结、揭发、交代、会议记录、工作笔记、统计汇总等等)——尤其是它的政治复杂性,甚至决定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

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敦促开放文献档案,并积极寻觅文献档案,加强“文革”史料建设,树立“史料为本”的理念,不仅是“‘文革’研究”的当务之急,更是一条学术正道。

二、“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

“文革”是一场发动全民、遍及全国、历时十年的政治动乱,尤其肇始于上海的“一月夺权”,冲击乃至摇撼了自1949年来建筑的权力机构。但“文革”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机杼,没有被这场动乱所触动——那就是全国的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动,因之,中国存在着“四个层面”的“文革”——中央层面的“文革”、省市层面的“文革”、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

固然,行政区划关涉地界,具有地理学的意义。只是此在的指向更在于政治意义的行政管理的构架。所以,所谓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动,并非是强调其地理上的管辖区域,而是强调其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的构成,即每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都是自成系统、自成“层面”的。于是,在“文革”运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冲突中,在这种冲突演进的不同阶段中,各个层面的“文革”均构成各自的冲突焦点。如中央层面的“文革”:从《五·一六通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二月逆流”到“杨余傅事件”;从“刘少奇案”到“林彪案”;从“一九七五年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再如省市层面的“文革”(以上海为例):从“安亭事件”到“康平路事件”;从“一月革命”到“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从“踏平联司”到“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从武装“上海民兵”到“未遂政变”。若以上海为圆心,逐层放射性地推演,可见第一半径圈的浙江省、江苏省,^[6]第二半径圈的福建省、江西省、安徽省、山东省(属华东局),乃至第三半径圈的湖北省、

河南省等等,均以行政区划为基准,演义着自身的“文革”故事。至于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同样是以行政区划来合围自身的运动空间。

如果说这只是平面地铺展中国“文革”的“四个层面”,那么,深入地剖析这“四个层面”的“文革”,便可见每一个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人员和队伍的组合,均是在所属的行政区划以内构筑的。这就是说,不管是跨层面的情况,还是同层面的情况,正是行政区划的界碑构成了在在不同的“焦点”和“组合”。如两个毗连的城区,以一条街道为界,尽管左右邻居走街串巷,但“文革”时期街道这边与街道那边的群众组织、干部队伍,以及斗争矛头所指认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再如两个毗邻的学校,以一道围墙为隔,尽管师生之间你来我往,但“文革”时期围墙这边和围墙那边的群众组织、干部队伍,以及斗争矛头所指认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文革”时期不变的行政区划,不仅形成“四个层面”的“文革”,更延伸性地形成千千万万个不同的“文革”群体和不同的“文革”冲突。

当然,确认“文革”的“四个层面”自成独立的系统,并非说这个系统就是孤立而封闭的。事实上,这个系统又处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开放状态中。

先自上而下地看:中央层面的“文革”,除了具有自身的斗争焦点和集团构成外,还领导和指挥着全国的“文革”运动,以至频频地向下发号施令。至于其运作的方式,有的是社论,有的是通知,有的是文件,有的是“最高指示”,于是,省市层面的“文革”、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均闻风而动(用当时的话语叫“不过夜”),由此推动“文革”的进程和步骤。如1966年10月,《红旗》杂志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再如1974年1月,中央批转

江青编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掀起“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11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最高指示”，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正是这些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此为当时的话语），制造了中国长达10年的崎岖和坎坷。同时，还应看到自上而下的传达并非一马平川。这恰恰是因为省市层面、地县层面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各有自身势力分布和利益得失，以致在具体的接受、解读和执行时，总是按照自身的立场和需要来作抉择。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号令向下传达时，往往发生“弯曲”、“变形”的缘由所在；这也是不同层面的“文革”呈现各自复杂性的缘由所在。

再自下往上地看：其实，各省市层面、地县层面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既然独立地自成系统，那就与该行政区划所属的历史缘由、文化传统、政治现状和组织人事关系紧密相关。如该地党、政、军机关和干部人事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之间的政治取向和权力机构的政治组建；再如该地民众的人口构成和民风的传承特征，往往影响“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方式等。这即是说，各个层面的“文革”都会在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中，自下而上地产生影响大局走势的事件、人物和经验。有的是发生在下层，而后被高层作为例证和典型，或引为教训，或推而广之，如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清华的“百日武斗”，以及福建的李庆霖和辽宁的张铁生等。在上海则有“一月革命”的夺权、上体司鲁迅兵团的整风、市六女中的大联合、国棉十七厂的整党建党、上海机床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同济大学的“五七公社”、上钢五厂二车间的工人理论小组等等。有的则是发生在下层，却直接自下而上地主导了整个政局的变动。如上海《文汇报》“三五事件”和“三二五事件”，就率先引发了南京大学学生的抗议，继而演变成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等。所以，正是这些自下而上的事件和行动，构造了整个“文革”运动的多元复杂。

同时,还应看到各个层面之间也存在着交错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的人员往来(如“文革”运动初期,北京红卫兵在各地建立联络站等)和间接的形势辐射(如全国大武斗时,各省市之间的呼应等),以致“文革”运动呈现出多重叠合的线索。但必须指出,这只是“文革”前阶段的现象,且比较短暂,而以行政区划为依归的“四个层面”的“文革”,才是贯穿整个“文革”运动持续而稳定的情状。

缘此,“文革”的“四个层面”的阐说,就为开展“文革”区域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和构架。因为该阐说从理论上证实了省市层面、地县层面的“文革”,在行政区划范围内具备“干部—权力”、“群众—组织”、“政治—运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完整的运作系统,且与各层面之间处于互动的状态中,以致进入“文革”区域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某一层面、某一行政区划的“文革”史进行深入的梳理,便能对该区域的“文革”史实及其特征和问题等有所发现,有所剖析,有所建树。此类区域史研究,可称为中国“文革”史研究的“地方视角”(本书所承担的“上海‘文革’社会生活”的课题,就是“文革”研究“上海视角”的一个方面)——看上海的“文革”史;从上海看全国的“文革”史;从全国看上海的“文革”史——如此既放散又汇聚的思路,推广而去,便应有“文革”研究的“北京视角”、“江苏视角”、“河南视角”、“湖北视角”、“四川视角”、“广东视角”等等。可以设想,若是众多的“文革”区域史的学术成果问世了,不仅可展示各行政区划的“文革”运动,显现各行政区划的“文革”特点,更可通过相互间的比照和印证,引申出许多需要阐释的线索和需要求解的问题,这必将大大促进和提升中国“文革”研究的整体水平。

与此同时,在高层档案暂不开放,中央层面的“文革”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革’起因”、“刘少奇案”、“林彪案”三大板块)难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倡导各地学者进入“文革”区域史研究,不仅存在可能

性和可行性,甚至是相当正确的路径。这不仅是因为落于省市层面和地县层面的“文革”时,各地的研究者可利用各自“地缘一人缘”的关系;各自“经历一经验”的优势,在资料获取和人员组织方面求得许多便利。从外部向中心进击,从底层向高层合围,或许正是中国“文革”研究的出路和趋势所在。

另外,在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研究方面,应指出选取的研究对象,必需在“权重”和“资料占有”两个要点上显现出意义和价值。“权重”的要点属历史的,那就是该基层单位的“文革”运动在所属城市、省区内,曾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重大的影响,甚或是“龙头”单位、“风向标”单位等。如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的国棉十七厂、柴油机厂等。再如浙江省的浙江大学,江苏省的南京大学,陕西省的西安交通大学,四川省的四川大学以及重庆大学等。据有关信息,清华大学(唐少杰)、复旦大学(金光耀)、南京大学(董国强)等,均有学者在做该校的“文革”运动史。可以设想,若是全国各主要大学均有学者投身此类研究,完成中国大学“文革”史研究系列,即从一个个“高权重”的基层单位,扩展到一座座城市、一个个省区的“文革”史研究,那将是中国“文革”史研究蔚为大观的局面。

“资料占有”的要点则是当下的,那就是即便所选取的基层单位在“文革”运动中并非重要和典型,但研究者却掌握了该基层单位的完整资料,如复旦大学一教授就从资料贩子手中,收购到上海某研究所从“四清”到“文革”的全部档案,大到下达的文件,小到工资明细,以此解剖“麻雀”(此处借用“文革”语汇),梳理一基层单位“文革”运动的“全过程”(此处借用“文革”语汇),看其中的运动进程、派别冲突、政策演变以及人事关系、经济收入、生活状态等,无论是纯粹的局部“文革”的定位和探究,还是对全局“文革”作铺垫和补充,在历史学意义上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总之,以“文革”时期行政区划的不变为依据,确立中国“文革”“四个层面”的模型,倡导并推进“文革”区域史研究,应是当下甚或相当长一个阶段的进路。

三、“文革”研究的“两个向度”

检索当前国内外关于“文革”史的研究,多数集中于高层运动史,即关涉重大事件的始末和重要人物的沉浮,可称为“政治运动的向度”,且往往标树为“文革”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当然,这是开展“文革”史研究顺理成章的结论,因为在一个“非常”的“革命”的年代,运动终究是主导的和支配的,终究是社会动荡和社会变迁的产床。如研究上海的“文革”政治运动,就不仅可见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三人如何登上历史舞台,还可见许多发生在上海“文革”中的事情、事件和事变,或许具有鲜明的上海地方特点;^[7]或许影响了全国的大局走势,这怎能不显示研究的价值呢!

但是,当“文革”研究全部聚集于政治运动,即被“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场景所定格的时候,人们的记忆便会以破碎了的、撕裂了的政治“片断”所支撑,而淡忘了“文革”时期的整体状态,那就是社会还在运行,人民还在生活——毋宁说日常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即便是“文革”政治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其社会生活的底部仍有涌动的潜流。如1967年初“一月夺权”的时候,上海市面上在抢购煤球和手表、缝纫机等高档商品(伴随着“经济主义”);7月份在抢购煤球和大米(伴随着“全国武斗”);10月份在抢购毛巾(因不要布票);至年底,则出现了抢购香烟、火柴、肥皂等小商品的风潮。如此将1967年的历史揭示开来,再叠加起来,大致可复原“文革”运动的整体面相。所以,在强调“文革”史研究“政治运动的向度”的同时,再引申出

“文革”史研究的“社会生活的向度”，就是认定应拓展“文革”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或者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座；或者用研究的视角扫描社会活动的扇面，由此从深度和广度激活整个“文革”记忆，就不仅使“文革”研究具有政治运动的骨架，更有社会生活的血肉。

同时坦率地说，当下“文革”史研究“政治运动的向度”不宜展开的客观情势，也是主张推进“社会生活的向度”的机缘。因之，顺应这样的思路和判断，还可有“文革”经济史、教育史、新闻史、外交史、文化艺术史、体育运动史等诸方面可能和可行的路径。应该指出，这些方面均属于“文革”史的组成部分，它们不同于“文革”政治运动，却又与“文革”政治运动相关。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从“文革”政治运动看社会生活；又从“文革”社会生活看政治运动，便构成两个“向度”之间的颇有意味的互动。

这其中大致有三类情况：第一类、第二类属程度不同的“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如“文革”政治运动中的“破四旧”、“大串联”、“三忠于”、“上山下乡”等，是全面进入了、搅动了市民的社会生活；再如“反击经济主义”、“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是部分牵连了、冲击了市民的社会生活；反之，则可解析这些“文革”社会生活的境况和断面，即通过千家万户的经历、遭际和心态等，折射出属于政治运动的性质、规模、政策演变等种种密码和信息。第三类属“潜在关联”，那就是单纯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基本不与市民的社会生活发生干系，但其进行过程中却有点滴的事实可划归于社会生活，如“上红总部”被造反派冲击解散时，发现其囤积的大量面包正在发生霉变；上海“安亭事件”时，市委向现场运送了一车的医药用品；“八四事件”时，居住在工农新村的联司家属呼天抢地，小孩子则一股股地在包围圈外袭击工总司等。这些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捕捉到的局部和细

节,正可丰富人们对“文革”政治事件的记述和认识。

由此,上海“文革”史研究的“社会生活的向度”,就在内容构架上向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宽泛地属于“文革”政治运动的范畴,但不关涉“文革”政治事件和人物,却又直接进入和影响家家户户的生活,例如破“四旧”、抄家、“大串联”、收集和交换毛主席像章、红卫兵报刊和宣传品、文艺小分队、家庭“大批判学习班”、马路“大批判专栏”、无政府主义思潮与“逍遥派”(所谓“路线斗争与线路斗争”,即男生装无线电,女生织毛衣等)、学唱“样板戏”、“三忠于”活动(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群众专政、打击流飞活动、上山下乡、“深挖洞”、“拉练”、学工学农学军、偷书与地下学习、“向阳院”、追查谣言、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时的社会反应等。

第二,不直接与“文革”政治运动相关,属于“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以“衣食住行”为中心),例如人口构成与变化(总人口、总户数、人口自然变动、机械变动、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婚姻(婚姻管理、仪式、结婚、离婚等)、计划生育、社会两性关系、职业与收入、物价与票证、城市管理(市容、道路、绿化、防汛等)、衣(服装的种类与价格等)、食(粮油、猪肉、禽蛋、水产、蔬菜、水果、烟酒的供应与价格等)、住(住宅建设、分配、租借、调换等)、行(铁路、航运、公交等)、用(各类生活用品的设计和品牌,供应和价格等)、商业(市场供应与服务等)、医疗(疾病与治疗、疫情等)、公用事业(水、电、煤等)、事故(交通、火灾等)、群众体育与文艺、广播电影节目等。

应该说,这两部分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其中第一部分的内容属“线性的联结”,即从“破四旧”开始到“毛泽东逝世时的社会反应”结束,基本顺沿着十年“文革”的路径演进。第二部分的内容属“点状的散布”,即从人口变化、城市管理到衣食住行、物价票证,均在“文革”

十年的平面上铺展着。正是这“线性的联结”和“点状的散布”的交错,立体型地展示了“文革”时期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社会行为,小到生活细节),以致从“生活—生存”、“个人—集体”、“家庭—社会”、“社会—角色”、“大众—心理—行为”等诸角度,一方面还原那个时代的生活本相,留下一部可信的文字记录;二方面揭示导致和构成那个时代生活的内在动因(经济、文化、物质生产和流动、社会风尚和习俗、人际交往和沟通等),力图补充和丰富“文革”研究,使之成为“文革”研究的有机构成。

何况,上海城市史研究已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且成果斐然。但研究成果多集中于 20 世纪前半段,这就反衬出建国以后上海城市史研究的欠缺和困惑。尽管其间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问题,上海城市史研究不断向建国后延伸则是不容置疑的趋动。尤其落实于“文革”时期——凸显上海的重要地位和典型价值,如中国最大的城市,其经济、商业、文化的影响及“全国保上海”;中国唯一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地方与上海人的特征等——正是以此为立足,本课题凭借上海“文革”为时空坐标,以“社会生活史”为铺展内容,力争为当代上海城市史和“文革”区域史研究树立一个范例。

四、“文革”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范式”

“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其总的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如大抄家、大串联、大武斗、大批判等等,以致正常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失措了。然而,事实和问题总是复杂的(“文革”研究呈现简单化的取向,却是今天令人担忧的“事实和问题”),那就是即便处在运动高潮的激荡和颠簸中,人们的生活还得进行,甚至还得筹谋着、掂掇着进行,所以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还包括两个层次的

“正常”态——

第一,称之为“顺应之中的正常”,即顺应着“非常”而产生的“正常”。此时的“正常”或许是维系必需的生活状态;或许是“非常”行动之后的归整,以致它是附着于“非常”的,它是“非常”的调节机能的显示和表达。然而,此时的“正常”因为处在“非常”的布置之中,便又会在“正常”的运作中出现“扭曲的非常”。这种“顺应之中的正常”和“正常中的扭曲”是无奈的、滑稽的、普泛的。现在可看本课题研究中的例证:

例如:从人口统计方面看,自 1967 年起,上海市区的总人口就呈现一路减少的态势,10 年间共减少 86.85 万人,这主要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所致。与此同时,上海总户数的统计却呈现增高的走势,即 10 年共增多 36.33 万户。这说明“文革”动荡中,群众的日常生活(包括迁移分户、结婚立户)总是在平稳进行着的,群众对日常生活的追求也总是不懈的。这种交错勾勒出了一条正常的曲线。同时,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登记数据为 279 365 对,尤其处于造反派夺权、武斗、大批判等沸反盈天的 1967—1969 年,结婚登记数为 91 958 对,达 32.9%。这说明时局动荡并不真正对市民的生活构成胁迫,社会上的谈情说爱和匹配良缘仍在大街小巷生动而活跃地开展着。反之,考察上海 1966—1976 年的总离婚登记数只有 6 489 对,即偌大个千百万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天的离婚人数还不到 2 对。这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一座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以致婚姻出现了裂痕,却害怕被插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前途,而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但事实上的婚姻裂痕,并没有因为当事人的忍耐而抹平;恰恰是这种忍耐,使当事人的意志和情感受到了更深重的压抑,只得慢慢地通过扭曲自我、磨损自我、熄灭自我,走向情感的枯萎和死寂。

例如：“文革”十年间，上海的面粉年销售量平均达到337 497吨，最高年份为1973年的392 905吨；最低年份为1970年的259 290吨。这是因为国务院决定利用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上升（1吨大米可换2吨小麦）的有利时机，以出养进，增加粮源。这证实即便在“文革”运动的非常时期，作为国家管理的职责和功能仍在运行。所以鼓励城市居民多“吃面粉”，应该是相当正常的举措。以致当时上海的许多家庭学会了擀面条（菜汤烂糊面）、蒸馒头等家务活，摊面饼、下面疙瘩等则成了家常便饭。然而，值得追问的是：明明是正常的社会供需，为什么偏偏还要在宣传中强调多“吃面粉”，是“支持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了世界革命”？如此夸张的推演，再加上宣布“严防敌人趁机造谣破坏”，必须“揭露和打击他们的各种阴谋活动”的严厉儆戒——恰是这一软一硬的两手，将意义的鼓吹和行动的惩治串联起来了。在此，固然是“文革”运动“政治至上”、“路线至上”的意识形态的牵引，但以非常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体系，为正常的“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涂抹一层大红的色彩，不啻是非常的荒诞和悲哀。

例如：“文革”时期，上海曾浇铸过三尊毛泽东金属塑像。同时，在同济、复旦、华师大、水产学院等校园里构筑了数座钢筋混凝土塑像。显然，这是“文革”非常形势的需要和造就，以致民间的情感正是通过对物质材料的雕塑，并倾注、凝聚于其中，而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支柱。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个相关制造组织为攀比炫耀，竟然相互封锁关键技术；而在以建筑为专长同济大学，却因排拒专家权威，发生设计失误，导致在建的塑像轰然垮塌的事故。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基层单位的派别冲突，竟然围绕着“为毛主席塑像”的事项，而展开激烈的争斗。如华东化工学院的一派别，9个月不去对立派在大草坪上建筑的毛泽东塑像前请示、开会。至于造像过程

中,违反财务纪律,动用军需物资,挪用专项经费,更是比比皆是。这说明在一片歌颂声中,“为领袖塑像”的行为和主题,尽管不失外在的“神圣”,内质里却已经渐渐地被标签化,甚至被工具化了。

第二,称之为“应对之中的正常”,即应对着“非常”而产生的“正常”。此时的“正常”或许是变通地保持着一种状态;或许是借助于“非常”的机缘,以致它是拉扯着“非常”的,它是“非常”的制造功能的扩展和延伸。然而,此时的“正常”因为处在“非常”的裹挟之中,便又会在“正常”的处置中出现“妄为的非常”。这种“应对之中的正常”和“正常中的妄为”是张狂的、狡猾的、特别的。现在再看本课题研究中的例证:

例如:大串联是全国在校大、中学师生因“革命”而有资格、有机会“乘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称“三免费”),在以北京为轴心、以各大省会城市为连贯的天南地北间奔走呼号,可谓“文革”运动爆发以来的第一个泼天大祸。当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通知》,全部大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十人推选一人)可进京串联,上海核准的“正式代表”约十万人左右,铁道部共增开了“北京—上海”列车7对。正是这种非常的社会运动,引发了大批“非正式代表”的上访请求,以至频频出现“非正式代表”围堵“正式代表”,甚至以“非常”为“正常”,即通过“买短途票不下车”(软性)和“冲击车站、拦车、扒车”(硬性)等手段达到外出的目的。而当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暂缓外出串联时,则有不少学生或途中签票,或越站乘车,甚至互换车票,反相乘车,将串联进行到底。如果说大串联初期,确有许多红卫兵抄大字报,集传单,开座谈会,真正是革命的样子,那么,前后不过三个多月,周游大地、探访亲友者已不是少数,甚至部分赶在最后的日程里回家的串联师生,带着照相机,背着土特产,有的从三峡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革命的红卫兵变成了潇洒的旅

游者。

例如：据报道：1966年8月，上海毛泽东像章的生产量为18万枚，至10月，月生产量猛增为1000万枚。由“文化大革命”掀起起来的对领袖的爱戴和效忠，使佩戴毛泽东像章成为一种新的审美“时尚”。同时，在上海南京路黄陂路口、北站、提篮桥等地，则迅速生成颇具规模的交换市场，不仅影响交通，还孕育出了买卖或变相买卖。其实，存在于毛泽东像章交换中的牟利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有挪用生产原料的贪污盗窃，其数量动辄达上千公斤铝皮甚至牵涉机床、马达等物资交易；有买进卖出的投机倒把，其行程遍及全国甚至飞机来来往往；有纠合人员的地下生产，其规模分列各类车间甚至形成流水线生产等。同样，上海“文革”中的“宣传品”和群众报刊，也出现大量的地下印制和地下交易，甚至巴金的家都被一地下编辑部占有着。在此，与其说利润的诱惑是炫目的，不如说是原初的和现实的。其中既有商业的意识，又有取巧的心机，还不失狡黠的判断和决策，而革命的名义反而成为一种包装和掩饰。

例如：考察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因计划经济“全国保上海”的运作，即便在“物资短缺”的情势下，总体上仍保持着正常的水平和状态，且在经营管理方面，标树“为革命而卖菜”之类的口号，实际上是沿用着“文革”运动前强调“优质服务”的套路和模式，只是其支持系统的政治符号和政治指向（目的）不一样了。然而，伴随着的问题是：在“文革”“阶级斗争”利剑的高悬下；在“文革”“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符咒的念叨下，谁能知道在关系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的背后，竟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通风报信”、“代购紧缺品”等“开后门”现象和“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等贪污盗窃活动。这证实非常的“革命”，也不能阻止一部分人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答这种冒犯，更不能

解决这种冒犯,因为这种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达。

综上所述,不管是非常中的正常(顺应与应对),还是正常中的非常(荒诞和张狂),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交汇和兼容,构筑了“文革”社会史的复杂面相和精彩题旨,以致它既说明了时代的错乱,如果这是在现象上揭举事实的话;那么,它又在本质上(长时段)证实了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立足在这个判断上,以非常与正常的交错关系,铺陈出一条可伸展的纽带,便能将“文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串联起来,建构起来,不仅成为一个有血肉、有灵魂的研究本体,更能从中看到血肉躯体之伸缩,读到灵魂归附之挣扎。

五、“文革”社会史研究的昭示和价值

比照“文革”运动史(政治史、事件史)的研究,“文革”社会史关涉人口、环境、习俗,集体心态,以及衣食住行等内容,在视域方面因落实底层而更宽泛;因观测直接而更真实。所以,在完成《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并求得结论的时候,深感有些观点是值得展示和绍介的,列举如下。

第一,十年“文革”的“危难局面”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同样也表现在社会层面。^[8]由此可见人民群众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联系自身的现实生活,不仅在行为上存在着一条因背离而岔开的路径,还在思想上存在着一条不断思考和觉悟的线索。展示这条路径,揭橥这条线索,便进一步可见人民群众的求“真”、求“善”、求“美”,具有不可遏止的生命力。比如破“四旧”时有人机智保护文物;大串联中上海学生在外借款 400 余万元,后偿还率达 80%;黄军装、红袖章式的崇“武”的审美,至“文革”中后期已演变出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还有所谓逍遥派、地下读书,甚或“追查谣言”、“流飞活动”、“青少年

犯罪”等内容，均从不同的侧面昭示“四人帮”的政治路线不得人心，阐明了为什么至“文革”中后期民怨沸腾，“四人帮”必然走向灭亡的缘由。

第二，开展“文革”社会史研究，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就是将“文革”政治运动与国民经济生产、与社会管理（计划生育、爱国卫生、环境保护、备战备荒）、与日常生活（工资、物价、开销以及婚姻、疾患）等区分开来进行专题的关注——于是，往下看，可看到普通的百姓生活；往上看，则可看到“国家管理”的“在位”。比如上海“文革”期间的粮油主管部门，不仅承担票证记数、发放、转移等常规工作，还组织小分队下里弄举办展览会、学习班，号召“战备储粮”；还深入到车站、码头、港口等交通要道，严加查处粮食外流。粮油主管部门的此类行动，并非纯粹的业务性质，而是带有鲜明的“文革”运动的色彩和印记，代表着“国家管理”的意志，行使着“国家管理”的职权。同时，考查上海“文革”时期的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一方面，“全国保上海”，各地的农副产品源源调进；二方面，上海的轻纺、轻工产品源源调出，呈现出计划经济统筹和运作的状态，且属“文革”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均可在理论上确认：尽管“文革”动乱，但“国家管理”依然“在位”。

第三，关注上海“文革”时期人民生活（衣食住行）的收入与消费，必然会在计量和购买方式上，牵涉到“计划经济”与“票证时代”的关系。其实，所谓“票证时代”，是指按户籍人口，凭“票证”供应物品的政策，其时间跨度为 5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据统计：在上海有持续存在 38 年（1955 年至 1993 年）的粮票流通史；有接续存在 37 年（1955 年至 1992 年）的猪肉票证史和 26 年（1959 年至 1985 年）的水产品票证史，从而在整体上确证了“物资短缺”和“供应紧张”的事实。但研究同时证实，包括“文革”十年时期，上海的粮油价格，猪肉、水产

品等副食品价格,即便在收购价提高的情况下,仍维持统销价(发生的政策性亏损,概由财政补贴,如上海粮油商业的政策性亏损达61 188万元),以保证市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则可见“文革”十年间上海市民食品类的支出总额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从1966年的56.1%到1976年的50.5%,只小幅度地下降了5.6%。这说明社会经济状况,尤其表现在民生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和进步(以1985年食品类支出占总额的37.0%为参照,可知相比于1966年,其构成比例下降了19.1%。说明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真正是横跨了两个时代)。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文革”期间的上海市民生活,既没有经受灾害,也没有享受富裕,在总体“物资短缺”的前提下,在“低工资—低物价”的构造中,在“收入—消费”平衡中,年复一年,基本保持了低水平的“温饱型”重复。

第四,“文革”运动初期,毛泽东所作的“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的“五七指示”,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工农兵学商”的联合体,描绘了一幅全民共进的理想蓝图。由此,将“文革”社会史(含“文革”教育史)中的“复课闹革命”、“街头大批判”、“学工学农”、“开门办学”、“赤脚医生”、“七二一工人大学”、“野营拉练”、“五七干校”、“向阳院”等内容串通起来,便可认为在“文革”运动史的整体框架内,还生存着一条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为主轴的进路(至于这条进路的特征和性质,则另作评论)。尽管这条进路在“文革”初期就萌生了,尽管这条进路不断地处于中辍和接续的起伏中,尽管这条进路曾努力地寻求着粗壮的时运和伸展的空间,但它终究没有随着“文革”运动的开展而显露其美好设想的塑形,反而被“文革”政治运动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遮掩着、挤压着,因不得发育而显得苍白和细弱;因被搁置而成为景观和寄托。相比之下,又可见“文革”政治运动的指向是偏重于批判的,而围绕着“五七指示”的这一进路则是侧重于树

立的——偏重之中的侧重；批判之下的树立——恰是在这一点上，两者又纠合在一起了。

在此，从“文革”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胪列四个方面的内容和线索，既是通过对材料爬梳整合的感悟，还应构成一种发现和思路。因为从思想上揭示人民群众面对“文革”动荡，存在着一条求“真”、求“善”、求“美”和不断思考、觉悟的线索；从政治上确立伴随着“文革”运动，存在着一条以“五七指示”为蓝图，以建立“工农商学兵”联合体为目标的进路；从经济上判断“国家管理”在意志上、职能上和运作上的“在位”，以及对“文革”十年间上海市民的生活水平，作出“温饱型”重复的定性分析等，均是对“文革”整体史研究的抵补和丰满。正是以此为基准，将“文革”史研究校对在一个平稳的坐标系中，才能汇聚各个象限反馈的信息，才能对“文革”研究中层见叠出的问题，作出准确而透辟的回答。

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革”，因堪称“史无前例”，而构成百年之中国，乃至百年之世界的公共话题。然而，展开“文革”研究却需要大勇的开拓者和大智的探索者，扪心自问，若能忝列其中，便为学术生命至高之价值，学术追求至大之职责和荣耀。

以为自勉。

注 释

- [1] 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95 页。
- [2] 据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见《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96 页记：1966 年初夏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当即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中国季刊》、《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等学术刊物在两三个月内就开始讨论“文革”问题。美国智库机构兰德

公司反应也很快,它的社会科学部的成员和顾问在 1966 年夏末就开始系统地研究“文革”。

- [3] 如有学者认为“文革”是一场“反官僚运动”,见《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 2008 年 4 月版,第 9 页。甚至“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大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净化人性、完善人性的新伦理和新文化的教育运动”。见 2009 年第 1 期,《记忆》网络版,《2008 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 [4] “文革”运动具有一整套“意识形态革命”的理论,如“阶级斗争”、“防修反修”、“第三个顶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
- [5] 据了解,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的曹树基教授、复旦大学的冯筱才教授、张伟然教授、上海社科院的承载研究员、吴建熙副研究员等,均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经费,利用各种机缘,启动各种关系,打通各种关节,在基层,在民间,成规模地收集着原生态的档案文献。笔者的工作经历也证实,留存的“文革”史料不仅数量大,而且成系统,关键在于付出心血去发现和搜求。
- [6] 1976 年 5 月 3 日,张春桥就“写走资派”问题发表意见时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曲折,南京才有意思呢。南京比上海可写的东西多,你们写走资派,不要就写上海的,可以到其他几个省市去跑跑,多了解一些情况。见 1977 年 1 月,《“四人帮”反党集团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摘编》,第 15 页。
- [7] 1966 年 11 月的“康平路事件”和 1967 年 8 月的“踏平联司事件”,均是工人造反派以“围剿”的战术,一举歼灭对立派,并迅速将为首者扭送至公安局。专政机关直接地介入,构成强大的政治威势和压迫,对立派便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以致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独占天下,没有发生两大派的“军械性武斗”。
- [8]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伟业,盖因“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

后记

心心念念

——写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 时期的社会生活》交稿后

金大陆

人生会有意外，更多的则是平常和实在。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以为前一句是智慧的支撑，表面上讲的是意念（或者是意念的寄托），实际上是在讲襟怀；后一句是事理的叮嘱，不仅是讲“事”，更是在讲“人”。故而，自我检视六十年累累的足迹，时常自问自答两个问题：

第一，如果迄今没有机缘承载文革史研究的使命，未来的路途便不会完全浸沉在学术之中了。因为在我的知识构架和学术视野中，已没有什么研究选项可以类比文革史研究，值得我以整个生命去托付、去追求了。

第二，如果以迄今的综合状况为人生坐标聚合点，无条件地回溯到生命的起始点，即让生命伴随着六十年的风起云涌和时空嬗变，整个儿地再来一遍，其中包括六七十年代所有遭遇的切肤之痛和覆盆之冤（当然，家人的劫难是必须排除的），只要是能够到达今天的位置，并能够在这个位置上从事文革史研究，我都是甘心情愿的。因为艰辛和苦难早已烟消云散，而其间的人情和天数（运道）却是不可忘

却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就是以自我标树的崇高感充溢胸怀，来承担自我认定的崇高的使命。在此，之所以强调“自我”，是自我设定了一个限制，那就是我深深地意识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危险所在——因为“理想”，因为“理想崇高”而强加于人！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己所欲”，亦应“勿施于人”。认定这个限制，对我保持独立而谦谨的态度从事文革史研究，或许是有儆戒作用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中学生，却不是一个红卫兵。缘由不是没有信念和激情，是没有身份和资格。信念和激情是内在的冲动，身份和资格是外在的羁绊。一般情况下，对我们此类“黑五类”（或隐性“黑五类”）子女，羁绊可以制约行为，却不能征服心灵——殊不知，心灵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向往之，甚至是信服之的。何况，我居住在江湾五角场，那儿聚集着复旦、同济、二军大、上柴厂、空四军等单位。地理上的方便，使我以一颗“向往之”、“信服之”的少年之心，常年流连于以复旦校园（称为“上海文革的风向标”）为中心的这块上海“文革”要地。所以，在整个“文革”运动中，我不是参与者，却是观察者；不是行动者，却是思想者。

检索“文革”中的思想轨迹，应该承认，我们这代人在“文革”前就曾受到《九评》的感召（包括文风）。“文革”时期，所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修正主义就在身边”、“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资产阶级夺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系列的理论，不仅阐述周密，推断严整，其革命性、创造性的品质充满着激扬和诱惑。毋庸讳言，我曾虔诚地一身单衣在天寒地冻中三次见到了毛主席；我曾崇敬地将“旗手”江青的画像剪贴在随身带的记事本上；至

今还留有十多本“文革”创作的札记作为“抽屉文本”躺在那儿呢。

大概与多数“文革”亲历者的思想动态相近，中共“九大”的召开确实给人“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振奋和期待。然而，正是林彪案的轰然爆炸，如同天际崩塌了一片，使人怔忡惶怖，大惊失色（我是在一个冷风嗖嗖的深夜，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我几乎不能自持，浑身哆嗦着走回家去。记得那天夜色低矮，走进弄堂，自己的脚步声从两边的墙上反弹回来，像似有人在追击我）。冷静以后，再造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指认的“形‘左’而实右”等批判，非但不能折服我，反而使我对高层政治产生严重的恐慌，对“文革”运动产生强烈的质疑，甚至还包括十分幼稚地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产生深深的忧虑。其实，这不只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而是整个思维方向发生了扭转。从此，尽管对“文革”运动的思考仍然有种种的彷徨和困惑，但一条反正的指向却在内心中日渐清晰起来。记得我对批林批孔、评《水浒》等都有了独立的看法，不见得高明，却不再像先前那样呼应主流意识形态了；记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正在一所学校代课，在全校师生按照统一口径，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5 3 2 1 — | 1.2 33 2.3 21 | 6 2 6 5 — |）的时候，我回身离开了会场；记得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时，我和朋友彻夜未眠，人在上海，心早已飞向了北京……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在心田里播下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以后，近二十年的学习、教书、研究，始终怀揣着这颗种子，温暖着它，孕育着它，催促着它早日萌芽。但内心中的“不二”却因上不着天（气候），下不着地（土壤），使出浑身解数，就如同跟空气打拳一样，无法落脚与着力，以致我很长时间只得侧身行进，即以“老三届”一代

人的“生命历程”为研究的重点(主要成果有《苦难与风流》和《世运与命运》)。有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创见的“切口”,因为“老三届人”经历十七年教育、“文革”运动(知青)和改革开放,描述其“生命历程”,就是将两个时代联通起来,便可“看它们之间的关系,看它们之间的转折,看它们之间的是非功过和历史分野”。确实,这属于青年运动史范畴中的有意味的选题,但与我直面“文革”研究的志趣仍然相去甚远。我信奉“不放弃”、“不等待”、“不奢望”的态度,默默地在外围筹谋着、行动着、坚持着。

真是天道酬勤(成事在天,天赐良机)!1996年,一个人事变动的故事所产生的腾挪空间,使我砰的撞开了“文革”史研究的大门,并径直走进了它的深处。又是近十年,我像苦力一样地穿着厚衣,戴着口罩在野猫下仔的库房里爬梳;像民工一样地一手拎着布包,一手握着面饼在大街小巷奔波。当然,也有车辆来回接送,端坐在空调房里查阅;也有发动一群学生志愿者帮助抄录的“美好日子”。直至我正式调进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专题从事“文革”史研究。眼看着收集了满满一屋子的“文革”史料(什么时候可以设立“文革博物馆”呢),感觉着那颗心田中的种子已茁壮成长为可倚靠的树干,人生的满足和畅快,还有什么比心中的意愿“在对象化中显现了”更重要呢!所以,我常年怀着一颗感念之心,对用各种方式(或关照、或扶持;或引见、或推举;或放行、或接纳)直接、间接成全我心志的领导、朋友深深地鞠躬——他们是复旦大学的程天权教授、谢遐龄教授、姚大力教授;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研究员、程兆奇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映芳教授;共青团上海市委的王仲伟书记、陈靖书记、马春雷书记和陈永弟书记、王敏书记。还有长期支持我研究的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潘世伟教授、上海社联党组书记沈国明研究员,上海党史研究室的徐建刚副主任,以及中国

社科院社会学所单光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长征等的一些朋友们。

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我的研究如鱼得水，这本《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就是所属系列课题之一。芮传明、虞万里、钱杭、宋钻友、马军、马学强、王维江、王敏、陈磊、沈志明等同事给予多方帮助。按照一般程序，历史研究的首要的是开掘、整理资料（此前，编纂《上海“文革”日志》和若干《年谱》的工作已进行数年了），继而是撰写政治史、运动史之类的篇章，而后才是展开社会史、生活史之类的研究。现在，因为政治的原因不太方便，便倒转着将“文革”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提前了。现在看来，这个“提前”不仅可行，甚至还能收到意料之外的效果。那就是基于“文革政治运动”与“文革社会生活”实质上不可剥离的理论前提，虽然该项研究暂时回避了“文革政治运动”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却因展示了“文革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尤其是将民生和民情、民心和民意的内容剖析出来，便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完善了对“文革政治运动”的理解。例如在有关的章节中，我们可见“大串联”时，上海的有序管理和居民阿姨的深情厚谊；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武斗”时，多数上海市民敢怒不敢言，却也时时有大胆者围堵北京红卫兵；上海“一月革命”夺权时，地下市场的投机倒把，包括对毛主席像章的倒卖照样猖獗；红卫兵“破四旧”刚刚过去半年，上海的流氓阿飞就已经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拉练”军事训练时，上海城里的中学生兴奋无比，将其演变成一场趣味无穷的郊游……再例如在有待撰写的章节中，我们可见两派“路线斗争”激烈对峙时，逍遥派的“线路斗争”（男生装无线电，女生结毛线）依然十分精彩；“三忠于”活动时，“早请示、晚汇报”的一脸虔诚，很快就在一些场合流于滑稽，乃至私下的抱怨；在整个社会突出“阶级斗争”为圭臬的“性禁忌”的氛围中，包括上海工总司内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文革”是“全国运动看上海；上海运动看工人；工人运动

看工总司”）、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后，都存在相当严重的“性骚扰”和“性侵犯”，至于基层社会出于或政治、或经济为目的的“性交易”，公共社会流行的“搓拉三”（北京称“拍婆子”）等“歪风邪气”，更是构成了消解性的反弹……还有关于上海社会“衣食住行”的研究，证实“文革”十年间，在“物资总量短缺”的情况下，粮食不涨价、猪肉不凭票，市民生活在一种“低工资—低物价”的构造中，在“收入—消费”的平衡中，年复一年，基本保持了低水平的“温饱型”重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充实着“文革”研究的整体框架和总体内容。正是有了这样立体的视域，或者说在“文革”社会史的底衬中，关于“文革”运动史的研究怎能不丰厚起来，圆满起来，怎能不产生新的研究旨趣，收获新的研究价值呢。

确实，这是上海“文革”社会史研究的第一部（上、下），接着还有第二部（上、下），那就是继续以“非常与正常”的理论“范式”（“非常时代中有正常的生活；正常生活中又有非常的荒诞与难堪”）为主导，其基本构架应该是“文革”十年间上海的行政区划与权力机构、职业与收入、城市环境（市容、道路、绿化、防汛等）、城市交通（公交、铁路、航运、航空等）、住宅建设（新建、修旧、分配、租借、调换等）、公用事业（水、电、煤等）、医疗卫生（体制、疾病、疫情等）、商业服务（市场、供应、价格等）、群众体育活动、广播电视电影节目等；以及宽泛地属于“文革”运动的范畴，却又进入和影响市民生活的内容，如抄家、破“四旧”、家庭“大批判学习班”、马路“大批判专栏”、文艺小分队、无政府主义思潮与“逍遥派”、学唱“样板戏”、“三忠于”活动、工农兵大学生、“性禁忌”与社会两性关系、群众专政与打击流飞活动、偷书与地下学习、“向阳院”、追查谣言、救援唐山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时的社会反应等。

坦白说，“文革”运动史的研究多以事件和人物为坐标，多以形势

和过程为曲线,时序紧凑,因果清晰,便于集中史料,进行突破性地梳理;“文革”社会史的研究则或以一种社会现象、或以一种社会境况、或以一种社会群体、或以一种社会心理为中心,边际宽泛,关系模糊,事由之间的反差和弹性难以把握,这便对搜罗和剖析资料,聚焦和设定议题提出较高的要求。所以,比较而言,从事“文革”社会史研究,难度更大、时效更慢,似乎在学术价值的权重上和市场阅读的精彩度上也有所欠缺(有些朋友如此评说)。我承认它的难度,却不认同它的所谓“欠缺”。既然已翻山越岭至半途,我是“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的。因为我相信,中国文革史研究终究要在整体上进入社会史的领域。我能尝试着在这片处女地上开犁,是时世赋予的一种责任和光荣(只是,我承认在社会史研究方面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导致《日志》和几项《年谱》的编撰工作有所延迟,而时时有所焦虑)。

说到焦虑,我坦言甚至时时计数着心中的“愿景”(这是近年来,中国台湾人带给大陆人的一个美好的说法)与生命大限之间的关联。说实话,我并不害怕生命大限的降临,我害怕的是心中的“愿景”成为海市蜃楼,只在水面上漂浮、幻化,而不在陆地上奠基、构筑——因为我的“愿景”中除了前述提及的《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研究》、《上海文革日志》、《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等,还有《中国文革漫画史》(我收藏了近五千幅文革漫画)、《后期红卫兵研究》、《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遭际与心态》等专题(我不敢将长卷本的《上海文革通史》纳入计划,只能全力地将《日志》、《年谱》等编撰得详尽周至,并及时地以点评的方式表达思考和见解)。就这一代人来说,我是比较自觉比较早地进入“文革”研究的。此后,机缘巧合又成全了我对资料的把握。在我的心中,与其说将这个“把握”看成是辛劳的成果,不如说更看做是人缘和天意的“成全”。人缘之深厚,我必怀报答之情;天意之高远,我必怀敬畏之心。所以,我时刻不能疏失,不能懈怠,自始至终要将生命

的指针校对在心中“愿景”的刻度上。

我曾在《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一文中，提及“亲历者”研究的问题，即“亲历过‘文革’运动的研究人员”的研究——不是回忆录，不是口述史，而是认真的研究论著，应是不可或缺的。一般而言，历史时期沉积得久远，功过纠缠松懈了，是非纠葛淡化了，便于后人在一个宽敞的境况里作出评判。但当今时代的交通、通讯及传媒高度发达，以致时空紧密压缩，其质量（信息含量）大大超越过往，就不是原本意义的“历史时期”可以比拟的。何况，“文革”运动已过去四十多年，特别重要的是其间发生了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正是从这个历史性的“折断”处渗透出种种消息的源头，伸展出种种追寻的线索，怎能不让“亲历者”有所触动，有所感悟，而跃跃欲试地要去剥离它，探究它呢。

固然，“文革”亲历研究者的思考和视野会有局限，客观上可能是由于史料禁闭，无用武之地；主观上则可能因身陷其中，会一定程度地丧失客观性。但不可否认亲历“文革”的研究者们在情势和场景上的体尝；在细节和心态上的感悟，正是年轻学人们（非亲历“文革”的研究者）不可企及的，尤其表现在“文革”社会史方面，因其主题和内容具有很开阔的扩散面，若是有大量亲历的故事、经验和感知充实其间，便能丰富和提升整个研究的质量。正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文革”亲历研究者的工作不仅是难以替代的，还值得吸引、鼓励更多的人来参与。

其实，在当下从事“文革”史研究需要有“承担”和“奉献”的精神准备，这并非因为研究主题的复杂和烦难，关键在于如资料、发表等种种外在的因素（内在因素是“政治敏感”），与学术机构中如考核、升职等种种规章不可通融，以致形成掣肘和障碍。但这种局面如何改变呢？等待不是出路，坐观更没有出息。我以为只要胸无宿物，不为

功名所累,同时坚持“史料为本”、“学术至上”的原则(不是随风漂浮。坚信只有学术才是真实的和有力量的),具体操持时既大胆又小心,揆情度理,握筹画布,在大的方向上,相信心志的正大,相信志业的高远,相信处处会有担待之人,相信路途越走越宽。在小的进入处,智慧地回避高层政治的锋芒(因为我以为现时根本做不出第一流关涉“高层政治”的成果,现时的路径只能是多方面地积累资料),多从“文革”区域史研究着眼,多从“文革”专题史研究(如“文革”生活史、教育史、新闻史、医疗史、体育运动史、文化艺术史等)着手。总之,尽量缩小研究选题的视域,并使之游走在“高层政治”的边缘,这是因为中国“文革”史研究正处在“待分娩”、“待剥离”的状态中,于是,从边缘合围中心;以学术切割政治,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当然,这是我的经验和想法,说出来是供参考,不是为推及他人。但作为一个亲历“文革”的研究者,除了坚持自身的研究外,怎么样才能为未来的后人们的研究提供积累和帮助呢?那就是不在乎自我的成果是多一本,还是少一本;而在乎现在的工作能否在往后适宜的时机,带动起一个学术团队昂然崛起。具体而言,就是能否大批、成套、分专题地为后人编选整理出《文革研究史料选》(不是现成的“文革社论”、“首长讲话”之类,是我称之“深部细部”的史料,如《复旦大学“文革”大字报选》、《上海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研究史料选》等)——我甚至认为这在我未来的学术生涯中,是一桩更值得倾心投入的重大使命——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心念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一拍即合,达到高度的认同,并得到双方单位的支持。眼下,我正协助金光耀教授在复旦历史学系建立一个“文革”研究资料库(复本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并联手召开学术讨论会(如“历史事件与集体记忆”国际研讨会等)、联手出版书刊(如《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等)、联手口述访谈“文革”人物(自由撰稿人李逊参加)。光耀

教授对我说，个人著作沉浮很快，史料选本将永远为学生所用。兆奇研究员对我说，把所收集的一屋子史料分类选编出来，比你多写几本书都重要。正是在同道和朋友们的激励下，我思忖：即便因管理层方面政治的，或出版社方面经济的原因，该选题不能被出版社正式接受，那么自费编印 20 卷以上规模的《文革研究史料选》系列，无偿赠送给各高校、图书馆，也是甘心情愿，心满意足的事。

不知不觉，絮絮叨叨了这么许多，就如同蚕吐丝结茧一样，只顾倾吐心中种种的感念，直到把自己包裹在里面，等待蜕变。大概，我的以“文革”研究为志业的生命旅程，正进行在这个阶段上，接下来就是变成蛹，变成蛾；再接下来就是咬破茧，飞出茧，最后扇动着翅膀产下一大片一大片的卵，安然死去。冬去春来，大地苏醒，千万条蚕宝宝孵育而出——这不就是生命的轮回吗！但愿这种轮回能织出一幅幅灿烂的锦缎。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金大陆著

FEICHANGYUZHENGCHANG
SHANGHAIWENGESHIQIDE
SHEHUI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以丰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详尽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水产品供应、群众报刊、毛泽东塑像、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本书没有把对“文革”的研究停留在宏观的政治层面，而是把视野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层，使“文革”的研究不仅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本书内容详细准确，观点鲜明，在细致的传叙中，还有一些中肯的分析和评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金大陆，1949年12月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多年来从事青年运动史研究，侧重于上海红卫兵运动史、知青运动史和“文革”社会史方向，以及“文革”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主编《上海青年志》。主持《上海文革资料留存和分布情况调查研究》、《上海知青运动大事记》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项目。在《读书》、《社会科学》、《史林》、《青年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上百篇，主要著述有《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世运与命运——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等。

上架建议：历史·社会

ISBN 978-7-5326-3284-8

9 787532 632848 >

定价：88.00元

www.cishu.com.cn

易文网：www.ewen.cc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下

作者:金大陆著

页数:459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5

简介:本书是《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之一。本书作者选取1966-1976年的人口状况作为研究的切入口，是为了承担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整体研究，以求深入地把握许多社会问题症结之所在的平台。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上海市-1966-1976

SS号:12788426

DX号:000007663645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63645&d=CDE13F715DF3BCED4DEA450C27333B31&fenlei=110308&sw=%B7%C7%B3%A3%D3%EB%D5%FD%B3%A3>